

太原大会战 1937

陶纯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章 山西这片土地.....	4
第一章 大战前夜	7
1、夹缝中求生存，阎锡山说：我不亡于共，便要亡于蒋	7
2、毛泽东早就看好了山西，彭雪枫被秘密派往太原	14
3、八路军 115 师率先进入山西	22
4、北方的庄稼熟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26
5、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那天便开始了	35
第二章 聚焦平型关.....	50
1、要么不打，要么就打出个样子来	50
2、林彪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之情	61
3、日军最精锐的第 5 师团开赴山西	66
4、临阵动摇，高桂滋说：当务之急，撤！	77
5、两军协同，马革裹尸是军人的光荣归宿	87
第三章 平型关大捷，让全体中国人扬眉吐气.....	92
1、林彪眼下的任务是打好平型关这一仗.....	92
2、弥漫的血腥气使人喘不过气来	99
3、有了八路军的感召，晋军也不是吃素的	114
4、在延安的毛泽东感到轻松多了	121
5、八路军撤了，晋绥军仍在坚守	127

6、阎锡山平型关下慌忙撤退，蒋介石回电安慰：继续杀敌，以争最后的胜利	134
第四章 忻口血战	141
1、卫立煌率中央军主力到达晋北	141
2、张培梅说：百川平时只知养羊，不知养虎	151
3、旅长姜玉贞壮烈殉国。阎锡山诗云：全区平原战最烈，三团只剩五百人	157
4、军长郝梦龄家书：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	164
5、实际上守忻口即是挽救山西危亡。忻口之战惨烈异常	177
第五章 守住娘子关，是忻口战役成败之关键	193
1、娘子关一战的前景难以乐观	193
2、娘子关前，赵寿山所部拼死抵抗	203
3、雪花山丢了，娘子关危险了	215
4、原有 3000 人的第 38 军教导团只剩下 100 多人	223
5、董其武受伤后叮嘱部下：不许声张，以影响军心	232
第六章 铭记忻口，铭记那些伤痛	243
1、中国军人血肉之躯，填满了忻口正面战场	243
2、八路军在阳明堡烧了日军 24 架飞机	254
3、川军开赴山西	266
4、部队大量伤亡，陈长捷没落一滴眼泪，他已经麻木了	273
5、娘子关失陷，太原危矣	288
第七章 强弩之末	301

1、大事不妙，阎锡山要把挑子全撂给傅作义和卫立煌	301
2、混乱的大撤退.....	308
3、傅作义孤军守太原.....	314
4、最后的抵抗	326
5、彭德怀说：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	333
尾章 叶落无声	338

序章 山西这片土地

华北平原的西面耸立着一块山脉环绕的高地——山西，它东以太行山毗连华北平原，南以中条山及黄河邻接河南省，北依外长城及阴山支系接壤察绥两省，西临吕梁山及黄河接境陕西省。山岳围绕，悬崖峭壁，宛如一大天然城郭。自古以来，被誉为“表里山河”的三晋一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无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权，如果得不到山西，在华北就很难站稳脚跟。

1911 年，在辛亥革命的隆隆枪炮声中，一个来自五台山脚下的 27 岁的年轻人乘机发迹并掌握了山西的政权，从此开始了他对山西长达 38 年之久的统治。他就是阎锡山。

那是一个不安分的年代，群雄并起，主义泛滥，灾祸不断，战争的轮子一遍又一遍地碾过古老中华的土地。1917 年，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时，阎锡山惊恐地说：“看吧，赤化全世界的大祸，快要来到中国了。”1925 年大革命以后，他又说：“国民党终究打不过共产党。”在山西，他写了《防共应先知共》的小册子，发至学校和机关，并亲编《防共歌》，让在民间流传；又编了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批评马克思“把失业恐慌、经济侵略战争的交易病误认为分配病”。

1930 年，羽翼渐丰的阎锡山联合另一军阀冯玉祥，同如日中天

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中原大战”。此战以冯、阎的失败而告终。冯玉祥从此一蹶不振。而一年多之后，阎锡山却起死回生，重回山西当上了土皇帝。为了加强统治，1935年，他领导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提出了人人必须遵守的信约：“我们的使命是主张公道”、“我们的任务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我们的途径是：民族革命的途径是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社会革命的途径是实现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我们的目的是造成公道森严富强文明的社会”——这不过是笼络人心的空话。他的日趋腐朽的统治只能使一切走向反面。他早已接受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德国与日本的军事化国民教育，认为明治维新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好榜样。他常赞不绝口地称道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的法西斯强盗政治为“飞机式的进步”。

而此时，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同山西一河之隔的陕北。这支代表中国最先进思想的队伍迎来了她改天换地的新曙光。

在欧洲，已显露出大战的迹象；在亚洲，太平洋上的岛国日本正加紧备战，其侵略魔爪已由中国东北伸向华北。《塘沽协定》的签订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组织出现之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承认了日本占有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五省，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整个华北已置于日军监视之下，为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此时此刻，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巨大威胁。

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整整 100 年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国度，不停地在血与火的汪洋中浮沉。而抗日战争，却激起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因此，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当日本人的铁骑席卷而来时，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注定有一场规模不小的战役，这便是抗战初期有名的太原会战……

第一章 大战前夜

1、夹缝中求生存，阎锡山说：我不亡于共，便要亡于蒋

在群山环绕的晋中盆地的北端，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太原。

太原，古称晋阳，简称并，是山西省省会，华北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它东傍太行山，西依吕梁山，东西两山对峙向北合拢环抱，汾河从北向南纵贯市区中心，形成南北狭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太原地势险要，资源丰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 497 年，自春秋以来数十个朝代，一直是北方的重镇，曾作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朝“霸府”、盛唐“北京”、五代要垒、宋元时的“锦绣太原城”、明清边城。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它又成了阎锡山的首府。

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处，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山峰——五台山。《水经注》载：“五台山其山五台巍然，故曰台。”又名五顶山，又名五峰山，又名清凉山。《华严经》上说：“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五台也。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名清凉。”五台，一为中台，又名翠岩峰；一为东台，又名望海峰；一为西台，又名挂月峰；一为南台，又名锦绣峰；一为北台，又名叶斗峰，为五台山主峰，也是华北最高的山峰，海拔 3058 米。自东汉以来，五台山就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圣地，它与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

佛教名山。

1883年10月8日，阎锡山出生在离五台山不远的五台县河边村文昌堡。环绕着风景秀丽的五台山，有一条在中国北方颇有名气的河流——滹沱河，滹沱河缓缓地流过文山脚下，与一条从西南方向湍湍而来的牧马河汇合了。就在这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坐落着一个近千户人家的大村庄，这便是河边村村名的来历。河边村的屋宇建筑，按地理形势和家族宗祠自然形成了18个堡子，而且名称各异。阎锡山出生在永昌堡，由于这个堡子里建有一座文昌阁，因而当地百姓习惯把它称为文昌堡。

阎锡山，字百川，号垒地，乳名叫万喜，人称“万喜子”。万喜子6岁时，他的母亲曲月清去世了，父亲阎书堂续娶了陈秀卿。但继母坚决不养万喜子，被扫地出门的他只好由外婆领去抚养。年幼的万喜子为此饱受了寄人篱下之苦，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小时候，他的性情就非常刚烈。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异常狂暴，有时十分驯顺，有时放荡不羁。9岁时，他的外婆和舅舅送他到一家私塾念书，老塾师给他起了一个他沿用一生的名字：锡山。16岁那年，他随父亲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明白了什么是“精打细算”、“唯利是图”和“投机钻营”。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京出版的一家报纸曾经刊登过一幅这样的漫画：阎锡山身穿团花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手举着一架算盘，一手拿着一张委任状。这幅漫画便是对他的最真实的写照。

大约在他 18 岁那年，他的父亲破产了，父子二人跑到太原躲债。他在柳巷“裕盛店”里当上了小伙计。一天，在太原繁华的街道上，他目睹了清廷官员的炫赫声势，羡慕不已。也许从那一刻起，他便立下了“跻身官场，光耀门庭”的勃勃雄心和志向——这原本是旧时代很多中国青年人的远大抱负。

1904 年，清政府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阎锡山应试录取。他和山西武备学堂的 20 名学生一起赴日学习。这成为阎锡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4 年之后，比阎锡山小 4 岁的蒋介石也来到了日本。

蒋、阎在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二人均出身于理财之家，性情刚烈，图抱负飘洋东渡，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他们的发迹也颇为相似：在革命中壮大自己，工于心计，攀附名贵，利用权术，投机取巧。他们都成功了，一个当上国民党的总裁，中国的头号人物；一个当上了山西的土皇帝，威震一方。

但阎锡山并不满足于一个山西。1926 年，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讨伐冯玉祥的战争中，他看准机会，乘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绥远。北伐战争结束后，他曾一度控制了晋、察、冀、绥四省和平津两市。但他仍不满足于当一个“华北王”，他的最大梦想是当上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上”。他对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后称帝非常崇拜；对汪精卫充当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很羡慕；对蒋介石掌握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权特别眼红。有一次，逢他过生

日，众人纷纷前来为他祝寿，高兴之余，他对亲属说：“相家说我八字相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

亲属投其所好，说：“有朝一日，你和袁世凯一样，会当上皇帝的。”

然而，蒋介石具有同阎锡山一样的雄心，在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年代，有着这种雄心的人可谓多矣——但蒋介石在和各路军阀的争战中更具备高人一筹的能力。1929 年秋天，是蒋介石自鸣得意的时期。在南方，他摧垮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两广皈依蒋记中央；在北方，西北军被分化，争相求媚于蒋；张学良此时也已听从他的指挥，掀起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可谓万事如意。但在同年 8 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上，蒋急于“削藩”的作法激怒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而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最具实力。于是，蒋介石决定拿阎锡山开刀。

机会终于来了。1930 年，湖南军阀唐生智率先反蒋，屯兵于河南南部。本打算拥唐反蒋的阎锡山权衡利弊后决定拥蒋反唐。蒋介石委派海陆空副总司令阎锡山为讨唐总司令，阎锡山愉快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本意在于借讨唐之机占据河南，染指中原，以便日后和蒋介石抗衡。

不久，7 万晋绥军浩浩荡荡开往郑州。阎锡山心情很好，从石家庄换车时，他竟然乘上当年慈禧太后的龙车，威风而又神气。

蒋介石决定在郑州对阎锡山动手。他找来民国政府总参议何成浚密谋。在蒋介石眼里，何成浚是“最好不过的参谋长”。领会了蒋介石

石的意图后，这位“最好不过的参谋长”信心十足地说：“委座放心好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拿不住活的，也给你搞具尸体来。”

二人商定，具体由何成浚和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执行。

阎锡山到达郑州后，何成浚和韩复榘精心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阎锡山的宴会上，何成浚代表蒋介石致词，他“高度”评价了阎锡山的功绩。何成浚说：“阎百川先生是蒋委员长和我留东洋振武学校时的兄长，是推举蒋委员长二次北伐的功臣，此次又担当讨伐逆贼唐生智的重任，劳苦功高……诸位，让我们为阎总司令的健康，干杯！”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已经嗅出了这种热闹场面背后所暗藏的杀机。他找到一个叫张象乾的参事，面授机宜，令他常驻郑州电报电话局，检查来往电报，暗中窃听电话，以获取情报。

几天之后，守护龙车的阎锡山的警卫发现，车站周围出现了很多十分可疑的陌生人。这天晚上，张象乾慌慌张张来到阎锡山的住处——也就是停在火车站的龙车上。阎的行营办公处处长梁航标问：“有何急事总司令正在休息。”

张象乾便把他偷听到的何成浚给韩复榘打电话，向韩复榘布置秘密处置阎锡山，以绝后患的事，告诉了梁航标。梁说：“我马上向总司令报告，你也赶快回电信局，有情况及时报告。”

阎锡山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给驻新乡的第9军军长冯鹏翥发电报，令他火速弄一个火车头挂一节车箱，另带一个连的部队来郑州。然后，他身着便衣，打扮成商人的样子，脖颈上缠一条遮住半个

脸的大围巾，只带几个卫兵，悄悄登上火车，呼啸而去。

蒋介石满以为他一手策划的谋杀计划万无一失，到头来还是让这个老奸巨滑的阎老西跑掉了。有趣的是，8年之后，这次行动的主要执行者韩复榘却没能像阎锡山那样幸运，他被蒋介石几乎用同样的办法搞掉了。

侥幸得以逃脱的阎锡山再一次领教了蒋介石的阴险和歹毒，他咬牙切齿地说：“不打倒蒋介石，我阎锡山实难生存。”

不久，就爆发了规模宏大的蒋、冯、阎中原大战。

想起这场大战，阎锡山一直心有余悸。中原大战的惨败，差一点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若不是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和日本人的帮助，他阎锡山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积多年之经验，阎锡山认定蒋介石是一个极其狡诈、极其毒辣、极其自私、毫不手软的人。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被蒋介石铲除了。阎锡山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保护着他。

1931年秋天，战败后流亡在外的阎锡山偷偷回到他的家乡河边村，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这时，他的父亲阎书堂问他：“你偷偷回来，不怕蒋介石、张学良再找麻烦”

阎锡山故作轻松地笑笑：“不怕。要怕还不回来呢。他们把咱咋不了。”

他是嘴上说不怕，心里怕得要命。蒋介石太强大了，除了共产党，谁人不怕他？几年来，阎锡山一边卧薪尝胆，秣马厉兵；一边倡言“经

济建设”，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不久就使经济十分落后的山西形成了一个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相结合的，较为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蒲铁路。为了完成他的一系列庞大的计划，他不惜加重人民的负担，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交税，还美其名曰“讲究卫生”。有个叫刘师亮的人为此写了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

这天早晨，阎锡山起床后，在绥署东花园散步。他站在一座精致的凉亭下，面对初升的太阳，呼吸了一阵“东来紫气”，总觉得缺乏了往日的悠闲自得，以后恐怕不会再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他不免沮丧地摇摇头。

这时，他的亲信梁化之前来晋见。他问：“化之，近来中央军有什么动静”

梁化之说：“中央军进入各地后，眼下正着手发展国民党组织，趁机削弱咱的势力，其目的就是挤走会长。”

自 1935 年成立“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山“当选”为会长后，他的部下都称他为会长。

停了好长时间，阎锡山才悲叹道：“化之，你要记住，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其实，这个时候，令阎锡山悬心的，不仅仅是一个蒋介石。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已日益暴露，对中国的领土由蚕食而鲸吞，已经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统治。

2、毛泽东早就看好了山西，彭雪枫被秘密派往太原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中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并提出“美洲就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阎锡山长期盘踞山西，推行自己的一套治理之策，把山西搞成国中之国。在许多外国人眼里，阎锡山以山西门罗主义而著称。而山西门罗主义，自然也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任何外地势力都不得干涉山西的事务”。

山西门罗主义，此时已是空想——半年多来，可谓云飞浪卷，寇深祸亟，阎锡山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日本人的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二是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猛烈地震撼着他在山西的统治；三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这三种危险摆在他的面前，怎么办向何处去降日还是抗日拥蒋还是反蒋联共还是反共……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只好徘徊在诸种矛盾中间。他很清楚，在目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稍有不慎，他的山西老巢就会被人一脚踹掉，他的“土皇帝”的桂冠就得落地。如何在日本、蒋介石和共产党这三种势力中间求得生存，对于他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曾几何时，阎锡山对日本人充满了幻想。二十多年来，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很希望像早年的张作霖那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就一番大业，但他又绝不愿意像张作霖那样落个被炸身亡的悲惨下场。

1908 年，25 岁的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他已经在日本呆了 4 年。这是他一生之中颇为愉快的一段时光。他从高速发展的日本工业和蓬勃向上的日本国民身上，看到了这个岛国强大的未来。于是，他利用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一年时间，和队长冈村宁次、教官板垣征四郎、同学土肥原贤二等人建立了不薄的交情，尤其和土肥原贤二过从甚密。阎指望这些人日后在他需要的时候能给予他某种帮助。

1930 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把逃亡的落脚点定在大连，其目的就是在大连便于和日本人来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山再起。他和老同学、老朋友土肥原贤二多次晤面，订了密约三条：

- 一、阎锡山赞助关东军占领东北全部；
- 二、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脑；
- 三、日本关东军将设法保护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1935 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部分高级军官开会，参加的有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朱绶光等人。朱绶光问：“日本人对咱们的态度究竟怎么样”

阎锡山说：“日本人不会打咱们。只要咱们有力量，它(指日本)还得依靠咱哩。你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整顿队伍，只要把队伍整顿好，有了力量，咱就什么也不怕了。”

阎锡山派代表去日本考察，板垣征四郎对他的代表说：只要阎百川不抗日，我们就会给阎以帮助。几年来，他一直信守这一“诺言”，在山西他的地盘上从来不许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生怕得

罪日本人。在全国抗日风潮逐渐高涨的情况下，他仍同意日军在太原、归绥、大同等地，公开设立特务机关；并在天津设有秘密电台，与日军联系，其目的无非是换回山西的“安全”。

然而，日本人得寸进尺，贪婪异常。1935 年以后，先是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向华北节节进逼，已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到了 1936 年 5 月，他们又唆使伪蒙军在绥东频频挑起事端。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与日本妥协，在广大的国民面前将蒙上“千夫所指”的汉奸罪名，不但他阎锡山自己会身败名裂，而且他和他的家族的一切弄不好都得完蛋……

想到这里，阎锡山的心紧缩起来。

他自 1911 年当上山西都督以来，与各种势力不断角逐，成为中华民国史上少见的“不倒翁”。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大风大浪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它。

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是“存在就是一切，需要就是合法”。他说“人类需要的只是生存进化。”因此，他办一切事情都以存在为标准，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从来不走极端，不搞一边倒，在各种矛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也是他时常被人称为“九尾狐狸”的原因。

面对严峻的局势，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决定绝不能倒向日本人的怀抱，而且他还打算适当的时候，打出抗日的旗号，以求落一个“民族英雄”的美名。

但是，要想抗日，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找到同盟者。那段时间，他不断召集赵戴文、贾景德、梁化之，以及绥署军法处处

长王怀明、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溶、绥署参议李冠祥等人开会，研究对策。他说：“对于蒋介石，咱应该明白，他是想借共产党之手或是自己动手消灭咱。但如果和他翻脸，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咱必遭失败。拥蒋又非咱所愿，而对付日本人又需要国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咱虽然不满意蒋介石，又不得不依靠他……在眼下，联共倒是一条出路，但这样，蒋介石肯定又制约咱，使咱不能公开地和共产党采取大的联合行动。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采用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些进步人士为咱服务，有限度地允许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点上一支(抗日的)小蜡烛……”

他又说：“我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害，决定选择一条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蒋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又不公开合作的道路。这样做，就是在日、蒋、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在这三方的夹缝中求生存。说穿了，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啊……”

很显然，他打的算盘是，这种政策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还可以避免让蒋介石一口吃掉，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也不会向他下手，可谓“万全之策”。他把这叫做“自己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之路。他甚至有些兴奋地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看谁能制服谁了！”

1936年7月，阎锡山选拔1000多名青年学生，组织“暑期健身团”，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他在开幕式上大讲：“万变之中有个不变

的中心……变者其子，不变者其母……存在是永远不变的，为了存在而采取的方法则是随时可变的……”为他改变政策做舆论准备。

当中共中央意识到阎锡山从降日到抗日，从反共到联共的转化后，将此视为对山西进行统战工作的良好机遇。毛泽东早就看好了山西，他认为山西日后一定会成为红军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也许会像当年的红都瑞金一样，成为红军发展壮大的又一个摇篮……

征得阎的同意，中共立即派彭雪枫去山西，在太原秘密组建红军驻太原办事处，并设立了电台。彭雪枫到太原后，起初只是和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来往，并通过梁化之给阎传递信息。彭雪枫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阎锡山联共抗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月初，毛泽东决定放回红军东征时俘虏的阎方团长郭登瀛。经过教育，郭登瀛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毛泽东托郭登瀛向阎锡山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患得患失，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提到了被红军俘虏的吉县县长琚秀咸。他写道：

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据说阎锡山看了这封信，沉默不语。许久，他才对内心极为忐忑

不安的郭登瀛说，你先歇着吧，让次陇(赵戴文)在省府给你找个差事干，如果需要，我再派你去见毛润之……

这段时间里，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的阎锡山还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来往密切。蒋介石对日坚持“不抵抗政策”，听任华北“特殊化”；而日军的战略企图，显然是要占据晋、绥等地，如此下去，很可能会促使他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结局!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晋军占领了济南，阎、冯联军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就在这时，战役之初保持中立的张学良突然宣布拥护“中央”，亲率大军入关，致使阎、冯大败，阎锡山和张学良为此结下了宿怨。如今，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剧变，出于需要，他们可以说差不多尽释前嫌了。

张学良身边主管情报、新闻工作的李金洲奉张学良的命令，以张学良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太原，探讨阎锡山对一致抗日的看法。李金洲先拜访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戴文说：“阎主任认为，剿匪是必要的，但眼下并非上策。因为内战损失了国力，将来对外难以抵抗日本军队。”

李金洲接着拜访了阎锡山。后来，李金洲有如下记载：访阎时“所谈亦同”，阎并表示“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

不久，李金洲与张学良的参谋长、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窗好友戢翼翘再次来到太原。李金洲在《亲历记》中称：“与阎先生长谈两次，内容与前完全相同。”

大约在秋初时节，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太原。阎锡山和张学良单独极秘密地会晤了两次，所谈内容，除当事者外，别人无从知晓。估

计可能是请阎锡山一同出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0 多年后，曾在抗战时期担任第二战区炮兵司令的周玘回忆说：“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我在场。内容是张学良请阎锡山在侧面支持他。张学良临走时，还是我送他到机场的。”

张学良离开太原后，阎锡山对绥署参谋长朱绶光 and 周玘说：“小六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阎在背后，一贯称张为小六子)。中原战败后，我们元气大伤，只能见机行事了。”

周玘还回忆说，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也亲自来过太原。但不巧，他患上了感冒，在山西大饭店多住了几天，周玘常去探望他，所谈也大都都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话题。

一个多月后，杨虎城又派西安绥靖公署秘书蒲学政来太原探询阎锡山的态度。阎锡山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不难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把阎锡山当作同路人和支持者来看待的。

山西的抗日风潮逐渐形成了。按照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大政方针，他要想法保持各个方面的平衡。9 月，日本提出要在太原设大使馆办事处，在绥远设领事馆，他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已无法使阎锡山保持平衡。10 月下旬，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相继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日本特务遍布山西，他们绘制地图，拍摄山西的防卫设施。日本关东

军的特种小分队秘密策划袭击大同，在那里炸毁了一个很大的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拿下绥远后将向山西进攻的流言蜚语到处流传……

阎锡山愤怒了。他对前来采访的南京中央社记者说：“你们看一看‘九一八’后的东北四省和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之下，若不想叫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了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

1936年12月18日，阎锡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他说：“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强自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他又说，“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应当在守上努力。”他认为贫弱的中国没有绝对打胜仗的把握，但打“死仗”却“实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拼命的守土抗战……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人，也该守土抗战。”

日本不给他面子，他仍然给日本人留了一点面子——他只说“守土”，不说抗日。这里面似乎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子：只要你不来侵占我的地盘，我就不抗战。

阎锡山在“守土抗战”的口号下，提出要把自己军队扩充到10万人，并建立一支3倍于军队的民兵组织，以及一支由1.5万名学生组成的“军官预备团”。这一决定吸引了大批华北各省及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进入军官学校参加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位来自北平的学生说：“华北的所有学生都把阎锡山看成一片黑暗大海中的烛光。”

3、八路军 115 师率先进入山西

1937 年 7 月，古老的中华大地赤日炎炎，来自北方的战火硝烟弥漫了整个的天空。

太原。阎锡山释放了共产党人王若飞。他对驻太原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彭雪枫说：“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这个时候，阎锡山已经预料到，日军进入山西已不可避免。7 月底，他提出了一个山西省战时动员方案，并成立了山西省、县、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省动委会由阎锡山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县动委会由县长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训练、宣传、总务四组。省、县两动员委员会负动员、指导、督饬、考核和解决下级困难之责，实际工作，则全在村动员委员会——方案规定各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下设各队：(一)儿童队：以 7~12 岁的男童和 7~14 岁的女童编组，做唱歌和简单传话工作；(二)少年队：以 13~17 岁的男少年编组，做放哨、传话、送信、侦察敌情工作；(三)自卫队：以 18~35 岁的青壮年男子编组，加以军事训练，负保卫村庄，必要时配合部队打击日军之责；(四)壮丁队：以 35~50 岁的男子编组，负运送军用品、挖战壕、抬伤兵之责；(五)救护队：以 51~65 岁的男子编组，负看护伤兵、救护逃难老弱、劝募慰劳及救济款物之责；(六)缝洗队：以 15~60 岁的妇女编组，负制做军鞋、缝洗军衣之责；(七)老年祈祷队：以 61 岁以上女子和 66 岁以上男子编组，专做祈祷战事胜利并负照料各家幼儿之责。

这个方案很快下达到各县、村。但正像整个抗战期间一样，政府发动群众仅限于口头上，并未做多少实际工作，而共产党却把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当作大事来抓，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成为共产党人发展、壮大自己的一条根本捷径。

8月上旬，蒋介石电邀各地军政大员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独霸一方的阎锡山自然在被邀之列。当时他正在生病，且日军已开始进攻平绥线上的重要关隘南口，山西局势已出现了动荡，但他还是“决计飞京”，并即兴赋诗一首：病体未痊赴国难，轻身为国理当该。扶病南行参国计，但求此去不空回。

此行他有自己的实际目的：找蒋介石解决财政和人事问题。

会议结束的那天，军委会宣布了编制序列，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和绥远两省的所有部队。晋绥军编为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当时驻在绥远的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名义上亦受第二战区指挥。如果红军开往山西，肯定也要受阎锡山的节制。自从和蒋介石打交道以来，阎锡山还没有这么高兴过。

回到太原，一下飞机，他就喜形于色地对前来迎接他的众部下说：“看来，抗日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不打老百姓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

不久，他被南京告知，八路军将开赴山西境内作战。又过了几天，南京来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他早年的参谋长、现被派往南京任常驻军事代表的台寿民说“共

产党红军开到山西来，够你对付的。”

“咋的啦他朱德、彭德怀敢不听我阎司令长官的指挥”他笑着反问。

8月22日，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

9月3日傍晚，冒着仍下个不停的秋雨，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从西安出发，前往潼关。这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给安排的专列。

车到潼关正好天亮，他们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登岸而行，这一行人中，也许数徐向前感慨良深。自从1924年考上黄埔军校离开家乡五台县永安村后，10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终于踏上家乡的土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霎时攫住了他。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母亲赵金奎已于年前过世，他和前妻朱香蝉所生的女儿松枝也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10余年的时间不算长，恰恰就是这10余年的时间，当初那个穿灰布长衫、不爱说话、在阎锡山家乡河边村川至中学当教师的徐象谦，摇身一变，成为名震八方的共产党杰出将领徐向前……

梁化之奉阎锡山之命，带着两节专列火车迎候在风陵渡车站上。此前，梁化之从未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但这些“共产党的大头目”每一个都是如雷贯耳……梁化之不由得多看了他们几眼，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谦恭和拘谨。

周恩来等人上了车，这种窄轨车的车箱确实小，人坐在上面便觉出狭促。彭德怀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

周恩来看了看徐向前，说：“当心呀，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

大家都笑了。

小火车在晋南大地上行驶，透过不大的车窗玻璃，他们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在窗外广袤的土地上掠过。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片美好的土地就会成为中日两军刀兵相见的战场。八路军已经挥师北进，但对于他们，毕竟是一场全新的战争，前面等待着的，将会是什么呢……

周恩来的思绪也许更遥远一些。本来，洛川会议结束后，他打算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的，到西安后，连续接到毛泽东两封急电：“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于是，他便中途折往山西。

此时的山西，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眼里，更为重要了。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华北分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西上，攻南口、张家口，进逼晋北重镇大同；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保定，准备夺取石家庄。两路日军中，其主力使用于前一方面，也就是晋北方面。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要的意义。日军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中国军队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进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日军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日军由平汉路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到困难。毫无疑问，山西早已成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更重要的是，八路军主力正集中在山西境内。山西是八路军从陕北开往抗日前线最便捷的地方。依托着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可以使日军的重武器——坦克、大炮、飞机难以充分发挥性能，极有利于八路军发挥它的长处，进行山地游击战，消灭日军，壮大自己……

周恩来收回目光，问坐在他身边的聂荣臻：“荣臻同志，115 师到了什么地方”

聂荣臻想了想，说：“估计先头部队已到达侯马。”

车到侯马车站，聂荣臻下车，率第 115 师先头部队继续北上。

4、北方的庄稼熟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从南京回来后，高兴了没几天，阎锡山的心就沉了下来。险恶的局势不容他喘息。到 8 月底，南口、张家口相继陷落，晋北完全暴露，战火很快就要烧到他的家门口。

他在太原呆不住了。9 月初，他匆匆拟定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自己则于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设立行营，亲自督战。

位于代县以北 40 里的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名关”。它又名“西陉关”，《唐书·地理志》载：“西陉，关名也，在雁门山上，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相传每当春雁出塞时节，雁衔芦叶，翱翔半晌，叶落方可渡关，雁门关由此得名。雄关依山傍险，高踞勾注山上，东西两翼，山峦起伏。长城矗立在山脊上，其势蜿蜒，东走平型关、紫荆关、倒马关，直抵幽燕，连接瀚海；西去轩岗口、宁武关、偏头关。观其形势，确

是“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的这座雄关能扼制住强大日军的进攻势头吗

在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阎锡山率第二战区指挥机关来到距雁门关尚有十几里路程的太和岭口。本来他想选择一个和风丽日的时辰来这里的，无奈这一阵子天气一直不好，而情况又越来越紧急，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车后，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地势。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被从山涧顺下来的一条干沟切成了两半，河西靠太原至大同公路的一侧称作西梁，河东靠雁门山的一侧谓之东梁。第二战区行营就设在东梁山脊下的一个坐东朝西的小小院落里，除了隐在山崖下的那孔穿堂窑洞外，还有一堂两屋的三间向阳瓦房，窑洞可供防空使用，平房可当会议室以及侍从们休息之用。阎锡山对部下选择的这座院落十分满意。

站在这座小小的院落里，能够看到不远处巍峨雄峻的雁门天险。早晨，往往是雾气飘荡，混混沌沌，迷迷蒙蒙，如入仙境。过一会儿，山风呼啸，雾气被翻卷成缕缕云带，飘落在山凹，卧地枕石，悠然而歇了。此时，峰峦沐浴在阳光下，珠光水气，斑斓夺目，闪闪烁烁，犹如金盔银甲。面对此情此景，阎锡山的脑子里不由得涌出唐人李贺的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阎锡山终日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困扰。如今，日本人又心怀灭亡中国的欲火，举兵来到了他的家门口。日军铁蹄所过之处，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他这个最不想和日本人为敌的人，已经没有了退路。面前这美好的河山，究竟会属于谁对于个人前途的忧虑，常常使他夜不能寐。

此时平绥路东端的战略要地南口已经失陷，山西也已出现混乱的局面，谣言四起，人心慌慌。在晋北通往太原的各主要道路上，不断有成群的伤兵和溃兵走过，他们沿途抢夺财物，胡乱放枪，骚扰百姓，散布流言，对民心 and 士气影响极大。这天一大早，阎锡山在指挥部的院子里散步，他突然回过头来，问他的参谋长朱绶光：“张培梅现在哪里”

雁门关下的崞县中泥河村。每到傍晚时候，人们就见村口的官道上有一个老人在溜达，有时见他一大早背着粪筐到田野里捡粪。他50出头的年纪，浓眉大眼，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盛气逼人，显出一身豪侠之气。他就是名震四方的前晋南镇守使张培梅。

1907年，22岁的前清秀才张培梅来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他的同期同学里，有一个叫蒋中正的人，日后曾经主宰过中国的命运。

毕业不久，他就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在率队攻打山西巡抚大院时，有人说：“担当此重任，应不要命。”他慨然答道：“要命者绝不革命！”后来他历任团长、旅长、晋南镇守使等职，192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在晋军中，张培梅素以强硬派著称。他为人正派，办事认真，能征善战，打起仗来勇猛无比，敢作敢当。他信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慈不掌兵”、“军中不斩不整”等信条。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派4个旅的部队出兵娘子关，阻截吴佩孚调兵北上，张培梅受命指挥两个旅担任左翼作战。但这两个旅的旅长——刘树藩和龚奉山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而且刘树藩仗着是阎锡山的亲信，拒不从命。张培梅一怒之下，将这两个旅长斩首，并将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挂在营门口示众。张培梅从此声名大震。

自1928年他因故辞职后，已远离军中9年。如果没有别的变故，他也许就要在乡间终老一生了。但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他义愤填膺，破口大骂那些不顾民族利益、胆小怕死之徒，恨不得立刻回到阔别已久的战场。他每天都阅读报纸，常常长吁短叹——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阎锡山任命他为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的委任状。激动万分的他当下向乡亲们表示：誓与山西共存亡。

两天后，他来到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阎锡山对他说：“鹤峰，眼下大敌当前，军心不稳。请你出山，是为扶正压邪，整肃战场纪律。今日起，我把整顿晋绥军的生杀大权交付于你，如何”

9月7日早晨，阎锡山和往常一样，5点钟准时起床。侍卫长张逢吉帮他穿衣服时，他说：“今天穿那套官服。”

阎锡山平时的穿着比较简朴，一般都穿灰布军服或马黄呢制服，很少穿皮鞋，通常是松紧口布底青呢帮鞋，天冷以后，披一件黄呢斗篷。那套上将礼服，只在检阅部队或大典时穿戴。张逢吉有些不解。

阎告诉他：“今天共产党的周恩来要来。”

穿好上将礼服，腰间又佩上短剑(中正剑)，他伏在窑洞里那张老式的八仙桌前批阅了一会电报、信件。6点准时吃早饭。他的饭食也很普通，一般都是家乡风味的素淡饭菜。给他做饭的厨师们曾私下里编了段顺口溜：“司令长官饭好做，河边馍馍大兴(村名)的糕，山药蛋烩菜把豆腐烧，莜麦壳壳麦转转(麦转转指青麦粒碾成的丝条)，拌汤里加个鸡蛋蛋……”

这天早晨，他的饭桌上摆着各一小碗家乡风味的山药、白菜、豆腐、粉条，两碟咸菜，另有一碗面条。吃完之后，他带领众随从从东梁的小院步行到西梁的村口路边等候。他平时的穿着打扮虽显出一种道家风度，但难免露出“土气”，这天戎装披挂，也就显现出一个战区司令官的威武英姿。

八路军已全部开往山西，他希望山西的守土抗战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听说周恩来等共产党高级将领要来，他是满心欢喜的。在日军节节进逼，晋绥军已显出败相之际，他很想听听周恩来的高见。他以前曾和周恩来有过接触，周恩来的智慧、性格、谈吐和优雅的风度令他信服，尽管他不大佩服别人，包括蒋介石，但他佩服周恩来。

两辆汽车停在太和岭口西梁的路边，从第一辆车里下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和彭雪枫，第二辆上坐着第二战区长官部派出的警卫人员。

阎锡山笑脸相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一行说笑着，步行来到设在东梁的二战区行营。从安全考虑，会谈在那孔隐进山崖很深的

窑洞里进行。

张逢吉吩咐侍从们给客人倒上一杯热茶，每人面前又放一包炮台牌香烟。阎锡山不喝茶，他的面前放着一只绛紫色的小泥壶，里面盛着热米汤，渴了他就抿一口；平日里他也极少抽烟，有一个时期，为了防止风湿病，曾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有苍术、沉香等中药，但不久他就不抽了。今天许是高兴，他抽出一支烟，截成三段，将其中一段点着，轻轻吸了起来。

这次会谈主要围绕三个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补充问题。会谈还算顺利。

阎锡山介绍说：“我们要搞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我们要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

周恩来说：“百川先生，我们建议不要单纯死守这些关口，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

阎锡山边思考边点头。

周恩来说：“我们打算将 115 师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司令长官有什么意见吗”

阎锡山沉思片刻，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贵军的物品补充，二战区可以解决。并负责将贵军迅速运送到平型关东面的涞源、灵丘一带。”

会谈结束后，气氛更显融洽。阎锡山半开玩笑地说：“周公来山

西也真会选陪同者呀，把你们的军事家、我的五台同乡徐向前带来，与我谈判了……你此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他边说边冲徐向前笑了笑。

周恩来笑说：“百川先生多虑了。我这次和徐向前一快来，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们几个带路的。徐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第129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和你见见面，以后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呢。”

看着周恩来带来的这几员共军大将，阎锡山眼热得不行。他想到，八路军还有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叱咤风云的战将，难怪共产党怎么也剿不灭。而自己的手下呢王靖国、孙楚、杨爱源、赵承绶、李服膺、傅作义等人，除了傅作义高出一筹外，其他的虽说一个比一个听招呼，就是本事不济。傅作义倒是个将帅之才，偏偏又后脑勺上长反骨，不听使唤……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蒋介石视浙江人为心腹，阎锡山这方天地更痛快——“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在晋军中掌权的，大都是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县的人，阎视他们为亲信。这多少带点“中国特色”。对于徐向前，阎锡山的心情颇微妙。五台老乡里——而且不是一般的老乡，两家只隔着一条滹沱河——出了个徐向前，打遍了半个中国，名声在外，但就是不为他所用。他铁了心跟共产党，有啥办法

他曾经对不少部下说过，徐向前缺少粮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他还说过：“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

上依靠徐向前。”人各有志。到头来，又有哪个能依靠得住

但阎锡山还是对徐向前说：“我阎某人可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亲不亲，同乡人’，我准备派朱参事(朱点，徐向前原配妻侄)陪你看看父母老小。问问父老，我阎百川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还让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呢!”

徐向前说：“谢谢司令长官。军情紧急，以后再回去吧。”

最后，阎锡山请周恩来等人帮助写一个第二战区作战计划。他们商量了一下，仅用一天时间就写了出来。阎锡山看后，吃惊地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他又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他遗憾地摇摇头。

9月9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又赶到大同，和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见面，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时，傅作义和阎锡山的矛盾已很突出，阎曾多次流露，对他不大放心。傅作义向周恩来表示，大敌当前，他拥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和第二战区长官部的统一调度。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恩来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

当晚，他们折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谛听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以及嘶哑的汽笛声，他们渐渐沉入了梦乡。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人率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当天下午，阎锡山派一名高级参议接朱德到太和岭口去商谈，

周恩来陪同前往。

也许是受到一直和阎锡山打交道的薄一波的启发，这次二战区副总司令朱德同总司令阎锡山的商谈更具“艺术性”。

创建由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参加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实际是为共产党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基，由于冠之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便被阎锡山欣然同意了。

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戴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的帽子，竟也获准施行。阎锡山并且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

朱德、周恩来此行，收获够大的。

精明的阎锡山还是没能算计过共产党人。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红军的作战方针——红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和游击战，这是红军的两个作战原则。阎司令长官在他的辖区内基本满足了共产党人的这两点要求。

“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毛泽东这样说。

朱德同阎锡山告别时，阎锡山再次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朱德用他高亢的嗓门说：“好。好，司令长官放心，八路军很快就会有动作！”

1937年秋天，北方的庄稼——高粱、大豆、玉米、谷子即将成

熟的季节，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5、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那天便开始了

在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时，阎锡山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判断，日军下一步的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行牵制攻击，以主力向广灵进攻，企图切断我雁门关后路。

但这两种情况，他更倾向于第一种，也就是日军主攻方向在天镇、大同。他打算实施机动的作战方针，那就是——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置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他设想：如敌以主力进攻广灵时，该处守兵应固守待援，以总预备队主力应援该方面之战斗……如敌主力进攻天镇，天镇守军拼死待援，大同附近之总预备队应向天镇挺进，浑源附近兵力偷渡桑干河向天镇右翼实行侧面攻击，以牵制敌人。俟其顿挫，由天镇两翼夹击之。

这一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鼓励，蒋介石还答应速派河南地方部队刘茂恩的第15军开往山西，归阎锡山指挥。

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李服膺第61军在天镇、阳高等地设防，占领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日军西进，掩护聚乐堡、大同主阵地带。其任务是沿平绥线节节抵抗，诱敌至大同外围，由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和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聚而歼之。

负责打头炮的是李服膺。他的第 61 军首当其冲，正面迎敌，对整个防线举足轻重。一切的关键在于，李服膺能尽最大限度顶住进攻天镇、阳高的日军，使主力部队从容布防。

李服膺是在匆忙撤退的过程中接到阎锡山令他防守天镇、阳高等地的命令的。第 61 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其实仅有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 7 个团。况且这点部队在平绥线上同日军已有所接触，虽未大打，但仍受到一定损失。

对于天镇、阳高等地的“国防工事”，第 61 军的官兵十分熟悉，因为这些工事是一年来他们自己动手修筑的——正因为比较熟悉，李服膺和他的部下才深知其中的利害。施工时，他们从太原只领到很少的材料，钢筋、洋灰不足计划准数的 1 / 10，民工工资、兵工津贴被阎锡山百般克扣。据说阎锡山用它在全国各商埠大做买卖。这种偷工减料做成的所谓国防工事能抵御日军的飞机大炮吗况且此时还有不少工事未完工，难以使用。有人发牢骚：“做国防工事，不给工具材料，一味克扣工资津贴，这明明是拿上肉弹顶铁弹……”

不难设想，当李服膺接到阎锡山“坚守 3 天，拒敌西进”的命令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惊慌。但他信奉“咱不做阎先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这一类的话。仓促中将独立 200 旅第 400 团部署在盘山制高点上，第 101 师的 3 个团依次在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山瓦窑口一线布防，第 399 团负责天镇城防，第 401 团驻守在天镇城外，第 414 团驻守天镇以西约 30 公里的阳高县城。这样，第 61 军构成了以盘山为主阵地、由 4 个团组成第一道防线，以

及以天镇、阳高两城为纵深防线的“T”字形防线。军司令部驻于阳高县城内。

据亲历过天镇之战的第 101 师第 213 旅旅长杨维垣回忆，战前，李服膺曾亲莅一些部队讲话，号召官兵不怕牺牲，坚守阵地，军部还印发了《告全军官兵书》，部队可以说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9 月 5 日，即第 61 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大批日军尾追而至。开始日军并未攻击最为重要的阵地盘山，而是集中火力攻击第 101 师第 425 团的李家山、罗家山阵地。团长李在溪注意到，日军这次进攻，并不用惯用的步炮协同的战术向他们冲击，而是先以步兵涌至阵地前，诱使他们进入阵地后，敌飞机即低空投弹扫射，然后继以猛烈炮火轰击。如此反复，整整延续了 4 昼夜。敌步兵根本没到他们团阵地直接冲锋，他的 1300 余名的团队即伤亡官兵 700 多人，全团 9 个连长，阵亡 3 人，伤 5 人。

李在溪心中十分焦急，前后共给军长李服膺送去 18 份紧急战况报告——40 多年后，李在溪回忆道，李服膺和他军部的全体人员，惊慌失措，整天忙于钻防空洞躲飞机，他的 18 份报告，被军参谋长刘金声装入裤袋内睡了大觉。第 4 天的傍晚，李军长和他通了电话，说：“你团的情况十分危急，应该给你增调兵力，但目前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无论如何你要尽力支撑，不能放弃阵地。”

然而，李在溪的直接上司、第 101 师 213 旅旅长杨维垣却回忆说：“此时，军长李服膺在阳高城内坐卧不安，率幕僚人员与直属骑兵连进驻天镇城西村庄，指挥作战……综计我 101 师伤亡官兵共达千余

名。遗憾的是，我旅 425 团团长李在溪，自始对抗战抱悲观消极态度，在阵前竟越过师、旅长，多次径电军长请病假辞职。军长知他无病，复电责以大义，指示他勉为其难……该团程琮营被敌人突破一处，全团溃退下来。我严令该团立即反攻，虽未完全恢复原阵地，总算稳住阵脚，全线未受严重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最初的战斗是激烈的。3 天过去了，第一线的部队虽歼敌不多，但伤亡十分惨重，工事悉数被毁。所幸的是主要阵地并未丢失。李服膺在阳高城他的指挥部里，总算舒了口气。然而，这时候，他又接到了阎锡山“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的电令。阎锡山的命令他自然不敢违抗，只好强打精神督促部队全力坚守，一俟完成任务马上撤退。

如果不出意外，再坚守 3 天估计问题不大。天镇是雁北地区的门户，此仗是日本进攻山西的第一仗，如果打好了，谁的脸上都感到光彩。

然而，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意外的情况就出在防守盘山的第 400 团身上。

盘山位于天镇东南约 4 公里的地方，是一座高峻险要的山峰，也是天镇的名胜。站在山顶，既可以俯瞰平绥铁路，又能屏障天镇全城。按说日军要占领天镇，必先攻下盘山。

第 400 团的团长叫李生润。几天来，别处都打得很激烈，本来应该首当其冲的盘山主阵地，却不见日军来攻。他有些暗暗得意。大约在 9 月 8 日的傍晚，李生润给第 425 团团长李在溪打电话，说：“团

长(李生润曾当过李在溪的团副)，这几天你们阵地上很危险吧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军长既无法抽调部队，我私自抽一个营支援你，如何”李在溪说：“这怎么能行呢，抽调兵力要请上级决定，况且你那里是主阵地，关系重大，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你那里情况怎样”“我是高枕而卧，阵地绝无问题。”李在溪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敌。李生润好像满不在乎地说：“老团长，请放心，我随时注意着哩！”

就在这天夜里，大批日军乘夜色偷袭了盘山阵地。400 团仓促应战，极为狼狈。守卫主阵地的营长高宝庸被炸死在石洞内。至拂晓时分，该团在付出 500 多人的性命后，将整个盘山丢失。

盘山一丢，形势急转直下。第 101 师的 3 个团慌忙后撤，此时这 3 个团的长官已经掌握不住部队，残兵本应退往夫镇城继续阻敌，他们却绕开天镇，从南北两侧继续向西溃退。

这给了守卫天镇城的第 399 团一个歼敌的机会——尾追的日军误以为天镇是座空城，便高举太阳旗，列队进城。大约有近百个鬼子，被潜伏在城内各处的第 399 团击毙。团长张敬俊估计日军遭此意外打击，必将前来报复，他命令将被击毙日军的脑袋砍下来，高挂城头，激励士气，以壮军威。

果然，不一会儿，日军的飞机大炮便对天镇城实施了凌厉的攻击，步兵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第 399 团坚守一天一夜后，于 9 月 10 日退出天镇。

紧接着是阳高。自从盘山失守后，李服膺的指挥所就撤离了阳高。阳高的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顺着墙根堆积的砖石即可徒步登城。

第 414 团在军指挥部撤离后，仍坚守了 1 天多，团长白汝庸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巷战，团副曹静山、第 3 营营长都来宝和六七个连排长共 200 多人战死。白团长见大势已去，遂率部撤出。阳高陷落。

撤退的过程是异常混乱的，差不多等于逃跑。这时候李服膺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了。按照第二战区长官部的部署，第 61 军丢失第一线阵地后，应集结残部在阳高周围的第二线阵地再抵抗一阵，结果除原防守阳高的第 414 团外，其余的 6 个团皆溃退了。他们更没有按照阎锡山原定的方案向镇边堡转移，与集结在丰镇、大同、得胜口一带的傅作义部会合，而是沿大白登方向一直向南逃，直到过了桑干河好久才站住脚跟。

其实从第 400 团大意失盘山开始，祸根就种下了。

史料记载，当第 61 军在天镇、阳高与敌周旋之时，第 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曾建议阎锡山进行大同会战。然而，政治上十分老练的阎锡山军事上却优柔寡断，尽管大同会战最初为他提出，但这时候他退缩了。他的理由是：地形不利，援兵未到。仅仅几天之后，板垣第 5 师团主力由察南蔚县进攻广灵，直奔雁门关后路而来——大同会战便成了一句空谈。

9 月 13 日，大同——这座矗立在御河侧畔的塞外古城，东条兵团未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太阳旗便飘扬在了城头。

第 61 军的溃退，大同的撤守，使平绥线正面失去了防御力量，晋北门户大开。

而且，9 月 11 日，日军击溃驻守天镇的第 399 团占领天镇后，

大肆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数千名天镇百姓几乎无人幸免，其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南京中央社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天镇屠城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首例大规模暴行。3个月后，又有了更为惨虐的南京大屠杀。

大同失陷和日军天镇屠城震动了南京统帅部和国内舆论。

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会战”那天，沮丧之际，他写了一首《弃雁绥工事》诗：

国防大计定当先，临时决策事难全。

工事费款千余万，放弃全由南口牵。

可见，他仍然对南口陷落耿耿于怀，为他撤守大同寻找依据。

很快，他就感受到了来自南京统帅部和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且比他设想的要严重得多。国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他，责骂他畏敌如虎——“似这等战区司令长官早该撤职查办，重重治罪，以肃军纪，以谢国人。”

蒋介石发来电报，斥责他“临阵慌乱，御敌不力”。

要求追查晋绥军失守土之责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寄往南京军委会和阎锡山的太和岭口行营。阎锡山感到了惊慌。他对他的参谋长朱绶光说：“娘那个熊！事情弄大了，可怎么收场”

也许就在这个瞬间，他想到了第61军军长李服膺……

似乎命中注定，李服膺难逃此厄运。

连日阴沉的天气逐渐晴朗起来，太阳难得露出它固有的模样，和风徐徐吹来，满坡已显发黄的青草轻轻摇摆。在这样的时刻，站在第

二战区行营的小院里，能够清楚地看到不远处雁门山的巍峨雄姿。身处9月的太和岭口，原本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这天下午，负责行营人员给养和伙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上尉参谋庞小侠，突然听到司令长官对王玉林说：“你给我接南京蒋介石的电话，要快！”

王玉林是行营有线电大队大队长，负责通信联络。电话就在阎锡山的住房里间，王玉林扯着嗓子叫通南京的电话后，对各处的人员说：“阎司令长官现在和蒋委员长说话。其他电话一律停止。”

说完后，王玉林就退了出来，庞小侠等人也都退到门外。因为在外边，庞小侠对阎锡山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他只清晰地听到了“军法从事”四个字。

因为这几天行营人员都在议论，第61军军长李服膺搞不好要倒霉。所以庞小侠首先想到，可能要对李服膺“军法从事”。他突然感到有些恐怖。

灭顶之灾正像一张黑色的大网，悄悄罩向了李服膺。

在滹沱河南岸，李服膺集结起他的残部，由广灵以西经应县向雁门关转进。途中，他接到了阎锡山召集各军军长开会的电报。他的部下里已经有人预感到可能要出事，舆论对晋绥军，尤其是对第61军责骂得非常凶。于是左右的人说：“军长，后方各地对天镇的实际战况不明了，难免以讹传讹，有所指责，目前平型关战局危机，全局很快将有变化，不如迟几天去较为妥当。”

但是，李服膺却表现得极为自信，他认为阎不会委屈他。于是，

他骑上战马，带少数随从，毅然起身去太和岭口报到。

与此同时，军部派军械处长刘树勋去第 400 团扣捕团长李生润。第 61 军没能在天镇、阳高坚守更长一点时间，与李生润麻痹大意丢失盘山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追究责任，李生润首当其冲。

然而，李生润却幸运地逃掉了——先是被抓获，而后又被人放掉的。至于是谁放掉的，说法不一。李在溪回忆说，刘树勋将李生润捕获后，送交第 213 旅旅部，军参谋长刘金声念与李生润是老同事的情面，于李生润吃饭时故使眼色，李生润托词解手，越墙逃跑。贾宣宗回忆说，独立第 200 旅旅长刘潭馥(李的顶头上司)在气愤不平的情绪下，主使李当场逃走。杨维垣在回忆中引用傅作义的话说：“我当即指示你们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李团长逮捕解送二战区军法总监部。谁知你们副军长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竟让李生润由军部偷偷换上便衣，化装逃往西安。”

总之，李生润是逃掉了。据说他到西安投奔了胡宗南，并改名李德庵。后来他在胡部当上了少将高参。

如果李生润不逃跑，李服膺的结局会改变吗

李服膺 23 岁那年，被阎锡山派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最让阎锡山看重的一件事也许是，曾为阎从保定军官学校拉回了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十三太保”，他被唤作大哥。这些人后来成了阎锡山打天下的资本。20 多年来，他一贯唯阎锡山之命是从，是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阎锡山的心腹。据说他还是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传说他与何应钦也有拉扯。

他同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同后两人的交往也许令阎锡山稍感不快。

也有人认为他长于外交，短于军事，经常奔走于太原，进行私人活动，很少驻在防地，对所部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在用人上，一贯抓牌子(陆大)、拉关系(同乡、旧部)，练兵时看表面，作战时重私情。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在阎锡山眼里，他是个信得过的亲信，这比什么都重要。

时隔多年之后，已无人能说清李服膺什么时间到达太和岭口的。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刚一到达，阎锡山就命人把他扣了起来，押在张培梅的宪兵队。战区长官部上尉副官庞小侠念及李与他父亲是老朋友，就到设在西梁的宪兵队看他。庞小侠说：“老伯来了，想吃点啥，你就说吧。”

李服膺只是让他给找几本闲书看。他嘴上答应了，回到驻地，根本找不到，也就罢了。

那时李服膺仍然认为自己不会有事，会长扣起他来，是为了应付舆论。所以，在外人看来，他并不是很紧张。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仅仅半个月之后，阎锡山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说阎锡山一上来就想处决李服膺，那也不是事实。据众多的当事者或知情人回忆，阎起初是想包庇李服膺的。日军在晋北长驱直入，与阎锡山决策上优柔寡断，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有极大的关系。在南京统帅部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下，为了应付国内舆论，搪塞国民

党政府，更主要的是开脱自己的责任，阎锡山找一只替罪羊，势在难免。当然也不是说李服膺就没有责任，第 400 团大意失盘山，造成整个晋北防线的崩溃，他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据杨维垣的回忆——有一次，傅作义对他说：“原计划在大同地区集结各主力军，准备与敌人进行会战。先是令 61 军在天镇、阳高固守 3 天，迟滞敌人的西犯，掩护主力在大同地区之会战部署，旋又追加固守天镇、阳高任务 3 天，共计 6 天。结果，因为敌板垣师团过南口后，竟从察南向平型关进犯，直抄雁门后方，以致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分令各军进关，重新部署作战，显得很为忙乱。你们军虽然守天镇、阳高已超过时限，但阎长官认为还不够持久，对尔后战局影响不利，特别是放弃绥东与雁北广大国土，使国内舆论哗然……当你们军长被扣起来后，我不止一次地向阎长官进言，盘山永久工事的失守，影响天镇阳高防守和尔后战局，主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潭馥身上。为了严明军纪，激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阎当时同意了 my 建议……”

作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此时在干什么呢庞小侠说，那时，不断有退下来的零散部队。副官处叫老乡蒸馍，过来的士兵每人发给 5 个，伤兵多给几个，没有准备菜。一天，一个伤兵在五道庙拉手掷弹炸死了自己。张培梅知道后，把庞小侠叫过去问道：“你们怎么准备的吃的东西光吃馒头不行，小心你的脑袋！”张培梅的意思是给伤兵弄点菜。

那些日子，张培梅的脸色很难看，动不动就发火。

关于张培梅在李服膺这件事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培梅好杀。他得知李服膺部天镇溃退、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对那些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该处决，才能杀一儆百，提高部队的士气，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对全国其他战场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

二是起初张培梅主张处决李服膺。但当他得知天镇、阳高失守的全过程后，认为李服膺不是死罪。他向阎请求将李服膺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同意。

虽缺乏权威性的史料记载，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半个月之后，在太原省府大堂，阎锡山于深夜提审并下令处决李服膺时，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没有到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这时 he 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来看了看。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唐生智来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

京审理。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一辆汽车悄悄停在省府大堂门口，宪兵从车上押下李服膺。他并没有被捆绑。一进大堂，李服膺蓦然发现大堂内设有公案，两旁宪兵肃立，气氛阴森恐怖，顿时呆住。他嘟囔道：“这是干啥”担任陪审官的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会长一会儿要和你谈，你且等等。”

未几，阎锡山从里边走出。他双手撑在公案上，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睛盯住李服膺，低声说：“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

李服膺插话说：“让我守6天，我守了6天，我有电报……”

“你胡说！”阎锡山逼视着他，顿了顿，“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

李服膺这时流下了眼泪。阎锡山朝周围的人点点头，快步离开。

谢濂说：“慕颜，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诉我。”李服膺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下一摔：“那还说球哩！”

有人上前捆他，谢濂制止：“那像什么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李服膺的肩上。上车后，他对谢濂和宪兵司令张建说：“为啥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人，使我死得不明不白”

车到小东门大教场，他们下车。宪兵司令张建跟着李服膺往前走，还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建往一边让了让，负责行刑的绥署警卫连长康增从背后一枪将李服膺打倒在地。黑暗中看不清他临死时的模样。

连续几天，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败军之将李服膺被惩办的消息，阎锡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秉公办案、阎长官“挥泪斩马谡”……这一招很灵，李服膺一死，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化解了。

李服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三个多月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在武昌被处决。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终年都是 48 岁。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死都曾轰动一时，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

罪名一样，死法一样，内情却有别。1938 年 1 月 28 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自作战以来，死法虽然不同，我国已死了不少的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之死，人人为之掉泪，朱耀华(第 18 师师长，淞沪会战中兵败自杀——笔者注)之死，尚有人为之惋惜，李服膺之死，亦尚有人为之代抱不平，只有‘青天草包’(指

韩复榘)之死，人们却认为是死得应该的。”

50 多年来，国内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权威性的文章，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大都把李服膺和韩复榘视为同类。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却这样写道：“从 9 月 5 日开始攻击……天镇县城之敌仍旧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没有退却，11 日(日军)才攻占县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

1937 年 9 月中旬，放弃了“大同会战”的阎锡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日军精锐的第 5 师团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似的，直趋内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关隘平型关。后来被海峡两岸的战史学家皆认可的“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

第二章 聚焦平型关

1、要么不打，要么就打出个样子来

1937年9月12日，拂晓。从半夜开始，就下起了沥沥淅淅的秋雨。9月的原野上，已长成半人多高的玉米和高粱在并不密集的雨中静静伫立，水珠儿从叶片上轻轻滑落，在湿润的土地上渐渐凝成混浊的水洼。因这一年的雨水格外多，不远处的壶流河的水面比往年宽出了许多。

虽然已风传日本人很快就要到来的消息，但位于察南蔚县和山西广灵县结合部的暖泉镇仍然显示出一派少见的宁静。当地的百姓大都以为日本鬼子走铁路，走公路，不会到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就连晋绥军第73师派驻这儿的一个连的警戒部队也这么认为。所以，这天拂晓，当一阵尖利的枪声突然响起时，人们似乎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仅仅一袋烟的工夫，驻扎在暖泉镇的第73师一个连就被报销了，而且鲜有漏网者。进攻他们的是日军第5师团的主力第9旅团。

这便是强悍的第5师团进犯平型关的前哨战。

9月13日，还是拂晓。天上仍然下着雨。在暖泉镇西面10多公里远的洗马庄，第73师第424团设在村口的哨兵发现情况异常，迅速鸣枪报警。

洗马庄在广灵县城以东 10 公里远，因元朝时在宫廷中专司洗马的庞清曾在此居住过，故名洗马庄。

昨天，从暖泉镇逃难来的人已经向第 424 团团长吕超然上校报告了日军到来的消息。他的部队为此加强了警戒。枪声一响，官兵们马上进入阵地。

进攻洗马庄的日军大约有一个联队，1000 多人，10 余门山炮，还有 6 架飞机前来助阵。第一线阵地很快被突破。临近中午的时候，吕超然亲率团预备队一个连向敌逆袭，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当即毙命。第 424 团随即溃退。在他们的阵地前，日军留下了 100 多具尸体。

9 月 14 日，还是拂晓。雨停了，但天气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大约有两个联队的日军，向第 73 师主力守卫的广灵城发起猛烈的攻击，上午 10 时左右，广灵失陷。师长刘奉滨负伤后率残部逃往平型关。

与此同时，日军第 5 师团第 1 旅团在北面的火烧岭、刘家沟一带，向高桂滋的第 84 师、李仙洲的第 21 师发起攻击，守军阵地多数被突破。

太和岭口。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阎锡山还未及做出反应。对于日军在察南和晋东北动手，他感到惶惑。他更倾向于认为，这大概是日本人玩的一个小把戏——派小股部队，到这几个地方点几把火，佯攻一下，其目的无非是干扰他对晋北的注意力。因此，他仍全神贯注于晋北地区，考虑怎样扭转晋北一线的不利局面。

出乎他意料的是，日军攻占广灵后，又紧追第 73 师，直趋灵丘；又据情报部门报告，打垮第 73 师等部的，是板垣第 5 师团的主力时，阎锡山好一阵子没说出话来。他简直懵了。

很显然，第 5 师团的行动等于从他的背后插了一刀，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终于醒悟过来，日军的主攻方向不在大同——雁门关，而在灵丘——平型关。攻占了平型关，就等于切断了雁门关的后路。这仗还怎么打日军主力选择的进攻路线，是他本以为最安全的地带，那里地形复杂，为用兵之大忌，是一个静态的战役走廊。当然，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就像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一样。那里同时是一个要害点，阎锡山清楚。但他认为日本人人地生疏，轻易不敢冒这个险，因此，他只部署了少量的兵力以防万一。这就形成了中国军队大同——涿州防线的中间裂缝，也正是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防御部署的空当。然而，日本人偏偏钻了这个空子！如果他们对这里的地形不是了如指掌的话，是不敢冒这个险的……

阎锡山一手摸着胡须，一手插在裤后腰里，在行营的小院里踱了一会儿步。他想起来了，一年前……

一年前的夏天，阎锡山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的队长、现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给他写信，说要来山西拜访他，顺便观光旅游。他马上回信表示欢迎。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板垣一不坐飞机，二不乘汽车，而是脱掉戎装，换上便衣，仅带少数随从，沿着察哈尔省的蔚县至山西代县的蔚代公路，徒步旅行。他们风餐露宿，对沿途所过之处的山川地貌一一进行了勘察。这些阎锡山都知道，但当时他

并未在意。现在，当板垣再次领兵沿着这条路线直插他的后背时，悔之已晚。

行营的很多人都看到，这一刻阎锡山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他跺了跺脚，怒骂道：“板垣这个狗杂种，我哪想到他还是特务！……”

当阎锡山弄清楚日军主力的真正意图是攻取平型关时，他只得忍痛放弃雁北和绥远，重新集结兵力，沿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设防，其重点在平型关。

经与参谋长朱绶光等人商议后，阎锡山紧急部署从雁北撤兵，具体情况是：把在东井集的杨澄源第 34 军撤至应县下社、茹越口，收容李服膺的第 101 师、独立 200 旅等残部，归入该军；而把原属该军的郭宗汾第 71 师和续儒林的新编第 1 旅编为第 2 预备军，置于繁峙城附近；

把在大同、聚乐堡的王靖国第 19 军后撤至雁门关，加入方克猷独立第 2 旅，守备雁门山；

在绥东丰镇的傅作义第 35 军，向阳方口、宁武转进；

赵承绶的骑兵第 1 军退至朔县、神池方面，警戒雁门、宁武两翼；

门炳岳骑兵师退至平地泉，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共同警戒绥东；

在应县新编成的陈长捷预备第 1 军，分经雁门关、虎峪口撤至雁门山的代县。

这项措施的一个最突出的地方就是阎锡山彻底放弃了绥远。如今，为了山西，他已经顾不上绥远了。虽然雁北也有所放弃，但雁门

山和恒山一线仍有重兵把守，说明他仍然打算在两个方向作战。

为了应急，阎锡山先调雁门关附近的孟宪吉独立第8旅驰赴平型关，增援第73师；又命令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前去指挥已进至平型关附近的部队。

恰恰这个时候，蒋介石发来了电报：

集中兵力于一点，与敌决战，是失我之所长，而补敌之短，此非不得已，切勿轻用。

看罢电文，阎锡山有些不快。他对朱绶光说：“不集中兵力与敌决战，难道咱们也像共产党那样钻山沟打游击再说你蒋介石不也正在上海集中兵力与日本大打吗”

朱绶光说：“司令长官，可否这样认为，咱们放弃大同会战正是按照委座这个意思办的，所以咱们不应受指责。”

阎锡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对。”

9月18日。太和岭口。阎锡山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

每一个与会者的脸色都不好看，似乎都怀着满腹心事。彼此都是熟人，以往每次开会，总有人插科打诨，说几句笑话，这回全免了，连相互间的握手、问候都显得生硬，能说一句不说两句。

窑洞里烟雾腾腾，除了咳嗽声、茶杯盖碰撞杯沿的声音外，没人说话。突然，有人轻喊一声，大家一齐朝门口望去，就见阎锡山在行营参谋长朱绶光等人的陪同下，走进窑洞。众人站起身，向阎锡山颌首致意，阎锡山摆摆手，意思是让大家坐。

阎锡山先讲。他说这一次的情况使他想起了 1927 年，那年他与奉军张作霖作战，对方几十万大军和他有限的几万人马，在灵丘、繁峙间对阵，敌强我弱。他利用这一带有利的地形，凭险顽抗，终于大败奉军。这次和上次何其相似，只要各位将领同心协力，历史就有可能重演。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加重语气说：“我们此次与日本人会战的方针是，拟诱敌深入到沙河以西地区，从恒山、五台山两方面发动钳击，并截断平型关要隘，歼灭敌人于滹沱河上游盆地。”

紧接着，朱绶光离开座位，来到墙上挂着的巨大地图前，讲解战区长官部关于此次战役的具体部署。

平型关正面：由第 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孙楚的第 33 军(包括第 3、第 8 两个独立旅)，和高桂滋的第 17 军(高的第 84 师和李仙洲的第 21 师)，以及从广灵退下来的第 73 师(王思田旅长代理师长)，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排列独立第 3 旅、第 73 师、独立第 8 旅，迄平型关正面；团城口方面，并列第 17 军的第 84 师和第 21 师。各部迅速设置阵地，掩护雁北各部撤入雁门山、恒山以内。先依靠险要地势，阻止日军锐进，给予重大消耗，然后主动向南转移，分别从大营、沙河隐入五台山，作为南机动兵团，再待机出动。

雁门山北侧：主战场的北侧，依恒山、雁门山为屏障，除布置刘茂恩第 15 军于恒山外，以杨澄源第 34 军第 101 师和梁鉴堂旅，分守北娄口、大小石口、茹越口间的已设阵地。保持重点于繁峙北的茹越

口。从太原刚调来的姜玉贞旅，到繁峙以北地区，归入第 34 军序列。以王靖国第 19 军加入方克猷独立第 2 旅，附属山、野炮各一团，右连第 34 军，扼守五斗山、马兰口、虎峪口、水峪口至雁门关、阳方口间的已设阵地，保持重点于代县、雁门关间。在傅作义的第 35 军未撤至宁武时，姜玉贞独立旅暂时控制于阳明堡，以对雁门关重点策应。

决战地带：选定沙河及繁峙间的地区为决战地带。以第 34 军军长杨澄源统一指挥主阵地带的陈长捷第 1 预备军和郭宗汾的第 2 预备军，加强主阵地带的各项防御力量。

机动兵团：第 35 军进入阳方口于宁武集结后，向代县挺进，适时进出于繁峙以北的恒山方面，连同刘茂恩的第 15 军为北机动兵团；南机动兵团以孙楚为总指挥，高桂滋的第 17 军为主力。

朱绶光讲解完战区长官部的作战部署后，回到座位上。阎锡山扫视了一遍众人，问：“我的这个部署怎么样”

没人吭声。也许众人还未来得及思考，一时拿不出意见来。

阎锡山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神色。别人能看出来，他对他的方案十分满意。果然，他说：“咱这是给板垣这个狗杂种布了一个口袋阵，让他进得来，出不去！”

他特别关心“口袋底”阵地。会议结束后，特意留下陈长捷和郭宗汾两个新提升的军长，面授要领，要他们无论如何要把“口袋底”扎紧。并要求他们马上到沙河、繁峙间周密勘察主阵地带，选定扼要地形，构成数道最强固的“口袋底”，以胶着日军的主力。

阎锡山共投入 7 个军的兵力，约 8 万人，加上已推进至内长城一线的八路军第 115 师，总人数近 10 万人。

此次同没有实现的“大同会战”一样，阎锡山有决心好好打一仗。这次会议召开前的两天，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来太和岭口见他，他们进行了密谈。彭雪枫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青年将领，他 1926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大队政委、纵队政委、师政委、中央军委一局局长。自他肩负重要使命来山西后，多次同阎锡山交谈。阎锡山也很喜欢这个办事干练、机敏多谋、极守信义的青年人，因此，每逢彭雪枫托梁化之捎信要见他时，他总能痛快答应。

彭雪枫告诉阎锡山，八路军第 115 师此时已由原平向平型关开进。阎锡山显得十分激动。他说：“如能得到贵军的帮助，我阎某下定决心背着棺材抗战！”

彭雪枫也激动地说：“如果司令长官决心抗战到底，我们就拥护你领导我们抗战到底！”

阎锡山当即答应，先送给八路军“79”式步枪子弹 50 万发和冲锋枪、机关枪 200 支。

3 天之后，朱德来到了太和岭口。也就是周恩来陪同朱德来的那次。

一辆吉普车在太和岭口至山阴县的土石公路上穿行，车后扬起大团大团的黄尘。傅作义坐在车上，闷闷不乐，一言不发。早在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会战”时，朱绶光就曾给他打电话，说司令长官打算将第 35 军调入雁门关内，保卫山西。并派赵承绶代理绥远省主席。

他的内心有说不出的苦衷。他作为绥远省主席，有守卫绥远之责，而且手下兵员多为绥远子弟，也有返绥保卫家乡的心愿。在太和岭口开会时，他几次想找阎锡山，要求回绥远，但阎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好像阎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现在，命令已下，第 35 军开往阳方口、宁武集结，然后向代县挺进，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车过桑干河时，傅作义对随行的参谋人员说：“我是绥远省主席，35 军是绥远人民供养的，理应回绥远，保卫绥远人民，可阎长官命我们撤到雁门关以南，军令不可违，我太对不住绥远百姓了！”

他的声音很低沉。

部队已由丰镇动身，傅作义赶至山阴时，先头第 218 旅正好到达。他问旅长董其武：“部队情绪怎么样”

董其武：“仍有不少人想不通。”

傅作义：“要告诉弟兄们，在哪里都是打鬼子嘛。而且要加快行军速度，我 35 军要么不打，要打就打出个样子来！”

第 6 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大营镇东山底。大营是繁峙县城东面的一个小镇，它位于恒山与五台山之间的滹沱河边，西距繁峙城 40 多公里，东距平型关仅 15 公里。平型关是晋北的险要关隘，内长城从河北省境内逶迤而来，进入山西后，经镢柄山、牛邦口来到这里，由此经西北面的团城口向西，沿恒山山脊至阳方口，然后再向北延伸至偏关的老营东北侧与外长城相接。出平型关向东北，是一条长约 5 公里，宽数十米的关沟，关沟两边是起伏的山峦，沟口有个叫小寨的村庄；由小寨再向东约 5 公里，便是灵丘县境内的东河南镇。由灵丘通

往大营的公路，就沿着东河南镇、小寨、关沟，出平型关口后到达大营。

大营镇周围的地形条件，决定了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第二战区长官部在部署平型关战役时，认为把它作为第6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是再合适不过的。

第6集团军的总司令是杨爱源，但在平型关战役期间，杨爱源却很少来大营，副总司令孙楚作为杨爱源的代理人，实际担负着平型关方面作战指挥的全责。

孙楚生来瘦弱，身材不高，被同僚戏称为“孙猴子”。他办事麻利，从不拖泥带水，在晋军将领中，比较有战术思想。然而，他在实际指挥上，又常常喜欢翻花样，举措恍惚，有“孙神经”的诨号。

20多年前，孙楚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学习时，与大他4岁的同期同学杨爱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被人视为莫逆之交。他聪明机警，才思敏捷，遇事颇能谋划；杨爱源则老成稳健，善于利用他人所长。在校期间，孙成绩优异，但家境贫寒；杨才智短拙，却手头宽裕。因此，孙在学业上不断地帮助杨，杨则在经济上不时接济孙。任军职后，杨由于是五台人，被阎锡山视为亲信不断擢升，孙是晋南人，沾不上这个光，他只有凭借自己的军事才干，再就是杨的庇荫，虽不能与杨齐头并进，但能够随杨晋升。20多年来，或杨为团、旅、师、军长，孙为营、团、旅、师长；或杨为主官，孙任副职。每逢遇到重大战事，作战计划基本由孙来拟定，最后由杨来拍板定夺。熟悉他们的人，称他们“孙不离杨，杨不离孙，孙杨合璧，相得益彰”。

1928 年 2 月，国民革命军举兵进行二次北伐，晋军编为第 3 集团军，奉命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计划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孙楚作为前敌总指挥，“率师向东，策划指挥，衣不解带者逾 50 余日，仅以 2 万余众敌军阉 10 余万精锐之师，一败敌军于石家庄，再挫敌锋于定州，望都城外激战最烈，方顺桥前大破敌军，此后以战胜之余威作破竹之进展而下保定。”

6 月 7 日夜，北京城外人声嘈杂，大批奉军沿着保定通往北京的道路向北溃退，连驻守北京城的奉军也正准备撤离，到处是车马，到处是人流，异常混乱。就在这条乱作一团的道路上，一辆卡车鸣着喇叭行驶，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小个子军官，黑暗中看不清他的军衔，但隐约能看到他戴着一顶奉军军官的大盖帽，溃散的奉军慌忙退向路边，让开道路，不时有人向他举手行礼。他就是孙楚。在他的后面，有数十辆卡车鱼贯跟进，那是他率领的卫队营。次日凌晨，这队人马进入北京城。孙楚的突然降临，使奉军留守人员顿时慌了手脚，纷纷逃往日租界。孙楚化装奇袭，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为晋军抢占了北京城。这大概是他的军事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

12 天后，国民政府决定改北京为北平。

不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通令嘉奖有功人员，孙楚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被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

时过境迁，在日军兵临平型关下的时刻，孙楚又被阎锡山指定为杨爱源的代理人，负责指挥平型关之战，这说明阎锡山更为信任他。

他还能再创造一个辉煌吗

2、林彪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之情

9月14日，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率部来到太原北面的原平。原平是崞县所属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同蒲铁路从这里拐向西北，如果去雁门关或繁峙、平型关，从原平下车最为便捷。抗战爆发后，第二战区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军事交通处。

师长林彪已经提前赶到了原平。他是最早深入山西腹地的八路军高级将领。由于战乱，昔日颇为繁华的原平镇已显出战前的混乱和颓败。第343旅到来后，以营为单位分驻到周围的几个村庄，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镇内，只派宣传队来镇上刷写标语。

15日清晨，李天佑第686团的一个营，作为第343旅先头部队，从原平出发，徒步前往代县。其余的部队等待战区派出的车辆，以便尽快赶往大营。

紧接着，第二战区派来一个汽车团，负责输送第343旅主力和师独立团。大约在16日前后，这些部队在大营集结完毕。

在第6集团军总部，林彪和孙楚的手握在了一起。从外表上看，这两个人都是那么瘦弱，个头也差不多。不同的是，林彪面孔苍白，略显忧郁；而孙楚脸色红润，显得开朗、从容。当然，林彪由于比孙楚小近20岁，他身上的青春气息是孙楚无法比拟的。

根据第二战区的作战部署和八路军总部拟定的行动计划，第343旅和师独立团只在大营停留一夜，便出发向灵丘以南地区开进，19日进抵上寨地区休整待命。

部队向前开进后，林彪仍留在大营与孙楚商讨两军的相互配合问

题。20 日，似乎已能够听到前方隆隆的炮声，林彪呆不住了，乘孙楚的吉普车，率少数随从人员和电台到前线侦察。

自从踏上山西的土地之后，林彪便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之情。一路之上，他用兵家的眼光审视着坚如铁壁的太行山、重门叠户的吕梁山，还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山峰，使他这个长期征战于南国水乡的军人，有一种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率陈光的第 343 旅和师独立团，作为八路军的一支先遣劲旅，率先迎敌而进，挺进的方向，恰好是晋、察、冀交界地区，雄踞内长城要隘的平型关，成了他们的必经之地。

吉普车沿着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那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来到北岳恒山和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接壤处，然后又吃力地爬上海拔 1800 米的长城隘口——一座署有“平型关”三字的残颓的拱门迎面而来。

林彪冲司机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吉普车迅即停下。他们下车，林彪仰起脸来，对准“平型关”三个字仔细瞅了好一阵。然后，他登上平型关巅，举起胸前的望远镜观望。无论是北面的恒山，还是南面的五台山，这些层峦叠嶂的山峰，以及盘亘于崇山峻岭间的内长城，都能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很容易使他产生一种激情。最后，他将目光越过平型关之巅，望见了关前的一条峡谷甬道，它由西向东，曲曲弯弯，穿山而过，一直通向很远的地方。深谷两侧，是险峻的山壁，一条公路蜿蜒其间，沿着这条公路，就能到达灵丘，通过灵丘而到冀西……

10 年前，他就听说过平型关，那是晋奉战争中的一段往事，但

印象早就模糊了。如今，置身在这座著名的雄关之上，前方炮声似乎已隐约可闻时，他明白，马上就要有仗打了，而且肯定就在附近打。

当然，这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林彪自己，都不会想到，仅仅 5 天之后，第 115 师就创造了一个举世震惊的结果……

山风一阵阵地刮来，初秋的晋北已是寒气袭人。林彪和部队的官兵一样，仍穿着刚换上的国民革命军的单装，冷风一吹，他和他的随从人员都不由打起了寒颤。

吉普车从平型关口驶出，沿着坑洼不平的公路向灵丘方向前行，车子出关口不远，就钻进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这条沟道林彪刚才在望远镜里已看到过，此时他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沟长约 5 公里，深数丈到数十丈不等，很难攀登上沟沿。而且沟底的甬道仅能通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途中，仅见到一个叫老爷庙的地方有个缺口，能通到山上。

吉普车再次停下来。林彪在警卫员杨兴桂的搀扶下艰难地攀上老爷庙以及庙后的老爷岭。这时，杨兴桂听到师长说：“如果阻住正面路口，截断敌人的增援，将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地里，在缺口处的高地上设置重兵，公路上的敌人就是瓮中之鳖了。”

他们到达灵丘城时，得知日军已前进到距城不到 5 公里远的地方，不能多作停留，于是原路返回，途中又在东河南镇一带察看了地形，然后回到大营。

21 日，林彪向孙楚辞行。他骑马赶到上寨，暂时与第 343 旅旅部驻在一起，等待聂荣臻率师直属部队和第 344 旅到来。

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关于作战方针和布置原则的训令》。训令中讲到第 115 师时，这样写道：

115 师陈旅控制于上寨镇附近，小部经常袭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徐旅最好位于阜平东北，随时协助陈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挺进游击队，深入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总直属队开到五台附近，发动五台以南、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群众。

对这个训令的主要内容，林彪大体上是同意的。但在第 115 师的具体使用上，他有不同的看法。

两天后，一大早，他问随从参谋：“聂副师长率师部直属队和 344 旅今天能来这里吗”

9 月 20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号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来到太原。

黄绍竑这年已经 52 岁。“七·七”事变发生时，他任湖北省主席。8 月，蒋介石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面设 6 个部，最先成立的是第一部，主管作战。黄绍竑被任命为第一部部长。他认为军队的实权都握在陈诚手里，而他对军队的情况又不熟悉，只不过把蒋的面谕或手谕拟成命令发布下去，或汇集各方面的情况向蒋报告，他感到自己至多算个傀儡。而且尽管如此，陈诚仍不放过他，在给蒋的电报中，称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此，他对作战部部长这一别人十分垂涎的职务并无兴趣。

蒋介石找到黄绍竑，说：“季宽，如今我们在华北和淞沪两地与日本人决战，华北作战的重点在山西。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进入山西，再经汉中进入四川。你去一趟山西，同阎锡山商量大同失守后的作战计划，怎样”

黄绍竑这才有了山西之行。来到太原后，梁化之安排他住山西大饭店。此时八路军已大部进入山西，他在饭店里碰见不少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很想和这些过去曾经是对手的年轻人交谈一下，无奈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几天以后，黄绍竑来太和岭口和阎锡山见面，在座的还有赵戴文、朱绶光、张培梅。阎锡山说：“欢迎黄部长来山西。委座有何谕示”

黄绍竑：“蒋委员长认为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绥军对防守也有很好的经验，务要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铁路的西侧面，不让敌军沿平汉路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

阎锡山：“中央的指示，我很清楚，也很同意。我在抗战前，在山西境内各要隘及太原城北郊，都做了一些国防工事，也就是为了要保卫山西。”

停了停，阎锡山又说：“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自动放弃。我同委员长的指示一样，要死守住东起平型关、雁门关，西至阳方口之线。我的判断，敌人必先取山西，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如果平汉路方面，能在保定以北挡住敌人，敌人光从大同方面进攻雁门关，尚易抵御。如果保定、石家庄不守，敌人必然进攻娘子关，从东、北两个方

向包围山西。我感到敌人对晋北方面是主力的进攻，平汉路方面是助攻。晋北方面现在只有晋绥军和少量的八路军，兵力尚嫌不足，不能兼顾娘子关方面。为确保山西，尚须加调中央军协同作战。”

黄绍竑认为阎锡山的分析极有道理，答应回南京后向蒋建议，调有力部队支援山西。

临离开太和岭口时，阎锡山似乎有些激动地说：“我坐镇雁门关，决不后退。请你报告蒋委员长，放心好了！”

3、日军最精锐的第 5 师团开赴山西

自第 73 师在广灵被击溃后，平型关前倒也出奇地平静了几几天，一时未见日军的大部队来攻。身在大营东山底的指挥所里，孙楚居然感到有点寂寥。

他喜欢琢磨。但琢磨来琢磨去，他又翻起了花样——像熟悉他的人说的那样，他开始发“神经”了。

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时，孙楚没有去，阎锡山让他坐镇大营，一步也不能离开，防止日军大部队来袭。杨爱源回来后，向他传达战区长官部的部署，他当时没说什么，心里却对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有不同的看法。当他认为自己的想法逐渐成熟后，便找到杨爱源，一五一十地讲给杨爱源听。本来他们平时就无话不谈，如此重要的关头，杨爱源也想听听孙楚的想法。

孙楚指着墙壁上一张刚挂上没几天的地图，急煎煎地对杨爱源说：“星如你看，从蔚县进攻广灵之敌，不径趋浑源、抄击大同后方，

而向灵丘前进，这说明了什么”

杨爱源摇摇头，没有回答。

孙楚说：“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敌人兵团都是机械化部队，机动能力强，重武器多，这就决定了敌人仍必利用铁道交通之便，向大同输送，南攻雁门山。这也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一般规律。”

杨爱源习惯性地扶了扶近视眼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孙楚又说：“我判断，目前我军的主作战方向仍在雁门山一带。而进攻广灵、灵丘之敌，不过是一支游动牵制的奇兵而已。如按阎司令长官的把敌人放进关内打的设想，则利于敌之分进合击，不是我军掌握内线作战的要领。”

杨爱源频频点头。似乎是受到杨的鼓励，孙楚越讲越来劲：“星如，我估计，以第 17 军、第 33 军两部扼守平型关、团城口间的险要地带，尚有把握。再配合八路军林师抄击灵丘敌后，相机出击，可能打个局部胜仗，对雁门山主战场的作战也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

很显然，孙楚的这一见解同战区紧急军事会议下达的方针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楚的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问题在于，素来缺乏主见的杨爱源竟同意孙楚的这一错误判断。孙楚鼓动说：“星如兄，阎长官相信灵丘之敌系敌之主力，从而忽略了雁门山防线，如此打下去，咱非吃大亏不可。应想法让会长改变主意才对。”

杨爱源说：“萃崖，这事交给我便是。我将亲自去岭口，当面向会长陈述，请他定夺。”

杨爱源说办就办，他快马加鞭赶到太和岭口。偏偏在那里，他又

碰到了第 19 军军长王靖国。这些日子，王靖国时刻不离阎的左右，参与大计，深得信任。杨爱源刚陈述完，阎锡山还未表态，王靖国就站出来说：“会长，治安认为，萃崖的意见是极为正确的。我军在平绥路沿线，所有的抵抗濒于危殆，是由于受到敌之主力的侵犯。具有坦克和重炮的敌人不会选择平型关附近那样的荒山野岭作为主攻方向的……”

王靖国边说边观察阎锡山的脸色。阎锡山说：“治安，你大胆陈述便是。”

王靖国放开道：“治安认为，雁门关仍旧是敌人的主攻方向，这和萃崖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主张把傅作义的 35 军控置于代县和阳明堡地区，作为对未来雁门山主战场的支援。”

三说两说，阎锡山的决心就动摇了。他叫来参谋长朱绶光：“绶光，傅部尚未到来，而且繁峙以东主阵地工事构筑尚需时日，咱就批准孙萃崖、杨星如和王治安的建议，以现有兵力固守平型关、团城口一带，并使李仙洲的第 21 师向北延展一下，与刘茂恩的第 15 军连系起来，转变为对恒山东侧的掩护。这样，不论平型关、还是雁门关，都好办了。”

这种前后矛盾、举止失措的部署，使本已风雨飘摇的平型关防线变得更为雪上加霜。仅仅几天之后，它所带来的恶果就出现了……

9 月 22 日凌晨。在蔚县城内的日军第 5 师团司令部内，一个矮小、粗壮、着一身细黄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日军高级将领，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前面的建筑物上高挂的一面太阳旗出神。他

就是第 5 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第 5 师团的司令部里一片忙碌景象。每逢大战来临之前，都是这种气氛，忙乱而有节奏，紧张而有秩序，师团部的参谋和机要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场合。往往这时候，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板垣中将却显得超脱而平静。

对于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讲，板垣这个名字早已不令人感到新鲜了。他 1885 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从进入日本军界起，即开始从事侵华活动，而且一贯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在他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以及云南、汉口、沈阳等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公使馆武官期间，就已获得了“中国通”的称号。他不仅能流利地用汉语对话、写作，而且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1928 年 6 月，另一个著名的日本军人河本大作大佐，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阴谋炸死了家喻户晓的军阀张作霖，不久，河本在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解职，接替河本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便是已在日本军界崭露头角的板垣征四郎。板垣同河本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不久，就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合谋策划参与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他同颇负“盛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联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也就是说，板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创造了两个“惊世之举”。后来，他的官阶不断上升，先是关东军参谋副长，然后是参谋长，日军大举侵华的前夜，他被调任陆军本部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第 5 师团的师团长。他对这个任命非常满意。第 5 师团是在明治二十一年编

成的精锐部队，是日军建军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曾入侵中国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建立了“殊功”。

“七·七”事变后，第5师团作为日本国内第一批动员侵华的师团，率先进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本打算将强大的第5师团投入平汉铁路正面，作为战略进攻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南口战役展开后，由于第11旅团进攻受挫，第5师团才奉令加入平绥线方面的战斗。这正中板垣的下怀。他早就对山西有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战争展开以后，进攻华北的日军应该集中主力，首先向山西挺进，而以西进绥远，南下河北，作为进攻山西的两翼。同时，华北方面军应前出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在这有1亿人口的范围内，建立日军控制下的政权组织，以便获得支援战争的物质资源。为此，他向6年前同他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密友、现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中将发出私人信件，阐述他的观点。

半个月前，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编组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编为方面军直辖师团。有资料表明，9月4日刚刚上任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上任伊始，就把板垣召到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寺内是个资格更老的职业军人，他深知在他的方面军中，第5师团所占的分量，他还清楚，在皇军所有的师团长一级的将领中，无论从资历，还是从魄力上衡量，板垣都是胜人一筹的。

那天他们的交谈，主要围绕山西进行。他们谈到了山西的名胜，山西的地理位置的重要，谈到了阎锡山以及蒋阎的矛盾。寺内的观点

比较保守，他认为将战争扩大到山西十分危险，关东军也没有力量进攻山西。而板垣的意见恰恰相反，他对山西的兴趣并不是寺内所能说服的。

寺内说：“基于对华战争全盘考虑，方面军感到应首先击溃平汉铁路正面的中国军队，也就是实施华北平原会战计划，第5师团进入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后，主要应作为华北皇军主力的右翼掩护兵团，必要时迅速向保定地区转进，参加该方面的作战。”

板垣说：“对阎百川和他的晋绥军，司令官不必担心。30多年来，我以他在帝国留学时的教官身份，和他的往来一直未曾间断，我深知他的为人——狡猾、保守、个人利益至上。有趣的是，他对大日本帝国充满了幻想。以我第5师团和东条君的察哈尔派遣兵团，从他的手中夺取山西，是有此把握的。”

寺内未能完全说服板垣。但板垣作为一个久经风浪的军人，执行上司的命令是不会含糊的。第5师团进入察南蔚县后，仍准备两面作战：一面寻找机会占领山西，一面担任平汉路方面的右翼掩护部队，随时准备投入保定会战。占领山西是板垣的心愿，参加保定会战是上司的命令，舍弃哪一头都难以令人愉快。

占领山西，控制华北——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应当说板垣的思路是正确的。

由于日军统帅部缺乏战略远见，起初并未打算在山西进行大规模作战。

40年后，蒋纬国先生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中，也进行了这

样的描绘：

……第 5 师团主力，由怀来攻取蔚县……此时，第 5 师团基于华北方面军命令，正准备以其主力由蔚县向保定平地转用，唯该师团接获在晋察省境之中国军，有采取攻势之情报，乃决定击破该方面中国军后，再向保定平地转移……

由此可见，日军山西作战的始作俑者是板垣征四郎。

而且第 5 师团和它的配属部队一进入山西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那天，在寺内和板垣的谈话中，极少提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一支十分神秘的部队。也许这支装备极差、人数很少的队伍不值一提。他们都不会想到，强大的第 5 师团刚到达平型关下，还未放开手脚，就遭到一次惨重的打击。给予他们重重一击的，又恰恰是这支他们不屑一提的队伍……

但是，工于心计的寺内已经从板垣的谈话中，明显感到了这位部下下的骄纵和狂妄。这是一个失败的信号。

话又说回来，那时的日军将领，又有几个不狂妄和骄纵呢

在 9 月 22 日凌晨的雨雾中，默默伫立于窗前的板垣接到了第 21 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从前方发来的电报。说 he 已率所部进入东河南镇以西的蔡家峪一带，正向平型关顺利攻击中。板垣接到这一报告后，紧绷着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平型关之战——抗战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大营。当阎锡山听信孙楚的意见临时改变最初的部署后，孙楚着实高兴了一阵子。随即他也相应调整了一下平型关正面的防御部署：从广灵溃退下来的第 73 师，占领平型关南面马跑泉经平型关至东跑池南侧之线；第 17 军占领东跑池经团城口、西河口至西河口西北高地之线；第 15 军占领大坪村(西河口西北)经凌云口至北楼口之线；独立第 8 旅为集团军总预备队，集结于大营。然而，第 73 师由于刚溃败下来，一时不能占领阵地组织防御，孙楚只好命令独 8 旅顶上第 73 师的空缺。如此一来，孙楚手中连一兵一卒的预备队都没有了。他的胆量确实够大的。

最先同日军第 21 旅团接火的，是新编第 11 团的一个营，孙楚派他们到东河南镇与小寨间的蔡家峪附近破坏公路，意图延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这个营设置一个连担任警戒，其余的人包括几十个民夫用铁锹和镐头在公路上挖沟。因为长官告诉他们说，不把沟挖好，就是鬼子来了，谁也不能跑，你跑，鬼子开枪，我们也开枪。所以他们干得十分卖力，不一会儿的工夫，本来就坑洼不平的公路上，出现了数不清的沟沟坎坎。正在这时，前面的道路上，扬起一阵烟尘，就见几百个穿米黄色衣服的鬼子兵成战斗队形向这边开进，中间还夹着几辆汽车。他们头上的钢盔和手中的三八大盖枪闪闪发光。有人喊一声：“不好，小鬼子来了……”

民工们扔下手中的工具，拔腿就跑。士兵们则扔下工具，拿起武器，找个隐蔽处卧倒。与此同时，几发掷弹筒射出的炮弹呼啸着飞过来，顿时就有人被炸飞。

与这个营遭遇的，正是第 21 旅团长三浦敏事率领的两个大队。

由于公路已被破坏，日军的汽车无法开动，只好派步兵成散兵线向前冲锋。守军虽没有重武器，仅有两挺轻机枪，但是地形有利，居高临下，不费劲地往下丢手榴弹就行，居然坚持到中午才被击溃。

三浦集合起已有较大伤亡的两个大队，边修路边前进。再往前，便碰上了第 33 军独 8 旅第 623 团。

这天早晨，第 623 团第 1 营营长刘光耀将所属的 3 个步兵连布置好，然后将机枪连的 4 挺马克沁重机枪分到各连，营指挥所设在第 2 连阵地后面仅 50 米处。他命第 2 连中尉排长司金贵带一个排到前方公路侦察敌情，然后，把电话打到团长郎春生那里。郎春生问：“有情况吗”

“从灵丘方向退下来的散兵络绎不绝，这些熊兵说灵丘城里驻满了鬼子兵。”

“要防止他们散布恐敌情绪。最好将他们强制收容，参加战斗，不然，一打仗就往后跑，谁还守阵地”

临近傍晚，司金贵回来报告说：“山下公路上已经没有从前方退下来的友军散兵了。中午曾有部队同鬼子接火。”

刘光耀问：“你破坏公路了吗”

司金贵说：“没有。”刘光耀当即给团长打电话。团长答复说：“友军情况不明，俟弄清后再决定破坏公路。”由于他们阵地前的公路未及破坏，三浦敏事于当夜即率部前来攻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司金贵在跃起投弹时，被一颗机枪子弹击中，身负重伤。初次交

战，1营伤亡了20多人。

与此同时，占领浑源的第21旅团第21联队经小道沟、西河村到达平型关前，猛攻第623团第2营防守的东、西跑池南北侧各高地。这天夜里，平型关前枪声不断，2营的5、6两个连的士兵们还跳出战壕，与接近之敌进行了数度肉搏。虽付出了上百人的伤亡，但阻止了日军的攻势。次日上午，这两个连200多名官兵几乎全部阵亡，团预备队紧接着顶上。

独8旅的官兵们在坚守了一天一夜后，三浦敏事仍未能突破他们的防线，攻势顿挫。第21旅团被迫改变主攻方向。

应当说，中国军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好景不长，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

自进入山西后，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眉眼就没舒展开过。尤其是他的第84师被放在平型关正面，而且又是受孙楚的指挥时，他更是满心的不高兴。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天，在陕北剿共时，他就曾受过孙楚的节制，那时，大家都想让对方的部队打头阵，把正面留给对方，因孙楚是上司，高桂滋吃的亏自然多一些。第84师不是中央嫡系，作为杂牌，保存实力尤为重要。高桂滋虽然瞧不起刘汝明之类的人，强敌面前一退千里，但也不想过多地损失自己。阎锡山看透了他的心思，向蒋介石建议，将李仙洲的第21师归他节制，并任命他为第17军军长——无非是给他块热砖头抱抱，一张空头支票而已。第21师是中央军，他能指挥动李仙洲吗说到底还得靠他的第84师在这世上混饭吃。因此，他最担心的就是别给“孙神经”牺牲

掉。

日军第 21 旅团在独立第 8 旅的阵地前一筹莫展，三浦只得改变路线，沿灵丘、浑源间的临时公路，绕过蔡家峪，转攻团城口。这正好打在高桂滋和李仙洲的结合部上。问题一下子就出现了。

高桂滋的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 10 多公里远的一座民房里，他命副官随时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大约 23 日午后，日军开始炮击第 84 师驻守在东、西跑池的部队。还未和敌步兵接火，高桂滋就让值班参谋给他接通了孙楚的电话。

高桂滋说：“孙副总，敌人攻势十分猛烈，职部伤亡惨重，请速派部队增援！”

孙楚说：“高军长，我集团军各部都在和敌人交战，都在告急。我哪有那么多预备队贵军久经战阵，作风勇猛，坚守几日当无甚问题。请高军长严饬部属，勿使敌人突破！”

孙楚放下了电话。高桂滋感到靠孙楚救不了自己，和幕僚们商量后，直接给阎锡山打电话，意图从阎那里套得活口，好早些与敌脱离。

高桂滋道：“阎长官，职部已和敌人多有接触，伤亡惨重。按战区长官部的计划，应予撤往关内，将敌人放进关内围击，部下认为不宜再拖……”

阎锡山给予的答复是，一切由孙总指挥决定。

高桂滋试图撤离团城口的愿望第一次落空。

尽管高桂滋力图避战，但第 84 师的中下层官兵的抗战热情仍很高涨。在与日军接踵而来的步兵和战车的较量中，一个营长阵亡，第

502 团团长艾捷三上校负重伤。但由于守军依靠既设的坚固阵地抵抗，尚无重大伤亡。

4、临阵动摇，高桂滋说：当务之急，撤！

第 115 师副师长聂荣臻率师直和徐海东的第 344 旅向前线开进的途中，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刚从侯马上火车，就遇上了大雨，山洪暴发，铁路多处被冲毁，部队只好和铁路员工一起修路，到 9 月中旬末，他们才赶到原平。下火车后，天又下雨了，他们向北走，不少国民党溃兵却向南走，这些溃兵歪戴帽子，用步枪挑着弹药、包裹和抢来的鸡。当时在第 687 团供给部工作的刘炳华回忆说，这些散兵游勇碰到他们就问：“你们往哪里开呀”

“上前线打鬼子！”

“鬼子的大炮飞机厉害呀！”

“我们八路军的步枪、手榴弹更厉害！”

“哈哈！你们他妈的吹牛皮。凭几支吹火筒、大刀片能打鬼子”

“你们不信，就看老子去打吧！”

一天晚上，部队在一个镇子里宿营，一伙退下来的国民党兵也住那里。半夜，一个国民党兵的连长起来解手时，问八路军的哨兵：“你们八路军上哪去”

“哪里有鬼子就上哪里去。”

“去不得，日本人厉害呀！”

“怕死鬼才这样说。”

那位连长无话可说。后来，哨兵又问他：“鬼子有多少人”

“数不清呀！”

“你们为什么不和鬼子拼几下呢”

“没有好的指挥嘛。”

“那么，你带一个连又打死了多少鬼子呢”

“我们还没见到过日本人的样子哩。”

众多的回忆文章都讲到了类似的细节。不少八路军老战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这么说。

那时候，恐日情绪是四处弥漫的。聂荣臻顾虑到繁峙大道上撤退下来的国民党溃兵影响部队士气，决定避开他们，师直和第 344 旅绕道五台、龙泉关。22 日，他们到达下关地区。

就在这一天，三浦敏事少将指挥第 21 旅团主力向平型关正面发起攻击。

23 日早晨，聂荣臻接到了林彪发来的加急电报，让他带师参谋长周昆、第 344 旅旅长徐海东立即赶到上寨，参加上午召开的作战会议。从下关到上寨约 25 公里远，聂荣臻等人随便吃了点饭，骑马赶路。一队战马在山间崎岖的道路上“沓沓”前行，路过一个山口时，他们不由自主地勒马立住。这时，他们清晰地听到了平型关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

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上寨。聂荣臻告诉林彪：“部队都带过来了。前边的情况怎么样”

“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地形不错，可以打

一仗。”说完，林彪摊开地图，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讲给聂荣臻听。然后问聂的看法。

聂荣臻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是很便宜的事。”

他又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

高桂滋仍在不断地向孙楚和阎锡山告急，说他的第 84 师和李仙洲的第 21 师苦战力竭，阵地随时都有被日军突破的危险，请求火速派兵增援。孙楚简直给他弄糊涂了，搞不清高桂滋所报的是真是假，他手头又确实无预备队可调，除了空口鼓励，再就是打哈哈，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拖一天是一天。

24 日，第 115 师派往大营负责联络的司令部参谋袁晓轩报告孙楚，八路军已于当日从平型关南翼潜出，埋伏在平型关东 10 公里的关沟公路两侧，部署对敌后的抄击，希望平型关方面各军，对辗转于关隘险区的日军前锋予以沉重打击，和八路军的敌后抄袭密切配合，争取围歼平型关前的日军。

孙楚将这一情况报告阎锡山。阎锡山说：“八路军出击当然好，但他们能起多大作用呢值得咱好好想想。”

孙楚说：“他们人枪有限，唱主戏的还是咱们，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到这时候，阎锡山仍对日军的主力在哪个方向吃不准。他告诫孙楚：“八路军打仗不含糊，咱知道，既然他们来了，咱就争取让他们给创造一个好形势。但仍要兼顾雁门山的会战，慎重处理。我已命郭宗汾预备第2军进至大营，听你相机使用，必要时从正面出击，配合八路军作战。陈长捷预备第1军仍留代县，作为占领繁峙东面‘口袋底’阵地的必要准备。”

第2预备军到来后，孙楚先让他们在大营待命——他耍了一个两面手法，对声嘶力竭连连求援的高桂滋说，即派郭宗汾部前往救援；对八路军则说，拟派预备军增加平型关北翼出击的力量，配合八路军抄击敌后。

自那次乘孙楚的吉普车到关沟一带看过地形后，林彪紧接着又带几个团一级的干部和参谋人员去了一次。他穿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件老百姓的破大褂，腰里扎一根布带，头上扣了顶山西人喜欢戴的毡帽，那样子活像一个当地的农民。

他们没有骑马，一路走着，爬山、过河。也没有带干粮。到了中午，大伙都觉出饿了，有人提出到附近弄点吃的，林彪没同意。这一行人都是外省人，一张口容易暴露身份。最后他们从地里抠了点生山药蛋，边吃边走，吃得津津有味。

看地形回来，警卫员杨兴桂感觉很累，一躺下就睡着了。半夜醒来，他看到林彪还没有睡——林彪的眼睛紧盯着摊开在桌子上的地图，锁着眉头在沉思。

9月24日下午，第115师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进行战斗动员。

会场设在上寨村小学的土坪上，无任何布置，只有几张从学校借用的讲桌放在师首长面前。全体干部整齐地坐在土坪中央。离会场不远处的高坡上，有一群孩子在唧唧喳喳朝这边望。天气已明显变冷，但有几个男孩仍光着屁股，女孩们则穿着家织的粗布花格子衣服，脑后细细的小辫子一甩一甩。担任会场警卫的战士赶他们走，他们嬉笑着离开。不一会儿，他们又从另一个地方露出了脑袋。

会议由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主持，林彪先讲。他用他特有的尖细而柔润的声音分析了战局，介绍了敌情。然后，他提高嗓门说：“同志们！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担当起，也一定能够担当起这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们要在日寇进攻平型关时，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从侧后猛击一拳，打一个大胜仗。给敌人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人民一个振奋！”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林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紧接着副师长聂荣臻讲话：“同志们！林师长的讲话我都同意。我们要打这一仗，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第一，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同日本鬼子打仗，首战必胜嘛；第二，现在友军节节败退到内长城线上，十分疲劳，士气不高，需要我们打一胜仗，鼓舞他们的作战情绪；第三，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必须给敌人一个打击，粉碎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四，我们必须打胜，以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在聂荣臻讲话时，一位机要人员交给林彪一封加急电报。是八路

军总部转发的第二战区作战指示。电报上说：

我军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 8 团兵力。明日拂晓可达平型关，并由正面向敌出击。希林师同时出击，夹攻敌之侧背。

电报上说的增加 8 团兵力，就是指郭宗汾第 2 预备军。

明日拂晓出击——林彪掏出怀表看了看，此时已经是下午 3 时——他感到太仓促了。聂荣臻一讲完，林彪马上将电报递给他。

林彪说：“必须赶快结束会议，各团立即用饭，晚间出发，向平型关外设伏地区开进。”

聂荣臻说：“你赶快在会上宣布。”

林彪命令，各主攻部队先由驻地向冉庄一带开进，由冉庄向伏击地区的开进时间，另行通知。

战斗就要开始了。

如果不是后来又出现了变故，八路军平型关之战的日期就要改写。

部队紧急出发之后，电台正要关机，却又在最后时刻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据战区电报称，由于准备出击的部队，今日未能按时进抵平型关地区，因此将出击时间顺延到 25 日晨……”

部队正在行进中，师部无法与各旅、团的电台联络，只好速派骑兵分别向部队传达这一新的命令。对这个突然的变化，林彪显得很气愤：“这么指挥，怎么能够打胜仗看来我们必须独立自主！”

聂荣臻道：“这样也好，免得我们过分紧张。明日我们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进一步作政治动员。冉庄已接近伏击地区，正好让各团、

营干部前去看看地形。”

林彪说：“只好这样了。”

郭宗汾率第2预备军来到大营后，整装待发。战前，阎锡山将郭宗汾任师长的第71师和新编第1旅合并，编为第2预备军。第71师是郭宗汾的老部队，也是晋军中多历实战的部队，初上抗日战场，气势旺盛。

有一群从灵丘一带逃难来的老百姓来到大营。他们说，途中曾见一支部队正在向平型关东北的关沟一带开进。孙楚命人将几个胆子大些、口齿还算伶俐的叫到指挥部。他问他们：“看清了吗是些什么部队”

回答是：“咱哪知道是啥部队，反正有好几千人。人家队伍齐整，说话和气，噢，都是些南蛮子，咱也听不真切说的啥。反正人家不打小百姓，也不抢小百姓的鸡。在冉庄，还帮房东扫院子、挑水。老乡们说，从大清朝以来，还没见过这样好的部队呢……”

派出去的侦察兵也回来说，八路军出动了。紧接着，战区发来电报，说八路军24日夜即进入伏击区，抄击敌后，命孙楚适时派郭宗汾部，向平型关西北面的六郎城及其以北地区出击，配合八路军围歼日军第21旅团。

孙楚面对墙上的地图琢磨一阵，向郭宗汾下达命令：“24日夜，联系团城口高桂滋部，迅猛出击，和八路军林师密切配合，打好这一仗！”

此时，孙楚终于坚定了配合八路军歼灭日军的决心。

得知郭宗汾率部到来的消息，高桂滋马上要通了孙楚的电话。

高桂滋说：“孙副总，阎长官和你都曾说，郭军要来增援我部。我连日苦战，消耗极大，有的营、连伤亡殆尽，难再支撑。请立即派郭军前来增援！”

孙楚道：“高军长，兄弟不是不增援你，而是阎长官和战区决意令郭军另行出击，配合八路军作战。请你再坚守一阵，明日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孙楚轻轻放下了电话。高桂滋怒骂一句，赶忙又要通郭宗汾。

高桂滋说：“郭军长，按阎长官的命令，贵军应来接替我部。我部连日苦战，伤亡惨重，实难坚持，请贵军速速前来接防阵地！”

郭宗汾说：“高军长，我并未接到增援贵军的命令，恕难从命！”

高桂滋急了：“阎长官和孙副总有命令在先，兄若违抗，只怕对兄不利，还是请贵军速来接防为好，不然，阵地若失，责任理当由贵军来负！”

郭宗汾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命令，叫我怎么行动请好自为之！”

说完，郭宗汾挂上电话。

他们在电话中的争执孙楚都监听到了。但他对这种近乎争吵的状况未加节制。郭宗汾来大营东山底指挥部与他商量出击的具体问题时，问他：“高桂滋军的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

孙楚连连摇头：“不瞒你说，高桂滋所报的情况，有真有假，真假难辨。唉，第 17 军不是咱们晋绥军，在咱这里属于客军，只能相

机指挥，他听则为好，不听，咱能把他怎么样”

郭宗汾说：“如果他擅自撤守怎么办”

孙楚说：“这个嘛，大敌当前，没有命令，我谅他不敢造次！”

郭宗汾没说什么，但一丝隐忧掠过了他的心头。

孙楚似乎看出了郭宗汾的担心，说：“载阳，你如果 24 日夜迅速出击，就会减轻高部的压力，到那时问题自会解决。”

24 日黄昏，日军对东、西跑池又发起攻击，高桂滋十分惊慌。他再次给郭宗汾和孙楚打电话，要求郭军先增援一部，以便缩短第 84 师的“单薄”防线。孙楚和郭宗汾都拒绝了他。

此时，第 115 师正准备出动，并打算派有力部队向大、小寒水岭挺进，借以诱导团城口附近的中国军队向敌进攻，共同围歼日军于鹞子涧、平型关之下。孙楚对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明说：“我认为当前战局形势很好，高部的吃紧是暂时的，愈坚持愈对战局有利，不应使郭军派兵接替高部的局部阵地，而减损出击的力量。”

灾难正悄悄降临。

入夜之后，孙楚又接到高桂滋求救的电报。他搞不清楚这是高桂滋第多少次求援了。这封电报的措辞更为激烈，甚至提出——“最后哀鸣，伏维矜鉴”、“再无援军，只有出于冒犯军令进行撤退之途”。

孙楚愤愤地将电报纸扔到一边。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明建议：“是否以刘茂恩第 15 军一部增援，减轻一点高部的压力”

“第 15 军阵地同样受到敌人猛攻，无力出击！”孙楚不假思索地说。他断然否决了卢宣明的建议。

然后，他让副官要通高桂滋的电话，口气比较严厉地说：“高军长，本人已饬郭军出击，请贵军坚守阵地，以便让郭军以全力，一举冲出团城口，配合八路军围歼敌人!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后退!”

高桂滋说：“孙副总，职已尽了全力，断难再坚持……”

没容他分辩，电话里没了声音。孙楚不再理他。他只好又要通“难兄难弟”——第 21 师师长李仙洲，说：“李师长，孙楚手中握有一个军，而不增援咱们，实在可恶!”

李仙洲道：“他不是要让郭宗汾出击吗”

高桂滋说：“即便出击，又顶屁用!而八路军抄击敌后，兄弟也认为这是孙楚虚构的幻想，他纯粹是有意牺牲咱们，而让晋军独占风头。咱不上他这个当!”

李仙洲问：“军长有何打算”

高桂滋道：“当务之急，撤!”

李仙洲犹豫了。

高桂滋说：“李师长，你撤不撤兄弟就不管了，我将马上传令，我的第 84 师撤至迷回一带!”

放下电话，高桂滋对他的参谋长说：“派传令兵下去，命令各团全线撤退!再给阎老西发报，就说我部按长官原定计划，撤回关内，放敌进到繁峙打!”

一个小时后，东、西跑池、团城口、鹁子涧一带 2 公里宽的防御地段落入敌手。

而孙楚等人一直蒙在鼓里。

后来，阎锡山在提到平型关战役失败，而独让八路军以大捷的威名扬于中外时，曾极为愤慨地说：“高桂滋放弃团城口，败坏大局，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

但是，没有人杀高桂滋。

5、两军协同，马革裹尸是军人的光荣归宿

冉庄是两山峡谷中的一个较大的村庄，它位于平型关东南约 10 多公里处，由冉庄向北行 10 余公里，就是第 115 师的预定设伏地区。

傍晚时分，孙楚派出的一个联络参谋来到冉庄，他带来了第 6 集团军 25 日拂晓正面出击的作战计划。

夜幕降临之后，天空阴云密布，四周一片寂静，远处，有隆隆的响声传来，不知是雷声还是平型关方向敌我交战的炮声。

在一间普通的茅屋里，聂荣臻手提马灯，林彪摊开一张大比例尺军用地图，二人借着昏黄的灯光，对照地图在研究第 6 集团军刚刚送来的“出击计划”。

林彪有些乐观地说：“如按第 6 集团军的出击计划，以 8 个团的兵力，越过团城口右侧守军阵地向敌人出击，进攻的敌人可能受不了这么强大的兵力反击，友军可能将敌人压到平型关这方面来，正好为我军夹击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即可在小寨、关沟一带凭借有利地形消灭敌人。如在友军出击时间，有敌后续部队由灵丘方向经蔡家峪向平型关增援，那么，我军亦可将这股敌人消灭在这一带，然后再向公路左侧山地攻击，协同友军消灭由平型关败退下来的敌人。因此，

不论哪种情况出现，我军都有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

聂荣臻对此抱有慎重态度。他说：“我考虑如果友军不能顺利出击，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单独作战了。而且，我们不能过分重视友军协同夹击敌人，而应立足于我们单独作战！”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林彪说，“我们固然不能依赖友军，但友军果真出击，即便不够顺利，亦可将敌人吸引在平型关前，为我们消灭敌人的后续部队，或从侧翼歼灭进攻平型关之敌，创造了条件。”

“要想打好这一仗，”聂荣臻进一步说，“我们必须对与友军协同作战取慎重态度，对伏击、侧击敌人采取积极态度。”

“你说得对。”

说罢，林彪转身对参谋长周昆说：“通知各部队，今晚 12 时出发，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

供给部给各战斗部队发放弹药——每人发子弹 100 发，手榴弹 2 颗。历经艰苦卓绝的红军时期的战士们，还从未一下子领到过这么多弹药。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出发之前，每个人的心里都极不平静。

第 343 旅第 686 团团长李天佑原想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睡一觉，但他怎么也睡不着。副团长杨勇同他开玩笑：“嗨，老战将了，怎么还这么紧张！”

李天佑说：“不是紧张，头一回同日本鬼子交手，生怕哪里想不到，误了事！”

杨勇收住笑，感慨地说：“是啊！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

息呢!”

大约 9 点多了，李天佑仍无法入睡。他披衣坐起，打算到林彪那儿聊几句，借此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随便问问有无新的情况。

李天佑是广西人，参加过百色起义和长征，红军改编前任红一军团第 4 师师长。他中等个头，精干利落，一副文质彬彬，稳稳当当的模样。

李天佑在黑暗中行走了一段路程，来到林彪的住处。林彪已躺下休息，头上还戴着健脑器。李天佑想到林彪已有许多天没好好休息了，突然感到很不安。但他的脚步声惊醒了林彪，林彪坐起来听他说明来意，默默考虑了一下，说：“按原计划执行。有情况一定会通知你们。”

只这一句话，李天佑觉得心里平静多了。林彪让坐，他不忍再影响他休息，随即告辞。

午夜，大雨从天而降，天地间一片混沌。

部队行进的路线，就是白天营以上干部前往勘察地形所往返的那条山沟。为了便于联络，师司令部规定，每人的左臂上系一条白毛巾。

这场不期而至的大雨给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山高路滑，寒风刺骨。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无任何雨具的官兵们途中倍感艰辛。他们希望老天多打雷打闪，好趁着刹那间的光亮放开步子往前跑一段。

遇到了奔腾的山洪。洪水挡住了前进的道路，队伍停下来。行进在队列中的李天佑听到阵阵催促前进的声音：

“蹚啊!蹚过去啊!”

“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都没拦住我们，一条小河顶个屁!”

“过吧，大胆地过吧!”

李天佑看到，他的士兵们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着手，或是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蹚过河去。

第 686 团过去了。

第 685 团也过去了。

也就是说，陈光的第 343 旅全部越过了这股汹涌的山洪。

但徐海东的第 344 旅只过去了张绍东的第 687 团，陈锦秀的第 688 团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阻在了对岸。

林彪和聂荣臻也徒步行进在队伍中。聂荣臻亲眼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河被洪水冲走。他对林彪说：“不应再作无谓的牺牲，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师的预备队，其余的不再强渡，好不好”林彪点头同意。

凌晨，3 个团全部进入伏击地点。第 685 团埋伏于白崖台以西，第 686 在白崖台至老爷庙一线，第 687 团在老爷庙以东。

不一会儿，团城口方向传来了密集的炮声。

大营。几乎在第 115 师离开冉庄的同一时间，第 2 预备军各部已集结完毕。郭宗汾来到一支队伍前，黑暗中，他看不清部下的模样，但他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一阵阵粗重的气息。少顷，他举起拳头，慷慨激昂地陈词：“弟兄们!保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是军人的光荣归宿!我们与友军协同作战，要义无反顾，杀敌制胜!……”

本来郭宗汾就口齿清利，声音洪亮，语言生动，极善于演讲，此

刻，他富有震撼力的声音在茫茫夜空中回荡，使他的士兵们热血沸腾。许多人将枪支举过头顶，霎时，誓死杀敌的口号响成一片。

这同样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

然后，各部冒雨出发。按照计划，军主力向迷回村前进，然后再从东、西跑池一线越过第 84 师团城口阵地，以关沟为目标，进攻平型关正面的日军；抽出一个旅附一个山炮连向六郎城进击，并拟带动第 21 师与挺进于大、小寒水岭的八路军联系活动，绕击敌侧背。

孙楚催促郭宗汾大胆出击，不要有顾虑。

然而，当已经没有顾虑的郭宗汾随军主力行进至迷回、涧头一线时，忽然遭到来自团城口方向猛烈炮火的射击，部队顿时陷入混乱。

郭宗汾大吃一惊。他的参谋长说：“这些炮火从团城口国防工事线上打来，会不会是高桂滋部同我部发生了误会军长，应赶快派人同高部联系！”

郭宗汾镇定下来，他依据对方的射击方向和火力配置，很快得出结论。他剧烈地摇晃了几下手臂，大声说：“我判明，高桂滋部的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等高地，均已被敌人占领！”

近前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郭宗汾的面部表情非常痛苦，他最初的顾虑终于应验了。片刻工夫，居高临下的日军从南到北对他们进行疯狂扫射，各部的联系被切断，数千人在狭窄的山隘内陷入被分割包围中，进不得退不得。谁都没有想到，原本士气十分高昂的第 2 预备军初上战场，即陷于绝境！

郭宗汾命令：“马上传令各部，变攻为守，构筑阵地，就地抵抗！”

第三章 平型关大捷，让全体中国人 扬眉吐气

1、林彪眼下的任务是打好平型关这一仗

1937 年 9 月 25 日拂晓。

聂荣臻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他看到，在关沟两侧的树丛下、荒草中，以及冰凉的山地上，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潮湿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第 115 师指挥所设在白崖台北面山峦前的一个土包后面，土包上丛生着杂草和树木。这里离第 343 旅指挥所很近，距第 685 团和第 686 团的指挥所也不远。此时雨已停歇，冷风仍在飏飏地刮着。

冷风吹不动这个凝固的历史时刻。

延安。毛泽东居住的山村小院坐落在延安城西南方向的凤凰山下。传说远古时代这里曾是凤凰降落憩栖的地方。西安事变后，毛泽东迁居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运筹全国的抗日战争。

窑洞坐西北而面东南，深秋时节，它显得宁静而温暖。在每一个静静的夜晚，毛泽东读书、写作或思考问题。如豆的灯光将他巨大的身影折射到刚粉刷过不久的墙壁上。

西安事变和日军大举入侵是中国革命的两个伟大的转折点，身居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中国美好的未来正向共

共产党人招手，恰似站在宝塔山巅，遥望东方喷薄欲出的太阳。他对未来充满了喜悦和信心。他自然已料定，出于其反动本性的蒋介石不可能动员全国的力量，赢得抗战的胜利，断定国民党依靠片面抗战的路线，必定招致失败。那么，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头。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只有几万人的红军怎样应付抗战的局面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发电报，第一次郑重地涉及到这个问题：

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1/3的兵力为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8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人，明确提出红军在协助友军部队作战时，只宜作侧面的钳制和打击，不宜作正面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头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22日晚，在冯家村头一个权充会场的私塾小学的土窑洞内，毛泽东从容道出他的深谋远虑：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一、创

造根据地；二、牵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日军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如此一来，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世界军事家们颇感新鲜的话题：为坚持持久战，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战略问题。

有些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此感到不解，林彪首先把自己摆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他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种论调并不使毛泽东感到意外，他深知，红军由正规军重新变为游击军，由运动战变为游击战，在现象上表现为倒退性的转变，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对于某些红军指挥员来说，这既是战略上的大转变，更是思想上的大转弯。他耐心地开导他的将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必须避开与日军的正

面冲突，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扩充实力，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到底，最后战而胜之……”

毛泽东又说：“从战略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怕日本人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只要游击战在广大地区发展起来，整个中国会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

毛泽东认定，游击战是红军对付日本人的惟一策略。因此他特别强调：只打游击战，不打运动战；只能打小仗，不能打大仗，要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

他并不为八路军出师后是否尽快获得声望所困惑。相反，针对高级将领中比较普遍的“速胜论”思想，他苦口婆心地反复开导他们：“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这就是我们的家当。拿这点家当同掌握现代化重武器的日本人硬拼，会是什么结局呢？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军队去深壕对垒，无论如何是不适宜的。”

当然，毛泽东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果只讲山地游击战，似乎又窄了点。因此，八路军出师华北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前方硝烟正浓，后方的将士磨拳擦掌，但毛泽东仍然在作着他高瞻远瞩的部署：八路军 3 个师不一次开出去，而是循着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至少可以避免被国民党把这 3 个师用到同一个战场上去打阵地战。

规定八路军出师以后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分散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尽快扩大抗日力量，在完全独立而不是协同作战中壮大自己，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面前点了头，但他的思想疙瘩并未真正解开。

9月14日，林彪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他将“343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日军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

此电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林彪担心起来。

16日，毛泽东直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蒋介石)、何(何应钦)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两天后，林彪回电：“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

随后，林彪在另一份电报中，进一步说：“关于一方面军目前行动方针，我意不只陈旅应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徐旅亦应以同样任务靠近陈旅，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

他的理由是：“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由于林彪一再坚持，9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又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为了及时纠正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接着指出：

阎锡山现在处在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部下全无信心，他的军队已失去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须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和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的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利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

若干年后，彭德怀检讨说，他当时也存在“速胜论”的思想，对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只认为是个战术问题，八路军应该全力配合友军对日进行正规作战。

还有少数高级将领认为，“华北也许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日军前进”、“日军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击战争只能在日军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和前途是不大的”，因而，他们主张“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日军前进”。

9月25日，即第115师平型关战斗打响的这天，毛泽东仍致电

八路军总部：“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要“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伺机在“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贺师在晋西北使用同此原则”。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北方局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如兵运、统一战线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责任……发动华北全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惟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全党和八路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极其正确的。这再一次证明了他超出于众人之上的远见卓识和战略预见。

但林彪眼下的主要任务是打好平型关这一仗。

埋伏在关沟两侧的数千名八路军官兵在焦急地等待着即将来临的光荣时刻。

天大亮了。终于，从小寨村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

林彪说：“友军出击部队没有希望了。现在日军的后续增援部队来了，我们在这条山沟里正好消灭他们！”

聂荣臻道：“必须通知各团，加强隐蔽，没有师部的命令不准行动！”

这股日军由灵丘方向开来，他们是第5师团第21旅团的一个大队和部分辎重部队。大约近百辆汽车和百余辆大车沿着公路鱼贯进入

沟内，车上除军用物资外，坐满了戴着钢盔的鬼子兵。马达声和马蹄声在山沟里回响。

时候差不多了。林彪大声喊：“发信号弹！”

聂荣臻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怀表。他记下了这个时间：清晨 7 时整。

2、弥漫的血腥气使人喘不过气来

已经无法说清是哪支部队先开的枪。随着红绿两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便响彻了整个山谷。

方才正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行进的日军，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阵形顿时大乱。山沟里，车撞车，人挤人，马嘶人窜，火光闪闪，烟雾弥漫。站在指挥所前的林彪和聂荣臻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一商量，决定把日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林彪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

第 686 团的指挥所设在白崖台山坡下一片谷地的坡坎里，前面是公路，两旁是山峦，正对着团指挥所的是三四百米高的老爷岭，半山腰的老爷庙十分显眼。李天佑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个控制公路的制高点上却没有埋伏兵力。

当初看地形时，林彪曾注意到老爷庙，不知什么原因，关键时候恰恰忽视了它。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沟内，现在调动兵力已来不及。

打响之后，李天佑正紧张地观察战斗的发展，一个参谋大声说：“团长！团长！师长叫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李天佑太专注了，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师长要我去好。”

师指挥所就在他们身后右侧的山坡上，相距半公里远。李天佑从谷地里一口气跑了过去，他看到林彪正披着雨衣迎风站立。

林彪对气喘吁吁的李天佑说：“沉着些。日军比较多，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的。”

然后，林彪抬手指着山沟里激烈的场面又说：“看到了吗日军很顽强。”

李天佑顺着林彪的手指望去，看到公路上的日军正利用汽车顽抗，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

林彪说：“我们包围了一个旅团，有 4000 多人，块大不好一口吃掉，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日军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日军消灭在沟里！”

李天佑冰：“看！几个鬼子正在往老爷庙爬呢！”

林彪说：“是啊！你们动作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李天佑立正：“明白了！”

林彪一挥手：“好，去吧，狠狠打！一定要狠狠地打！”

李天佑顺原路跑回团指挥所。副团长杨勇说：“团长，你在指挥所全面指挥，我和几个同志下到各营去，好不好”

李天佑点点头。杨勇等人离开后，李天佑马上命令右侧山上的 3 营：“向老爷庙，冲上去！”

随着冲锋号声，3 营迅速冲下山坡。但山沟里弥漫的烟雾令他们看不清目标，已经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的鬼子，以汽车、大车和沟坎作掩体，猛烈还击，3 营往下冲的过程中已有不少人伤亡。战士

们什么也顾不上了，只知道拼命往前冲，往前爬，往前滚……

3 营排长田世恩带领全排冲上公路，日军也从各种临时掩体后面跳出，端着明晃晃的三八大盖枪迎上来。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开始了。这是八路军战士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衣着、装备和长相都令人感到新奇的东洋人，战后许多人在谈到这个独特的瞬间时，都说当时只觉得眼睛发酸发虚——一种难以表达的全新的感受。

在呛人的硝烟和火光中，战士们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长枪上不带刺刀的战士便扔掉枪，拔出砍刀搏杀，有的连砍刀都没有，只好徒手与日军撕拼扭打。田世恩端起刺刀朝一个矮个头鬼子刺去，那家伙举枪相迎，两把刺刀顶在了一起。田世恩往后一退，抽出枪刺，发现自己的刺刀硬是被那家伙顶弯了。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田世恩右肩中弹，鬼子更加来了精神，挥枪刺来。田世恩咬了咬牙，猛地转身，纵身一跳，调转枪托，然后抡起，照准他的脑袋直劈下去。那家伙尖叫一声，倒在地上，田世恩顺手抽出他的长枪，朝他肚子上连扎两刀，将他送上西天。紧接着，田世恩又跟冲过来的一个鬼子官儿拼上了，那家伙拿的是洋刀，没有田世恩的长枪吃劲，一下子就被刺中。此时，排里的战士高建枝也冲过来，又刺了那军官两刀。

大约半个钟头后，鬼子顶不住了，活着的都往汽车底下钻。枪声稀了，喊声也渐渐弱了。但 3 营此时也遭受了重大伤亡，其中 9 连干部差不多打光了，100 多人的连队只剩下 10 余人。

李天佑的电话打到了 3 营长那里：“你们怎么样还能打吗”

回答仍像战前一样干脆：“保证完成任务！”

3营的主要任务是攻占老爷庙，因此他们不做停留，紧接着向老爷庙冲击。但是，一股日军已经占领了老爷庙，他们的火力压不过日军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片片地倒下。李天佑从望远镜里看得真真切切，他拿起电话，再一次命令3营长：“猛冲，一定要拿下老爷庙！”

3营长放下电话，亲自带队冲锋。占领老爷庙的日军用机枪往下扫射，战士们就趁对方换梭子的时候猛往上冲，然后再停下还击。刚冲到半山腰，山下沟里的鬼子又从背后涌上来，朝他们开火，3营长负伤。3营处于腹背受敌的险恶境地。

幸亏2营及时冲上公路，将3营屁股后面的日军消灭，才解除了3营的后顾之忧。田世恩带两个班冒着弹雨向山上爬，终于接近老爷庙，他们向上甩手榴弹。整个山头黑烟腾起，乱石横飞。日军的机枪哑了，战士们趁此机会端着刺刀冲上去，将残余的日军全部消灭。田世恩看到，每个鬼子身上至少要挨两三刺刀。

与此同时，第685团的一支部队从另一个方向冲上了老爷庙。八路军完全占领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

25岁的副团长杨勇随3营爬上了老爷庙，被一颗流弹击中负伤。

丢失了老爷庙制高点的日军并不甘心。已将指挥所移到公路北一个山坡上的李天佑看到，约有五六百个日军拥挤着反复向老爷庙冲击，日军飞机也飞临上空，贴着山头盘旋、威胁。但日军的数次冲击均告失败。

第685团的阵地在最西面，师部给他们的任务是，等第686、687两个团放日军进到伏击圈，由他们迎头痛击。而且他们还要准备两面

作战，防止平型关方面的日军回援关沟。

有人对杨得志说：“团长，我们这不是打蛇头吗？”

杨得志点点头：“对，打蛇要打头，这是句俗话。但是，看这次师首长的布置，除了我们打蛇头外，兄弟团队斩蛇腰，断蛇尾的任务同样重要。打蛇，就要将蛇头砸烂。”

杨得志曾担任过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第2师师长，在红军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杨得志和他的团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曾数次谱写悲壮而又激越的篇章。此刻，这个年轻的指挥员担心能否打上这场盼望已久的伏击战。终于，日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了杨得志的视野，鬼子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他突然觉得自己心跳加剧，赶紧把电话耳机用力按在耳朵上，随时听候上级的命令。在他的身边，几个营指挥员紧张地望着他。战士们都虎视眈眈地趴伏在地上，机枪射手们早已压好了子弹，步兵的手中紧握着枪，雪亮的刺刀闪着寒光。

这时，电话耳机里传来一股急促的声音，随即发来了命令：“师长命令你们冲锋！”

杨得志两眼一亮，向离他很近的机枪射手们高喊一声：“打！”

话音未落，机枪子弹便像阵阵疾风向山下扫去，显得有些稀疏的迫击炮弹也在沟底炸响。转眼之间，前面的几辆汽车被打坏，公路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紧接着，隐伏在山头后面的战士呐喊着冲锋。5连连长曾贤生高喊：“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日军，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日军！”

5连在曾贤生的带领下率先接近公路，他们投出的第一批手榴弹

就炸毁了日军的好几辆汽车，有些来不及下车的鬼子在急促的爆炸声中血肉横飞。借着手榴弹爆炸产生的浓烟，5连冲上公路——也是肉搏战。身着草黄色衣服的鬼子和穿灰色军装的八路军战士捉对厮杀，刺刀与刺刀相碰的声音、金属戳进肉体的“噗噗”声、偶尔响起的零星枪声、战死者沉重的倒地声、受伤者发出的惨叫声，此起彼伏，搅成一团。

刺鼻的血腥味儿在山谷间弥漫。十里关沟——此时也许是它有史以来最为喧嚣的时刻，这条带有明显远古遗迹的峡谷在正义者的怒吼声中震撼。

残酷的白刃战是八路军平型关之战的一个主要景观，第5师团不愧为一支强敌，往日红军在内战时期令国民党兵闻风丧胆的白刃格斗，此时用来对付日本人，根本占不了便宜。因此，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

5连连长曾贤生身中数刀后壮烈牺牲。遍地都是敌我双方战死者的尸体。鲜血和泥浆混合在一起，缓缓流淌。

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第685团终究堵住了日军。

如果说第685团处于打“蛇头”的位置，那么，第687团自然是打“蛇尾”了。由于山洪的阻隔，第688团没能拉上来，第687团又被布置在战场东侧打助攻和阻援，因此，作为旅长的徐海东心里不免感到遗憾。

徐海东绰号“徐老虎”，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两年前，徐海东率红25军策马陕甘，为红军主力北上充当了先锋，

然后又与刘志丹的红 26 军对接，在陕北高原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开辟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这位窑工出身的将军一向以争排头、打硬仗著称。内战时期，徐海东多次让西北军、东北军的国民党将领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一提起徐老虎来，他们既感到胆颤心惊，又对他佩服不已。因此，他的脑袋就很值钱——国民党的飞机不止一次地从陕北高原的上空往下撒传单：“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前来投诚我军，当赏大洋十万！”

来平型关时，徐海东带着一身的伤病，这些伤病源于过去身经百战——他曾 9 次负伤，七尺身躯上带有 17 处伤痕，左腿为二等残废。虽然他的行动已大不如前，身体很虚弱，爬山时需要有人扶着，但他仍让旅参谋长陈漫远坐镇指挥所，自己带几个参谋紧随第 687 团在前面指挥战斗。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行军途中，他带作战科长张池明、作战参谋张竭诚下到营里了解情况，他对各营的干部说：“无论如何要抢时间，多带上一名战士，早上一分钟，就增加一分胜利的把握。”

部队进入阵地后，徐海东又带着那几个人来到师指挥所。林彪对他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日军的特点。

然后，徐海东把各营的位置都看了一遍。他要求团里干部都下到营里协助指挥。越是紧张，他的老脾气越爱犯——嘴里不停地骂人。

“什么皇军不可战胜，放屁！”他骂了不知多少遍。当他给 1 营 1 连连长交代任务时，边走边骂：“妈个×，1 连一定要打好，打不好我

砍你的头!”

50 多年后，当时一直跟在徐海东身边的作战参谋张竭诚说：“这个战斗中第 687 团团长张绍东和副团长田守尧都很勇敢，真正的阵前指挥。最让我担心的是徐旅长了，他在战斗过程中还到 2 营去了一趟，2 营打得最厉害。他听到枪声就坐不住了，总要跑出去亲自看看战斗情况。参谋控制不住他……”

张竭诚又说，他认为平型关战斗八路军打得一般，歼敌太少了，我们伤亡也大，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他跟徐海东来到 2 营阵地前，他们亲眼看到，土坎上有两个日军，见到八路军战士往前冲，上去一个打掉一个。

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仍然淘洗不掉张竭诚脑海中的这个细节。他说，狗日的，枪打得真准。可我们不行，瞄得准，就是打不准。

战后，徐海东强调，一定要注重军事训练。他说：“训练不好，就打不败鬼子。”

虽然师里给第 687 团的任务是助攻和阻援，实际上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不能暴露目标，日军最先经过他们的阵地，如果暴露，伏击计划就要泡汤；二是必须扎紧“口袋”，才能够“关门打狗”。

第 687 团团长张绍东和副团长田守尧将团指挥所设在小寨村的龙王庙里，离公路很近。第二战区派来的一个联络参谋不安地说：“团座，这儿是不是靠前了些，撤出的道路没问题吧”

张绍东没理他。田守尧说：“等我们把鬼子杀得一个不剩时，从

哪儿撤出都一样。”战斗开始后，混乱中果然有一股日军冲上龙王庙高地，他们才急忙向后转移。很快龙王庙高地又被战士们夺了回来。

战斗顷刻间打响。3营长带领通讯班最先冲到沟边，把机枪架在人身上往沟里扫射，担任后卫的约一个小队的鬼子顿时倒下一片。接着11连赶到，战士们抱着枪从山下往沟底滚，9连和12连也上来了，短兵相接，还是白刃战。

站在山头上的张绍东和田守尧看得清清楚楚。二战区那个联络参谋惋惜地说：“对面下来的这个营算完了！”

“说错了！30分钟后，我这个营准打到这边山上来。”田守尧说。

果然，半个小时后，3营打到离老爷庙不远的山下。3营长两手卡着腰，在沟底指挥重机枪向日军扫射。这时，夹沟和谷地里的残余日军不断从各个方向朝团指挥所打枪，子弹打进张绍东和田守尧身边的泥土里，他们像是根本没看见，依旧沉着地站在那里。而那个联络参谋已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

第687团2营是清一色的陕北子弟，刘志丹的部下。战斗打响后，一股日军从另一个方向冲击老爷庙高地，师部命令团里抽一个连到师指挥所领受任务。这个任务最后落在了2营6连的肩上。

6连跑步前进。19岁的杨士梅就行进在这支队伍中。他们赶到师指挥所时，杨士梅看到，副团长田守尧已经负伤被抬下来了。

聂荣臻副师长交代任务：6连迅速进入阵地，阻击从侧面向老爷庙高地冲击的日军。领受任务后，他们快速散开向山下运动。

向老爷庙冲击的那群鬼子大约有50多个，6连到来后，他们放

弃了向老爷庙的进攻，和 6 连顽强地对峙起来。打了一阵，6 连副连长从阵地上抬头瞭望，然后站起来高喊：“冲啊！”话音未落，被日军一枪击中牺牲。

如今杨士梅已记不起副连长的名字和模样，但他倒下时的情景杨士梅怎么也忘不掉。战斗结束，有 90 多人的 6 连只剩下 30 人。

第二天去打扫战场时，杨士梅看到，他们战斗过的阵地上，留有 50 多具日军尸体。他还看到尸堆中有他一个很要好的陕北老乡，战前，那老乡曾对他说：“如果我死了，看在乡亲面上，千万给我挖个坑埋了。”杨士梅含着泪，将老乡的尸体拖到一条雨水冲出的小沟里，草草掩埋。

第 687 团 3 营 9 连的冲击地段紧挨着第 686 团。走投无路的日军数次拼死冲击 9 连脚下的山头，均告失败。不久，副连长郭春林发现一股日军偷偷爬上他们阵地右前方的一个小山棱，并在那里架起了一挺机枪，疯狂地朝 9 连阵地扫射。郭春林想，必须把这挺机枪干掉，他命令 2 排长秦二愣带人迅速完成这个任务。这时 2 排只剩下 13 个人，而且都已挂伤。秦二愣毫不犹豫地带着这 13 个人扑了上去。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抱着枪从山上滚下去，到日军跟前后，猛地甩出手榴弹，将这挺机枪炸掉。随后，全连都涌下山去，与敌短距离交战。一颗子弹飞来，郭春林左臂负伤，他赶忙用毛巾扎上。

又一场肉搏战开始了。一个鬼子见郭春林负伤，挺着明晃晃的刺刀扑过来，他正想举驳壳枪射击，只听“噗哧”一声，鲜血溅满面前的土地，鬼子应声倒下——从鬼子背后赶来的秦二愣一刀刺穿了他。

郭春林看到，站在他面前的秦二愣两眼通红，浑身是血，呼哧呼哧喘气，他几乎认不出是谁了。此时秦二愣身上已多处负伤，郭春林劝他下去。话没说完，又有几个鬼子嗷嗷叫着扑过来，秦二愣前胸后背四把刺刀闪耀着寒光。他毫不慌张，转着圈抵挡……他被刺中一刀，又一刀……他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头，在倒地的瞬间，用最后的力气，也给了日军致命的一击，这才摇摆着同日军倒在一块……

郭春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郭春林的心目中，全连最勇敢的一个同志，他最好的战友秦二愣，就这样牺牲了！郭春林喊叫着，俯身去抚摸他的胸口，幻想那儿是温热的，但是，已经冰冷冰冷……

平型关之战打响前，林彪和聂荣臻还在西北面的驿马岭一带埋伏了一支奇兵——国民党的编制序列上并不存在的“黑兵”，杨成武独立团。他们的任务是，大胆深入敌后，切断从涞源至灵丘和从广灵至灵丘的公路运输线，并阻击这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之敌。

23日中午，部队从上寨出发时，林彪说：“你们如不能把日军的援兵挡住，平型关之战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顶住日军！”

聂荣臻提醒说：“将来还要开辟根据地，和日军长期作战。头一仗倘若把你们的本钱打光了，那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过，我相信你们会打好的！”

次日中午，独立团赶到了山西与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叫腰站的小村庄，东面不远处有座高山，山顶有个马鞍形的隘口，那便是驿马岭。

然而，此时驿马岭隘口已被日军先头骑兵占领，正在行进中的独立团尖刀排与日军突然遭遇，一阵短促的接火后，双方都撤回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杨成武心头一沉，意识到必须迅速调整阻击地点。他立即命令部队占领公路两旁的山头，构筑工事。这些山头虽然比驿马岭矮些，如果坚守住，仍可阻止日军援兵的前进。

24 日夜间的那场大雨同样浇到了独立团的头上，寒冷的夜晚，官兵们就在无任何遮挡的山间工事里度过，借着雷鸣后的电闪光亮，杨成武看到他的士兵们怀抱步枪和手榴弹，静静地坐在一块块岩石上，任凭雨水冲刷。在雨中，他们持枪坐到了天明。

天亮后，雨停了。杨成武得到情报，大约一个联队的日军已到达涞源城，并派出部分兵力，经驿马岭向平型关增援。几乎就在平型关打响的同时，独立团和已进至脚下公路上的日军交火。

这里虽不是平型关之战的主战场，但战斗依然激烈而残酷。冲锋号吹响之后，1 连阵地上率先站起一个满身是泥的人，挥动着驳壳枪，率领战士们冲锋。杨成武仔细一看，那是绰号“醴陵拐子”的 1 连长张德仁。他是湖南醴陵人，个子不高，但很机灵。其实他不瘸不拐，还有一双快腿，爬山涉水行军打仗总走在别人前头。因为他活泼好动，爱和大伙开玩笑，别人对付不了他那股“刁”劲，才送给他一个“醴陵拐子”的绰号。这时他的帽子不见了，在紧紧盯住他的杨成武眼里，他大步如飞朝日军冲去，半路上，他把驳壳枪往腰间一插，弯腰捡起敌尸旁的一支三八枪，打开枪刺，不一会儿就率领战士们冲进敌群，

与敌展开了肉搏。一时间，猛烈的金属碰击声隔很远都能听到。

几分钟后，下到公路上的日军被张德仁和他的部下消灭了。张德仁扔掉刺刀已经变形的三八枪，又从敌尸上抓过一支，擦去溅到脸上的血，沙哑地喊了一声：“上啊！”又带头朝驿马岭隘口冲去。

杨成武的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张德仁。只见他像松鼠似的，又蹦又跳，紧跟着溃退之敌往上冲，致使日军无法用火力阻挡。但是，就在他们冲到半山腰时，隘口两翼突然喷出七八条机枪火舌，张德仁身子晃了晃，便和前面的两个鬼子一同摔倒。他身后的战士也纷纷中弹，顺着山坡往下滚……

杨成武心如刀绞。1连的牺牲太大了，而且他们中有不少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许多年过去了，杨成武上将仍然无法忘掉机灵、调皮的“醴陵拐子”张德仁，每每想起他来，一股强烈的崇敬、悲伤之情便会涌满杨成武的胸间……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通信员送来了师部的电报：“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1000多人。你独立团已胜利完成打援任务。”

杨成武当机立断，决定全线出击，独立团的战士们呐喊着冲上驿马岭，残敌逃向涞源城，他们一直追到城下，乘机光复涞源。

这一仗，日军在驿马岭前遗尸300多具。独立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连和3连减员过半，有的班排竟全部阵亡，烈士的遗体上，很多都是身中数弹或数刀……

战前，林彪曾对师侦察科长苏静等人说，他计划此仗俘虏一批日

本人，押到太原游行，以扩大影响。苏静记得当时还对部队作了动员。

真正打起来了，才发现情况不是那么回事。面对八路军居高临下的打击和排山倒海般的冲锋，已经陷入绝境的日军并不惊慌，他们除了不断地妄图抢占制高点外，其余的都钻到汽车、马车下，或是利用沟坎掩护，拼命还击。刚刚从内战中走来的八路军战士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日本人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即使听懂了，也不会有人缴枪，回答战士们的，是一声声的冷枪和明晃晃的刺刀。许多人因缺乏对日作战的经验而阵亡——原本有些牺牲是可以避免的。

战后，第 686 团团长李天佑说：“1 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鬼子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军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日军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被日军打伤了。由于日军的野蛮和骄横，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鬼子的伤兵同我们的伤员扭打，直到拼死为止。”

第 687 团 12 连机枪班长霍薄凌说：“大部分鬼子被压在沟里冲不上去，少部分冲上去的，又被阻住退不下来，经过一阵冲杀，他们的人已经越战越少了，只得三五成群地在沟滩上乱吼乱窜。我们用生硬的日本话喊着：‘投降吧，缴枪不杀！’可是那些不识抬举的强盗，像根本没听见似的只顾乱窜，谁也没举起手来。部队只好从四面八方冲下山去。我们连的打旗兵冲到鬼子中间，嘴里不停地喊着‘缴枪不杀’，

不料，被一个鬼子猛刺了一刀，只见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使出毕生力气，一刺刀戳进那鬼子前胸，和鬼子同时倒在血泊里。”

据说第 687 团好不容易抓住一个鬼子，想把他送到后方去，怎么也弄不走，没别的办法，只好把他捆起来，放在担架上抬着走。但这家伙在担架上也不老实，一次次往下滚，于是，战士们便把他绑在担架上。一路上他不停地喊“八格牙鲁”，大伙还不知道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也没在意。走着走着，谁知他硬是挣断了绳子，又从担架上翻滚下来。有个战士去抱他，他张口就咬，这个战士一怒之下，开枪将他击毙。

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小寨村的村民们也抓住一个鬼子，大伙用绳子捆上他，想把他制服了，送给八路军。但这个鬼子也是见人就踢，逢人就咬，像个疯狗。当时目睹了这一场面的一个姓田的老汉说：“见他那个孬样，可把乡亲们气坏了，几个人把他拉到山梁上，一顿镐头把他打死了。”

到 25 日过午，战斗进入尾声。聂荣臻随同出击的部队下到沟底公路。他在察看战果的时候，碰到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洞口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但那家伙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聂荣臻说：“丢手榴弹，消灭他！”

到头来，居然一个俘虏没抓到。

下午 4 时，战斗结束。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息，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刚才还是杀声震天的十里长沟，突然间寂静下来，静得令人感到恐怖和迷惘。

第 687 团 3 营 2 排副排长程荣耀站在沟底，他是个小胖子，一副敦敦实实的身材。他使劲眨巴几下眼睛，看到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汽车，横七竖八的尸体，死在车上的日本兵，囫圇个的很少，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有一辆车上有半槽子死尸，血肉模糊，分不出个来，或许叫肉馅更恰当。驾驶室里的司机趴在方向盘上，脑袋开了花，脚踏板下红的白的流了一大摊。程荣耀又把目光移到河滩上，到处是一摊一摊的血迹，几乎每一块河卵石上都沾满了血，大片血迹以及积存在石缝里的还未干透，小片的和零星血点已经风干，变成了绛紫色……

远处，隐隐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

3、有了八路军的感召，晋军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郭宗汾的第 2 预备军受阻和八路军第 115 师在关沟与敌激战之时，第 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受命来到大营指挥作战。

孙楚和高桂滋之间的磨擦阎锡山都清楚。他生气地说：“孙楚这个总指挥没用，连个军长都制不住，这仗咋打”

参谋长朱绶光说：“必须派一个有威望的将领到大营统一指挥。”

阎锡山：“那就让傅宜生去吧！让他负责指挥平型关全线。雁北方面的敌情如何”

朱绶光：“目前无甚大的变化。”

阎锡山：“我认为平型关外大有可为，不可让八路军专断。再令陈长捷率 61 军从代县出发，急速赴援平型关，咱好好在平型关打一仗！”

傅作义风尘仆仆赶到大营的时候，满面戚容的孙楚迎上来同他握手。他们可谓老朋友了，同为晋南籍将领，两人在太原的公馆又相距不远，素日过从甚密。去年傅作义在绥远作战时，孙楚极力赞同，并受傅之邀到傅府分析形势，策划戎机，百灵庙大捷，傅作义声名鹊起，这其中亦有孙楚襄赞之功。

一见傅作义，孙楚就气急败坏地说：“宜生，高桂滋、李仙洲这些客军不听命令，擅自放弃阵地，致使勇敢出击的郭宗汾军陷入极大被动，吉凶难卜，不但无法配合八路军围歼日军，反而难以自救，实在令人愤慨！”

傅作义对孙楚稍加安慰，问：“郭宗汾打到了什么程度”

孙楚说：“他们与总指挥部的联络已经中断，详情一概不知。”

傅作义沉思片刻，首先要通已避于恒山之下的高桂滋的电话：“高军长，目前平型关激战正酣，陈长捷已兼程前进赶往增援，阎长官仍决定于平型关外大举歼敌，为了确保迷回、涧头、六郎城等重要据点，便利大军进出，作义盼望第 17 军挽回团城口。”

高桂滋为难地说：“傅总司令，职部已被敌突破，尚在散逸，未及收容整顿，职力难从心，请总司令体谅。”

傅作义又要通李仙洲。回答仍是力不从心，实难从命。傅作义摇摇头，他能做到的只是连续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陈长捷率军主力兼程前进，同时设法与郭宗汾取得联系，命令他率部坚守阵地等待增援。

孙楚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傅作义做这一切。他深深感到，当部

下不听指挥的时候，才是最难受的时候。空头司令难当啊！他不由得垂下已有少许白发的头颅。

鉴于此，当更为惨烈的忻口战役开始后，孙楚便托病不出了。

事实上孙楚虽然由下级军官擢升为晋军高级将领，但阎锡山对他并不十分信任，他自然清楚这一点。然而，他只念阎的知遇之恩，始终对阎忠心耿耿。几十年间，晋南籍将领大多背阎而去，也曾有人策动他拥兵自重，或者投蒋；蒋介石知悉他是个军事人才，亦曾数次拉拢，试图网罗，他总是不为所动，一直对阎鞍前马后尽心尽力。他说：“阎跳崖我跳崖，阎滚沟我滚沟。”即便到了1949年太原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阎锡山金蝉脱壳逃离后，他仍没有动摇，直至战败被俘。惟有一次例外，那是1940年“晋西事变”前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寇勾结，降日之风甚嚣尘上，他郑重地拜托杨爱源转告阎锡山，明确表示：“如要降日，我就解甲归田！”

有一个时期，孙楚迷上了无线电，并不断钻研，竟学会了修理收音机，能拆能装，装拆自如，一台收音机随人而走，常年不断听时事新闻。因此，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曾一度分析美日绝对不免一战，而战败必属日本。不数日而太平洋战争起，迄至日本投降，一如所他预测。

也算一个很不错的预言家了。

从代县出发前，阎锡山将在晋北被打散的李服膺第61军的番号转畀给陈长捷，陈长捷第1预备军便改称第61军。这个新的第61军与先前的那个61军无任何直接关系，陈长捷的部队中甚至没补充李

服膺的一兵一卒。而且这似乎是一个不吉利的番号——原部被日军击溃，又被阎锡山拆散，军长李服膺被关押，处境险恶。陈长捷还未来得及琢磨这些，便接到了急速赴援平型关的命令。

陈长捷率部经繁峙向大营日夜兼程。他命令军属第 217 旅在前，军部随先头部队行动，主力第 72 师和第 208 旅、独立新编第 2 旅及军炮兵营随后跟进。沿途不断遭到大雨的袭击，道路泥泞，部队行动倍感困难。过繁峙城后，陈长捷接到了傅作义接任总指挥后发出的第一道急电。他命令所部冒雨火速东进，部队一夜急行军 100 余里，26 日凌晨，军主力抵近大营。

还在部队过沙河时，陈长捷便带卫队骑马率先驰往大营。寂静的夜晚，马蹄声传得很远，平型关方向，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更显军情紧急。微明时分，他们赶到了大营，陈长捷抹一把脸上的冷汗，纵身下马。此时，总部的幕僚们仍在熟睡，有人爬起来迎接陈长捷。陈长捷急问：“现在情况如何”

回答是：“由于高桂滋军临阵脱逃，致使郭宗汾部冒险出击，被敌压制，隔离于东、西跑池、迷回、涧头和六郎城各地，苦战支撑。幸好八路军一部从关沟方向进攻东、西跑池的敌人，减轻一些郭部的压力。据报郭军被分割各部虽然损失较大，但尚能坚持待援。”

傅作义听说陈长捷到来，衣服未穿好即迎出来。他们已顾不上寒暄。

傅作义：“介山，你来得好快，部队现在何处”

陈长捷：“一部正在向齐城急进，军主力随后就到。我军如何增

援”

傅作义：“当务之急是解除郭宗汾的困境。你要协助郭宗汾全力反攻团城口，趁势进出大、小寒水岭旋回压迫敌之侧背，以引起平型关正面第 33 军同时出击。目前防守平型关正面的第 33 军独 8 旅士气尚可，你无须顾虑。”

陈长捷：“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傅作义：“越快越好。估计八路军仍在东、西跑池和 1886.4 高地之侧，如你今展开攻击，可和他们一同取得夹击敌人之效！”

这时，第 61 军参谋长李铭鼎打来电话，向陈长捷报告：军先头部队第 217 旅到达齐城一线，已将围攻涧头之敌击退，并向迷回村进攻中。第 208 旅第 415 团展开在齐城以东，掩护军主力集结。

陈长捷指示李铭鼎：“炮兵要支援第 217 旅进攻。”

放下电话，陈长捷说：“情况紧急，我马上去布置攻击，总司令还有何训示”

傅作义说：“梁春溥第 217 旅完成解救郭军在涧头、迷回之围后，暂归郭军长指挥，以恢复郭军的战势。对从团城口下来的溃部，无论何属，一律在齐城线上强制收容，勿任其流窜影响后方。最后祝你马到成功！”

陈长捷敬礼，退出。傅作义目送他打马远去。外面天已大亮，团城口方向的炮声更为猛烈，好像天边滚滚的闷雷。

陈长捷在齐城至沙河的泥泞道路上快马扬鞭，沿途除遇到第 1 预备军新 1 旅的一小部溃散官兵外，未再见到流散部队。再往前，却又

碰到整队的炮兵往下退，大约有两个山炮连，炮件驮马都很齐整。陈长捷眉头一皱，勒马立住。副官驱马上前，不一会儿，带回一个 30 多岁的官佐。副官说：“军长，他是这个炮营的李营长。”

陈长捷喝问：“你是哪支部队的”

李营长说：“报告长官，我营是隶属于高桂滋军长的晋军炮兵营。”

陈长捷：“你为何擅自撤退”

李营长：“部下是奉高军长命令，从前日晚间撤出西跑池阵地，到迷回村后又奉命到大营归还团建制。”

李营长边说从怀中掏出高桂滋下达的撤退命令。陈长捷的脸色缓和下来，他说：“傅总司令有令，所有流散部队一律强制收容。李营长，我命令你率山炮营原路返回，暂归 61 军指挥，重新投入战斗！”

李营长虽不太情愿的样子，但还是听从命令，率部返回了。

第 217 旅刚刚将被困于涧头村的第 2 预备军一部解救出来，战死者的尸体还未及掩埋，一些茅屋仍在燃烧。陈长捷等人骑马来到，他在一座未受战火损坏的房屋前下马，对左右说：“军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这里离团城口的直线距离 5 公里多一点，日军的重炮不费劲就能打过来。

9 月 25 日那天，第 6 集团军第 33 军独立第 8 旅旅长孟宪吉透过望远镜，目睹了八路军第 115 师在十里关沟与日军血战的壮烈场面。独 8 旅被认为是阎锡山的看家部队，虽备受阎的信赖，但战斗力很一般，自担任平型关正面的防御任务后，旅长孟宪吉心里七上八下，不

清楚这仗到底会打成什么样子。

两天前，八路军第 115 师联络参谋袁晓轩来见孟宪吉。袁高参说：“八路军即将在平型关下给敌人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贵旅的防地紧靠我们的伏击地点，是包围圈的一个口袋底，希贵旅坚守阵地，不要动摇。”

孟宪吉听了喜出望外，脱口答道：“能，无论如何我是要与阵地共存亡的。”

袁高参不放心地说：“山西军队可是不能打仗呀！”

孟宪吉脸一红：“军队与军队不一样，打着看吧。”

当时孟宪吉心想，八路军论人数，论装备，不仅不如蒋介石的军队，就连晋绥军也比不上，为什么他们就不怕敌人呢

经过与袁高参的几次交谈，在袁高参的鼓励下，孟宪吉渐渐树立起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八路军平型关下与敌血战的壮观而又悲烈的场面使他感动和感慨，他对第 623 团团长郎春生说：“人家八路军说干就干，毫不含糊，咱独 8 旅要像人家那样，不能装熊。”

26 日天刚蒙蒙亮，日军约一个大队的兵力猛攻独 8 旅的一些主要阵地，孟宪吉当即抽调一个营与日军展开对攻，双方在山坡上进行白刃格斗，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这个营居然很快将日军打退。孟宪吉放下望远镜，原本十分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他咧嘴笑了笑，对随从说：“以往打仗，咱们晋军不敢和敌人拼刺刀，这回不赖，以后就这样打！”

在这天的战斗中，一股日军多次冲击第 623 团 1 营阵地，各连连

长纷纷向营长刘光耀求援，或是请求后撤，刘光耀没说别的，只是对他们说：“旅长和团长让我告诉你们，昨天八路军在蔡家峪伏击敌人，获得重大胜利……”

这一招很灵，八路军的胜利喜讯传到前沿阵地后，激发起了官兵坚守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没有人再要求后撤。在此后的平型关作战中，原有 500 余人的 1 营仅剩下 100 余人。

许多年后，早已成为平民百姓的孟宪吉和刘光耀老人感慨地对来访者说，晋绥军在平型关战役中打得很不好，但是，如果没有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鼓舞，将会打得更糟糕，人家八路军才真正是铁军哩！……

4、在延安的毛泽东感到轻松多了

蔚县。日军第 5 师团司令部。

9 月 25 日早晨，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仍像前几日那样，站在指挥所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面前建筑物上的一面迎风飘扬的太阳旗出神。

板垣刚刚接到第 21 旅团旅团长三浦敏事的电报，电报上说，皇军已倾其全力攻占平型关附近的团城口，正在扩大战果，下一步即可进占大营，完成对雁门关后路的包抄。板垣非常高兴。

少顷，他收回目光，在有些阴暗的房间里踱步，嘴里哼着略显苍凉的日本军歌——

将士的红领章，

恰似万朵樱花开……

他反复哼唱。自中日爆发大规模冲突以来，也许他的心情从未这么好过——攻下平型关，太原就指日可待了，整个华北即可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囊中之物……

突然，他的参谋长西村利温推门而入，急切地向他报告：第 21 旅团后卫和辎重部队在平型关东北面的关沟被众多的中国军队包围，已处于被全歼的危境之中。

这时候，板垣还不知道给他敲响警钟的，恰恰是他并未放在眼里的八路军。正像后来日本决策当局所醒悟到的——日本还未准备与有名的八路军作战，八路军则准备与日军长期战斗。

第 5 师团的司令部里顿时乱了套。板垣立即请华北方面军派飞机到关沟一带助战，同时命令在蔚县的第 42 联队派两个大队乘汽车迅速前往增援。然而，飞机飞临战场上空时，因双方已混战在一起，无法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前往增援的各路日军尚在途中，关沟的战斗就已结束。

3 天之后，三浦敏事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派出平岩大队去关沟清理战场——实际上是去收尸。八路军只将自己的伤亡人员和缴获的军用物资运走，众多的日军尸体和被击毁的车辆仍遗弃在战场上。

后来，平岩大队将清理战场的情况写成一份记述：

9 月 28 日，龙泽中队得到友军的支援后，勇气百倍再次继续前进中，此时遇到意外的情景，一刹那间吓得停步不前。冷静下来看时，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 余辆汽车惨遭毁灭，每隔

20 米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阵亡者，或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无数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

用了长达 3 个小时，才把一辆辆烧焦的汽车拖到公路的一边，处理好阵亡者的尸体，公路勉强可以通行，龙泽中队开始前进，到达岭上。从岭上往峡谷一看，辎重车队不是也全部覆灭吗公路不是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尸体堵塞着了吗……宛若地狱图画的悲惨情景。

龙泽中队长鼓励因饥肠辘辘和震惊而意志消沉的士兵，收集阵亡者的指甲，识别标志，把车辆运到后边的空地上，以及收拾尸体和马匹，约用 2 个小时完成这些作业后，公路才勉强能够通行。这时，在半山腰发现并救出 3 名半死不活的伤兵……

这一切似乎来得太突然。

平型关，无疑给板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48 年 12 月 22 日深夜，在东京鸭巢监狱内，当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被送上绞刑架时，也许他会意识到，他的厄运正是从平型关开始的……

9 月 26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庆祝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胜利。

同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 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来自国内各地乃至海外的祝捷电报雪片似地飞往南京，飞往延安。也许由于平型关的胜利是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

意犹未尽，感慨颇深，紧接着又发出一封嘉奖电：

朱总司令玉阶兄：

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中正

仅此一仗，八路军声威大振。26日这天，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红军地位成了神奇古怪的东西。多数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晋军有专学红军吃饭样子。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黄绍竑前几日从太和岭口辞别阎锡山后，乘火车回南京，刚到达石家庄，就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他亲眼目睹，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这时黄绍竑还不知道，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任命他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娘子关之战，和忻口之战一起成为保卫太原的两翼。

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著名爱国人士续范亭著文：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在于双方伤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日军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顿挫，

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日军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虽然大捷是空前的，但许多年后，不少亲历过平型关之战的老战士却认为，这一仗打得并不是太好，主要是对日军估计不足。这股日军还不是很强的主力，是后勤辎重部队，居然都这么难打，碰上真正的强敌怎么办

林彪也在反思。打扫战场时，发现日军遗有尸体 1000 多具，而各团报上来的伤亡数字有 600 多，也许还不止这些，朱德亲自来第 115 师师部祝捷并总结战斗经验时，问起伤亡数字，聂荣臻直率地说：“我看不下千人。”

这一夜，林彪和聂荣臻一同躺在平型关下白崖台旁一间低矮的小窑洞的土炕上，疲倦已极的聂荣臻很快打起了鼾声，林彪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一心想创一个惊世之举，其实到头来只与板垣打了个平手。而且越想越感到后怕：要不是预先占据有利地形，出敌不意，攻其无备，以优势兵力迅猛攻击，那后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而类似这样的伏击战，内战时期，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几乎每次都不太费劲地取胜了——4 年前的春天，第四次反围剿时，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带领部队，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配合下，在黄陂圩、蛟湖、登仙桥一带设伏，半天时间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俘虏 1 万多人，红一军团军威大震。半个多月后，他们又在草台岗附近遭遇国民党军中赫赫有名的第 11 师，一场恶战之后，陈诚赖以起家的、被蒋介石称为绝对主力的、据说从未打过败仗的第 11

师几乎全军覆灭……

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几天前，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曾针对林彪说过一段话：“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起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的确是情况大大不同了。

林彪后来著文承认，在平型关，“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很少捉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

说到底，八路军在平型关地区的战斗，仅仅是配合平型关正面防御的友军而相机发动的一场侧击战斗，八路军虽然取得胜利，仍不可能扭转接踵而来的晋北防御的失败，更不可能协同国民党军取得“决战”的胜利。

20天之后，林彪在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时说：

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己订出的出击计划，他们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

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有了平型关这一仗，林彪的思想才真正转过弯儿来，好在为时不

晚。

周恩来也在思索。他感到，在八路军指战员中较为普遍的“速胜论”想法，在他身上也有反映——为什么把正面作战看得那么重，而对敌后游击战看得那么轻为什么在八路军出征时总是为能否获得声誉所困惑，却不为民族革命战争最后取得胜利而忧虑……

周恩来赶到五台县中部凤凰山麓的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此时朱德、彭德怀刚刚发出一个“以太原为堡垒”的华北军分会《指示》，这个指示中也并未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他们的思想上也有疙瘩。

平型关之战是个契机——时过不久，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们才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使入晋抗战的八路军 3 个师的兵力部署发生大变，各师分兵若干支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以及后来的长期对日作战中，八路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日军遭到了远比平型关更为惨重的打击……

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感到轻松多了。

5、八路军撤了，晋绥军仍在坚守

行进中突遭日军猛烈袭击的第 2 预备军已就地坚持了一天一夜，初上战场杀敌心切的官兵们遭此意外打击，意志并未消沉，他们在临时构筑的简易阵地上顽强抵抗，这使军长郭宗汾稍感欣慰。而不能按时出击到位，协同八路军围歼当面之敌，又令郭宗汾极为难堪——平型关战役结束后，他为此背上了“黑锅”，高桂滋指使人在太原的报

纸发表文章，谎称团城口被突破乃郭宗汾见死不救拒绝增援所致，就连八路军也认为他隔山相望，袖手旁观，不按计划出击。

单靠第 2 预备军攻占团城口不但不可能，反落得需要别人救助，郭宗汾的气不打一处来。除了鼓励部下为国效命、勇敢杀敌外，他一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所幸八路军结束了关沟的战斗后，杨得志的第 685 团又向东、西跑池和 1386.4 高地展开对日军背后的攻击，钳制了团城口、鹁子涧日军的行动，才使第 2 预备军在涧头、迷回一线站稳脚跟，主力未受大的损失。八路军撤走后，形势又一度吃紧，迷回正西约半公里远的六郎城失守。郭宗汾命令第 214 旅旅长赵晋负责夺回六郎城，赵晋将任务下达给第 428 团团长王荣爵。这天晚上，王荣爵召集营连长开会，经研究后决定，派 2 营 4 连少尉排长王学成组织奋勇队完成这个任务。

王学成一当兵就在团长王荣爵手下，平时团长对他很好。团长此刻向他交代任务的时候，却一脸杀气地说：“军长限令我团今天夜里夺回六郎城高地，天明夺不回来就要我的脑袋！现在决定由你排编成奋勇队，天明前夺回来，赏洋 2000 元。你有什么好办法按时完成任务”

王学成想了想，说：“敌人在山顶下方的梯堞上筑有明暗工事，由正面或侧面攻击，要受很大损失，也不一定能攻上去。不如利用夜幕掩护，翻过山从敌人后头摸上去，占领敌人阵地的上边，不愁拿不下来。”

王荣爵说：“很好，你还需要什么”

王学成说：“给我配备 6 挺轻机枪和 12 名射手，10 支冲锋枪，一共 40 多人蛮够了。另派一个连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作为预备队，其余什么也不要了。”

传说北宋名将杨六郎当年曾驻守于此，这个并不起眼的山头因此得名六郎城。夜间 11 时，王学成带奋勇队向平型关关口出发，很快翻过两道山梁，顺着一条山沟绕到日军阵地的后面，急速攀上六郎城。山顶上有一块较为平整的地段，下面就是日军藏兵的战壕和明暗工事，所有的射向都指向前方和左右，王学成估计这里大约有日军一个中队驻守。当他们继续向前运动时，日军的哨兵听到了动静，与此同时，他们手中的 6 挺轻机枪喷吐出密集的火舌，日军顿时惊慌起来，顾不上还击四下逃窜。因为天黑，加上从上往下射击，死角大，看不清日军逃跑的方向和去处，结果大都让他们跑掉了，奋勇队无一伤亡。清理战场时，王学成看到，除了敌尸、枪支和食物外，还有 4 只长约 40 多公分，宽、高各有 30 多公分的牛皮大背包。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打开它时，少校团副邢子耀从后面赶上来：“王排长，发了什么洋财啦”王学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只皮箱，里面满满装着用白色绷带包裹的一只只小包，再打开那些小包，在场的人谁都没想到，每一个小包里面都有一只左手，包上有日文，这 4 只皮箱里装有 100 多只血迹未干的左手！

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许久他们才明白，这是日军记录阵亡者的一种方式。

26 日上午，第 61 军第 217 旅击溃围攻涧头村的日军后，旋即联

合守卫涧头的第 2 预备军一部再向迷回攻击前进。

这时，派出侦察的骑兵向陈长捷报告：“西北面的鹁子涧之敌前来增援迷回，东、西跑池之敌纷纷下山，冲向第 217 旅右侧。”

陈长捷命令：“展开在齐城东地区的 208 旅进出于 217 旅右侧，迎击西跑池之敌。两个旅的炮兵营在齐城东的公路两侧占领阵地，对迷回、西跑池之敌射击，支援这两个旅进攻。军炮兵营要集中火力，截断从鹁子涧通向迷回东南的隘路，阻止敌人增援迷回。”

第 217 旅旅长梁春溥命令所部：“先头部队接敌后，即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各团要把部队控制好，不要都放在阵地内，监视哨亦要严密隐蔽，不要轻易放枪。因为正面的地势较低，来敌可能是小股，不要滥放枪把敌人吓跑了。等敌人到了跟前，突然冲出捉活的。”

果然，不一会儿，第 433 团的士兵兴高采烈地押着刚刚俘虏的 6 个日军医务人员来见梁春溥。梁春溥令他们赶紧将俘虏押往军部。

又过了一会，新兵团的一个营长来到旅指挥所，那个营长对梁春溥说：“我所担任的正面有一座独立房屋，窜过来 10 多个日本兵，死不缴枪，打了半天，都把他们打死了，缴获一支勃朗宁手枪送给您。”

梁春溥说：“你干得很好，请把手枪直接报缴你的直属长官。”

傍晚时分，第 217 旅左翼第 434 团在团长程继贤的率领下，从涧头东北一口气冲上迷回北面的山头，旅主力随后跟进。日军两次反扑均被击退，遂解了郭宗汾军迷回之围。第 208 旅第 415 团攻占西跑池，救出困守在一个小据点里的郭军一部，然后继续向东跑池攻击，日军凭借高桂滋军原来的阵地，顽强抵抗，而鹁子涧之敌又冒着猛烈的火

力阻击，源源不断地增援东跑池，夜深之后，两军对峙于东跑池南山头，第 61 军的攻势暂告一段落。

27 岁的第 217 旅第 434 团团长期继贤上校是山西太谷县人，他有一张英俊的娃娃脸，粗粗的眉毛，细长的眼睛，厚厚的嘴唇，留着光头。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敏，深得军长陈长捷的喜爱。

一个多月前，陈长捷率部参加南口作战时，第 434 团被阎锡山指定留在雁北看守所谓“国防工事”，“大同会战”时，该团又被调到阳高，临时归属作战不力的原第 61 军军长李服膺指挥，一直未能同日军照面，程继贤和他的弟兄深以为耻。来平型关前，程继贤多次上书旅长梁春溥和军长陈长捷，要求他的团队打前锋。他还嘱咐军需官：“此次到抗日前线，估计十有八九回不来了。我如果阵亡，请你多加关照我的老母、妻子和女儿……”

26 日夜里，第 434 团占领迷回北山头后，程继贤迎风站在山顶，借着炮火的光亮，他看到鹁子涧的日军不断向东跑池方向增援，作为平型关西面屏障的鹁子涧肯定已变得空虚，他决定一鼓作气攻占鹁子涧。团副郭唐贤说：“应先报告旅部再行动。”他说：“来不及了，先拿下再报告吧。”果然，他们一个冲锋，顺利攻占鹁子涧，将团城口和东跑池的日军阻隔开来。这时，程继贤对郭唐贤说：“你带 2 营去六郎城，与被日军隔离的第 2 预备军陈光斗旅长打通联系，我在这里等待旅主力到来后，再协同六郎城的部队攻打团城口。”

1 小时后，郭唐贤带 2 营打通了与陈光斗旅的联系。陈光斗却以该部受敌两日攻击，幸得解围，亟需整理恢复为由，未能配合程继贤

团。少顷，哨兵报告迷回村东北面发现不少日军，其实这些日军是从鹁子涧溃退下来的。陈光斗误以为日军又增兵南来，反扑迷回，连第217旅旅长梁春溥也相信了。他们不但未行侧击，还强留下已打算向鹁子涧推进的第433团作应急准备。这样，第434团置于鹁子涧的不满千人的两个营便陷于孤立突出的位置，而且程继贤所创造的出击团城口的大好形势瞬间丧失。

次日清晨，失去鹁子涧后的日军为挽回平型关正面和团城口被阻隔的危急情况，以大约一个联队的强大兵力从两面猛烈夹攻鹁子涧。一时间，小小的鹁子涧被炮火覆盖。从关沟方向冲出一股日军迅速攻占了1386.4高地，鹁子涧处于被敌钳制之下。程继贤命营长傅冠英率部反攻。正在山间与敌相持之时，看到团城口上的日军向鹁子涧发起冲锋，傅营长又赶忙回援。

此时，鹁子涧涂满了鲜血。程继贤嗓音嘶哑，已发不出声音，也无需再说什么。他和营长傅冠英、梁世荣来到最前沿，与士兵一起往前掷手榴弹……黄蜂般的鬼子一群群地往上涌，怎么也打不退。双方紧接着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一个时辰后，程继贤和两个营长以下近千名官兵全部战死。

团副郭唐贤和2营长张景舜遥见鹁子涧战事激烈，率2营急速赶来，又与日军在山下遭遇，二人均负重伤。

第217旅旅长梁春溥闻讯后，即率第433团赴援，然而已经来不及，被阻于鹁子涧西侧。当满面热泪浑身是血的团副郭唐贤和2营长张景舜被人抬下来时，梁春溥仅收容到第434团所剩的不足一连人，

而且大都负伤。

这是陈长捷部继南口抗战后又一次整团的壮烈牺牲。陈长捷一怒之下，给予应负节制失机之责的旅长梁春溥以戴罪图功的警告处分。

板垣征四郎和三浦敏事连日向平型关增兵，似乎要将在关沟被八路军痛歼的仇恨发泄到晋军身上。

夺回鹞子涧后，已推进到东跑池南山的第 61 军第 208 旅成了日军打击的又一个目标。该旅第 415 团阵地前打得最为激烈，经反复搏杀后，第 415 团损失过半，团长刘崇一胸部和大腿中弹，无法站立。刘崇一坐在地上，仍然不停地摇晃着双臂高呼杀敌。

旅长吕瑞英手下已无预备队可调，仅余第 416 团的一个干部营。但这个营 300 多人都是晋绥军教导团刚拨来随军见习战斗的干部苗子，战区曾有交待，不得轻易使用。面对各部的求援声，旅长吕瑞英很为难。

但这些干部苗子纷纷要求上阵地参战。吕瑞英思忖了好一阵，终于咬咬牙同意。临时发给他们武器，由第 416 团团长宋恒宾带领增援打得最艰苦的第 415 团。一场恶战后，干部营伤亡 80 多人，营长范占元重伤。

虽经数日鏖战，第 61 军和第 2 预备军仍未能夺回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六郎城等高地，两军伤亡在 5000 人以上。但平型关正面仍在守军手中。

6、阎锡山平型关下慌忙撤退，蒋介石回电安慰：继续杀敌，以争最后的胜利

太和岭口。第二战区行营。这几日来，先是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令阎锡山如鲠在喉——八路军虽从属他的第二战区，但那毕竟是共产党的部队，这些“部下”打了胜仗，他不但未见高兴，反而感觉酸溜溜的。他说：“平型关，独让八路军名扬天下！”

再就是平型关正面战事并不顺遂，令阎锡山感到焦虑。27 日一大早，他两手插在裤后腰上在小院里转来转去，参谋长朱绶光、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第 19 军军长王靖国、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此时续还兼任阎的高级参谋)等人也都站在院里。张培梅上前几步，对阎锡山说：“长官不要犹豫，可以到前方走走。就是哭哭啼啼叫士兵们看看，他们也好打仗。”

续范亭说：“长官如果去，对前方将士将是个很大的鼓励。”

阎锡山哼了一声，没说什么。王靖国一直没吭声。张培梅又说：“去吧，还犹豫什么，日本人的飞机用不着怕！”

三说两劝，阎锡山终于答应到平型关前线走一趟。

大营。尽管第 61 军加入战斗后未能夺回平型关附近的一系列高地，但傅作义判断，日军第 5 师团的攻击已到极限，如果此时再投入一支生力军，即可大有作为。此时，他想到了他的第 35 军。

阎锡山同意第 35 军加入平型关方面的战斗。于是，刚刚率部到达代县以西阳方口的第 218 旅旅长董其武和第 211 旅旅长孙兰峰，还未顾上喘口气儿，便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即日开往平型关。”

多日来一直平静无异常的雁北方面出现敌情。东条英机率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后，便飞赴长春，把部队交给关东军副参谋长笠原幸雄指挥。

笠原幸雄重施切断中国军队后路的故伎，日军未沿同蒲铁路南下，而是直奔繁峙正北的应县，27日深夜，先头第15混成旅团到达内长城外的要地茹越口。

茹越口是恒山与雁门山衔接部北麓的一个山口，再往南翻越长城不远就是繁峙城。茹越口也正是晋绥军第34军和“客军”第15军的接合部。

担任茹越口守备任务的是第34军第203旅。战前，旅长梁鉴堂将第406团布置在茹越口正面，该团3营被留做旅预备队。

28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在前沿担任警戒的哨兵发现大批日军成战斗队形向前冲锋，马上鸣枪报警。阵地上，顿时枪声大作。日军和伪蒙军步骑兵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蜂拥而来，其间还有9架日机飞临战地上空助战。仅一个冲锋，就将第203旅的大部分阵地突破，茹越口失守。

正在后方指挥所的旅长梁鉴堂闻此消息大惊失色，马上带预备队由驻地向宋家窑和茹越口之间的东山攀登，试图夺回茹越口。在这支预备队中，有一个叫刘茂的年轻人，他是第406团3营9连少尉排长。50多年后，他对笔者说：“他(梁鉴堂)身着黄呢军服并佩戴军衔，在旭日照射下，从山顶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日军发现，以重机枪射击，当即牺牲……”

刚满 40 岁的梁鉴堂是河北蠡县人，中等个头，英俊潇洒。刘茂清清楚楚地看到，旅长的颈部中了三弹，喉管被打穿。3 营营长储寿昌感到自己未能保护好旅长，痛悔不已，急率全营直奔前沿阵地，在沟内与日伪军展开白刃搏斗。1 小时后，储寿昌被日军的刺刀刺中牺牲。

茹越口失守时，阎锡山正行进在前往平型关的路上，随行的有张培梅、续范亭以及侍卫人员共 20 多人。他急令第 19 军军长王靖国负责恢复雁北的防御。28 日晚间，阎锡山一行渡过沙河，杨爱源、孙楚等人已在河边迎候多时。杨、孙将阎护送到沙河以南、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住宿。这个小村子位于五台山北麓出口处南峪的东山脚下，因而得名东山底。

过了沙河后，平型关方向沉闷的炮声便充斥了阎锡山的耳膜，才使他真正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

29 日上午，阎锡山在杨爱源、孙楚的陪同下来到大营指挥所。见到傅作义后，阎坚持要亲临前线视察，由孙楚陪同前往。他们乘车刚到达齐城，一架日本飞机飞临上空，众人赶快下车隐蔽。日机飞走后，阎锡山从隐蔽处钻出来，他突然看到平型关顶和周围的高山上都已满目白霜，想必雁门关和宁武关也已被白雪覆盖。他喃喃地说：“三关戴孝，不祥之兆啊……”

孙楚说：“长官来前线的事，已通报各部队，对稳定军心已起到很大作用。为了安全，长官不宜再前行！”

坏消息频频传来。日军第 15 旅团攻占茹越口后，迅速拿下邻近

的铁甲岭要塞，然后直插雁门山后方，于 29 日傍晚占领繁峙城。繁峙丢失，等于平型关后路被切断，内长城防御线即有崩溃的可能。

阎锡山感到局势大为不妙，他说：“雁北和平型关两方面，都使我们忧虑，得想想办法。”

此时，在内长城一线规避决战，大举退却的设想已注入阎锡山心头。

29 日晚上，寒风呼啸，四野一片悲凉之气。在东山底的一处民房里，阎锡山召集前方军以上的将领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傅作义先讲。他说：“侵入繁峙的日军数量有限，孤军深入，可以用代县周围的部队围攻和牵制侵入繁峙的日军。35 军仍按原计划向团城口地区前进，协同关外的八路军消灭日军第 5 师团，然后再回头消灭繁峙的日军，这是第一方案。还可考虑第二方案，就是在平型关以现有兵力坚守，以已行进到繁峙东、西的 35 军全部，夹攻侵入繁峙的日军，消灭或驱逐这部分日军出茹越口，带动第 15 军向团城口方向旋转，抄击平型关、灵丘，消灭第 5 师团。”

阎锡山倾向于第一方案。他说：“大家不妨提提意见。”

但大多数将领不同意第一方案，认为这一方案兵力分散，难以速决。孙楚说：“进击平型关、团城口前，如果不能即时解决战局，后方对大军的补给被阻，又将如何”

阎锡山：“看来大家不同意宜生所提第一方案。那么，对第二方案有何意见”

陈长捷站起来说：“我认为第二方案可行。这几日，日军占领的

一些高地虽未夺回，而以我军现有阵线相信尚可坚持对抗，不致动摇，且让 35 军先以全力从速解决侵入繁峙之敌，巩固后方。如此一来，即便平型关我军不出击，而是倚险与敌持久对阵，亦是胜利。”

在座将领大都同意第二方案。傅作义说：“看来，第一方案缺点较多。如果决定实施第二方案，作义愿到峨口组织 35 军收复繁峙，打破目前的危局！”

傅作义的态度令众人感到兴奋。偏偏这时候，平型关前线发来急报：日军向平型关以南移动，似有转变主攻方向于平型关南翼的企图。

孙楚听参谋人员念完电报，立即说：“防守平型关南翼的，是 73 师和独 3 旅，都是残破之部，所占正面又宽，如敌以主力进击，显然顶不住，在此情况下，需要将已到达沙河的 35 军 218 旅留下，以作应急。”

孙楚对第二方案又有所动摇。阎锡山也迟疑不决。这时，桌上电话铃响起，王靖国向阎锡山报告：雁北方面反攻铁甲岭、茹越口的部队已溃退回代县，拟留 35 军一部在代县东地区警戒。

两个方向均有顾虑，阎锡山已完全没了主意。傅作义毅然站起来说：“长官，咱们不能瞻前顾后，而应坚决地首先消灭侵入繁峙之敌，稳定后方，再图良策！”

杨爱源却以五台同乡的口吻提醒阎锡山：“会长，咱们五台人都清楚，热、察、绥的蒙古人年年朝拜五台山，走熟了从繁峙、峨口通往五台山的大小路径。伪蒙军既已进占繁峙，有可能再冲击峨口，直窜五台山！”

这话说到了阎锡山的痛处——不久前，刚刚修通了一条从峨口通向五台的土公路，这是乘汽车从平型关回五台的惟一道路，如果明日被敌骑所断，他连回去都困难了！……

阎锡山拍了下桌子，猛地站起来，大声说：“我看形势已无法挽回，拖下去弄不好全军覆灭！”他望着杨爱源和傅作义，又说：“星如、宜生，咱们就下令全线撤退吧！”

散会时，已是 30 日凌晨 1 时。

夜色茫茫。深秋的夜晚，寒气逼人，阎锡山披一件斗篷骑在驴背上，左右各有一名身材高大的侍卫搀扶着。他向来不敢骑马，只能勉强骑驴，而且还要有人照料。杨爱源、张培梅、续范亭等人骑马跟在后面。这支奇怪的队伍在山间崎岖的道路上缓慢行进，无人说话，只听见嘚嘚的马蹄声在寂静的山谷间回响。

开完紧急军事会议之后，阎锡山决定马上离开平型关。原打算乘车西行，经峨口去五台，由于繁峙已经沦陷，从平型关无法直达峨口。即便沿滹沱河南岸的一条小路骑马去峨口，而峨口又离繁峙太近，虽有部队掩护，也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杨爱源说：“由东山底直接入山到台怀镇，有一条山路，虽不能通车，骑马尚可，而且仅有三四十里。再从台怀去五台，就方便了。”阎锡山决定走这条山路。随从们临时从村内老百姓家找来一头壮实的毛驴，众人紧张上路。

走在漆黑的山道上，阎锡山感到忧郁烦乱，十分疲倦。感慨之际，几句诗涌到嘴边：

撤兵令下意凄凉，指挥杂军愧无方；

原由平型复南口，孰意茹越损鉴堂。

——《勾注撤兵》

天上飘起了雪花，更觉寒冷。道路泥泞不堪，骑在驴背上的阎锡山东倒西歪，他执意要下来步行，仅仅走了几步，又被侍卫扶上驴背。

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好不容易爬上距东台顶不远的山脊，阎锡山突然看到前方山间的黑暗中竟然有点点灯火在闪耀。有人告诉他，前面就是五台山上的光明寺，那些灯火是庙里和尚在凌晨时点燃的。面对眼前的景象，阎锡山又吟诗一首：

雪天彻夜走清凉，飞灯光辉遍山梁；

老人途中迟行进，徒步泥泞衣带霜。

——《走五台山》

9月30日上午，仍在太和岭口行营的第二战区参谋长朱绶光代阎锡山发出内长城一线总撤退令，各路大军到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集结，全力保卫太原。

同日下午，阎锡山在台怀镇致电蒋介石，电文中除报告战况和军队部署外，阎锡山又提出：“山指挥无方，丧失关隘，贻误国事，非特自疚，实为国法所不容，恳钧座呈请政府严予惩处。”

两天后，蒋介石回电：

吾兄躬亲督师，为国宣劳，殊深嘉佩。平型小挫，请毋介怀，仍盼策励各军，继续杀敌，以争最后胜利。

第四章 忻口血战

1、卫立煌率中央军主力到达晋北

10月初的太原正沉陷在异样的惊慌与恐怖之中。从黄土高原刮来的冷风挟裹着黄沙在城市的上空掠过，遍地紫槐树的枯叶和各种轻飘飘的杂物随风翻卷，使这个原本比较繁华的城市显现出末日来临般的颓败气息。沿街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主张公道”、“铲除坏官坏绅坏人，扶助好官好绅好人”、“动员三十万民众保卫山西”、“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经过雨水的冲刷，这些标语破败不堪，早没了过去的模样。

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中发布的，大都是各路大军溃退的消息。一些仍在勉强开工的工厂烟囱冒出的黑烟十分醒目。敌机前来空袭的警报声终日不绝，被炸弹炸毁的建筑物倒在路边，颓垣乱瓦堵塞了道路。商店已经关门，汾酒不再像过去那样迷人，有钱人开始出城远走高飞。若不是“牺盟会”的人和大批来自平津一带的学生在这里集中，参加一些活动，唱着歌四处奔走，太原几乎停止了呼吸。

这时候的中国战局出现了微妙的态势：在华北，进入山西的日军已突破内长城守军防线，准备向太原进攻，另一路日军占领保定后，已将矛头指向石家庄。在华东的上海方面，中日两军正进行激烈的阵地攻防战，战局处于胶着状态。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最担心的是日军

占领华北后，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而山西是华北抗战的生命线，其地位愈发显得重要。

10月2日，刚刚返回太原进行忻口战役部署的阎锡山，在痛感兵力不足与时间紧迫之际，接到了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电报：

山西抗战关系到全国战局，必须保持山西抗战阵地，坚持时间越长越好，最少要坚持一个半月，那时整个战局将会有所好转。为此，中央即派第14集团军所部增援山西，现该集团军正集中于石家庄，请山西立即组织部队运输，并和卫立煌取得联系。

10月3日夜晩，一辆玩具般的小火车悄悄驶进已被日军飞机炸得七零八落的石家庄火车站。一个中等身材、面孔黑红、留两撇小胡子的中年将领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火车。他就是卫立煌。

半夜时分，小火车在正太铁路上缓缓西行，卫立煌端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脸凝重的神色。车内的灯光已经关闭，往外看，也是一片黑暗，偶尔有点点灯火在远处闪耀，像是黑夜的眼睛。车窗外的西北风裹着黄沙碎石飞舞，打在玻璃窗上，发出轻脆的响声。秘书刘毓珩进来，小声说：“卫总，娘子关到了，我们已进入山西境内。”

卫立煌在黑暗中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自率部进入华北前线后，卫立煌原估计会在北平或保定附近与日军大战几个回合，却因种种原因，他还一直未与日本人正儿八经打一仗，这使他这个一打起仗来就兴奋异常的职业军人感到有些按捺不住。蒋介石令其率第14集团军入晋作战的电报一到，他当即意识到与日本人大打一场的机会终于来了。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

他自然清楚山西对于华北的重要，目前日军正不遗余力地进攻山西正说明了这一点，而蒋介石和阎锡山绝不会轻易将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战役在所难免。

这个寂静的、无聊的夜晚，在车轮和铁轨发出的机械声中，卫立煌得以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去——每逢大战来临之际，卫立煌就爱回忆过去……

1912 年，从小就饱尝生活艰辛的卫立煌来到上海，投奔了正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在上海发动讨袁运动的合肥人范鸿仙，当革命党人进攻袁世凯爪牙盘踞的上海制造局时，年仅 15 岁的卫立煌毫无惧色，他携带炸弹越过围堑，准确地将炸弹投掷进上海高昌庙袁世凯的兵营。但那时没人想到，这个营养不良、正患皮肤病的极不起眼的小家伙后来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

1916 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空大元帅，卫立煌经人推荐，来到孙中山的卫队当兵。孙中山先生很快注意上了这个经常为自己站岗的矮小瘦弱、但双目炯炯有神的小同志。一次，卫立煌随孙中山外出回府时，坐骑脱缰，惊马狂奔疾驰，身背长枪的卫立煌在入门时被门框卡住摔下马来，身负重伤，吐血不止。孙先生和夫人宋庆龄见其少年勇敢，大为赞赏并厚加馈赠，让他回家养伤。母亲遍寻药方为他治疗，听人说用几味中草药煮一百只孵鸡蛋吃可断病根，就照方操办。但他只吃了 70 只，便启程赶往广州。孙中山见他伤愈归来，十分高兴，当即升任他为警卫团排长。这一时期，卫立煌一直跟随孙中山左右，后来他称这段时间为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22 岁时，卫立煌即因战功升任粤军营长，被人戏称“小营长”。为了装扮老成，他从这时起就蓄起一撮胡须——这撮胡须便成为他外貌上的显著特征，历时 30 载，直到 1949 年他在南京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才被迫剃去。

1925 年 9 月，卫立煌率部参加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攻打惠州城时，卫率第 9 团最先攻入西门，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攻克了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不久，他升任第 14 师中将师长。

北伐胜利后，卫立煌进入南京陆军大学学习，他成为陆大特一期惟一带职学习的学员。陆大学员可选学一门外语，卫立煌选学日语，因为他感到，将来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一衣带水的日本。

1932 年 5 月，蒋介石调集 30 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7 月初，第 14 军军长卫立煌指挥两个师到达黄安附近。黄昏时分，红军一个奇袭，直捣他的军指挥部，卫立煌亲率特务连拼死抵抗。特务连清一色是合肥子弟，在卫立煌的部队，向来有“夜间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的说法，即便连司令部的保姆，都是合肥女人。在这方面，他同蒋介石、阎锡山如出一辙。那天黄昏，幸亏特务连武器精良，将士用命，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支当时国内极少见的英式自动步枪，红军见伤亡太大，没有穷追，卫立煌侥幸没当俘虏——5 年多之后，卫立煌在山西碰到鄂豫皖红军的主要指挥者徐向前，由衷地说：“谈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则说：“卫总司令也行。”卫立煌笑了：“别那么说了，那一年在湖北，我被你们包围起来了，漫山遍野都有人在喊‘活

捉卫立煌’，要不是情况有变，再过来 200 米，我就被你们捉去了。”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地跨鄂豫两省大别山中的险要之地金家寨，曾是太平天国、捻军和白朗军的重要据点，30 年代初又成为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蒋介石严令各军向金家寨进击，各部均临阵怯战，畏缩不前。9 月初，卫立煌精心策划，亲率 1 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直扑金家寨。在红军主力已经先行转移的情况下，卫立煌乘虚占领金家寨。蒋介石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除赠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另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 5 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命名为“立煌县”。

卫立煌声名大噪，的确够“威风八面”了。曾几何时，他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领之一、“嫡系中的杂牌”，美国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词典》中说他是“常胜将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 1 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他是“支那虎将”。朱德总司令后来称颂他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1955 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又赞誉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10 月 4 日早晨，卫立煌率少数随从人员到达太原，阎锡山按照接待朱德的规格迎接卫立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率文武官员到火车站迎接，阎锡山则在绥署宾馆等候。当个头不高的卫立煌走进阎锡山的视野时，阎如遇救星一般快步迎上去，连声大呼：“俊如老弟，是咱把你求来的，你辛苦了！”

寒暄一阵后，阎锡山看到卫立煌一行风尘仆仆，都是一身深灰色

的夏季军装，便叫过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你赶快找一家大服装店，给卫总司令和随行人员每人弄一套呢军服和一双皮马靴。”

阎锡山向卫立煌谈了他关于忻口战役的设想，卫立煌报告了第14集团军输送情况。阎锡山说：“俊如，咱请你来，就是让你来指挥打仗的，我已给蒋委员长发报，让你担任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统帅晋北全部的中央军和晋绥军。”

卫立煌说：“就怕俊如力不胜任，有负副委员长栽培。”

阎锡山说：“俊如啊，你放开手脚大干吧。两天前，我刚刚下令处决临阵脱逃的61军军长李服膺，谁不听指挥，李服膺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中午，阎锡山在绥署宾馆设宴为卫立煌接风洗尘。

下午，卫立煌到府东街第二战区长官部，也就是绥靖公署大院回访阎锡山。阎锡山说：“共产党方面还派了一个重要代表到了太原呢。”

卫立煌忙问：“是谁”

阎锡山说：“周恩来。”

卫立煌说：“好极了!我能和他见见吗”

阎锡山说：“怎么不能，本来他和我约定，下午4点钟到我这里来，一会儿就到，请都不用去请。”

卫立煌的思路飞快地回到北伐以前——那时，身为中下级军官的卫立煌，多次听过比自己小一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极富魅力的演讲。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蒋介石打算撤下易守难攻的惠州不打，先攻潮梅。

周恩来认为，要想消灭陈炯明，必须先攻下惠州，否则还会像第一次东征那样，不彻底。周恩来先攻惠州的高见增加了卫立煌对周主任的信仰。1926 年北伐开始，周恩来任第 1 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是该军的一个团长。蒋介石别有用心，设置障碍不让军事干部和周恩来接触。卫立煌虽然在公共场合多次和周恩来谋面，但从没有单独交谈过。对于周恩来，当时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的不少人都曾引用过李白的诗句——“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来比喻自己认识周恩来的心情。

1936 年底，著名的西安事变发生的那一夜，随蒋一同来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 20 几个国民党要员住在西安最繁华的西京招待所，他们半夜被一阵嘈杂声惊醒。除邵元冲不听警告在跳窗时被击毙，陈诚被从地下室的啤酒木箱堆里拖出来，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钱大钧、万耀煌、陈调元、蒋方震、蒋作宾等人及其随员、家属全被集合在招待所的大厅里，受到严密监视。卫立煌知道自己是一个和红军打仗最多、最狠、积仇最多的人，估计凶多吉少。然而，半个月之后，他和众人却平安回到了南京家中。周恩来从中起的作用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下午 4 点，周恩来在一位军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他看到站起来迎接他的除阎锡山外，还有一个佩戴上将军衔的中年军官。他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位上将的面容，就见他恭恭敬敬地朝自己行鞠躬礼：“卑职卫立煌，今天见到周先生，十分荣幸。”

“啊！你是卫将军！”周恩来立即上前同卫立煌握手，并认真打量

他一番，“俊如，十年没见面，变化真大呀。没想到我们又走到一条战线上来了！”

周恩来的话令卫立煌感到了某种惭愧——那年第 14 军占领金家寨后，短短 3 个月内，他的第 83 师就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 900 多人，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呀……

阎锡山说：“正好周先生和俊如都在，咱们再好好议议下一步的部署。”

周恩来说：“目前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各界朋友及其他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最严重的情形，就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挽救危机的惟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醒民众’四个字……”

周恩来喝了口茶，接着说：“从军事上说，要改变我们的战略战术，不能只依靠打阵地战、游击战。有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武器装备不如人，这不是根本问题。八路军的武器不仅不如日本人，不如你卫俊如的中央军，就连晋绥军都比不上，不也是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吗”

卫立煌道：“八路军取得大捷的消息，俊如是在北平西南撤退途中得知的，当时我兴奋不已。我向八路军表示祝贺。”

阎锡山道：“关于八路军 129 师的使用问题，南京方面授意放在正面，百川和俊如也认为，八路军是一支能打仗的生力军，必能以一当十，希望周先生能够同意这一部署。”

周恩来当即表示：“我们不赞成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更不赞成把 129 师调到中路的正面打阵地战。百川先生和俊如将军都

知道，八路军长于游击战、运动战，不善于阵地战。所以用于正面防御，是避其所长，就其所短，不仅不能为友军以好的影响，还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恩来主张让他们迁回到日军后方，寻找有利的条件打击日军。”

阎锡山和卫立煌听后，觉得有道理，不再坚持调第 129 师到忻口正面打阵地战。

后来，卫立煌对人说，周恩来讲的战略战术以及组织群众、武装民众等问题，都是对的，但是不容易做到。在战场上用主动积极的作战方法，从侧面进行包围迂回作战，当然是好，但他深知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的素质，担当不了这种任务。那时他能做到的只是让这些军队能够服从命令，不溃不散，顶住日军就很不错了。

辞别周恩来和阎锡山后，卫立煌回到招待所。他要通第 14 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找到负责人吴海德，让他从速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

差不多这个时间，在五台县的小豆村，八路军第 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见到了第 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他们同为五台老乡。在讨论晋北局势时，徐向前说：“保定、集宁、沧县已经陷落，日军逼近了娘子关，忻口有没有把握守住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配合你们打游击战，要打到敌人侧翼和后方去！即使整个华北沦陷了，我们也还是在敌后打游击。你们最好也不要那种死守阵地的消极打法，工事靠不住。从几次和日军接触看，官兵作战还是很勇敢的。203 旅旅长梁鉴堂在茹越口以身殉国；在团城口，一个团长率部与敌人拼杀，200 多人同

归于尽。但由于打法欠妥，阵地一个个都失掉了。”

徐向前又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要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可以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

杨爱源点头称是，说：“希望你们到山上走一走，也给弟兄们讲一讲。”

10月3日晚，匆匆从贵州赶到石家庄的郝梦龄第9军加入第14集团军战斗序列。从这天晚上开始，第14集团军所属第14军李默庵部和第9军郝梦龄部，乘正太铁路线上的窄轨火车赶赴忻口前线。这种窄轨火车每车只能拉一营人，每15分钟发一列，次日下午，当最后一辆车发走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值班的有心人统计了一下：一共发走了94列。

部队经过太原时，补充了被服装具。时值中秋节刚过，每个官兵在太原车站领到两个半斤重的大月饼，上面印有“勿忘国耻”四个醒目的红字。

即将部署到忻口前线的部队，不算八路军和其他掩护部队，仅忻口正面和左、右兵团，计有第14集团军第14军、第9军，以及第35军、第61军、第15军、第19军，第2预备军、第17军以及5个独立旅，总兵力约10万人。

南京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10月6日晚上，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到达离忻口约25公里的晋北重镇忻县，设立总指挥部。

10月4日这天，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雁门关南的代县城召开进攻太原的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板垣和师团参谋长西村利温外，还有步兵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本多政村、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筱原诚一郎、独立混成第1旅团长酒井镐次。此时，日军集结在代县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约有5万余人——还不算战役展开后的补充部队。

板垣说：“遵照天皇陛下的旨意，本师团长受命指挥各位攻占太原。陆军部命令原属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1、2、15旅团归本师团长指挥。方面军决定，在进攻太原的战役发起之后，将继续派遣部队支援我们作战。此外，关东军司令官阁下还承担了内长城以北地区的安定任务，这样，本师团指挥下的部队便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力向太原进攻。”

板垣来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根据情报，敌人正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布防，准备与大日本皇军决战。忻口以北有两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崞县和原平，敌人一定会在这里阻击皇军的进攻，以便完成在忻口的配备。因此，皇军必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立即发动进攻！本师团长命令：本多旅团长指挥所部攻击崞县之敌，筱原旅团长指挥所部攻击原平之敌。其余部队在代县休整，待崞县和原平攻占后，再前出到原平以南、忻口以北地区展开，向忻口敌军发动攻击！”

2、张培梅说：百川平时只知养羊，不知养虎

位于忻县城北25公里的忻口是太原的北大门，它的东面是岗峦

起伏的五台山脉，西面是一望无际的云中山脉，两山之间的一片峡谷里，有一座数十米高的土山，它便成为这片峡谷的惟一制高点。

滹沱河从北面流来，云中河从西面流来，两河在此交汇东流。北同蒲铁路和太原至大同的公路也从峡谷中穿过。整个忻口地域，自然形成了三山之间夹有两条川道，是组织攻势防御的理想战场。在这种地域中运动的军队，总是三面受敌，无法避免来自横、纵、斜向的攻击。相传因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平城(今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 40 日，脱险后回师驻蹕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清顺治 6 年，吕梁农民起义军曾在此与多尔袞部将激战。

当然，向来有晋北锁钥之称的忻口论险要尚不及长城的十分之一，但仍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阻击地点。这片峡谷、山川、河流在沉默了几个世纪之后，迎来了它最震撼人心的时刻。

崞县。第 19 军军长王靖国将军指挥所设在县政府的青砖大院里。因这里马上就要打仗，老百姓纷纷出城躲避，就连政府的办公人员都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县政府大院早已人去屋空。

老家在五台县新河村的王靖国被认为是阎锡山最信得过的实权人物之一，他一贯逢迎阎锡山，阎锡山对他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因此，他也受到其他将领的妒忌。抗战以来，第 19 军被布置在雁门关一带，因此处不是日军的主要突击方向，第 19 军尚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这令军长王靖国感到窃喜。

内长城一线全面撤退后，王靖国率第 19 军于 9 月 30 日夜间来到阳明堡。这时，他接到了阎锡山的电令，命令他率领第 19 军以“依

城野战”的方式，固守崞县到10月10日，掩护各路大军占领忻口，完成部署。

王靖国这才感到有点傻眼——第19军要在这里坚守10天，而身后，日军的几万大军已经尾追而至，这自然是个相当艰难的任务。军参谋长梁培璜看到，王靖国放下电话后，脸上掠过一丝惊恐的神色。

匆匆赶到崞县后，王靖国对梁培璜说：“我判断，日军必然乘突破内长城我军防线的余威，迅速发动进攻。我决定，205旅依据崞县北城，215旅依据崞县西城及南关西南部，209旅依据崞县东城及南关东部，各部经常以三分之一兵力守备城防，三分之二兵力在城外部署，准备作战。”原属第19军的第196旅到原平布防。这样，在忻口大战来临之际，第19军和第196旅便成为最先放在刀刃上的两支部队。

10月4日上午10时许，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在飞机、战车掩护下，向崞县东城和西郊发动攻击，揭开了崞县保卫战的序幕。

中午时分，王靖国再一次接到阎锡山发来的让他“固守崞县，无命令不得后退”的急电。

下午，战区长官部发来原第61军军长李服膺在平绥线作战中，违令擅自率部撤退，破坏了大同决战计划，已被枪决的通报。

王靖国倍感沉重。他不难想到，阎锡山将枪毙李服膺的消息通报各部，首先是给他看的。似乎已没有退路，既然阎锡山铁了心要在忻口打一仗，谁要违抗他的命令，还不是硬往他的枪口上撞。从枪毙李服膺这件事上，王靖国也感到，阎锡山真要急了眼，那是毫不留情

的……

紧接着，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派宪兵送来一封信。王靖国深知，那个倔强的、六亲不认的、杀起人来眼都不眨一眨的“黑头张”找上门来绝对不会有好事——果然，他颤抖着手展开信笺，看到这样几行笔力道劲的大字：

王军长览：

放弃雁门，你就该死。守住崞县，犹为侥幸之幸。再失此城，国法岂能容你。泰山鸿毛，皆是一死，交在生死，不敢不告。

梅手字

王靖国脸当即变色。

布防在城北地带的是第 205 旅。从 10 月 5 日拂晓开始，日军从北、南、西三个方向对崞县城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击，尤以北面的攻势最烈。

第 205 旅旅长田树梅将第 407 团布置在正面。初次同日军交手的第 407 团官兵杀敌情绪虽然高涨，但日军猛烈的炮火和飞机的低空扫射、轰炸令他们难以招架，根本没有能力主动反击。不一会的工夫，外围阵地被突破，日军很快攻到北城根下。旅长田树梅光着膀子来到北城墙下督战，该团的两个营拼死抵抗，好不容易将日军的冲锋打退。

未及喘口气儿，日军的炮弹铺天盖地一排排打过来，设在北关的第 407 团指挥所的一间窑洞被炸塌，上校团长刘良相、中校团副高育麟以及众多的通信兵、传令兵被埋在里面，全部遇难。失去指挥后的第 407 团阵地逐次被突破。已转到第 410 团阵地督战的旅长田树梅闻

讯赶来，迎面碰到第 407 团营长柳青魁。田树梅问：“你的部队怎么样了”

“没有收集起来。”柳青魁嗫嚅道。

“你们团长呢”

“被埋在了窑洞里。”

“你刨了没有”

“没，没有刨。”

“团长死了，还有营长，谁叫你们撤的你为什么不指挥作战”田树梅越说越上火，他当即命令随从，将柳青魁就地枪毙。

田树梅刚刚将第 407 团的溃军堵住，第 410 团的传令兵又急冲冲跑来报告：该团团长石焕然在激烈的混战中被流弹击中牺牲。

至 5 日傍晚，第 19 军在城外的阵地全部丢失，各部均退回城内负隅顽抗，同攻入城内的日军展开巷战。这天夜里，王靖国多次组织部队向敌逆袭，试图恢复被日军占据的某些阵地，均未奏效。6 日，双方又混战了整整一天，第 19 军伤亡过半，崞县城眼看不保，王靖国束手无策。

入夜之后，已经开始有官兵从东城墙上跳下逃跑，而且居然有人将王靖国派往东门的警卫人员砍首，夺门而出。王靖国慑于军令，不敢擅自撤守，军参谋长梁培璜将情况电报阎锡山和赵戴文，建议与其束手待毙，不如退出城外，东渡滹沱河，回身扰击敌后。阎锡山未予理睬，赵戴文却回电说：“如果情况属实，可如拟办理。”这无疑是一纸救命电，为第 19 军撤守崞县找到了依据。

7日拂晓前，第205旅上尉参谋李晏仲跟随旅长田树梅到南门集合，准备撤退。李晏仲看到此时南城门洞里围了很多，他听到军长王靖国大声说：“我不走了，你们开枪打死我吧！如果你们不忍心，就用被子包住我再开枪。”李晏仲一下子意识到王靖国在装腔作势，玩弄花招。如果真的决心与崞县城共存亡，就应亲率部队与敌死拼，拼死在日军刀枪之下，何必在临阵逃跑时叫下级打死自己呢

王靖国没有完成阎锡山令他守到10月10日的任务，但他并没有受到军法制裁，不知执法总监张培梅作何感想。4个多月之后，性情极为刚烈的张培梅最终却因王靖国而死——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张培梅亲赴隰县石口镇督促王靖国坚守阵地。王靖国说：“3天之内可以守住，3天以外不保。”张培梅说：“我一定找部队增援你，3天之内只要守住就与你无关。”不料，第二天石口镇便已失守，王靖国逃之夭夭，张培梅不由勃然大怒，坚决要求处决王靖国，并亲自带执法队乘车寻找王靖国，以便就地正法。阎锡山出面干涉：“咱们就这几个人，把他们都杀了，还靠得上谁。”张培梅说：“抗日救国，不成功，便成仁，吾法不行之人，当行之己，吾若效彼败军之将，复何面目以对我军民！”心如刀绞的张培梅悲愤无奈，吞服鸦片自杀，弥留之际，赵戴文让张的两个儿子跪在床前，央求他快服泻药，但他拒绝施救。他对赵戴文说：“次陇，我是战区执法总监，却不能处决抗战不力的王靖国。我早就说过，军法如不能绳之于人，必绳之于我。百川平时只知养羊，不知养虎，这次将山西大片土地丢掉了，我心疼呀！我发过誓，绝不活着退过黄河，誓与家乡共存亡……”

在西安，各界人士为张培梅举行了追悼会。偏偏是阎锡山的祭文最具文采：“你很爱国，你很壮烈，你以为晋民苦矣，国家危矣，不忍睹，不堪睹，君乃自了，遗其妻子，别其朋友，君乃自了矣！我则不作如是感。我国有二千年大一统之光荣，亦随有二千年大一统之遗毒，使维新革命均无大效，经此疯狂自损之日本军阀一打击，必能去旧鼎新，而成现代化之国家。我不悲观……君之清廉无积，我所素知，家庭生活我负其责，君可释念。”

第 19 军是在混乱中撤退的，过滹沱河时，军山炮营的 10 门日本三八式野炮只带走了 1 门，其余 9 门陷在河中。军参谋长梁培璜以为这些宝贵的武器可能长沉河底了。哪想当他们到达忻口的右侧背时，八路军的一支队伍拉着那 9 门大炮赶上来物归原主。

南撤的道路上，第 407 团 3 营 9 连连长王伟见到八路军与他们交臂而过。八路军军容齐整，精神抖擞。有人问：“崞县城都丢了，你们到哪里去”回答说：“我们打游击去！”这是王伟第一次看到八路军，他心里不禁暗暗钦佩。

3、旅长姜玉贞壮烈殉国。阎锡山诗云：全区平原战最烈，三团只剩五百人

10 月初的夜晚虽然寒气袭人，但白天仍令人感到舒适，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第 196 旅旅长姜玉贞少将迎风站在原平镇外的土围子上，望着他的部队渐渐开抵原平附近。这是 10 月 1 日的上午。姜玉贞是山东菏泽人，他有着山东大汉的身躯，模样威武，性格粗犷，治

军有方，作战勇敢，而且有一副侠义心肠。

第 196 旅大约有官兵 4000 人，由于是晋绥军中的杂牌，姜玉贞又不是山西人，尽管他资格比较老，还是南京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但一直未受阎锡山重用，武器装备也不如人，他心里自然有些窝火。然而他相信自己的部队能打仗，弟兄们不怕死，这就够了。日军攻入山西后，他多次对部下说：“咱们要在战场上和那些五台派比一比！”

姜玉贞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他看到原平镇周围都是平坦的开阔地，地里种着高粱。同蒲铁路及公路由西关外 2.5 公里处平行着通过，滹沱河从镇子东面 2.5 公里处由北向南流去，河的东岸即是深颜色的山麓，镇内有千余户人家，周围用并不高大的土堡围起。从原平到忻口仅有 15 公里远，它是忻口的最后一道屏障。

这天早些时候，姜玉贞接到了阎锡山令第 196 旅在原平死守 7 天的电报。当他把这个命令向团营的官佐传达后，官兵们三传两传就变成了：“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 7 天。”

姜玉贞问站在他身边的旅参谋长谷泰：“部队都到了吗”

谷泰回答：“已按旅长的部署，391 团守火车站，392 团守公路，413 团为旅预备队，炮兵在镇内放列。”

姜玉贞说：“各团要迅速征集给养及防御工事器材，构筑阵地并扫除阵地前射界，标定距离，还要构筑防空洞。另外，晓谕妇孺即时离镇。”

谷泰道：“是！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好”

姜玉贞说：“镇内邢家花园。”

10月2日那天，即有小股日军来犯，在火车站附近被击退。到10月4日中午，日军独立第15混成旅团由崞县城西迂回过来，大规模的战斗就此打响。

最初的激战在镇外进行，白天主要是炮战，然后日军少量步兵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向前沿阵地冲锋。第196旅每团有一个迫击炮连，旅部直辖一个炮兵营。炮兵营共有12门山西制造的“一三”式山炮，这种炮射程约7000米，射击时需要7人协同操作，行军时靠骡马挽拽或驮载。由于炮兵营的成员大多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起初同日军进行炮战时并不示弱。一天傍晚，炮营3连的瞄准手孙定康站在一个较高的建筑物上向远处瞭望，他是个烟鬼，抽旱烟也抽洋烟，有时还偷偷摸摸抽大烟，人称老炮筒，但他炮打得准，打起仗来不含糊，多次作为军里的炮兵尖子给别人作示范。这时，孙定康隐约看到远处的高粱地里有一团火光，周围有很多人影在晃动，立即意识到这是鬼子在做饭。他眯起眼睛，目测了一下距离——约有2.5公里远。于是，他马上从墙头上溜下来，找到连长说：“鬼子在吃饭，奶奶的，咱趁机给他一炮，叫狗日的端着饭碗上西天！”连长说：“打了一天了，让弟兄们歇歇吧，算了算了。”“我就打一炮行不”“你打一炮，他还你十炮，得不偿失。”“这我不管，我只保证一炮命中。”连长有些动心：“你有把握吗”孙定康认真地说：“要是打不中，你枪毙我！”“好吧，那就打一炮，打完赶快转移阵地。”孙定康咧嘴笑了。

赶忙将其他人喊来，孙定康把手中的烟蒂甩出去，俯下脑袋，眼睛几乎贴在大炮的瞄准镜面上，按照别人报给他的数据，很快瞄准了。

紧接着，一颗炮弹呼啸着飞出。站在高处观察的人大声说：“嘿，打中了!打中了!”

这一炮，正好击中日军的饭锅，大约 20 多个端着饭碗的鬼子被炸飞。

旅里没有高射炮，对日军的飞机便没有任何办法。敌机紧贴着地面扫射、轰炸，尾部喷出的气流居然能将高粱秆子连根拔起。一次，一架飞机竟把一座建筑物的屋脊挂倒。躲在简易工事里的官兵大批伤亡。

对城外阵地冲击最大的除了飞机，还有坦克。

第 391 团 1 营 2 连的阵地在原平火车站的西北面，连长杨明甫反复交代，日军冲锋时，不要管坦克，先打步兵，消灭了日军步兵，坦克就起不了什么作用。6 日上午，约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向 2 连阵地扑来，2 连的两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一起开火，日军抵近后，他们又甩手榴弹，很快将步兵击退，但那两辆坦克却没有退，一直向前冲来，杨明甫一挥手：“爆破手，上!”话音未落，两个怀抱炸药包的士兵跳出战壕，然而他们刚刚前冲几步，就被坦克上的火力击中。杨明甫再一挥手，又上去两个，没跑出多远，2 人全部中弹。眼看两辆坦克就要横辗战壕，仅有的 4 个炸药包又全被爆破手带到壕外，大伙惊骇不已。这时，从杨明甫身边嗖地窜出一个小个头士兵，只见他灵巧地接近行进在前面的那辆“九五”式坦克，飞身跃上车顶，将手中的两颗特大号手掷弹从一个窗口里塞进去。一股浓烟冒出来，这辆坦克瘫痪在地。后面的那辆赶紧调头逃走。然而，没等

小个头士兵跳下坦克，一阵机枪子弹扫过来，他身子一歪，扑倒在车顶。

泪水模糊了杨明甫的双眼——这个小个头士兵叫王家海，他只有16岁。半年前，部队在娘子关、井陘一带做国防工事时，团部派人将从附近刚征集来的8个小伙子送到2连，其中就有王家海。他的个头那么小，仅1.5米出头，眼睛倒是很大，一嘴细牙闪着亮光，嘴唇上几乎连茸毛都没长出来。杨明甫望着比自己矮一头半的王家海，怜悯之情在涌动，他说：“你如果不想当兵吃粮，给我说一声，我放你回家，你太小了。”谁知王家海却说：“连长大叔，是我自个愿意来当兵的，我要跟你好好干，混好了，挣了钱，到石家庄的大医院给我娘看眼病。”——他家里很穷，父亲原是个挖煤工，前年在井下遇难身亡，母亲偏偏又是个瞎子，比他大一岁的姐姐嫁给外村一个50多岁的地主当小老婆。临上轿时，姐姐哭得很伤心。

一个月前，部队开往晋北。行军途中，王家海小声问杨明甫：“连长，打起仗来怕吗”杨明甫安慰他：“不用怕，怕也没用，子弹专找胆小的。”来到原平后，杨明甫特意对他说：“你就跟着我，我怎么打你就怎么打。”前天，日军第一次进攻2连阵地时，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身边，王家海左臂负伤，他当即就哭了。杨明甫一看仅仅是擦破了点皮，喊过卫生员给他包扎，并厉声说：“哭什么！还没掉脑袋呢。”王家海抹了抹眼泪，抓过那支比他短不了多少的中正式步枪，卧倒瞄准。在打退日军的进攻后，他既兴奋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连长，我刚才打死了一个鬼子，我看清了。”杨明甫鼓励他：“小王，你会成

为一个好兵的。”

现在，杨明甫抱着王家海的尸体，泪水四溅。几天前，这个小不点儿对他说，他长高了，当兵后长高了半头，日后回家娘一定能够摸得出来。前些日子，他的瞎眼娘已经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媳妇，比他大三岁，腿有点小毛病，但能干活。他曾腼腆地对杨明甫说等打完鬼子再回家娶媳妇……

10月7日，原平镇外的阵地全部丢失，拿下崞县的日军增兵猛攻原平，下午，一部日军从土城的东北角突入镇内。此时，姜玉贞又接到了阎锡山令第196旅续守3天的命令。

这天晚上，第392团少尉副官田家德跟随营副吕子茂在城边巡查，曾碰到也正在巡视阵地的旅长姜玉贞。姜玉贞身着黄呢将校服，仅带几个卫兵。令田家德惊奇的是姜旅长的脖子上还挂着两个大号的手掷弹。田家德一下子便感受到了姜旅长誓与原平共存亡的决心。

原平镇内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街，日军渐渐占据了东半部，第196旅所剩官兵顽强地扼守住西半部。双方各自在自己一方的商店橱窗或房屋的窗口用土袋作掩护，白天对峙，半截枪管密密麻麻地伸在土袋外面，很是壮观。到了入夜，则互相发起袭击，逐屋逐院逐巷进行争夺，肉搏时的喊杀声响彻全镇。

一天晚上，第392团的士兵捉回一个日军中队长，那家伙身带手枪、军刀、手表和温度计，腰间的牛皮图囊里有地图和全家像。报告旅部后，姜玉贞打电话请示阎锡山，阎命令派人送到太原。但士兵们在将俘虏送至旅部的过程中，你一拳我一脚，竟把俘虏给打死了。姜

玉贞十分生气。

战斗进行到 10 月 10 日下午，第 196 旅仅剩官兵千余人，第 413 团团长崔杰阵亡，第 392 团团长张振铃重伤，营连排长大都伤亡。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第 196 旅退守到城西南角一隅，右臂负伤的姜玉贞仍坚持不退，督促部下拼死抵抗。同时，他给阎锡山发报：“我旅正与敌人逐院逐巷死拼，请长官放心。我已告忻口前线指挥郝梦龄将军，在援军未到忻口，新阵地未布置好以前，姜某绝对死守原平，望长官绝不因原平危机而生顾虑。”

10 日晚，在全旅即将覆灭之际，姜玉贞下令突围。官兵们只能从西南城根匆匆挖好的一个洞口往外钻。不料洞口外的开阔地又被日军的机枪封锁，每次冲出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牺牲，尸体把洞口都塞满了，后面的人只得先拖开尸体再往外冲。冒死冲过那片火光闪闪的开阔地，进入高粱地就比较安全了。

姜玉贞随最后一批人出城，这时天已亮了，日军发现了他们，一阵密集的炮火打过来，姜玉贞中弹殉国。

第 196 旅坚守原平至 11 日早晨，为忻口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全旅仅剩官兵五六百人。日军伤亡千余人。当他们沿公路南撤路过忻口时，看到路边站满了执法队，其他部队的溃兵一律收容，有些杨树上还挂着鲜血淋漓的人头——那是冒充伤兵被查出后砍头的。但对第 196 旅退下来的官兵不加阻拦，执法队的人说：“这是阎司令长官和卫总司令的命令。”

11 日上午，板垣征四郎在参谋长西村利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原

平。日军正在焚烧战死者的尸体，未及清理的中国士兵的遗体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板垣感慨地摇摇头。独立混成第 15 旅团长筱原说：“据武汉电台广播，指挥原平支那军作战的 196 旅旅长姜玉贞已经毙命。”

板垣说：“姜将军是个英雄。遵照皇军的习惯，应在他战死的地方立碑纪念。”

“只是我们不清楚姜旅长战死的地点。”筱原说。

“那就写在你们旅团的战斗详报上，让其载入史册！”

太原。阎锡山赋诗纪念：“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剩五百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

南京。国民政府授予第 196 旅荣誉旅称号，永远保留之，并明令褒扬姜玉贞。褒扬令称：

查姜玉贞久历戎行，夙称忠勇。此次奉命抗敌。坚守围城，竟以身殉。眷怀壮烈，軫悼实深。应予明令褒扬，并追赠陆军中将，交行政院转饬军政部从优议恤，以彰忠烈。

4、军长郝梦龄家书：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

如果从 10 月上旬的高空俯瞰晋北大地，便会看到这样一种奇观——在内长城以南，几万大军正朝忻口方向蠕动，数十路纵队蜿蜒交错，掀起的黄尘不时地遮蔽了天空；而在太原至忻口的同蒲铁路上，小火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远道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主要依靠铁路运兵。

10月6日夜晩，忻口战役前敌副总指挥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到达金山铺。金山铺紧靠同蒲铁路，离忻口约有3公里远，这里是傅作义预定的第35军指挥地点。次日一大早，傅作义站在指挥部附近的空地上踱步，像突然想起什么，他问参谋长陈炳谦：“各部都到了什么位置”

陈炳谦答：“除客军一部已占领阵地外，其余部队尚在途中，总的来说行动缓慢。”

傅作义说：“形势不容耽搁。马上给董其武发报，让他先派1个营乘汽车火速开赴忻口以北云中桥附近抢占阵地，掩护中央军、晋绥军向忻口集结！”

差不多这个时刻，第61军军长陈长捷率第72师到达五台县的豆村。沿途得知，溃兵四处乱窜，随便派饭投宿，勒索百姓财物，甚至强奸妇女，连佛教圣地五台山都遭到了洗劫，陈长捷忿而无奈。这天早晨，在豆村村口，有六七个村民捆绑着一个溃兵来到陈长捷面前，村民们诉说他枪杀了一个抗拒强奸的少女。

陈长捷当即气得脸膛发紫。他盛怒不休，破口大骂，然后拔出腰间的手枪，亲手将那个溃兵击毙于路边。

截止到10月11日，先期赶来的中央军和稍后赶到的晋绥军终于在忻口前线布防完毕。中央地区：郝梦龄第9军(辖刘家琪第54师、郑廷珍独立第5旅)、李仙洲第21师、傅作义第35军、陈长捷第61军，前敌总指挥郝梦龄，副总指挥陈长捷；左翼地区：李默庵第14军(辖彭杰如第10师、刘戡第83师、陈铁第85师)、朱怀冰第94师、

郭宗汾第 2 预备军，总指挥李默庵；右翼地区：刘茂恩第 15 军，总指挥刘茂恩；总预备队：高桂滋第 17 军。另有炮兵 9 个团支援作战。加上战役过程中投入的部队，忻口战场共有 90 多个团——其中多数部队经南口、天镇、平型关等战役，均有严重减员，未及补充。

首当其冲的是郝梦龄第 9 军。

忻口是一个较大的村落，村子的西北面为红土山梁，梁北的云中河，流经忻口北约 2 公里的界河铺汇入滹沱河。滹沱河在此折向东北。这样，忻口村被夹在红土山梁与东面的灵山之间，形成南北之间的险要孔道，而忻口左右的两侧山地，分向东、西延伸，成为面对北方的天然屏障。环绕着方圆 20 公里红土山梁的忻口、界河铺、关子村、南怀化、下王庄、泥河、旧河北等村落便成为忻口战役的主要战场。

从 1935 年开始，阎锡山派晋绥军炮兵第 25 团的一个营，在忻口西北面红土山梁的后沟及沟外的东崖下修筑战备窑洞，一直修到抗战爆发前，总共修成 47 孔窑洞。这些窑洞全部用石块砌成，既深且宽，最大的深 20 余米，宽在 3 米以上，高约 4 米，洞门像城门状，上有石垛，垛下有“第×号”字样的横匾，字形端庄，一尺见方。预定忻口战役中央兵团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些窑洞里。

半个多世纪后，这 47 孔窑洞仍坚固完好，但很少有人来凭吊。物是人非，欲说还休，无语泪不流……

10 月 5 日零点刚过，一列小火车长嘶一声，在忻口车站摇晃一阵，然后停下。从火车中部的车箱里走下一位身着将校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将领。他就是刚刚担任第 9 军军长不久的郝梦龄。

有飕飕的西北风刮过来。一轮残月挂在西边的天际，天上数不清的星星在闪耀。部队陆续下车，车站上乱糟糟的。几只提在铁路员工手中的马灯晃来晃去。

这年 39 岁的郝梦龄身材魁梧，略略发胖，留着平头。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表情。下车后，郝梦龄暂时住进村北一个叫李存全的人家里。

郝梦龄祖籍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 6 期步兵科毕业。29 岁时，他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 30 军第 2 师师长，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他率部转战于豫、皖、湘、鄂、冀等省，屡建战功。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国民政府授予他二等宝鼎勋章。

虽然在军阀中闯荡，郝梦龄却惊人地保持了洁身自好。他严于律己，绝少军阀恶习，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狎妓，更不纳妾娶小，从不克扣军饷，而且在他的部队中也坚决禁止赌博、吸毒、纳妾等恶习。手下有个旅长因为吸毒，他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他的叔父在他手下当军械处长，这位叔父违犯军纪偷偷纳妾，他知道后当即决定将叔父遣返回乡。叔父前来求情，他说：“在家里您是我的叔父，我以长辈待您；在军中您是我的部下，我不得徇私情呀！”

1930 年 10 月，郝梦龄兼任郑州警备司令。置身于官场的他常遇到宴会中狎妓一类的应酬，他虽深恶痛绝，但又不便指责同僚。为此，他想出一个妙法——每次赴宴时都带着 6 岁的女儿慧英同往，同僚们不好意思在女孩面前狎妓，只得作罢。

出身于贫穷人家的郝梦龄具有深切的爱民之心，他的部队以纪律好而著称。有一次行军作战，遇到大雨，道路泥泞，炮兵行动困难，

一名士兵强拉百姓一头黄牛，双方发生争执。他听说后当即传令将这个士兵枪毙。行军宿营时，他尽量指挥部队在野外露宿，如果迫不得已进村，只能铺柴草席地而眠，出发前还要将柴草放回原处，水缸挑满水，院子扫干净，并指派值日官检查有无违纪情况。他还自编了一首军歌让部队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爱老百姓，挑水莫挑有鱼塘，莫向人家打门板……”

他身经百战，但他对“人民遭殃、流血千里”的内战感到惭愧和痛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他曾请求解甲归田。1937年5月，他再度提出辞呈。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正在重庆陆军大学学习的郝梦龄顿觉一股豪情涌满胸间，他对妻子剧纫秋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我应该去与敌人拼！”

夏末时节，多次请缨率部抗日的郝梦龄终获批准。正在汉口开会的他立即电告远驻贵阳、遵义、独山的部属第54师：“即刻出发，徒步到长沙乘火车经汉口到石家庄下车待命，沿途严防空袭。”当时，第9军的另一个师——第47师驻扎在蚌埠一带，早些时候才能北上。

9月14日，军部和第54师到达汉口。郝梦龄问该军军官军士训练班主任李文沼：“部队士气如何”

李文沼说：“全师士气旺盛。”

郝梦龄高兴地说：“好！前年你看过东北军韩光第的讣告了，他和我同学。他在满洲里同苏俄因争国界作战牺牲，我非常钦佩。他为

保卫祖国边界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们都要效法。”

9月16日，是第9军从汉口开拔的日子。15日晚上，郝梦龄和家人最后一次团聚。他先是来到自己的书房，打开台灯，沉思片刻，从笔筒里抽出毛笔，研好墨，在一张白纸上给孩子们留下这样一段话：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们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字予慧英、慧兰、荫楠、荫槐、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九月、十五。

这其实是郝梦龄留给5个孩子的遗嘱。写完后，郝梦龄将毛笔掷进笔筒，墨迹未干，他就将遗嘱装进了信袋。清冷的月光照在木格窗棂上，他也许有些伤感，遂起身来到客厅。儿女们都围过来，他们还小，还不能完全理解此时父亲的心情。他抚摸着孩子们，仿佛怕吓着他们似的，轻轻地、缓缓地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最后，他将目光停留在大女儿慧英身上。慧英已经13岁了，快长成大姑娘了，她圆圆的脸庞清秀、白嫩，长长的睫毛下，有一双仿佛会说话的亮丽的眼睛……他叫过慧英，从怀里掏出信袋：“我走后3天你再拆开看，再念给你妈听，好吗”

他的妻子剧纫秋识字不多，每次他从外地写来信，都是慧英念给母亲听。

然而，好奇心颇重的慧英非要当面拆开看，郝梦龄不忍心临行前

全家为此哭哭啼啼，忙上去和慧英对抢，父女俩嘻嘻哈哈打闹在一起——在抢夺遗书的瞬间，这个家庭充满了短暂的欢乐。

那封墨迹未干的遗嘱最终在对抢中撕毁了。慧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低头不语。郝梦龄说“孩子，爸爸过后再写一份寄回来。”

10月5日上午7时，一夜未睡的郝梦龄率第54师师长刘家琪及各旅团长到前沿视察阵地，他们骑马从忻口村出发，顺着村西的公路向北而行，没走多远，郝梦龄就看到了山梁根下那些外表几乎一模一样的窑洞。

看过几个里面空空荡荡的窑洞后，郝梦龄对军参谋处长说：“你立即让军部各处在这里收拾一下，把指挥所建立起来，首先将无线电台和通往师、旅的电话线架起来。”

然后，他们出沟前行。在沟口的左侧有一个叫红崖弯的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从这里有一条小路上山，可达关子梁上的烽火台，由烽火台下山往西走，可到南怀化村。后来，战斗开始后，郝梦龄多次沿着这条道路前往各阵地督战。

不一会儿就到了最北面的界河铺。郝梦龄一行下马后，爬上一个小山包，向北瞭望：面前的地形突然开阔，东面的滹沱河与西面的云中河在此交汇后向东流去，脚下，同蒲铁路和公路分别通过云中河上的两座桥梁贯穿南北。

郝梦龄问：“这里的地形确实险要。此处归162旅防守吧”

第162旅旅长王晋回答：“报告军长，部下派323团在此驻守。”

第54师师长刘家琪说：“这里是南北通道，河东侧又是我军同右

兵团的结合部，判断敌人会将这里作为进攻的主要突击地段。我已将战防炮一个连配属给 323 团。”

郝梦龄道：“你们的判断和部署是正确的。战斗发起后，一定要用火力的封锁这两座桥梁，不使敌人步兵和坦克通过，必要时炸掉它们。”

当他们行至关子村东侧时，看到一条深沟逶迤南下——这条天然形成、几乎横穿整个红土山梁的雨裂沟后来成为守军的主要隐蔽场所。参谋处长介绍说：“这条沟当地人叫它十里长沟，它是 323 团与 321 团阵地的结合部。关子村北面就是云中河。”

郝梦龄问：“河水多深能徒涉吗？”

“虽然今秋雨水多，但实地测量发现，最深处也不及 1 米，所以敌步兵可徒涉河水前出，对敌人的坦克阻碍也不大。”

郝梦龄思忖片刻，对刘家琪说：“铮磊兄，沿云中河南岸的滩头阵地需要加强，北岸我军的前沿阵地，更为重要。”

刘家琪是湖北武昌人，浓眉、阔嘴，身材结实，一举手一投足便显示出军人的威武。他是第 9 军的官佐中资历最老的人，年龄比郝梦龄大 4 岁，所以郝梦龄一直很尊重他。

听了军长的话，刘家琪侧身对随行的第 161 旅旅长孔繁瀛说：“孔旅长，请你命令各团，在河南岸与山麓之间较宽广的地段，构筑两道防御阵地，加强抵抗敌人渡河攻击的力量！”

郝梦龄回头南望荒草丛生的关子梁，打算上山看看。他们不顾疲劳，顺着村民们踩出的崎岖小路，徒步上山。半个时辰后，到达关子

梁南面的烽火台下。这个远古时代留下的烽火台，处处流露出岁月变迁的痕迹。郝梦龄登上烽火台，举目远眺。他看到西面的云中山和东面的五台山顶已经披满霜雪，像两个白发巨人，正北面的雁门山脉，灰蒙蒙的隐约可见。在山与山之间，是一块块的田园，其间村庄密布，河流纵横，树木伫立，一派富饶景象。

许久，刘家琪和各旅、团长们听到他们的军长说：“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

忻县。在南城墙根下，有一户姓杨的大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宅院修得十分气派，青砖青瓦，东西各三进门，大门口有两棵苍郁的古槐树，院子也用青砖铺成。卫立煌到达忻县后，就将他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了这里。院中间的正房作了办公兼会客室，西面是他的卧室，参谋长郭寄嶠和勤杂人员住进了最东面的小院。房东一家暂时搬进了厢房。院子后面的空地上停放着几辆小汽车。

一到忻县，卫立煌和参谋长郭寄嶠就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工作：制定作战计划、督促各部加快行军速度、部署阵地、调集弹药粮秣……各类人员进进出出，电台的发报声终日不停，房间里昏黄的灯光很晚才能熄灭，有时要通宵达旦。

卫立煌难得闲下来，偶尔有点空，他喜欢和房东杨老先生聊天。杨老先生大约 60 多岁，留着山羊胡子，头上罩一顶瓜皮小帽。对于卫立煌这样一个领兵几万的中央军大官住进自己家里，杨老先生一家都感到脸上很光彩，很兴奋，仿佛生怕打扰了这个脸相很年轻但留着胡子的“卫老总”，他们一家连说话走路的声音都尽量放轻。一天，

杨老先生问：“听说小日本鬼打起仗来很凶，个个刀枪不入。真个是这么回事”

卫立煌哈哈大笑：“人身都是肉长的，哪能刀枪不入哟！”

杨老先生也笑了：“那，你们怕日本人吗”

“不怕！日本国比山西省大不了多少，人口比咱中国更少，咱三个人换他一个，他换不过咱。老先生，你就等着胜利的消息吧！”

有时，卫立煌站在院子里，向北城瞭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雄伟壮观的北门城楼，据说此城楼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纯木结构，正面三层五开间，重檐三滴水，歇山顶式，四周带围廊，最醒目的是楼顶上高悬的“晋北锁钥”巨匾。

此时，10 万大军正逐次向忻口开拔，他们能成为晋北锁钥吗卫立煌有信心，但没有把握。

忻口后沟。第 9 号窑洞。在“第 9 号”名下，一共有 3 孔窑洞，它们面向东南方向，离山梁下的公路仅几步远，太阳光很容易照射过来。对过隔着沟，也是一排窑洞。到达忻口的第二天，郝梦龄便将他的指挥所搬进了第 9 号窑洞。

10 月 10 日黄昏时分，几辆汽车停在第 9 号窑洞门口，从头一辆车里走下卫立煌和郭寄峤。郝梦龄将卫立煌一行迎进窑洞。他们二人以前很少在一个战场上作战，彼此见面的机会不多，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但郝梦龄仰慕卫立煌的军事才华，卫立煌钦佩郝梦龄的品行，这便使他们一见如故。

坐下后，卫立煌关切地对郝梦龄说：“锡九兄，你的气色不好，

许是太劳累了，希注意身体。”

郝梦龄笑笑：“感谢卫总司令关怀，我的身体一向很好。”

卫立煌：“还是要注意休息，以便指挥部队作战。原平方向战况如何”

郝梦龄：“估计已到最后时刻，我很担心姜玉贞旅长的安危。”

片刻之后，他们骑马前往界河铺，与第 54 师师长刘家琪会合，然后沿云中河南岸经关子村向西南而行。到达南怀化后，他们纵身下马，卫士们接过缰绳。

他们徒步登上一个高坡，此时太阳已经隐入云中山的那一面，落日的余辉像浓郁的血光照射过来，所有的人浑身上下宛若涂满了油彩。

卫立煌看了看周围的地形，说：“南怀化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界河铺我军要重点防守，但这里也不容忽视！”

刘家琪说：“总司令说得对，郝军长和我判断敌人主要的突击方向：一是界河铺，一是南怀化，而南怀化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以本师战斗力最强的 322 团在此防守，准备对付敌人主力的攻击。”

卫立煌点点头。天色全暗下来，薄雾在田野上兴起，尖厉的小风一阵阵刮来，众人都觉出了明显的寒意。下山后，郝梦龄陪卫立煌等人回到第 9 号窑洞，他们又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讨。临别时，卫立煌握住郝梦龄的手，郑重地说：“锡九，你所指挥的界河铺至南怀化地段，是忻口作战的主要地段，估计敌人会倾全力向你冲击。我已

决定，此后的增援部队，大都用在这个方向。而且我已报阎司令长官同意，请你担任中央兵团的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这一线的部队！”

送走卫立煌后，郝梦龄裹紧灰棉大衣，站在窑洞门口的空地上呆了一会，没有马上进去。从原平方向传来的枪炮声已变得稀疏，而原平是忻口正面的最后一个堡垒，原平若失，日军不出半日即可到达忻口，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随从副官李振声劝他回窑洞休息。他在摆于窑洞中央的那张旧行军桌前坐下，煤油灯微弱的光线只能照亮一片不大的地方，前后左右都黑乎乎的。几天来，马不停蹄地看地形，指导部队修筑工事，夜晚难以入眠，他确实感到极为疲惫。但此时他仍无睡意。

郝梦龄戎马半生，大仗恶仗打过不少，但他从未像这次感到责任这么重大。部队北上途中，沿途群众箪食壶浆，热情欢送，郝梦龄十分激动，在石家庄，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从未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热情，往日误国，真该痛切反省。”

10月3日，在来忻口的火车上，他曾对第161旅旅长孔繁瀛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定要实行连坐法！”

10月6日，搬至第9号窑洞的头一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前者系内战，此次系国际战，较有功于国多多矣……”

10月7日，在南怀化第54师指挥所门前，他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人人都要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决心与敌拼杀。军

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实感可耻。欲置国家于磐石之上，欲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官兵用命，奋勇战斗。我在 54 师时间最久，官兵与我感情特深，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阎司令长官枪毙了弃守天镇的李服膺军长，给我们做出了军法无亲的榜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这天晚上，夜很深了，郝梦龄仍然没有入睡。许多年来，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等脑子静下来后，他抓过纸笔，开始写日记：

十月十日星期日

气候早晴午后阴温度六十五度

今日为国庆二十六周年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夜二时三十分接报告，我阵地已到敌装甲车及坦克车数辆，幸已有准备，将小桥拆断。车停桥上派兵趁机出击，将该桥上汽车烧毁，余车退去。八时敌派重炮猛攻原平，此时又接阎令，姜旅留予指挥，如早日出动，决无此事。午间接何部长长途电话，令与姜联络。午后六时，卫总司令来忻口，到××看阵地，归来到部，谈甚久，而后回忻县。候装甲车到，拟明早派王营沿公路游击，并与姜旅联络，炮兵今日皆进入阵地。

写完日记，郝梦龄熄灭油灯，和衣躺在窄小的行军床上，仍是睡不着。也许此刻他又想起了远在武汉的妻子和儿女，于是爬起来，点亮煤油灯，重新坐回行军桌前，在北方这个寒冷的夜晚，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给妻子剧纫秋写信：

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所念者中华民国及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倘若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郝梦龄抱定了必死之心。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但他没有想到，10天后，这封信出现在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章上，并赢得了千万人如雨如瀑的热泪。

5、实际上守忻口即是挽救山西危亡。忻口之战惨烈异常

1937年10月13日，日军向忻口地区中国守军发起全线攻击。12日下午光景，已有一部日军向界河铺一线发动试探性的冲锋，被击退。著名的忻口战役正式展开。

12日夜间，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已进入攻击出发位置，13日拂晓前，悄悄运动到守军备阵地前约半公里的地方。同时，中国守军全部进入阵地，官兵们隐蔽在战壕里等待恶战的来临。

这天夜里，四周十分沉寂，如果不是偶尔响起的零星枪声打破难耐的寂静，会使人觉得这样的夜晚多么像家乡的夜晚。田野里有雾气蒸腾，因守军的阵地都设在较高的山梁上，小风吹过，头顶的雾气很

快消散，所以，横躺竖卧在露天工事里的士兵睁开眼睛，能够清晰地看到满天的繁星。

天亮了，各级指挥官透过望远镜——最前沿的人不需要望远镜，凭肉眼就能看清云中河北岸日军黑洞洞的炮管。此时，不用长官命令，士兵们都已进入自己的射击位置。

血红的太阳终于从五台山的那一面升起，山下田野里的薄雾迅速消散。一连串炮弹出膛的声音未及传过来时，云中河北岸日军数十门大炮射出的炮弹已落至南岸守军面前。在东至南郭下，中至界河铺、南怀化，西至南峪、滕腾的 10 多公里长的战线上，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浓烟冲天而起。与此同时，南岸中国守军的炮弹也射向敌阵，但效果欠佳，暴露后的炮位遭到日军更为疯狂的还击，初次炮战即有不少大炮被击毁。约半个小时后，日军的炮火集中射击南怀化至新练家庄一带，这说明日军将向这个地段发动重点攻击。

炮弹扬起的尘土还未落下，大约 20 多架日军飞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对一些重要攻击目标反复轰炸、扫射。环绕界河铺、南怀化、新练家庄之间的红土山梁顿成一片火海。

南怀化位于红土山梁北端的西侧，因处在北云中河南岸，又名河南。这个约有 200 多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沟口，东距忻口直线距离二三公里，因为该村与云中河之间有相当宽的开阔地带，是进军云中河南的理想桥头堡，而从村东的沟口一直上去，便是忻口中间地区的制高点，所以，南怀化及其附近的山地争夺战成为战役之初最激烈的地方。

日军的炮火向后延伸，然后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强行从云中河徒涉，此时，部署在滩头阵地上的守军轻重机枪一齐发射，他们身后的战防炮也喷吐出火焰，日军步兵纷纷中弹，鲜血染红了云中河水，坦克和装甲车接二连三被战防炮击中，歪歪扭扭瘫在河岸上。作为第9军主力被配置在南怀化正面的第322团很快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锋。阵地上的硝烟还未散去，郝梦龄便来到了南怀化。他对第322团团长戴慕真说：“戴团长，赶快加修工事，越坚固越好，敌人的攻击被打退后，很快会发动第二次冲锋，应赶快做好准备！”

第322团共有官兵约2000名，3营的阵地在南怀化西南方向云中河岸边，2营在南怀化东北面的几道山梁上，1营作为团预备队随团部在南怀化村内。郝梦龄离开第322团阵地不久，对岸的日军集中炮火再次猛轰南怀化及其附近的高地，第322团前沿各部大量伤亡。接着，日军第21旅团约1个联队的兵力伴随坦克、装甲车很快涉过齐腰深的云中河，冲入第322团阵地。该团2、3两个营在人数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顽强拼杀，但是，日军怎么也打不退，一线阵地开始动摇。这时，团长戴慕真命令1营上去增援，同日军展开白刃战。然而，不到半个时辰，1营也伤亡过半，全团被迫退到南怀化村里与日军展开村落战。

这天虽是个晴朗的天气，但南怀化却浓烟蔽日，冲杀声响彻河川和山岗，遍地的血光刺人眼目，景象宛若地狱。仅仅半日工夫，双方在南怀化遗尸上千具。

过午时分。第322团伤亡过大。又被迫退出南怀化，占领村南的

小高地据守。团长戴慕真身上沾满了尘土和硝烟，他十分难过地对团副赵子立说：“咱 322 团是 9 军的主力，军长和师长才把咱们放到最重要的地方，可是，才半天时间，就丢掉了南怀化，咱们怎样向军长和师长交代”戴慕真几乎要哭了。赵子立说：“团长，这么快就丢掉南怀化，弟兄们都不甘心，不如趁敌立足未稳，把南怀化夺回来。”戴慕真说：“对！应该马上反扑。我们两人和 3 个营长都要上！”

他们马上将残部整理一下，官兵们呐喊着冲向南怀化，同日军逐屋逐院进行争夺。终于将日军赶出村子。但是，日军第 42 联队一部前来增援，大批日军蜂拥而至。激烈的战斗重新使小小的南怀化变成一片血海，团长戴慕真、团副赵子立和 3 个营长均负伤被抬下去，第 322 团随即再次退出村子。

由此，忻口防御阵地被日军打开了一个缺口。

忻县。卫立煌站在前敌总指挥部的院子里，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不费劲就能听到。已经有不少百姓开始出城躲避，房东杨老先生问他：“总司令，我们一家走不走”卫立煌说：“老先生，不要慌张，什么时候我走，你们再走不迟。”

入夜，郝梦龄从前线打来电话，报告本日战况，当卫立煌得知南怀化已失陷时，当即严厉地说：“该地是忻口正面的锁钥部，又是与友邻部队的结合部，它的丢失影响甚大，必须恢复！”

郝梦龄坚定地表示：“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组织部队尽快夺回南怀化！”

放下电话后，卫立煌吩咐通信兵叫通南京的长途电话，直接向蒋

介石报告忻口战况。蒋介石连日被上海方向的战事困扰——此时，在上海，中日两军正倾其全力在蕴藻浜、大场、南翔等地激战，双方每天的伤亡人数数以千计，而来自山西的消息同样使他感到问题的严重。一些颇有见地的舆论认为：“晋北之战，乃华北抗战胜败之门”、“实际上守忻口即是挽救山西危亡”。蒋介石则很担心日本人沿着元朝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由山西，经汉中，入四川。后来蒋纬国先生著文认为：“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两广一带，我们即使保有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去。”

在电话里，蒋介石告诫卫立煌：“卫总司令，请你一定严令所部坚守阵地，并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你速向各部传达我的命令，无论军长、师长，都要上火线，退者处以极刑！”

13 日晚上，占领南怀化的日军乘势又攻占了村子东南高地的一部分。在夜幕的掩护下，第 322 团的残余官兵曾对个别山头进行了偷袭。已经受了轻伤的团长戴慕真组织了一个 100 余人的奋勇队，委任 3 营 11 连少尉排长牛坤山为队长，并写下一条手谕：向左翼山头之敌攻击，攻克后官兵各晋三级。牛坤山在出发前告诫奋勇队员：“无论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只准你们随我向山顶奋勇前进。”不长时间，奋勇队便到达半山腰，他们投出一排排的手掷弹，然后一个冲锋，拿下了这个山头。牛坤山右臂被弹片击伤骨折，他以左手持枪指挥战斗。但立足未稳，日军一个反击又将他们赶下山头。

第 322 团已经没有能力再行反击。

这天夜里，中央兵团副总指挥、第 61 军军长陈长捷来到忻口后

沟第9号窑洞。陈长捷比郝梦龄大1岁，他个头比郝梦龄矮不少，但显得精干。他们两人商谈后决定，紧急调第61军、新编独立第4旅和第21师于14日凌晨5时反击南怀化。

14日凌晨3时，郝梦龄即赶到第322团。经一昼夜的激战，第322团已残破得不成样子，团、营、连长非伤即亡。郝梦龄趁这个间隙亲自对该团进行整编，将这个团合并成一个营，改称第322团第1营，任命2营营副翟洪章为营长。然后，全营人员集合，郝梦龄站在一个高坡上，用极其悲壮的语调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一个阵地，现在我们剩一营人还是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后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刻枪毙他！你们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

回答声像雷鸣一般：“誓死坚守阵地！”

郝梦龄高兴地说：“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这句格言，只有在凶杀恶战中才能体会出来！”

夜袭敌阵刚刚负伤归来的2营5连上尉连长秦福臻看到了这一幕。40多年后，他回忆说：“将军之豪言壮语感人至深。当时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象。”

十几天前从平型关撤下来的李仙洲第21师又加入了中央兵团的战斗序列。在南口和平型关与日军作战时，约有1万人左右的第21师已经损失了2000官兵。

14 日凌晨 5 时，天刚蒙蒙亮，李仙洲率两个团到达南怀化东南高地。此时郝梦龄匆忙赶来督战。而原定一同出击的第 61 军和独立新编第 4 旅尚未到达，郝梦龄决定不再等待，就用这两个团反击南怀化。他严令李仙洲：“限 3 个小时夺回！”

出击的信号未及发出，正面的日军却先行发动了攻击，其目的是继续扩大南怀化突破口，并夺取制高点——1300 高地。猛烈的炮火纷纷落在第 21 师的前进阵地上，部队大量伤亡。

日军的这一举动出乎郝梦龄的预料。按照常规，在遇到日军集中力量突击的情况下，本应组织部队转入防御，顽强抵抗，待日军被击退后再行冲击。但是，郝梦龄收复南怀化的心情太急切了，他命令第 21 师，不管敌情如何，立即发起反击。

上千名官兵从各个方向冲出战壕，密集的枪弹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中弹者成片成片地倒下，并向下翻滚。侥幸冲过火网的人则处在日军步兵的包围之中。双方拼杀成一团。

站在李仙洲稍后一点的郝梦龄突然看到李仙洲的背部有血液渗出。

郝梦龄问：“李师长，你受伤了！”

李仙洲说：“没事，好像是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

郝梦龄：“还说没事，子弹都从你背后穿过来了！”

郝梦龄急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包云南白药，让李仙洲吃下。军医赶来包扎时，李仙洲倒地昏迷。但往担架上抬时，他又苏醒过来，大口地喘着粗气：“刚才我不是死了吗？”弄得周围的人哭笑不得。

军医嘱咐担架兵：“刚才师长受伤，血没流出来，抬师长下山时，最好头朝下，这样可以把淤血控出点来。”

担架兵却不同意：“坡很陡，师长受伤严重，再让他头朝下，我们不忍心。”

李仙洲被送往汾阳的一家美国教会医院治疗，并由医术高超的院长周以德亲自手术。周以德说：“李将军，你的伤势很危险，性命就在呼吸之间。子弹从你的左胸部前面进去，从背后钻出。一般情况下，当时就没命了。看来子弹打中你时，正在你呼气之瞬间，此时心脏向回收缩，子弹便从肺叶中间穿过。若是在吸气的瞬间，子弹会打穿心脏，当时就完了。这大概是上帝保佑你吧！”

蒋介石亲笔写来慰问信：“仙洲吾弟，伤势甚重，希将每日之伤情告我，以免我挂念不止也。中正。”并发来养伤费 5 万元。

后来李仙洲用这笔钱买了药品，用于本师受伤官兵的治疗——李仙洲这人平时很注意爱护部下。1947 年，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左腿受伤被俘，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他谈话时，特意拿了个小板凳，垫在他的伤腿下面，说：“受伤的腿需要垫高一些。”1960 年，他成为第一批被共产党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

10 月 14 日这天，中央兵团在付出几千人的代价后，不仅未夺回南怀化，反而将整个红土山梁的制高点 1300 高地丢失。日军也在阵地前遗尸上千具。到处都是破碎的尸体、大片的血迹、弹壳弹片和遗弃的枪支弹药，未被炮火掀掉的没膝枯草变成了猩红色，像是刚从染

缸中捞起。

日军的炮弹和飞机扔下的炸弹仍像昨日那样，倾泻在经过缩编后的第 322 团第 1 营阵地上，硝烟、弹雨、砂石、尘土搅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像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新任营长翟洪章同 5 个传令兵、1 名叫彭水泉的勤务兵挤在一个临时挖的隐蔽部内，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上面，5 名传令兵全被炸死，翟洪章和彭水泉被埋在泥土和血泊之中，身上溅满了鲜血和脑浆。他们挣扎着从泥土中钻出，彭水泉说：“营长，咱们怎么办”翟洪章说：“此刻敌人火力正猛，不能动，更不许离开阵地，如果打不死，到晚上再向各连要人，埋葬这五位同志。”

第二天，翟洪章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份请求增援的报告，派人呈送军长郝梦龄。报告随即批回，翟洪章接过一看，上写“战在何处，死在何处”八个大字。翟洪章顿时无语。

形势愈发变得危急。15 日上午，卫立煌调 3 个旅加入忻口正面，受到重创的第 21 师退出战场。这一天，守军并未主动出击，而是在原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防止日军突袭。

下午，卫立煌和傅作义来到忻口后沟，他们和郝梦龄、陈长捷等人就在距前沿阵地不到 2 公里的第 9 号窑洞商讨次日的大举反攻计划。一向以沉着著称的卫立煌也显出十分的焦急。卫立煌说：“忻口之战已到关键时刻，敌人占领了中央阵地线的制高点 1300 高地，对我军整个防御阵地非常不利，如果不夺回来，全线就有被敌突破的危险。我和傅总司令研究了一个作战方案，请你们二位军长考虑执行。我军不能死守阵地被动挨打，唯有集中力量向敌人反击，才能扭转目

前的被动局面。”

他们研究后决定，以 7 个旅的兵力向 1300 高地、南怀化和云中河以北地区出击。并再次明确，郝梦龄和陈长捷不仅是这次反击作战的正、副总指挥，也是整个中央兵团的正、副总指挥。而指挥上的漏洞，各自为战，行动不能一致恰恰是前期作战的最大危害。

这时，阎锡山从太原发来急电：“所报反攻作战计划，完全同意。夺回 1300 高地和南怀化者赏洋 50 万元……”

50 万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阎锡山拿出了血本。

卫立煌说：“我再补充一点：凡此次作战中得胜的各部长官均请颁发青天白日最高勋章！”

战前，独立第 5 旅临时配属第 9 军参加忻口正面的防御作战。这支“杂牌”部队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忻口战役打响后，在南怀化西南一带高地防守的独 5 旅同样遭受到很大伤亡。16 日凌晨，该旅又参加了反击 1300 高地的战斗，旅长郑廷珍指挥一个半团连下周围的几个山头，并冲上 1300 高地，加入了混战。可是，旅长郑廷珍却在混乱中身中数弹，当即牺牲。独 5 旅同好不容易占领高地的其他部队一起，在日军的顽强反击下最终又全部退回原阵地。

有不少独 5 旅的官兵抱着郑廷珍的尸体大放悲声——独 5 旅的弟兄太熟悉他们旅长了，郑旅长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一样，性格直爽，爱护部下，没有一点儿官长架子。他平素经常和士兵接触，士兵可以和他平起平坐，可以和他摔跤比武，以至于掏他的腰包。他能叫出全旅大多数人的名字，一些老兵的籍贯和家庭情况他都能说得出来。作

为一个正直的爱国军人，郑廷珍早已厌倦了内战。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跑到南京，代表全旅官兵向军事委员会请缨杀敌，终获批准。

部队北上途中路过郑廷珍的河南柘城老家，他电告家人在柳河东站见面。在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面前，他并拢双膝跪下，磕了一个响头，含着泪向母亲表示：“不打败日本鬼子誓不生还。”

部队进入忻口正面阵地后，郑廷珍曾多次对部下说：“过去自己人打自己人，死了不值得，现在和日本人打，我们拼光拼净也甘愿。如不能守住阵地，希望弟兄们一个也别回来……”

郑廷珍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这实在是一场极其混乱的反击。1300 高地仅仅是一个凸出的山包，投入反击的兵力计有独立第 5、第 4、第 2 旅等部，这些部队虽已残缺不全，仍有数千人之众，这么多的部队投入狭窄的阵地上，而且各部又没有明确分工，没有规定联络信号和标志，加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作战，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难以复述，日军则躲在工事内以密集的火力疯狂扫射，冲锋的官兵一不小心就要滑倒、绊倒——遍地都是浓稠的鲜血和阵亡者的尸体……

后来担任第 9 军参谋长的符昭骞老人对来访者说：“事后据侥幸生还的人回来说：‘当时手榴弹、步机枪声，密如过年时放爆竹。我们冲到山顶时，有人讲日本话，也有人讲中国话。打到天明，大家就散了。’”

15 日深夜，零点刚过，郝梦龄叫通陈长捷的电话：“介山兄，各部反击已开始，我到前沿指挥，但战斗期间你我联系困难，有事可通

过我的司令部联系。”

陈长捷说：“锡九兄，你是总指挥，不宜亲到前沿，应在总指挥部主持全局。”

郝梦龄执意不肯。陈长捷无奈地说：“那好，我也去前沿。”

两位总指挥都离开指挥所，而且又难以在前沿确定的地方见面，所以根本无法实施统一指挥，反击的失败早已在所难免。

郝梦龄吩咐参谋长王冠留在第 9 号窑洞协同与各部联络。身边所有的人都挽留他不要离开指挥所。他说：“我到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不必阻拦！”

言毕，郝梦龄偕同第 54 师师长刘家琪、参谋处长李文沼和两个参谋走出第 9 号窑洞，军特务连两个班跟随。他们沿着后沟的小路上山，天蒙蒙亮时来到第 322 团第 1 营指挥所——一个高地下的土洞工事里。郝梦龄站在土洞门口，他发现独 5 旅阵地方向没有动静，此时他还不知道，几乎所有参与反击的部队都退出了 1300 高地。参谋处长李文沼说：“请军长先进洞休息。”此时不断有炮弹在近处炸响，子弹嗖嗖飞过，李文沼怕军长遇到不测。

郝梦龄瞪他一眼：“我们是来休息的吗”

李文沼灵机一动：“参谋长有电话，请军长进洞接。”边说边上前拉他。

郝梦龄一动不动：“你去接！”

然后，郝梦龄问站在身边的第 322 团 1 营营长翟洪章：“走捷径，去独 5 旅阵地怎么走”

这时，郝梦龄并不知道，他所关注的独 5 旅已在混乱的反击中败下阵来，他平素十分敬重的独 5 旅旅长郑廷珍也已血洒疆场——后世的某些史料谈及此处时，说郑廷珍和郝梦龄、刘家琪一同牺牲，而事实并非如此，据众多的亲历者回忆，郑并未与郝、刘牺牲于同一地点，他们仅仅是牺牲于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而已。

见翟洪章支支吾吾不想回答，郝梦龄又加重语气问了一遍。

翟洪章说：“由脚下到独 5 旅，必须经过一段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小路，长有 20 余米，昨天我营有 4 名传令兵均因通过那里牺牲了。夜间偷过危险小些，白天不能过。现在天已破晓，最好还是不去。您如果要去，请绕远路。”

郝梦龄说：“时间已经晚了，再要绕远路，啥时候才能到达！”

翟洪章说：“您写个命令，派人送去，不是一样吗”

郝梦龄冰：“还是我亲自去，效果大一些。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们走！”

话未说完，郝梦龄一挥手走在前面，刘家琪等人紧随其后。参谋处长李文沼赶紧跑上前拉着军长的手小声说：“进洞听电话。”郝梦龄吼道：“咱们都不得怕炮弹！”——这是郝梦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约 2 分钟之后，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郝梦龄腰部连中两弹轰然倒地。刘家琪喉、胸部三处中弹，他倒地后又猛地坐起来，他是想去救郝梦龄的……

南京。黄埔路官邸。蒋介石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

中央社太原 17 日电：晋北战事开始以来，其战况之激烈，牺牲

之重大，莫过于 15、16 两日忻口南怀化之一役，因这一线之进退，足以影响晋北战局整个前途，故双方均以主力死拼。经两日之酣战，敌伤亡约在 4000 人以上，我军亦有重大损失。尤甚惋惜者，即郝军长梦龄、刘师长家麒、郑旅长廷珍，均因身先士卒，奋勇指挥，先后阵亡。民国以来，军长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军长为第一人。国人由此可推想彼时战斗之剧烈，牺牲之悲壮，实足惊天地而泣鬼神。郝军长等死后，该军士气更为振奋，日军闻之亦甚丧胆。此役战绩决可在将来中日战史增最光荣之一页。现郝军长忠骸已运至太原，今晨在东门外革命军人公墓举行棺殓。阎司令长官对郝军长、刘师长忠勇殉职，极为哀悼。于灵柩到太原时，派 34 军副军长傅存怀代表前往致祭，各军政长官代表亦纷往致祭……

8 天之后，汉口《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的祭文：

矫矫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刘君继综，如影随形，我师生力，万钧雷霆，方其赴敌，宁惜一死，挺身杀贼，誓雪国耻。枪林弹雨，与寇偕亡，士气大振，无忝炎黄。

10 月 24 日，郝梦龄的灵柩运至武汉，在汉口火车站，各界人士 4000 余人素车白马恭迎忠骸。在迎灵的人群里，有他顿显苍老的妻子剧纫秋和 5 个泣不成声的孩子。14 年后，他的小女儿郝慧兰同父亲一样走上了战场，慧兰到了抗美援朝前线，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11 月 15 日，在武昌又举行了万人参加的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琪追悼大会，然后进行了国葬，全市下半旗致哀。汉口日租界的北小

路改名为郝梦龄路。12月6日，即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落的前7天，国民政府发表褒扬令：

陆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琪、第5旅旅长郑廷珍，矢忠革命，夙著勋勤。此次奉命抗战，于南怀化之役，率部鏖战，历五昼夜，犹复身先士卒，奋力无前，竟以身殉。眷怀壮烈，轸悼弥深，应予特令褒扬。郝梦龄追赠陆军上将，刘、郑各追赠陆军中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抚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勋荃，而垂永久。

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致演说词。词中写道：

八个月来，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悼念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琪、姜玉贞……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存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龄将军等数十人就是为这个而牺牲

了……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第五章 守住娘子关，是忻口战役成败之关键

1、娘子关一战的前景难以乐观

1937年9月下旬，同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并称为新桂系三巨头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黄绍竑，于数日前在雁门关下的第二战区行营辞别阎锡山后，乘火车经石家庄到达汉口。然后乘船去南京。在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黄绍竑见到了蒋介石。

他先是报告了山西之行的情况，而后说：“阎百川虽决心很大，但他自己同一些老人坐镇雁门关也不是办法，应该有个长久计划，山西才能确保。平型关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日军还在继续不断增兵，山西以后的困难必然是很多的。”

蒋介石沉吟片刻，突然问：“季宽兄，你到山西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帮帮阎百川的忙好吗”

黄绍竑一愣。当时他想：这个问题很简单，蒋固然是想让他去山西帮帮阎锡山，其实又何尝不是借此在山西插一手同时他还想到，作战部在蒋的直接控制之下，不过是承转命令的机关而已，这样呆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他说：“委员长考虑很是。我也愿意到山西帮阎百川，但要求委员长先征得阎百川的同意。”

阎锡山很快回电同意，但有一个条件，阎推荐与他有历史关系的

山西人徐永昌继任作战部长。

10月1日，年过半百的黄绍竑带高级参谋陶钧、裘时杰、徐佛观从南京出发，于5日前后到达太原。此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忻口作战，对黄绍竑的到来，他颇感高兴。他握着黄绍竑的手说：“季宽，你来了就好，我正担心晋东方面呢！”

黄绍竑问：“副委员长，娘子关方面情况如何”

阎锡山道：“平汉路方面如能在石家庄之线守得住，敌人自然不能进攻娘子关；即使石家庄之线守不住，而平汉路正面我军能与敌人保持近密的接触，敌人如西攻娘子关，平汉路我军就侧击敌人的后方，使敌人不敢贸然西进。”

次日早晨，位于平汉路正面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来电：平汉线上的日军已经向石家庄发起进攻，前锋部队已抵达曲阳、定县一带。司令长官程潜打算放弃石家庄，将部队置于太行山山地防守。当日午后，在太原绥靖公署会议室，阎锡山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晋北和晋东两个方向的作战方案，与会者有周恩来、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朱绶光。阎锡山最关心晋北方向，所以会议主要围绕忻口防御战展开讨论。轮到黄绍竑发言时，他说：“我上次离晋返京后，将战区情况和请求中央派兵援晋问题，向委员长作了报告。委员长对华北战局十分关心，尤其重视山西战局的发展，他决定在可能的条件下，多抽调部队参加山西作战。我料，敌以主力进攻山西，我应厚集兵力与敌对战。石家庄方面既然不能长久固守，自然不宜多置兵力与敌作战，应以主力守娘子关侧面，以一部兵力监视平汉路正面，以便长期保持太

行山高原之地利，这是目下最要紧的事情。”

关于娘子关作战，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已在战略上进行了周密的考虑，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已敏锐地察觉到了晋东方向的险情。走进会场之前，周恩来刚刚接到毛泽东的一封急电，毛泽东让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山西进攻，故龙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团，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一个师团左右，如果我方部署得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进攻计划的。毛泽东还指出此役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

黄绍竑讲完后，周恩来站起来发言：“程潜司令长官打算放弃石家庄，集中兵力守太行山山地是正确的，黄副司令长官刚才的发言也有同样的见解。但是，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然沿正太路进攻山西，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的防御显得尤为重要，须集结重兵，坚决固守，以便战区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同时防止敌人沿正太路西进，威胁太原。”周恩来接着将毛泽东电报中的内容重复了一遍。最后，周恩来说：“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建议，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速派生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一带。请放心，八路军林、贺两师主力可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的任务，第 129 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太线路，与娘子关战区守军配合作战。”

卫立煌对毛泽东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发言立即表示赞成：“毛先生、周先生的意见十分正确。如按二位先生的建议，这次战役可望取得胜利。忻口正面我军暂时应无问题，唯有东线娘子关，必须加强守备，这确实是忻口取得胜利的关键。”

阎锡山却说：“在东线娘子关方向，战区已经考虑了军队的部署，诸位不必过于忧虑。现在石家庄尚在我手，晋东很平静。即便第一战区放弃石家庄，总不至于全部放弃平汉路北段吧那时若敌人西攻娘子关，他们仍可侧击敌人后方，令日本人不能大胆西进。至于娘子关的防御，现已调陕军冯钦哉部两个师和赵寿山部 1 个师守娘子关及其以北至龙泉关之线；又调滇军曾万钟第 3 军，守娘子关以南九龙关、马岭关之线。在娘子关以东，现尚有朱怀冰第 94 师、许权中第 529 旅、孙连仲第 26 路军；中央军汤恩伯的两个师也已补充好，可以继续调来山西作战。南京蒋委员长已经答应再调川军一部来山西。这样密集的兵力，可保东线防御的稳定。”

在阎锡山的眼里，无论如何，晋北方向都是主战场，而娘子关自然是副战场。他所列举的这些部队，大都是装备极差的杂牌军，而且有的很快就被调走，有的尚在途中。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忻口，对晋东的防御，显然有所忽视。然而，正是不久之后娘子关的陷落，才导致忻口主力部队的后路险被切断，从而造成太原很快落入敌手。这是阎锡山此时所没有想到的。

这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卫立煌和傅作义即刻动身前往忻县。黄绍竑说：“趁忻口大战尚未开始，我先到娘子关去看看情形怎样，好作

处理。”阎锡山说：“很好。”其实阎锡山很想让黄绍竑负责娘子关方面的战事，只不过他还没有明说罢了。

事实上，日军对晋东门户娘子关的进攻，与对晋北忻口地区的进攻差不多是同时展开的。

9月下旬，保定失守后，第一战区的十几万大军纷纷向南溃退。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3个师团，从10月1日起，开始向石家庄追击。第一战区为保存实力，于9日夜间退出石家庄。10日下午2时，日军未战即进入石家庄。之后，日军继续向南攻击前进，13日占元氏，14日占内邱，15日占邢台，17日占邯郸，18日到达漳河一线。此时，华北方面军命令第1军在邢台以北地区集结，准备向安阳进攻，并以主力一部转用于正太线，以便迅速突破该线上中国军队的防御，进入榆次附近，协同在晋北忻口地区作战的第5师团会攻太原。

这样，第一战区的部队仅与当面的日军进行了零星的战斗，便放弃了石家庄南北的广大地区，退向冀南和豫北，日军得以从容地集结休整，并无任何后顾之忧地派主力一部沿正太铁路进攻娘子关。

太原会战到了严峻的时刻。

10月7日早晨，黄绍竑在高级参谋陶钧、裘时杰、徐佛观等人的陪同下，乘小火车由太原到达娘子关。这天是一个好天气，太阳早早露了脸儿，车窗外一片明亮。小火车颠簸了几乎整整一夜，黄绍竑感到很疲惫，但他此刻不想休息，他站在窗前，透过车窗打量外面的景致。半个多月来，他已数次乘车经过娘子关，然而还不曾仔细领略

娘子关的风光。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城东北约 45 公里处。娘子关的原址并不在这里，数年之前修建正太铁路的时候，铁路线由苇泽关经过，山西当局把进入山西的第一站改称娘子关，而把原来的娘子关称作旧关。如今旧关只剩下一个残破的箭楼，两旁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岩石。

娘子关雄踞于晋冀两省的交界处，为山西东面的门户和交通咽喉，形势险要，又是太行山的一个著名关隘，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迤娘子关而东，群峰梯次下落，沟壑万千，桃河在峡谷中湍流东去；晋冀古道绕行桃河，夹在峭壁、深渊之间。军队如果在此地运动，视界咫尺，步履艰难，兵力、火器均无法展开，进攻者纵有千军万马，却无用武之地，因此兵家早就有“攻不破的娘子关”之说。

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之妹平阳公主曾统领娘子军驻扎于此，因而得名娘子关。正因为如此，在娘子关一带，便产生了与平阳公主有关的种种“遗迹”：南门上的“宿将楼”、城堡西面桃河彼岸的“点将台”、绵山的“避暑楼”等等，相传都是平阳公主所建；在避暑楼东的山坳里，有一个终年不竭的小水潭，传说是当年平阳公主的“洗脸盆”……

目睹“攻不破的娘子关”，黄绍竑感到惶惑。在旭日的照射下，娘子关周围的山峰静静伫立，如果不是战事即将来临，这里多么像江南宁静而迷人的水乡风光啊……黄绍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故乡。高参陶钧的话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陶钧说：“长官，我们下车吗”黄绍竑道：“不！先到井陉车站。”

半个小时后，小火车在井陘车站停住。还未下车，黄绍竑就看到了站台上混乱不堪的景象。这里有正待登车转运的部队，也有从河北境内逃难而来的老百姓。井陘是有名的煤矿区，大量的原煤由这里运往外地，所以虽是二等车站的井陘，站房却十分宽敞。然而此时，宽敞的站房里全是挤成一团的人，情形同站台上一样混乱。

黄绍竑在站台上截住一个年轻的少校军官：“你们是哪个部队”

“报告长官，我们是第 26 路军，正准备坐火车开往忻口。”

“这里有没有第 27 路军的部队冯钦哉总指挥在哪里”因为原定第 27 路军总指挥冯钦哉负责指挥娘子关作战，所以黄绍竑非常想找到冯。

回答是不清楚。

“那么，你们的孙连仲总指挥在什么地方”黄绍竑不甘心，他想，找不到冯钦哉，能找到孙连仲也行。

回答还是不清楚。

黄绍竑感到失望，但他无可奈何。他对随行人员说：“赶快到车站里边打个电话问问。”

不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回来说，叫石家庄叫不通，叫获鹿站，也不通。黄绍竑判断，这些地方可能已被日军占领。他对左右说：“走，咱们到别处看看。”

他们离开站台，登上车站南面的一个高地瞭望，进入眼帘的仍是混乱的人群，有些军队已经登车，正待出发，他们一定是孙连仲的部队，而老百姓在这里等车不过是徒劳而已，因为车辆均已被军队控制，

他们不可能坐上火车。

“长官，这儿太乱了，如果敌人沿铁路冲来，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赶快回太原向阎长官报告。”有人向黄绍竑建议。

黄绍竑点点头。当他们往下走时，见一群老百姓扭着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来到他们面前。黄绍竑问：“怎么回事”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说：“老总，这人说话的口音不对，像是初学说的东北话；他穿的衣裳也不像本地人，可能是日本的便衣探子。”

黄绍竑对徐佛观说：“徐参谋，你会日语，就用日语审讯一下，如果是日本特务，就毙了他！”

黄绍竑带其余人先离开高地，不一会儿，徐佛观从后面追上来，说：“那人果真是日本探子，从他嘴里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就在高地上把他枪决了。”

“敌人的探子既然已到这里，说明日军离这里不远了。可是，我们的部队在哪里呢……”黄绍竑像在自言自语。愣了愣，他果断地说：“立即发车回太原！”

当日晚间，黄绍竑赶回太原，他顾不上休息，马上去见阎锡山。没等他把娘子关方面的情况汇报完，阎锡山就打断他，说：“季宽兄，我认为晋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今天接到第一战区发来的电报说，敌人从昨天开始进攻石家庄地区，程司令长官已令所部沿滹沱河两岸布防。调归咱们的孙连仲第 26 路军，除第 30 师留在现阵地归冯钦哉指挥外，其余的正车运山西，先头部队已运到太原附近，你在井陘看到的那些部队，正是第 26 路军的后续部队。调归咱们的冯钦哉第 27

路军和曾万钟第3军估计已进入滹沱河沿岸阵地，以便阻敌前进。而局势并未到敌人马上进攻娘子关的程度，因为石家庄尚未失守。”

黄绍竑急忙说：“副委员长，我却认为娘子关方面情况相当危险！第一是正面布置得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直线距离就有150余公里，仅有冯钦哉部、曾万钟部加上孙连仲的1个师共6个师防守，都是一线配备，没有重点，也没有机动部队，敌人如突破一点，则全线都要动摇；第二是尚未明确指定统一指挥的人。这种状况，令人忧虑！”

阎锡山说：“在娘子关防守的部队是少了点，但第一战区的部队仍在附近嘛。”

黄绍竑说：“第一战区已决定放弃石家庄，平汉路我军南撤后，我料敌人必以主力向娘子关进攻，策应忻口的会战，以少数兵力压迫南撤的我军。我军在平汉线上屡次溃退，即使是少数敌人南下追击，也很难对它进行反攻，无法牵制进攻娘子关的敌人。因此，娘子关相当危险！”

阎锡山似乎有点动心：“季宽，你说怎么办”

黄绍竑说：“我建议把孙连仲部调回娘子关方面，作为预备队伍，以备不测。”

阎锡山听罢，站起身踱了一会步，然后说：“也好，就照你说的来，叫孙连仲停止西进，暂在阳泉一带集结待命。季宽，我问你，由谁统一指挥这些部队好”

黄绍竑说：“我看让孙连仲指挥即可。”

“冯钦哉、曾万钟都是老军务老资格，孙连仲虽然资格也很老，但对冯、曾两人平时没有多少关系，指挥起来一定有困难。”阎锡山双手插在裤后腰上继续踱步，“季宽兄，你担任娘子关一线的总指挥如何”

黄绍竑怔了一下，没说什么。阎锡山定定地望着他：“季宽，我看只有你老兄以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前去统率，方可确保晋东战事的胜利。如此，我可以专事晋北作战，晋东方向我就放心了！”

见阎锡山决心已定，黄绍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10月10日下午，当数路日军高举太阳旗“和平”开进华北重镇石家庄之时，黄绍竑的幕僚们拿出了正太路方面作战方案，交阎锡山批示。这个方案的第一条这样写道：

为确保山西，将来收复华北失地容易，使我晋北作战军无后顾之忧起见，以第一战区由保定南移之部队，进占娘子关山地确实保守之，并相机进袭石家庄，威胁由平汉路南进之敌。

阎锡山看了这个方案后，未假思索便立即表示同意。

10月11日凌晨，太原城笼罩在明明灭灭的灯火之中，尖利的冷风撕扯着路边紫槐树上的残余树叶，街道上呈现出满目荒凉景象。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娘子关战役总指挥黄绍竑乘小汽车直奔太原车站，然后转乘专列小火车驶往娘子关。他的指挥部人员除了高参陶钧、裘时杰、徐佛观和两三个副官外，阎锡山拨给了他一部电台和几个电务人员，另外还有一支200多人的卫队，他们几乎全是广西人，是从桂军中临时抽调而来的。

这支卫队的武器，步枪是南京军政部拨给的，黄绍竑向阎锡山要机枪，阎说太原兵工厂已经停工，太原已无库存。黄绍竑坚持非要部分机枪，不然，光靠步枪，他这个副司令长官的安全没有保障。阎锡山只好从别处拨来 9 挺轻机枪交给黄绍竑。

小火车在高低不平的正太路上缓慢前行，黄绍竑感到肩头的担子分外重。眼下，在娘子关一线布防的部队，共有 8 个师 6 万余人，黄绍竑自从军以来，从未一次指挥过这么多的部队，然而，这些部队全是“杂牌”，“杂牌”军最突出的毛病是装备低劣，各行其事，不听指挥，甚至互相拆台。因此，对于娘子关之战的前景，他难以感到乐观。

11 日傍晚，黄绍竑的专列驶抵娘子关车站。高参陶钧说：“陕西军第 17 师赵寿山部就在附近，是不是让赵师长来见见长官”

黄绍竑想了想，说：“还是我亲自去吧。”

2、娘子关前，赵寿山所部拼死抵抗

解放以后曾担任陕西省省长的西北军第 17 师师长赵寿山，刚刚将他的指挥部在娘子关内的一座民房里安顿好，就接到副官传报：“黄副司令长官来到。”

第 17 师隶属于西北军第 38 军，这支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赵寿山即是其中之一。自西安事变后，赵寿山就在中共中央秘密领导下工作。抗战爆发不久，赵寿山率领第 17 师和另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许权中领导的第 177 师第 529 旅，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声中，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从陕西三原县出发，进抵河北省参战。8 月 2

日，他们奉命进驻保定，在漕河车站至新安镇一线阻击日军。9月中旬，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到保定同程潜、刘峙等第一战区的国民党将领会晤时，曾专程看望了第17师和第529旅官兵。周恩来鼓励全体官兵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坚持长期抗战。第一战区部队撤离保定后，第529旅开往忻口，第17师暂归第27路军冯钦哉指挥，冯钦哉命第17师在娘子关正面布防，担任正面的防御任务。

正在刚刚挂起的地图前凝神沉思的赵寿山听到副官的报告后，马上迎出门外。黄绍竑一行进至指挥部落座后，赵寿山操着浓浓的陕西口音报告说：“黄长官，我师是奉冯总指挥的命令，刚刚转移到这里布防的，我们的防线在郝家坡、雪花山、荆蒲兰至曹泉一线，部队正在构筑阵地。”

黄绍竑点点头：“娘子关前的情况如何”

赵寿山回道：“正面尚未发现敌情。我师有5个团，而且士气旺盛，光守娘子关正面，问题不大。可虑的是左右两翼，近日来，一直同左翼的冯总指挥联络不上，右翼友军既不知是哪个部队，更未取得联络。”

黄绍竑说：“赵师长，你的右翼是第3军曾万钟部。我已把孙连仲部调回作了总预备队，该部正向阳泉集结。”

赵寿山说：“这样就很好了。”

黄绍竑问：“你部是怎样布防的”

赵寿山冲身后一招手，一个参谋取出一张刚绘制的简易地图，赵寿山指着图上的标号说：“我决定以主力扼守关口外的雪花山，其余

则布置在铁路两侧高地间，雪花山守得住，也就是娘子关守住了。万一雪花山失守，关正面仍可扼守。”

对赵寿山的部署，黄绍竑感到满意。勉励一番赵寿山后，黄绍竑率指挥部人员离开娘子关，退回到离娘子关 15 公里远的下盘石车站附近的一座双孔窑洞驻扎。那个地方军用地图上叫做磨河滩，依山靠河，是构筑国防工事时拟定的指挥地点。但是，这个所谓的指挥所除了那座空荡荡的双孔窑洞外，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通信设备，没有粮食，没有办公用具。20 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政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黄绍竑回忆说：“在整个娘子关战役中，通信就依赖正太铁路的电话线和一些乡村电话线以及那部无线电台。”

黄绍竑命人赶快将指挥部布置好，然后又把负责在娘子关构筑工事的晋军新编第 10 团团长白长胜找来。

黄绍竑说：“白团长，请把你部构筑工事的情形讲一讲。”

白长胜看上去疲惫而紧张。他拘谨地说：“娘子关方面构筑工事的时间比太原以北晚得多，材料也欠缺，施工的部队仅有我这一团，兵员名额也不足，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请副长官原谅。”白长胜边说边拿出工事构筑图表请黄绍竑过目。

这个草图上标示，主阵地设在娘子关前的大台山、乏驴岭、核桃园、旧关、梁家垆至北青掌一线；娘子关南至西回村为预备阵地；往西在移粮镇车站南北为第二预备阵地。在各个阵地上，新编第 10 团虽然构筑了一些炮位，但一门大炮也没有，那些炮位不过是点缀而已。

娘子关难以久守的阴影这时候已笼罩了黄绍竑的心头。

石家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部。10月10日下午。

第1军所属部队不费一枪一弹进占石家庄后，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和参谋长桥本群少将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自进入10月份以来，日军在华北的攻势已完全将山西当成了突破口，即抢占太原，堵塞平汉路中国军队的西退之路，威胁河北左侧背，继而东进河北，实现华北平原会战计划，将中国军队聚歼于黄河以北。因此，日军统帅部鉴于山西的战略地位，急欲攻克太原。

然而，日军高层认为，仅以板垣征四郎指挥下的第5师团及其配属部队即可达到攻占太原的目的，所以，第1军在占领石家庄后，暂时并未打算以主力沿正太路西进。

10月11日，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接到了军司令部令其以一部兵力转入正太路作战，主力集结于石家庄南侧地区休整待命的任务。川岸对这个命令感到不可理喻。同日下午，他来到军司令部呈述意见。

在日军的高级将领中，川岸属于比较文雅的一类，但此时他的脸孔却涨红着。他说：“皇军此次攻击石家庄，十分顺利。本师团担任右翼攻击任务，几乎未加战斗便进至滹沱河一线，支那军纷纷向南向西溃退，眼下正是皇军追歼敌人的大好机会，可是，司令官阁下却命令部下以主力集结在石家庄附近，仅以少数兵力向西追击，失掉了消灭敌人的机会，实在可惜！”

香月清司哈哈大笑：“阁下是皇军中有名的战术家，但对战略考

虑不多，而战略又受到政略的制约。好吧，请桥本参谋长将全局情况讲给阁下听听。”

桥本群正襟起立，指着墙壁上的地图说：“皇军在华北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后，虽顺利占领要地保定和石家庄，但原来决定的在保定附近同中国军队决战，歼灭其主力的计划却未能实现。而在上海方面的作战又陷入胶着状态。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了一个新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主要设想是，华北和华中的战局要扩大，而且着眼战争的旷日持久，所以设想通过10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同南京政府和平解决。政府认为解决华北问题的目标是，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实际即是过去一贯主张的华北自治。”

出乎川岸的预料，香月司令官却插话说：“这是一厢情愿！”

桥本群说：“华北方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认为，由于皇军在华北和上海方面的攻击，南京政府可能会有深刻的战败感，但这种战败感能否达到挫伤其抗战意志的程度，尚存疑虑。因此，必须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才可逼使南京政府求和。”

香月清司说：“我们认为，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后，乘机进入山西、河北、山东追击敌人，并伺机向徐州进击，才能达到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意志的目的。”

桥本群说：“10月1日，统帅部命令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同时又指示，‘在山西省方面的作战地区大概定为太原以北’。这是由于统帅部采纳了板垣师团长的意见，重视了

太原的战略价值。由此，方面军下令板垣师团长指挥山西北部的作战，向太原进攻，第 1 军向石家庄进攻，第 2 军沿津浦铁路进攻。这即是华北皇军当前的作战计划。”

川岸仍对第 20 师团目前的任务感到不可理解。他想了想，说：“但是，到目前，方面军在河北省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正可以使用主力沿正太路前进，策应第 5 师团进攻太原。”

桥本群说：“方面军已经决定，不顾统帅部的命令所限，以主力继续沿平汉路向南追击，香月司令官阁下已令第 14 师团、第 108 师团、第 6 师团沿平汉路两侧攻击前进，而在石家庄地区仅有贵师团守备，因此，贵师团只能派少数兵力沿正太路作战。”

川岸说：“娘子关雄踞正太路东段，地形极为复杂，少量兵力是难有作为的，请司令官和参谋长阁下明白这一点。”

香月清司道：“是的，我和桥本君都清楚，但阁下只能服从全局的要求。目前，贵师团只要起到钳制中国军队于娘子关一线，不使其转用于太原以北地区，就算达到了目的。待皇军和平汉路向南追击到一定程度，再将主力转用于正太路，以便协同板垣君会攻太原。”

川岸终于明白了香月的意图，他得意地狞笑起来。两个小时后，川岸回到了设在永壁村的第 20 师团司令部，和他的参谋长一起制定了进击娘子关的具体部署：

以第 77 联队第 1、2 两个大队附山炮兵两个中队，迅速占领井陘，并向娘子关攻击，求得夺取娘子关。该联队的第 3 大队主力经井陘以北的南陉向贾庄、东王舍中国守军佯攻，第 3 大队另一部于井陘南沿

金珠、大尖山向南北漳城地区袭扰钳制日军，配合攻击娘子关的联队主力作战。

另有第 78 联队中派出以两个中队为骨干的钳击分队，在贾庄以北地区渡过滹沱河向洪子店地区袭扰。

空气中已经弥漫起浓烈的火药味。

11 日晚间，在井陉以北的贾庄，冯钦哉第 27 路军第 169 师武士敏部与日军骑兵一部接触，向西溃退；第 17 师师长赵寿山奉黄绍竑之命派出守卫雪花山的第 102 团 2 营前进至井陉以东的南河头警戒，2 营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即与日军交火，他们将数量很有限的日军打退后，退回到原阵地守备；曾万钟第 3 军一部在大尖山以东的金珠与少量日军发生了战斗；在井陉以北上庄与西王舍警戒的孙连仲第 26 路军第 30 师所部，也受到了日军的攻击。

娘子关战役的前哨战就此打响。

雪花山是娘子关与井陉之间的一座石山，正太铁路从雪花山北面的山脚下经过，它雄踞在进入娘子关的通道左侧，占据此山，即可阻止日军直接向娘子关进攻。第 17 师师长赵寿山命令主力第 102 团在此扼守。

尽管第 17 师的防御地段地形比较有利，但此地多是石头山，山石异常坚硬，构筑工事非常困难，部队进入阵地后，赵寿山严督各团加修工事，因无法挖掘，只能用麻袋装土堆砌掩体，在具有优势装备的日军面前，这样的掩体很容易被摧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师长赵寿山对此战充满信心。

12 日上午，黄绍竑亲自给赵寿山打电话询问情况。赵寿山说：“井陘已失，约有 1000 敌人已进至雪花山前，估计战斗很快会打响。”

黄绍竑问：“你们能否守得住”

赵寿山斩钉截铁地说：“请长官放心，我们一定守得住！”

赵寿山的抗战热情和信心，令黄绍竑十分感慨。虽然他以前并不认识赵寿山，对他个人的情况几乎一点都不知晓，但在黄绍竑眼里，赵寿山是一个难得的优秀指挥官，而在国民党军队中，黄绍竑极少见到这样的将领。当然，这时候黄绍竑并不知道，赵寿山早已是共产党员了。

果然，赵寿山刚刚放下电话，约有两个日军中队的山炮集中轰击雪花山守军阵地。顿时，烟雾弥漫，山石横飞，不一会工夫，那些仓促构筑的掩体便被炸得不成样子。随后，第 20 师团第 39 旅团第 77 联队 1 大队向雪花山发起了冲击。被日军的炮火炸得有些发懵的第 102 团官兵醒过神来，他们集中起所有的轻重火器，拼命向冲锋的日军射击，中弹后的日军像成捆的谷草翻滚着落下山崖。

日军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退。

第 1 大队随即又组织了几次冲击，均未奏效，直到中午，已在雪花山前遗尸累累。

午后时分，日军第 77 联队长鲤登行一大佐来到雪花山前指挥作战。鲤登仔细观察了雪花山的地形后，决定 1 大队继续攻击雪花山，实施佯攻，他本人亲率 2 大队沿雪花山南麓的刘家沟、长生口、核桃园向旧关进攻，并将炮兵的轰击地点转向刘家沟方面，企图从那儿寻

找突破口，威胁雪花山与娘子关正面守军防线。

守卫刘家沟的是第 17 师第 101 团的 1 个连，这个连在日军的冲击下伤亡惨重，阵地丢失。接着，鲤登率部向旧关攻击前进，第 101 团在团长张树岗的带领下，在长生口与旧关之间顽强阻击，打退了日军的数次冲锋。傍晚，日军暂时停止攻击，在雪花山下与长生口附近同守军形成对峙。

13 日拂晓，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已突进到长生口前的日军再行攻击，相继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核桃园，逼近旧关。旧关是第 17 师与曾万钟第 3 军的接合部，是战线上的薄弱环节。

临近傍晚时，旧关落入敌手。

旧关失陷的消息传到下盘石指挥所时，黄绍竑大惊失色。

旧关位于娘子关的东南侧，从旧关经关沟向西北可以直达娘子关。很显然，如果不消灭突入旧关和关沟的日军，娘子关会受到日军直接从侧后的攻击。而且，旧关距下盘石指挥部仅有 15 公里左右，双方激烈交战的枪炮声已清晰地传到了黄绍竑的耳边。

黄绍竑冷静一下，伏在临时从老百姓家借来的木桌前，给第 3 军军长曾万钟写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要曾万钟鼓励官兵不惜牺牲，奋勇杀敌，恢复旧关。黄绍竑将那封信交给高参裘时杰和徐佛观，说：“你们二人马上去见曾军长，并视察一下旧关方向的战况。”

据裘、徐二人回来说，曾军长确实增加了兵力反攻旧关，并亲临前线督战，占领旧关的日军兵力虽不是很多，但据险扼守，第 3 军屡次反扑均未得手。

在旧关尚未丢失时，黄绍竑在他的下盘石指挥部里曾经接到赵寿山的电话。赵寿山提出，为了保持雪花山防御线的稳定并牵制西进旧关之敌，他打算亲自率 1 个团向井陉出击，请副长官批准。黄绍竑当即在电话里答应了他。放下电话，黄绍竑高兴地说：“如果我们能有几个赵寿山这样的师长，何愁娘子关守不住”

13 日下午 5 时，天色阴暗下来，出击的时间到了。赵寿山命令第 98、102、101 团各抽 1 个营分 3 路出击。右翼第 98 团在团长陈际春的率领下，于晚 9 时消灭了突入刘家沟、长生口的部分日军；左翼由第 102 团 2 营向井陉县城实施佯攻；中路第 101 团团长张树岗率 3 营向雪花山麓石板片附近出发，截击日军向旧关的增援部队。

张树岗团长率 3 营趁暮色悄悄前行，他们刚刚到达石板片附近，派出侦察的人面带喜色回来报告，前面山坳里有几百个鬼子，正在休息，鬼子们麻痹骄横，连警戒哨都不设。张树岗高兴地一拍大腿：“嘿！机会来了，咱要叫狗日的尝尝厉害。传我命令，隐蔽前进，突然冲上去！”片刻过后，3 营接近日军，张树岗一挥手，机枪步枪手掷弹刮风一般射向日军，很多躺在地上睡觉的鬼子尚未睁开眼睛便见了阎王。3 营随即发起冲锋，同残存的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这股日军在损失大半之后狼狈向井陉方向逃窜。张树岗下令跟踪追歼。至深夜，3 营连下施水村、板桥、朱家疃、井陉南关车站，缴获了山炮、野炮、机枪、骡马等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自从同鬼子作战以来，3 营从未这么痛快过。

突然，从雪花山方向打来一阵排炮，炮弹正好落在 3 营喜气洋洋

的队列里，与此同时，已逃窜之敌也向井陘南关车站反扑过来，张树岗正惊慌失措之际，传令兵携带师长赵寿山的命令赶来：雪花山已失，各出击部队马上向占领雪花山之敌反攻。

事情已经很明显，日军乘第 102 团 2 营佯攻井陘时，向雪花山发动偷袭，一举攻占了至关重要的雪花山。本来，2 营的出击任务只是佯攻井陘县城，但团长张世俊坚持随 2 营出击，而且未经请示。张世俊率 2 营离开后，剩下的两个营又放松了警惕，当他们发现鬼子摸上山时，一切已晚——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仍然被迫溃退下去。只有 1 营 1 连至死不撤，70 多人全部牺牲在雪花山顶。后来人们想起，1 连连长张登弟是中共党员，他的部下中有不少党员。至于他们牺牲时的细节，已无从考证。

可谓因小而失大，师长赵寿山急红了眼，破口大骂第 102 团团长张世俊。他清楚雪花山对于娘子关防御战的重要性，因此，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夺回雪花山。第 102 团团长张世俊垂头丧气地站在他面前，赵寿山命令他组织所部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阵地，并命令其余部队支援该团。

这天后半夜，第 102 团在兄弟团队的配合下几次反扑雪花山，均以失败告终，山下和半山腰躺满了阵亡者的遗体。14 日凌晨，日军除增兵雪花山外，还集中炮火轰击反扑的中国军队，并有飞机赶来助战，再想夺回雪花山已不可能。

赵寿山沉着脸命令各团，撤退至乏驴岭、荆蒲兰一线占领阵地。

在部队撤退途中，赵寿山按照黄绍竑的命令，将第 102 团团长张

世俊就地处决，以正军法。据说张世俊临死前一声未吭，也许他觉得自己罪当如此吧。

雪花山和旧关的丢失令黄绍竑感到顾虑重重，雪花山是娘子关附近的制高点，占据了它可以俯瞰娘子关，而且山势陡峭，极难夺回。更要命的是，占领旧关的日军在得到增援后，马不停蹄地以一部兵力向南压迫第3军，以主力向北，企图占领下盘石车站，截断娘子关的后路。14日凌晨，几乎一夜未合眼的黄绍竑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一阵炒豆般的枪声从不远处传来，忙问副官是怎么回事。副官跑出窑洞了解情况，然后极为慌张地回来报告：“长官，大事不好，敌人已经逼近指挥所的后山！”

黄绍竑有些傻眼。他手里除了那200多名广西子弟外，没有掌握一兵一卒，如果日军知道他这个最高指挥官在这里，前来攻击的话，他想跑都跑不了！

正在危急之时，有人报告，下盘石车站有一支部队正待乘车，黄绍竑如遇救星，忙命人将这个部队的指挥官找来。

黄绍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

“报告长官，我是第26路军第30师89旅旅长侯镜如，我旅正准备乘车去忻口前线。”

黄绍竑说：“侯旅长，阎司令长官已命令第26路军全部加入娘子关方面作战，归我指挥，你旅不必去忻口了。”

侯镜如惊异地说：“可我尚未接到这个命令，怎么搞的！”

黄绍竑说：“你来得正好，敌人已逼近下盘石，这个地方不能丢，

你马上率部增加上去阻止敌人!”

国民党军队里，很少有越级指挥的事情，侯镜如虽没有接到直属长官的命令，但他却接受了黄绍竑的命令，这使黄绍竑感到欣慰。

侯镜如率第 89 旅拉上去后，总算把日军顶住了。

3、雪花山丢了，娘子关危险了

太原。10 月 11 日中午，八路军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亲率先遣第 769 团到达太原。刘伯承先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见过周恩来后，又赶到绥署大院去见阎锡山。刘伯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被誉为“当代孙武”，在红军中乃至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有着崇高的威望。

阎锡山欣喜地：“伯承兄，我正等你来商谈军务呢。”

刘伯承道：“阎长官，本师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特来拜访。”

阎锡山说：“我们正面防御的部队受到日军很大的压力，希望你师能配合我们打几仗。”

刘伯承道：“本师赶来前线，就是要配合友军作战的，只是我们武器太少，又很陈旧，弹药也奇缺，每人平均还不足 10 发子弹。请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

阎锡山说：“伯承兄，对不起得很，我的武器弹药都发完了，部队在打仗，抽也没法抽。”

刘伯承说：“阎长官一点也不给补充，太说不过去了吧，这恐怕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吧，对本师作战也不利呀!”

阎锡山急忙道：“伯承兄不要误会。不瞒你说，我们眼下也很吃紧呢，我们在阳方口的军械库给日本人端了，枪弹也难以为继，希望伯承兄多多体谅我的苦衷。”

刘伯承说：“阎长官，本师初到山西作战，总得有个后方基地，请在昔阳划一块山地供我们安置伤兵。”

阎锡山说：“这件事我还定不了，昔阳归娘子关方向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管辖，到时候你去跟他商量吧。”

步出绥署大院，刘伯承摇摇头说：“阎锡山这个老滑头，真是拔毛也要过秤。靠他们靠不住，还得靠我们自己。”

次日，刘伯承率师前方指挥所和第 769 团乘火车北上。7 天之后，刘伯承又率第 129 师主力赶到娘子关附近，支援娘子关正面的友军作战。

10 月 14 日清晨 7 时，第 129 师第 386 旅旅长陈赓到达太原车站。中午，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陈赓同周恩来、彭雪枫等人一起吃饭。陈赓看到饭桌上有红烧牛肉和鱼块，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牛肉放进嘴里，赞叹道：“真香啊！”

彭雪枫说：“这是平型关战斗的缴获品，日本罐头。115 师转送给周副主席几箱子，周副主席说他不能独自享用，放在办事处招待贵宾。”

他们边吃边聊。陈赓喜欢打趣，语言幽默，惹得众人大笑不止。但周恩来发现，陈赓很少吃菜，便用筷子指着那盘牛肉说：“你不是说牛肉香嘛，怎么不吃”

陈赓收起笑容：“吃别人的东西能香吗等我们自己缴获后，那时吃起来才真叫香啊！”

这时，工作人员将一封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递给陈赓。电报是阎锡山发给朱德后由八路军总部转发来的：

娘子关外的雪花山被敌攻占，旧关也于昨日失守。兹着 129 师速开阳泉，归黄副司令长官指挥。

娘子关之战逐渐进入白热化。

担任总预备队的第 26 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还有一个第 2 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在不久前的保定作战中，原第 2 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畏敌如鼠，丢下部队仓皇逃往河南，被讥称为“长腿将军”，蒋介石为树军威，撤了刘峙之职，而以孙连仲取代。但孙连仲指挥的，仍是原有部队，共 3 个师 1 个独立旅，3 万余人。孙连仲“升格”后，所部又设置了两个军长，第 30 军军长田镇南，辖第 30 师，师长张金照，第 31 师，师长池峰成；第 42 军军长冯安邦，辖第 27 师，师长冯安邦兼，独立第 44 旅，旅长张华堂。

14 日早晨，孙连仲偕同黄绍竑的高参陶钧登上娘子关南山的 882 高地。虽然陶钧以前并不认识孙连仲，但孙连仲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孙连仲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主要将领，同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等人被称为冯的“十三太保”。他生得威武高大，仿佛浑身都是力气，1915 年底的“护国”战争中，在冯玉祥的第 16 混成旅担任炮兵营班长的孙连仲，于四川泸州、宜宾间的龙头山一役中，曾一人扛起 238 斤重的山炮，带领士兵抄后路袭击护国军。他颇具军

人胆识，性格忠厚，作风朴实，作战勇敢。成为高级将领后，仍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博得了部下爱戴。“七·七”事变爆发后，孙连仲义愤填膺，部队从河南信阳北上出发前，他召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在会上慷慨陈词：“日本蓄意侵略我国已久，现国家命运已至最后关头，吾人须以全力报效国家，挽救危局，以尽军人天职！”军官们听后“至为感奋”。从8月初开始，孙部在良乡西南的窦店、琉璃河、涿县、保定等地曾多次与日军交锋。

孙连仲和陶钧并肩站在山巅。他们放眼望去，只见旭日初现，曙光照耀下的群峰巍然屹立于娘子关内外，东面，旧关雄踞在南北两座山岭之间，旧关的西北面有一条深沟直通娘子关，沟中间有个小小的村庄名叫关沟——在平型关前，也有一条叫做关沟的深沟，八路军第115师曾经在那儿创造了耀眼的辉煌。在旧关西南的两山之间，一条名叫新关河的小河缓缓流淌，沿小河向西南是甘桃关，再往西南不远处便是新关。从旧关向东北而行，就是直通井陉的关外古道。古长城蜿蜒于南北山岭之巅，在核桃园处被切断。此地是山西与河北的分界处。站在882高地向北眺望，他们看到正太铁路经南峪、北峪和乏驴岭与荆蒲兰之间的山口，沿雪花山北麓到达井陉。

河山壮丽，冷风扑面，一身戎装的孙连仲胸中涌起满腔豪情。

昨天深夜，孙连仲专程来到下盘石指挥部同黄绍竑商讨战局。焦头烂额的黄绍竑虽没直接提出要孙连仲部增加上去，但言谈之中已有所流露。孙连仲当即表态：“娘子关正面兵力单薄，只有让我的队伍上去了！”

旧关失陷后，日军源源不断进入关沟，并经旧关向新关推进。第20师团第39旅团长高木义人除令第77联队加强攻击，又将第78联队全部和1个炮兵大队投入娘子关一线，增援第77联队。

孙连仲决定14日清晨反击旧关，由第42军军长兼第27师师长冯安邦负责实施。冯安邦令第80旅1个团向旧关推进，第79旅主力由娘子关向核桃园，一部向大小龙窝的日军攻击，并请第3军给予配合。

一阵山风吹来，身披灰棉大衣的孙连仲不由打了一个寒颤。就在这时，东面的旧关方向响起剧烈的枪炮声。第一次反击旧关的战斗打响。

此时，第42军军长兼第27师师长冯安邦也正站在清晨的冷风中向远处眺望。他身躯伟岸，浓眉、阔嘴，面孔清瘦，前顶已谢，脑后的头发呈现出灰白的颜色。毕竟已经53岁了，冯安邦的模样无可奈何地透出老态。那时，在国民党正规军师一级的将领中，像冯安邦这种年纪的，十分少见。16岁那年，冯安邦就参加了山东无棣县家乡的义和拳，后来又在朦胧的救国救民思想的指导下，离家投靠冯玉祥当兵，在他3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曾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平定甘肃、“河湟事变”、中原大战、对中央苏区和湘鄂边红军的“围剿”等重大历史事件。

一年前，冯安邦回山东老家探亲时，曾对当年义和团和西北军时代的战友、而今在家乡种地的内弟说：“咱‘老西北’都有誓死抗战的决心，只要能开上抗日前线，就拼上了！”

10月14日这天，冯安邦指挥所部同第3军一起反击旧关，在核桃园、大小龙窝、关沟一带与日军第77联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阵亡者的尸体遍地都是。至黄昏时，反击的部队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消灭了进入关沟的日军一部，但没能攻下旧关。

15日凌晨1时，阎锡山致电黄绍竑、孙连仲、曾万钟：“娘子关附近作战，交孙总司令指挥；限16日将旧关之敌完全解决；总司令及军长均应亲身严行督战。”阎锡山还悬赏5万元。但当黄绍竑、孙连仲向全军通报这5万元的悬赏时，第27师第79旅的一个营长说：“赏什么啰！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即令牺牲了，只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在那儿立一块碑纪念我们这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位营长便牺牲了，他的那个营也大部伤亡。许多年后，已无人记起那位营长的名字，就像许许多多烈士的名字不被人记起一样。

15日这天，各部继续向旧关发起反击。由于日军的增援部队进入旧关附近，各部的反击均无大的进展。傍晚时，全线反击陷于停顿。

在这两天的反击中，有资料记载，中国军队击毙日军第77联队长鲤登行一大佐、大队长中岛利男中佐以下500余人，而自己的伤亡人数高达数千。一年之后，冯安邦将军于湖北襄阳遇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壮烈殉国。

下盘石指挥部。孙连仲部投入战斗后，黄绍竑的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他一时心血来潮，出了大赏——俘虏一个日本兵赏大洋200元。等了整整一天，孙部解送来的俘虏仅有两个，他突然感到有点好笑。

这天，一个被打散的日本兵，乱窜到下盘石指挥部附近，被黄的卫士团团围住。黄绍竑吩咐说，捉活的捉活的。但那家伙死不投降，像条疯狗一样边放枪边乱窜，卫士们很想得到那 200 元赏钱，但又不敢靠前，最后又气又急，只好开枪将其击毙。黄绍竑打趣说：“你看你看，我把洋钱都预备好了，就是发不下去。”

孟县岳家庄。两天前，第 38 军教导团在河北平山县洪子店受到日军袭击后退到这里。他们本是同赵寿山的第 17 师一同进入河北前线作战的，第一战区的部队撤离石家庄后，他们稀里糊涂跟着撤出，并且在转进途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背部已经负伤的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急欲与上级取得联系。

第 38 军教导团原是西安绥靖公署教导团，是杨虎城将军储备军事干部的机构，官兵一般都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程度。西安事变后，绥靖公署被撤销，教导团编入孙蔚如任军长的第 38 军。由于教导团仿照中央军校入伍生团的编制，因而 3000 多学兵都是下士军衔，官长的阶层也比普通团高。尤其是有部分共产党员在教导团担任教官，所以该团的战斗力甚至比一个旅都强。

这天，电话员偶然听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同阎锡山通话，马上向李振西报告。此刻，李振西已顾不上军纪了，便戴上耳机偷听他们讲话。

电话里，黄绍竑说：“副委员长！娘子关外的雪花山失守，敌人沿长生口进行迂回，已占领旧关，另有一部进入关沟。孙连仲正在调整部署，而我又未与冯钦哉第 27 路军取上联系，娘子关很危险哪！”

阎锡山说：“娘子关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快丢掉！你立即命令孙连仲指挥所部堵截，万万不能因为娘子关影响忻口战役的进行！”

黄绍竑说：“我明白娘子关的重要。请副委员长赶快由太原方向抽调些部队乘铁甲车开到阳泉增援！”

阎锡山为难地说：“老兄，忻口方面战事很紧，能拿上去的部队都拿上去了，这里实在抽不出兵来……”

就在这时，李振西忍不住插话道：“我们可不可以开来”

“谁在偷听”阎锡山咆哮着问。

李振西赶忙说：“我是第 38 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由滹沱河退下来后失去联络。”

黄绍竑却显得很兴奋：“你就是李团长你们现在哪里”

“我们在孟县岳家庄。”

“距娘子关多远”黄绍竑接着问。

“看地图不过 50 公里，现在才下午 5 点，我们马上出发，经寒潭、上下盘石这条路，明天可以赶到。”

黄绍竑转向阎锡山说：“这是杨虎城的卫队团，就叫他们开过来吧。”

最后，黄绍竑对李振西说：“李团长，你们马上出发，走近路赶到娘子关，归孙连仲总司令指挥！”

李振西放下耳机，对中校团副张希文说：“这下有仗打了！咱教导团这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命令 1 营以急行军姿态先行，2、3 营随后跟进！”

4、原有 3000 人的第 38 军教导团只剩下 100 多人

10 月 16 日拂晓，就在忻口地区的守军对南怀化实施猛烈的反击之时，娘子关一线的中国军队也对旧关展开了第二次反击。

几个小时前，日军第 39 旅团第 78 联队已进至旧关附近，第 77 联队长鲤登行一阵亡后，川岸文三郎师团长命令第 78 联队长南云亲一郎指挥旧关作战。与此同时，第 39 联队长高木义人把他的指挥所推进到井陘县城抵近指挥。

然而，这天的反击同第一次反击一样，进行得极不顺利。原定袭占旧关以东核桃园的第 3 军一部，在日军强大的反冲击下，放弃阵地向后退缩。而日军主力趁机进入 882 高地南侧的黄石咀、会道沟——经过这道由东向西直通娘子关正南侧的山沟可以直抵正太铁路，显然，日军企图驱兵正太铁路截断娘子关正面守军的后路，而且不远处的孙连仲、冯钦哉的指挥所也有被突袭的可能。所有奉命反击的部队在日军攻击下，不仅无法反击，事实上已经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弄不好已有的阵地都要丢失。

就在这种危急的关头，第 38 军教导团赶到了。

远远地就听见了爆豆般的枪炮声，闻到了丝丝缕缕的硝烟味。在崎岖的山路上经过一夜跋涉的教导团 1 营于太阳升起的时刻到达磨河滩附近的上椒园。走着走着，有人向营长殷义盛报告，前面沟口有几百名鬼子骑兵在做饭，连哨兵都没有放。殷义盛说：“好，咱给狗日的来个突然袭击！”他命令各连迅速散开，悄悄接近日军。少顷，随着殷义盛一声令下，1 营的 5 个连居高临下，呐喊着一下子冲到日

军面前，正端着钢盔当饭碗吃饭的日军猝不及防，丢下 20 多具尸体后跨上战马仓皇窜进沟内，被击中负伤的马匹倒在地上发出哀叫。各连连长过来请示怎么办。殷义盛想了想，说：“先将沟口封锁，等待团主力到后再说。”殷义盛立即赶到磨河滩去见孙连仲。孙连仲说：“你们动作好快，不愧是杨虎城的看家部队。”

这时，一个中等身材、模样凶狠、佩戴二级陆军上将衔的高级将领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过来。殷义盛认出，此人就是第 27 路总指挥冯钦哉。他马上上前敬礼。孙连仲略感奇怪地问：“怎么，你们认识”

冯钦哉哈哈一笑：“仿鲁兄，不是吹牛，陕军的人哪个不认识我老冯”

冯钦哉本系杨虎城陕西军的主要将领，他性情火爆，言语粗鲁，喜怒无常，小时候曾将庙中佛像的琉璃珠眼睛抠出来，弄得全家惶悚不安，不得不将其赶出家门。西安事变时，他因与杨虎城意见不合而闹翻，投向蒋介石的怀抱。今年春天，蒋在上海召见他时，赞赏道：“你是同盟会的老同志，这一次很出力(指西安事变时反对杨虎城)，关系重大，岁寒松柏能有几人。”蒋当即批给 10 万元，犒赏冯部全体官兵。在不久前的保定作战中，第 27 路军曾多次与日军接触，杀敌虽不多，但部队损失不小。部队受挫后，自称根本不把小鬼子放在眼里的冯钦哉变得胆小起来，他的部队在娘子关左翼防御，而日本人把矛头对准了右翼和正面，这使他心中大喜。

后来，娘子关战役总指挥黄绍竑对冯钦哉一直耿耿于怀。黄回忆道：“我要无线电台向冯钦哉取得联络，但一直到娘子关失守，都未

联络上，原来他没有将电台架起来，所以他那方面的情形如何，无从知道。我想冯钦哉所以如此，就是要避开上级付与他的作战任务。据我当时及事后知道，娘子关左翼是没有什么敌情的。如果敌人知道这个情形，由平山向六岭关进攻，一定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太原和忻口之间截断了，比之进攻娘子关省力得多。”

几个小时前，黄绍竑将他的指挥所后撤到阳泉，冯钦哉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他来到了下盘石附近的磨河滩，与孙连仲住在一起。

教导团 1 营营长殷义盛向孙、冯报告说：“我营已将沟口封锁，后续部队一到我们就冲进去。”

孙连仲没说什么，冯钦哉却急煎煎地说：“娘那×，还等个屁！赶快带你的部队往里冲！”

这时候，教导团团团长李振西正带着团主力急急向下盘石赶，当他来到上椒园附近的沟口时，发现 1 营已进至沟内与敌激战，不断有伤兵被抬出来，身边有乱糟糟的老乡扶老携幼向后逃。孙连仲派人赶来，那人没下马就大声喊：“哪位是李团长孙总司令有请！”

李振西来到磨河滩。他看到孙连仲、冯钦哉住着国防工事一明两暗的三间大窑洞，周围还有很多窑洞，堆放弹药、器材等。李振西背部的伤口痛得厉害，孙连仲让副官唤过医官先给他换药，然后交代任务。

孙连仲说：“今晨我军对旧关发动第二次反击，颇不顺利，冯总指挥的两个师到现在还没联络上，我手下的池峰城师才到昔阳境内，

娘子关无兵可调，太原又抽不出兵来。娘子关一失，太原很快就要受到威胁。刚才，日本人冲进 882 高地南侧的沟内，这条沟直通磨河滩这里，但我这里只有一个卫队营，目前就看你们了。你们这个团的战斗人员，比一般的旅还要多，近战武器又好，当面敌人今天给你们冲了一下，仓皇钻进沟内，现在趁热打铁，能一下子推到旧关更好。只要你们夺回旧关，我担保和黄季宽一起向中央请求扩充教导团。”

李振西说：“请总司令放心，我马上率部反击敌人！”

然后，李振西对中校团副张希文说：“你赶快把全团集结到沟口，跟着 1 营往里冲。”

李振西到达沟口时，1 营已进至沟内 2.5 公里处与敌鏖战，2 营的一半也钻进沟里，成批的伤兵往外抬，头顶还有日军的飞机盘旋。李振西侧耳倾听，感到里面的喊杀声很遥远，像从地狱中传来。两个士兵抬一副担架路过他身边，他示意停下，尚在清醒的伤兵说：“这沟有 10 公里长，两边是悬崖峭壁，几千敌人挤在沟内，骑兵、炮兵、辎重兵和战车把道路都塞住了。尽管敌人挤着向后退，由于受地形的限制，我们也攻不动。”

李振西又找到几个逃难的老乡一问，才知道在这种地形下，战术完全错了。他召集各营营长研究后决定，采用集中兵力火器、轮番冲击的战术，以营为单位，将全营的 48 挺轻机枪及 8 挺重机枪集中起来，分为 4 个火力组，每组 40 人左右，机枪兵背足子弹，步枪兵多带手榴弹，将沟内造成火海，步枪兵跟在机枪兵后面跟进，前一个突击组伤亡大了，便停下来，后一个接着上去，一拨接一拨地向日军冲

击。

中午时分，教导团按照预定计划，重新发动攻势。这一招果然奏效，到黄昏时，日军在扔下几百具尸体后退回旧关，教导团也有五六百人伤亡——后来，就连孙连仲都认为，如果不是教导团及时赶到，娘子关也许这时候就失守了。

月色朦胧。中日两军在旧关周围经过一天的厮杀后，都停顿下来，四周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李振西登上旧关附近的山头，他隐约看到，此时，著名的娘子关旧关虽已残破不堪，但在峰峦起伏的山脊中，雄姿犹存。

这天晚些时候，孙连仲、冯钦哉来到沟内李振西的临时指挥所，一见面，孙连仲上前紧紧握住李振西的手说：“老弟！教导团打得好！弟兄们辛苦了！”

李振西说：“可是旧关还在敌人手里，我担心明天天一亮，敌人会卷土重来。”

孙连仲说：“老弟说对了。光凭教导团夺回旧关不可能，我已发出明日拂晓第三次反击旧关的命令，你们可以配合。现在，教导团全部进入沟内，如果敌人反攻，跑都跑不及。你们不如乘敌人立足未稳，连夜出击，夺回关前的几个山头。我让我的特务连带来几百条麻袋，你们可用它们装上土，在旧关前堆成掩体，阻塞道路，加以固守，为明日的大部队反击创造条件。”

李振西说：“总司令说得对，今晚我们不把敌人撵走，明天敌人就会把我们撵走，我们干脆去拼一下。”

一直没说话的冯钦哉插话说：“很好！你们夺回一个山头，赏洋 5000 元！”随即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写道：“教导团夺回一个山头，赏洋 5000 元。总指挥冯钦哉。”冯钦哉当着孙连仲的面将纸条交给李振西。

16 日夜 12 时，教导团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风卷残云一般扑上旧关周围的山头，正在睡梦中的日军大都来不及抵抗就被消灭，并炸毁了 4 辆战车，缴获山炮 2 门，机、步枪 200 多支。

消息传到磨河滩指挥所，孙连仲说：“钦哉兄，这下你得掏腰包了。”

冯钦哉说：“我的命令是夺回一个山头赏洋 5000 元，他们夺回 8 个，怎么赏？”

孙连仲以为他在开玩笑，谁知最后他竟然真的一文没给。倒是黄绍竑拿出 3000 元奖给了教导团。

17 日拂晓。中国军队第三次反击旧关的战斗打响。同前两次反击一样，这次反击仍以失败告终。尤其是战斗未正式打响之前，战绩赫赫的第 38 军教导团遭到了日军意外的、然而又是致命的打击。

这是一个战场上少见的黎明——寂静、安恬，如果不是山坡上沟壑里那些破碎的尸体和凌乱弃置的武器，没人会相信这是两军残酷厮杀的战场。第 38 军教导团自驰援旧关以来，连续一日两夜没休息，饭只吃过一顿。此刻，他们又累又饿。团长李振西认为，日军已被打得够呛，没有相当时间补充，难以再发动攻击，于是命令各连就地吃饭、休整。各连的炊事兵干脆把行军锅背到各连排的阵地上烧起饭来，

升起的炊烟和燃烧的火光准确无误地给日军指明了阵地位置，从而招致了灭顶之灾!更要命的是，阵地上的人包括团长李振西在内，吃饱饭后倒头便睡……

蓦然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惊醒了他们。迷迷糊糊爬起来一看，头顶有 10 余架日军的飞机俯冲扫射、轰炸，一批批炮弹呼啸着飞来，李振西眼看着他的弟兄化为成片成片的碎肢断肉，刚才还是活生生的人，眨眼之间就消失了，面前变得空荡荡的……在这些光秃秃的山头上，每一颗炮弹都能造成数十人伤亡。教导团顿时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李振西好不容易组织起部分官兵，日军的步兵和战车已冲过来，多亏各连都有一些阎锡山的兵工厂制造的滚山雷，个头同西瓜差不多，杀伤力比手榴弹大两三倍，日军冲到近前时，守军拉断导火索往下滚——就靠这些黑不溜秋的铁家伙，教导团一连打退了日军的 5 次冲锋。傍午时，李振西统计了一下，教导团已有两个营长、100 多个连排长和 1000 多名士兵伤亡。

下午 2 时，千余名日军在飞机、战车的支援下分几路展开全面攻击，2 营守卫的旧关左翼几个山头打得最为激烈。日军的几挺重机枪架在阵地左侧的一个土坎上，那是一个无法消灭的死角。占据突出位置的 6 连和 8 连各种武器都用上了，却怎么也打不退日军的冲锋，那些头戴钢盔面孔发黑的鬼子在同伴倒下后继续前冲，而且他们一枪不发地保持了可怕的沉默，像螃蟹腿似的渐渐合拢过来——一场几乎是无声的肉搏战之后，这两个连的官兵绝大部分牺牲，阵地丢失。随即，占领阵地的日军将目标转向左侧的 7 连。

7 连守卫着旧关左翼最重要的据点，它瞰制着通往旧关的公路和周围的山头，如果失掉，旧关附近的阵地都难保持。李振西派传令兵找到 7 连连长崔俊英，令他无论如何不能退。此时，全团 20 多个连长除崔俊英外，非死即伤。崔俊英战斗经验丰富，平时深得团长李振西赞赏。崔俊英对传令兵说：“你回去告诉团长，只要我老崔还有一口气，7 连阵地就丢不了！”

炮火霎时覆盖了 7 连，崔俊英手执驳壳枪蹲在一个弹坑里，督促他的部下拼命还击冲锋的鬼子。他的耳边不断有人说：“报告连长，我们班只剩我一个了。”崔俊英说：“妈个×，给我打！”“报告连长，我们排长阵亡了。”崔俊英说：“你当排长！”“报告连长，我的枪打坏了。”崔俊英说：“混蛋！快扔手榴弹！”……

这边，李振西命令中校团副张希文把团部通信兵、卫生兵、传令兵、司书、副官、书记全部集合起来，拉上去增援 7 连。足足两个小时后，才将各路进攻的日军打退。入夜，教导团所剩不多的官兵就趴在血泊中等待天明——各个阵地都变成了赤色，仿佛有人在山头铺了一块巨大而肮脏的红布……

18 日凌晨，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接到了孙连仲的电话：“老弟，池峰城到了……”李振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轻轻地说：“总司令，是真的吗……”

第 26 路军第 31 师池峰城部接替了教导团的阵地。18 日傍晚，李振西带领仅剩的 200 多弟兄到达下盘石附近，当这支残破不堪的队伍经过铁路时，一列从娘子关方向开来的火车飞驰而过，80 多名来

不及躲避的官兵被碾死、撞伤!至此，原有 3000 人的第 38 军教导团只剩下 100 多人。

19 日，孙连仲派 1 个营把教导团阵亡的 2000 多官兵的尸体集中起来，在旧关沟口埋了几个大冢。团长李振西含着滚滚热泪登高远望，默祝将士们的爱国精神永世昭明……

在娘子关正面，第 17 师丢掉雪花山后，日军紧接着向他们仓促占领的乏驴岭阵地攻击，战斗一天都未停顿。某日夜间，师长赵寿山爬上乏驴岭视察阵地，明月照耀下的战场尽收眼底，感慨之余，他吟诗一首：

妖氛弥漫寇方张，百战何辞作国殇。

士卒冲锋杀敌处，娘子关外月如霜。

19 日早晨，日军攻击重点由旧关转到乏驴岭，经过整整一天的鏖战之后，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离。守卫乏驴岭南侧阵地的黎子淦营除 10 余人外，其余全部捐躯，9 连排长、中共党员刘惜棠率全排与敌反复肉搏，最后无一人生还。

至此，第 17 师在井陉、雪花山、乏驴岭一带浴血奋战 9 昼夜。撤退时，人们发现，他们的赵寿山师长头发、胡须都白了，仿佛一下子老了 30 岁！

后来，为了纪念娘子关战斗，第 17 师成立了一个剧团——“血(雪)花剧团”。其中有一首战歌的词中唱道：

我们在乏驴岭上，

誓与阵地共存亡。

我们在雪花山上，
血花扶着我们的刀枪。
井陘车站夺大炮，
娘子关外毁车辆……

5、董其武受伤后叮嘱部下：不许声张，以影响军心

自 10 月 13 日忻口大战正式展开之后，众多的共产党将领将目光紧紧盯住忻口。

在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对友军只知死守阵地的呆拙战法愤慨不已，他与朱德、任弼时、左权论及此事时，说：“‘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有 20 万，有国民党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战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

住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则频繁与阎锡山保持接触，一再向他建议：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数兵力钳制日军，主力向东北出击；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止日军突入，避免败绩。阎锡山同意改变部署，实际上并未采纳。

10 月中旬，忻口战役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周恩来、彭德怀来到忻县卫立煌前敌总指挥部。他们再次表示：不赞成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卫立煌深感他们说对，但无力改变。1938 年 1 月，卫立煌带第 9 军军长郭寄嶠、第 14 军军长李默庵到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给朱德、彭德怀拜年时，道出了他的“苦衷”：“在忻口，

用主动积极的作战方法从侧面进行包围迂回作战，当然是好，但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担当不了这样的任务。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军队不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紧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八路军的打法只好慢慢地学。”

那天，卫立煌心情焦灼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继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最大，一天因此几乎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当夜，彭德怀返回总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起床来到院子里，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原来，大家以为敌机从北平飞来。此时，彭德怀根据飞机的航速、续航能力和轮番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他命令刚开入晋北的第129师第769团进入代县，实地侦察。

金山铺。忻口战役前敌副总指挥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对前线的战况感到焦虑不安，他很少休息，不停地在屋子里或小院里踱步。他认为守军单纯防御不是办法，大兵力出击也有一定困难，但又一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这天，一群逃难的老乡路过金山铺。傅作义想，老乡们从北面而来，可能了解一些情况，便迎上去。

傅作义问：“老乡，你们是哪个村的”

“我们是旧河北村的。”有胆大一点的人回答说。

“你们村里有鬼子吗？”

“有。村外有好多大炮，村子西北角还有一个老爷庙，庙门口有鬼子把守，常有汽车停在门口，有好些挎洋刀的军官出来进去……”

傅作义根据老乡提供的情况和个别日军战俘的口供，估计旧河北村的老爷庙可能是日军的一个指挥机关，甚至是板垣的前线指挥所。他马上要通忻县卫立煌的电话，先讲了他的判断，然后说：“卫总司令，我有一个釜底抽薪、出奇制胜的设想：派一支精锐部队，于夜间抄袭旧河北村，以掏心战法，一举捣毁其前线指挥所，切断其通信联络，打乱其指挥系统，摧毁其对我威胁最大的炮兵阵地，造成有利形势，扭转战局！”

卫立煌当即说：“宜生兄，你的设想我完全赞同。我马上报阎长官批准。”

15 日下午，第 35 军第 218 旅旅长董其武奉命匆匆来到金山铺军指挥部。一进门，他看到除了傅作义外，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郭寄嶠也在。

傅作义把总部的决定讲给董其武听。董其武兴奋地说：“奇袭旧河北村板垣前线指挥所的任务，我坚决完成！但我旅只有两个团，完成奇袭任务后，继续扩大战果恐怕兵力不足。”

卫立煌说：“阎司令长官说了，将派 20 个团后续跟进。奇袭成功，奖赏 5 万元。”

傅作义说：“我相信 218 旅一定会很好地完成任务，事关大局，要向全体官兵讲清形势，激励‘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爱国精神，发扬 35 军抗日传统。这里大军云集，都在注视着你们，只能成

功，不能失败!”

董其武说：“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回到旅部，董其武马上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他讲完后，参谋长张征复补充说：“这次出击就是军长在平时说的‘掏心战术’。要达到猛、准、狠，给敌人个措手不及，先来它个‘黑虎掏心’，再来个‘大闹天宫’，弄它个天翻地覆。出发时要求轻快精干，不带骡马，轻伤病号都留下……连、排长在出发前，要切实检查士兵的随身装具，必须绑扎结实，不得发出响声。每个官兵右臂缠一块白毛巾，以资识别。口令临时通知。”

15 日夜间，鏖战了一天的战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第 218 旅饱餐战饭武装齐整后，于黑暗中快速、隐蔽地越过云中河，到达第 9 军第 161 旅下王庄前沿阵地。几天来，第 161 旅像钉子一样坚守下王庄这个忻口战役惟一的前沿阵地，居然未被日军突破。在下王庄的一座窑洞里，董其武见到了第 161 旅旅长孔繁瀛。就在这时，云中河南岸枪炮声震耳欲聋，中央兵团总指挥郝梦龄、副总指挥陈长捷正指挥部队对南怀化和 1300 高地发动大规模的反击。

孔旅长问：“董旅长，你们什么时候行动”

董其武说：“今夜已来不及，我准备明夜出击。”

天将拂晓时，日军向下王庄前沿阵地发动攻击，第 218 旅只好先协助第 161 旅固守阵地。隐蔽在村外洼地的第 420 团 3 营营长冯梓听到枪炮声越来越近，这时，派出观察的人回来说：“孔旅支持不住，敌人快进村了!” 冯梓一面命令部队准备战斗，一面派人向团长李思

温报告，然后他带几个人摸到一截战壕。迎面遇到一个带下士领章的士兵。冯梓说：“找你们营长。”下士说：“没有了。”“找连长。”“也没有了。有什么事快给我说，这里就剩下6个人了。我是副班长。队伍来了快上！日本鬼子就在前边不远的洼地和壕内，你听，正在喊叫，又要冲啦！”

冯梓急忙命传令兵去带队伍。3营的人刚进阵地，日军已冲到眼皮底下，他们立即投出一批太原造大个手榴弹——这种生铁制成的山西土特产每枚能炸裂成二百六七十块碎片，杀伤力惊人。中央军使用的全是济南造手榴弹，弹头光亮，分量比太原造的轻一倍，炸裂破片少，威力不大，而且中央军好像不习惯投弹。日军似乎初次尝到太原造手榴弹的厉害，丢下一片死尸后，马上退却。冯梓拿起一枚济南造手榴弹掂了掂，感到自己部队的好投弹手，能投出百八十米。他立即吩咐部下，赶紧投这些小“玩艺”，追着日军的屁股猛甩。3营轻轻松松打了个小胜仗，几乎没有伤亡。这时，董其武派第436团1营接替了他们，命令他们后撤休息。

16日傍晚，董其武在冰凉的雾气中来到村外，他边走边合计今夜出击的具体细节。突然，一颗冷弹飞来，他左臂负伤，血流不止。卫士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将他送回旅部。参谋长张征复吃惊地说：“旅长受伤了”董其武说：“不要大惊小怪。”医生赶来进行包扎，但弹片只有到后方医院才能取出。董其武又说：“现在是要紧关头，完成战斗任务再说。”他再三叮嘱旅部的人：“我这点伤没关系，不论上下，都不许声张，以免影响军心。”

夜深了，心急火燎的董其武决定当夜行动。他和参谋长张征复研究了一下，打算在袭击旧河北村之前，先解决弓家庄、东泥河之敌。旧河北村在西南面，西北面是东泥河村，正西是弓家庄，这三个村落都距下王庄约二三公里。而弓家庄、东泥河村是旧河北村日军前线指挥所的外围，只有先解决这两个据点，才有可能达到最终目的。而弓家庄地势较高，在位置上更显重要。

夜3时，第420团率先出击弓家庄，第436团策应。这天夜里没有风，露水很重，一弯冷月挂在西天。第420团先头1营进至距弓家庄200米处时，日军尚未发觉，他们伏在低洼处，借着暗淡的月光看到敌哨走来走去。营长张世珍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由尖兵先消灭日军哨兵。十几个士兵接令后匍匐前行，他们接近敌哨时一跃而起，挥动锋利的大刀将敌哨全部砍死。张世珍一挥手，几百个官兵从青纱帐中跃出，迅速冲进村内，与此同时，3营在冯梓营长的率领下从另一个方向冲入，他们分别包围了日军驻地。顿时，小小的弓家庄枪声大作，集束手榴弹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半个多时辰后，弓家庄之敌除少数漏网外全被解决。第420团阵亡官兵70余人。

在下王庄的董其武得到第420团顺利占领弓家庄的消息后，命令团长李思温马上率部攻击东泥河村。然而，该团先头2营刚穿过茂密的青纱帐接近东泥河村，忽然听到北面马达轰鸣，数辆日军的坦克前来增援，密集的机枪火力打得高粱棵子刷刷折倒，2营只好撤出。随即，所有部队全部退回下王庄。

又度过了一个难耐的白天。

董其武已决定 17 日晚上袭击旧河北村。参谋长张征复在电话里向军参谋长陈炳谦报告了董其武负伤的事。陈炳谦责问张征复：“为什么不早报告？这种事应马上向傅副总司令报告！”张征复放下电话讲给董其武听，董其武又责怪说：“我这点轻伤算什么，不应该给总部讲。”

17 日午夜，第 218 旅袭击旧河北村板垣前线指挥所的战斗开始行动。董其武的臂部伤口已经感染，疼痛难忍，饭也吃不下，但他坚持跟随旅预备队前行。

近半个世纪后，解放军上将董其武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夜晚，他回忆道：“这天是阴历九月十四日，月光洒在青纱帐中，各战斗队分成多路穿行在农田小路上，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走得很快，一点声息也没有……”

部队悄悄逼近旧河北村。董其武在村子东北的一个土岗下设置临时指挥部。凌晨 3 时，第 420 团从村北，第 436 团自村东，均准时摸进村子，秘密占据了几个制高点——有的是小高地，有的是屋顶。到这时候，麻痹大意的日军仍未察觉。两个团突然发动袭击，官兵们朝日军睡觉的屋里丢手榴弹，机枪、步枪伸进窗户往里打，鬼子的嚎叫声十分刺耳。借着月光和火器炸裂的光亮，他们看到不少未中弹的日军都是光着屁股仓促爬出被窝还击。

村外，第 420 团团副带人将日军的山炮阵地占领。第 436 团营长王建业率人冲进村西南日军的野炮阵地，消灭守卫大炮的日军后，王建业命令：“把炮拴拉出来，往炮膛里扔手榴弹！”后来撤退路过云中

河时，他们将这些山炮野炮的炮拴全扔进了河底。

第 420 团骑兵连长张振耀带人攻进一个院落，他们发现屋内除了日军尸体外，还有七八个赤身裸体的妇女——她们有的已被误杀，侥幸活下来的哭诉说，她们有些是从外村被抢来的，有些是本村的，鬼子兵怕她们跑掉，将她们的衣服剥光藏了起来，不分昼夜地凌侮……张振耀赶紧将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逐屋逐院争夺两个小时后，天已拂晓。除了村西南的一座高大院落和村西北的老爷庙尚在敌手外，其余日军全被解决。第 420 团团长李思温决定先攻打大院，他下令部队包围大院，用密集火力封锁大门口，并朝院内猛烈射击。打了一会儿，大伙觉得差不多了，遂停止射击，用特意学来的半通不通的日本话朝院内喊道：“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突然，大门从里面打开，大伙紧张地注视着——战战兢兢出来的，竟是一个 10 岁出头的小女孩。有人说：“中国人，别打枪！别打枪！”大伙招手示意，让小女孩快过来。“院里日本兵叫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开枪，他们就朝西北方向撤。”小女孩过来后颤抖着说。“想跑没门儿，老子就是来要鬼子狗命的……”很多人嚷嚷道。

第 420 团团长李思温和第 436 团团长李作栋一商量，决定继续攻击。李思温命令 3 营 7 连连长杨子希：“你带人上屋顶，居高临下往下打！”杨子希派人找来 3 架梯子，然后亲自带人快速抬着梯子接近屋后砖墙。竖起梯子后，杨子希等十几个人爬上屋顶，他利用已被打坏的烟囱口观察了一下敌情，对身边的人说：“就从这里往下打枪、丢手榴弹！”边说边举起手枪自烟囱向里面射击。屋内的日军发现房

顶有人后，即由房内仰射，杨子希胸部中弹，当即牺牲，滚落到地面。其他的人也大都伤亡。

攻击大院受阻的消息传到临时旅部，董其武想了想，说：“干脆用火攻。”

大伙从附近的院子里抱来柴草、树枝，浇上汽油，从四面放火，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时间不长，里面的日军全被烧死。事后得知这座大院驻扎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部。

部队在攻击村西北的老爷庙时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里的确是日军的一个高级指挥部，日军第 5 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曾数次来此视察，第 21 旅团长三浦敏事常住这里。本来，第 218 旅袭击旧河北村的目的就是摧毁这座老爷庙，活捉或者击毙敌酋，按说应该最先从这里下手，出敌不意攻占老爷庙。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分工不明，别处先开火，致使庙里的日军已经反应过来，加强了戒备，从而给攻击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董其武正焦急之时，第 211 旅旅长孙兰峰带 1 个警卫连突然来到。一见董其武，孙兰峰就说：“傅军长得知你负伤，命我急速前来接替你。”董其武说：“你来了，太好了。可是，在这种紧要关头，我哪能因一点轻伤就退下去呢！”孙兰峰点点头，没再坚持让董其武撤出。他只是说：“我先到前面看看。”

老爷庙地势较高，围墙坚厚，墙外有层层铁丝网和堑壕等工事，日军利用地利顽抗，攻击部队没有重武器，双方形成对峙。孙兰峰到来后，两次令第 420 团强攻，均未奏效，庙墙四周已经倒下几十个官

兵，其中有 3 营 9 连连长宋仲璟。偏偏这时，村北又有一股伪蒙军来援。这些伪蒙军身穿长袍，行动笨拙，不会利用地形，只知道跪地射击。负责阻击援敌的第 436 团很快将其击退。

下午，一部日军开来，他们从村北方向发动猛攻，逐渐接近老爷庙，形势急转直下。孙兰峰回到临时旅部，对董其武说：“老爷庙一定是个大贼窝，老鬼子少不了，可是敌人工事坚固，火力旺盛，咱们兵力太少，一时拿不下来，怎么办”

经过几天的战斗，第 218 旅已损失过半。董其武说：“这里的预备队，还有两连人，再拿上去 1 个连，就再无兵力可派了。”

“1 个连顶啥用，不是说后续还有几个团吗”

“那不过是鼓咱们的劲儿。现在就是向总部呼援，也远水解不了近渴。”

“要不再组织敢死队爆破！”

“或者从下王庄孔旅那里调两门平射炮，把那个大庙轰平！”

“恐怕来不及了。”孙兰峰顿了顿，“也想不出好办法，这样吧，我带 1 连预备队先上去，你和孔旅长马上联系。”

孙兰峰拔腿要走。正在这时，参谋长张征复走过来，大声说：“总部电话，命令我们马上撤出战斗，经下王庄，仍过云中桥，到忻口待命！”

董其武和孙兰峰愕然道：“没有说为什么让咱们撤”

张征复说：“没有。”

10 月 19 日拂晓前，第 218 旅回到忻口。见到卫立煌和傅作义后，

董其武才知道东线娘子关已陷于危急，阎锡山决定先调第 35 军撤离忻口，开赴太原。

第六章 铭记忻口，铭记那些伤痛

1、中国军人血肉之躯，填满了忻口正面战场

忻口战役中央兵团新任前敌总指挥陈长捷骑在马上，他神色严峻，一言不发。原本清脆的马蹄声被不远处的枪炮声完全覆盖，只见一溜马队四蹄翻飞，却听不到它们发出的任何响声——这些跃动的战马和骑在上面的军人宛若抽象的图案。

几个小时前，正在南怀化前沿指挥战斗的陈长捷接到军参谋长李铭鼎让他速回军部的电话。陈长捷狐疑不安地赶回石合子军部刚进门，卫立煌、傅作义派来的高参便急急迎上来。高参的手里拿着卫、傅联合签署的让他担任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的命令。到这时，陈长捷才知道，前敌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郝梦龄已于16日拂晓时阵亡。他的心头一阵悸动和痛苦。

陈长捷良久无语。未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对参谋长李铭鼎说：“赶紧收拾一下，我们即刻去忻口前敌总指挥部。”

马队急急前行。骑在马上的人能够清晰地看到前面的忻口阵地上，十几架日军飞机正轮番轰炸扫射，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蔽日。通往忻口的道路上，大批伤员涌退下来，有的呻吟不止，有的边走边骂：“鬼医生都滚到哪里去啦疼死老子啦……”有一个伤兵，用一只手端着自已另一只骨断筋连的血淋淋的伤臂，嚎啕大哭。还有一个伤

兵躺在路边央求别人：“给我一枪吧……我受不了啦……”他的小肠已经流出了一大截。

陈长捷紧绷着脸，丝毫不为所动。快接近忻口后沟时，一支队伍溃退下来。卫兵报告：“是独2旅。”陈长捷一挥手，他的卫队迅速展开，封锁了道路，并朝天上鸣枪警告。溃兵们这才站住脚。独2旅旅长方克猷从人群中钻出来，陈长捷用马鞭子指着他厉声怒斥：“冲上去！当着全国军队的面向后跑，不嫌丢脸吗？再下来，小心你的脑袋！”

独2旅的溃兵们在旅长方克猷的带领下匆匆返回，并向丢失的阵地发起了反击。

16日晚上，陈长捷走进忻口后沟第9号窑洞，默默坐在郝梦龄使用过的那张旧行军桌前，发出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后的第一道命令：“把我61军的6个团全部调往第一线。”

数天前，第14集团军第14军军长李默庵受命担任忻口左翼兵团的总指挥。李默庵将他的指挥部设在沙村一个叫姚宏的人家。左翼兵团统辖的部队主要有第14军的第10、83、85师和郭宗汾的第2预备军第71师、孟宪吉任旅长的晋绥军独立第8旅。

对于年纪只有33岁的李默庵来说，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战役中担任一个方面的总指挥，担子确乎是重了点。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在黄埔系的国民党将领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据说他曾一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不久，李默庵便退出了党组织，积极跟随蒋校长打天下。在北伐战争和军阀混战期间，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几乎算得上战无不

胜、攻无不克的常胜将军，深得蒋介石宠爱，26岁那年，即升任师长。但后来与红军作战时，他却一筹莫展，失了雄风。

3个月前，正值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在庐山任命李默庵为第14军军长，并令他和他的湖南同乡、黄埔一期同学、第14军第83师师长刘戡登台亮相，台下掌声如雷，李默庵和刘戡感到异常兴奋。部队北上之前，蒋介石特意把他和刘戡召到官邸面授机宜，然后留他们共进便餐。在尊敬的蒋校长面前，他们共同表示了誓死抗战的决心。

10月13日，日军对忻口正面和左右两翼发动全面攻击。下午3点，卫立煌把电话打到李默庵的指挥部。卫立煌指示李默庵：“第14军应自左翼刘庄、南峪方面，向阎庄、卫家庄1482高地一线之敌攻击，并进至楼板寨一线。”

1930年之前，李默庵一直受陈诚指挥，自他担任第10师师长后，才归到卫立煌麾下。他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卫立煌却是蒋不大放心的人，所以他和卫立煌之间存有芥蒂，但他很佩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每逢打仗，总是愉快地服从卫立煌的命令。

放下电话后，李默庵站在地图前沉思片刻，随即下达了战斗命令。

在后来的作战中，忻口左翼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无法和忻口正面比拟，唯有左翼的核心阵地——大白水阻击战可与忻口正面相类比。在发布上述命令的时候，李默庵将军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这一点。

大白水是忻口左翼兵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它位于云中河北岸，村子的四周有宽厚的土围墙，村内的民房大都是砖石结构，比较坚固，村子的西边地势渐高，东面和北面地势平坦，便于守军发扬火力。它

与忻口正面的高地互为犄角，增加了日军进攻的困难。日军如拿不下大白水，则很难南下深入。但是，村子东、北面的开阔地同时也有利于日军发挥战车等现代化武器的威力。

李默庵将他的第 10 师第 28 旅控置于大白水村及其左右地带。第 28 旅共有两个团，第 59 团在村外，第 57 团在村内，旅长陈牧农的指挥所设在村东南的一个姓王的人家。

第 57 团团长刘明夏是湖北武昌人，个头不高，显得精明强干。按照国民党正规军的编制，他这个团有 3 个步兵营，1 个八二迫击炮连，全团共有 2000 余人。每个营之下设 3 个步兵连，1 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有 9 挺“捷克”式轻机枪，75 支“中正”式步枪。重机枪连配备 6 挺马克沁重机枪，迫击炮连有 6 门炮。另外每个营还有两门临时配备的德国造“三七”战防炮，这种炮专门对付坦克。这样的武器配备令晋绥军和其他杂牌军眼红。

13 日那天，日军已将大白水北面 1.5 公里处的阎庄占领。15 日拂晓，当面之敌日军独立第 15 混成旅团集中坦克 30 多辆、数十门大炮，在飞机的支援下，从阎庄出动，向大白水发动猛烈的攻击。不大一会工夫，大白水村前及左、右守军的工事和交通壕几乎全被日军的炮火摧毁，第 28 旅尚未接敌便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守卫村外的第 59 团从早晨到中午，打退了日军的数次冲锋，团长王声溢、营长郑庭笈负伤。

这时，第 28 旅旅长陈牧农命令第 57 团派 1 个营出村增援第 59 团。第 57 团团长刘明夏指派 2 营前往。2 营营长张光裕带人立即出

发。他们刚刚到达村外，便与日军的坦克部队遭遇。几辆坦克怪叫着从斜刺里冲出来，坦克上的机枪疯狂扫射，而部队又缺乏打坦克的经验，眼看着官兵成片成片倒下，营长张光裕束手无策。残存的官兵慌忙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清查人数，发现全营伤亡过半，4个连长3亡1伤。张光裕知道自己责任难推，军法不容，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边哭边将手枪递给营部传令班班长李凤武，说：“回去也是死，干脆你开枪打死我……”李凤武吓得倒退几步，不敢接枪。张光裕说：“快动手！要不老子毙了你！”李凤武狠狠心接过枪，闭上眼睛叩动扳机——这一枪打在张光裕的大腿上，张光裕也算战场负伤，最后蒙混过关，未受军法处置。

2营退回大白水村后，团长刘明夏指定营副陈震接任营长，并把2营布置在村子的左翼。3营在村子的正面，1营在右翼。

15日下午1时许，日军步兵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以十几辆坦克做先导，率先向2营阵地冲锋。当日军坦克进入战防炮的射程时，新任营长陈震命令：“开炮！”两门战防炮各打出一发炮弹，未中。陈震火了，对战防炮排长说：“再打不中，我杀你的头！”排长红着脸跑过去将一门炮的炮手拉开，进入炮位亲自发射，连发5弹，击中3辆坦克。其余的一看不好迅速调头退却。

然而，暴露炮位后的战防炮阵地很快招致敌机和大炮的报复，几十枚炸弹和炮弹兜头打来，一时间血肉横飞，尘土漫天，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战防炮阵地荡然无存，这个几天前刚刚调来的战防排近20名兄弟全部阵亡，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

片刻过后，日军再行攻击，直扑 2 营阵地。6 连阵地是日军重点突击目标，该连集中轻重火器打退了日军的步兵，但是，两辆坦克却怎么也不退。有经验的人知道，面前这种怪物的名称叫“八九”式中战车，它全重 10 余吨，前装甲厚达 17 厘米，时速 20 多公里，上有乘员 4 人，配有五七加农炮 1 门，“九一”式机枪 2 挺。

此刻，这两辆坦克加足马力隆隆前行，无数的机枪、步枪子弹打在它身上，只打出一团团的火花，成批的手榴弹甩过去，爆炸后的浓烟遮住了它们，但眨眼之间，它们又冲出烟雾，怪叫着前冲而来。没有任何武器能对付它们，6 连的弟兄急得哇哇直叫。

就是这两辆凶恶的坦克这天下午横碾了 6 连的战壕，几十个活着的弟兄连同几十个刚刚阵亡的新鲜尸体被碾成肉饼。全连仅余上士班长杨少雄和七八个伤兵。许多年之后，参加过忻口左翼作战的老人谈起这段往事时，无人不提此事。

日军已从东、北、西三面团团围住大白水，激烈的战斗一直未停。打到下午 3 点多钟，2 营剩下不足百人。

团长刘明夏急调 3 营 7 连增援 2 营。7 连上等传令兵王杰仁在前面领路。在路过村南的一条干河渠时，王杰仁看到，河渠两边的柳树几乎全被日军的炮火打断，有的是连根拔起，树身树枝布满整个河滩，平均有半米多厚。7 连 100 多人进入河渠后，拔不出腿迈不动步，每前行一步都十分困难。这条河渠原是兄弟连队的阵地，树木倒下时有不少人被压在下面，轻伤的在哭叫，重伤的在呻吟。7 连顾不得救他们，拼命赶路。走出河渠后，面前的一段平坦的开阔地又被日军机枪

封锁。王杰仁卧倒，趁日军的射手换梭子时，猛地跃起快速通过，后面的弟兄却被打倒七八个。

王杰仁跳进 2 营的战壕时，2 营营长陈震一高兴，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站起来，挥臂高喊：“弟兄们狠狠地打！援军已到……”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正中他的脑门，他当即牺牲。

位于村东的 1 营在打退日军的数次冲锋后，突然听到前面不远处有乱作一团的牲口叫声。胆大的人从战壕里抬起头来一看，差点笑出声来——上百个鬼子竟然赶着一大群老百姓的牛羊慢慢腾腾前来进攻。跑在前头的一只山羊掉进了战壕时，1 营才开火。枪声一响，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顿时乱了营，四处散开，其中不少被打死打伤，一头个头很大的黑色公牛肚子中弹后，狂奔着跳进战壕，踏伤了好几个正集中精力射击的弟兄，有人一怒之下举枪将它击毙。

牛羊一散，鬼子完全暴露，1 营在冲锋号声中跃出阵地，与敌展开肉搏。双方正杀成一团时，一顿日军的炮弹突然从远处打来，弹片和烟雾笼罩了他们。双方的幸存者赶紧退回原阵地。有人边用手抠满嘴的泥土边含糊不清地说：“狗日的鬼子炮兵，真狠，连自己人都不要了……”

15 日下午，一部日军从西北角突入大白水村。奉命增援 2 营的 3 营 7 连又被调回，增援村内。他们刚到达村子的南口，上等传令兵王杰仁看到，团长刘明夏、团副魏巍正率领团部人员——参谋、卫士、伙夫、马夫、勤杂兵等等，对进入村内的日军进行反冲锋，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官兵的喊杀声、冲锋号声……这些杂乱无章的

声音交织在一起，地动天摇。团长刘明夏站在一截残垣上，振臂高呼：

“弟兄们 157 团是近卫团，死不能退！……”

团副魏巍负伤后被抬下。第 57 团和第 59 团残部一起，在第 83 师两个步兵连的支援下，经过逐屋逐院的争夺，终于将突入大白水的日军消灭。

由于大白水围墙坚固，日军的大批坦克难以进入，只有其中的 3 辆从东关顺交通壕突入村内，紧跟坦克的敌步兵被击毙或击退后，这 3 辆坦克非常猖狂，一直冲向第 28 旅旅部。旅长陈牧农十分紧张，忙将卫队连顶上去。然而，那些手持轻武器的卫兵纷纷被敌坦克上的小炮和机枪打死打伤，旅部的人慌作一团，旅长陈牧农叫苦连天，一再给总指挥兼军长李默庵打电话，请求向第二线既设阵地后撤。

在离此不远的总指挥部里，能够清楚地听到大白水方向炽烈的厮杀声。起初，李默庵命令陈牧农坚决顶住，无命令决不能后退。后来见情况确实危急，李默庵有些沉不住气。加之电话线路一度被敌破坏，前后联系中断，情况不明，吉凶难卜，李默庵慌张起来：“糟了糟了！恐怕要垮杆了！”

整个总指挥部的气氛异常压抑。李默庵转向军代理参谋长符昭骞和作战科科长吴宗泰说：“还是让他们转移到第二线去吧。”

“如白天撤退，则后果更坏。”符昭骞反对。他建议道，“以汽油喷浇敌坦克，然后投手榴弹，坦克着火后必退！”

“只好这样了。”李默庵说。这时，电话线路接通。李默庵向第 28 旅旅长陈牧农转告了这一办法。

至黄昏时，突入大白水的一辆敌坦克着火被毁，其余两辆见势不好，调头顺原路窜出村子。

这天，左翼兵团各部均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伤亡高达3000人以上。

在后来的战斗中，令守军头疼的，仍然是日军的坦克车。因守军缺乏消灭日军战车的有效武器，所以敌坦克十分猖狂，在大白水周围横冲直撞，守军官兵只要一露头，立即就会遭致坦克上发射的密集弹雨。战守均感艰难。

据第14军代理参谋长符昭骞回忆：一天，李默庵命令第83师师长刘戡派部队向大白水西北面的卫村夜袭，以减轻大白水守军的压力，并从该师抽调一个旅加强大白水的守备。刘戡指派第493团团长李纪云率部夜袭卫村。李纪云，这位10年后在陕北青化砭兵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青年将领当夜便领兵出发，但第493团夜袭未果，翌日继续攻击，战至黄昏，伤亡七八百人，仍未拿下卫村。

刘戡打电话向军长李默庵报告战况，李默庵责备刘戡：“怎么一个小小的卫村，你打了一昼夜，还攻不下来”

刘戡本来就对李默庵由第10师师长升任军长不服气，加之他认为不应该袭击卫村，因为卫村离中国军队阵地较远，即便夜袭成功，即需派兵固守，这样正面更大，兵力更散，更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而且第493团攻击了差不多一天一夜，遭致重大损失，所以，当李默庵指责他时，他火上浇油一般立即反驳说：“你第10师怎么没将敌人打退(此时，大白水外围的敌坦克仍在肆虐)你还拉我一个旅在大白水，

你第 10 师打得好吗你还要打我官话吗简直岂有此理!”

嘭地一声，刘戡扔下电话。从那以后，李默庵多次给刘戡打电话，刘戡就是不接，战况也不向军部报告。当时，李默庵对刘戡非常恼火，又无可奈何。

在忻口左翼，终究由于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而未使日军突破阵地，从而保证了忻口正面的持久作战。

在忻口右翼，以第 15 军军长刘茂恩为总指挥的右翼兵团日子要好过一些。右翼兵团的阵地处于五台山南麓，山峦起伏，滹沱河流经山前，日军的坦克等先进武器无法使用，所以这里并不是日军攻击的重点。

刘茂恩的指挥所设在定襄县一个叫受禄的较大的镇子，他本人住在一座人称王银通楼院的宽大宅第，房东主人的名字就叫王银通。

不久前，刘茂恩巧遇八路军第 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二人谈起过去打内战的事，徐向前说：“那年在河南西峡一带，你的军队把我们追得好紧呀!”刘茂恩说：“你们也几乎把我们拖垮。”说罢，二人握手言欢。过后，刘茂恩对军部参议、中共地下党员杨章武说：“人家共产党就是气魄大。现在国共合作，团结一致，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第 15 军是抗战爆发后最早入晋作战的“客军”，晋北各路大军向忻口转进时，第 15 军负责掩护，曾数度与敌交火，保证了大军顺利转进，保全了大批军用物资，阎锡山和卫立煌感到满意。

10 月 16 日以前，日军仅仅对忻口右翼进行牵制性的攻击。16 日

以后，板垣将刚增援至忻口前线的第 11 联队投入右翼灵山阵地，战斗一度激烈。刘茂恩亲临前线督战，据说他曾“坚持几个昼夜不休息，不吃饭，仍然精神饱满地勉励将士，捕捉战机，连连打退敌人的进攻”。

关于忻口右翼作战，鲜有史料记载。个别史料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防守灵山主阵地的第 15 军第 64 师一个叫张全和的副连长，在与日军肉搏时，肚皮被三八大盖枪的刺刀刺穿，小肠随即流出体外。张全和强忍剧痛，踉踉跄跄来到一个低洼处，自己动手将小肠塞入体内，用腰带缠紧，而后又执刀上阵。弟兄们劝他赶快退下，到后面治疗，他谁的话也不听，大喊着冲入敌群，继续与日军肉搏。半个小时后，张全和提着两颗血淋淋的鬼子人头，浑身是血回到弟兄们中间，只见他把那两颗人头狠狠地摔在地上，说：“病死，被日本人杀死，为杀日本人而死，同样是死。但这三个死在秤上过一过的话，就知道为杀日本人而死是重于泰山！我杀死两个日本鬼子，已经赚了一个啦！……”说罢，他在别人尚未反应过来时，解下腰带，将小肠从肚子里拉出，奋力撕断，用最后的力气说：“我已经尽了炎黄子孙的责任，我的血没有白流，现在已无生望……”话犹未了，张全和倒地溘然长逝……

日军突破灵山前沿阵地后，曾数次接近山顶。阎锡山致电刘茂恩：

仰速集结兵力，拼死恢复，以免影响战局，并着严督所部死力抗敌，不得再有疏失。

这天，第 64 师第 192 旅中校参谋长张霁乘敌进攻的间隙到灵山阵地观察战况，隔着我方设置的防御木栅，张霁看到木栅前方敌我双方阵亡官兵的尸体和遗弃的武器遍地都是，由于在双方火力控制下，

均无法拖回。在山顶和山坡上，布满日军的炮弹和飞机炸弹碎片。当他回到南坡时，适逢敌机前来轰炸，他赶忙卧倒。这时，突然从山顶上滚下一个已经断气的士兵，这名士兵遍体无伤痕——他是被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震死的。

半个世纪后，张霁老人回忆说：“右翼地区战斗，我军以劣势装备，坚决抗击优势装备之敌达 23 天之久，歼敌约一两千，我军伤亡约四五千。究其原因，首先是抗战伊始，我官兵积蓄已久的报国之心与必死之志初次得到进发的机会。”

忻口撤退，第 15 军仍负掩护之责。战后，刘茂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局是统盘的，要算总账，不能只打个人算盘。这次战役，15 军固然损失严重，但保证了数十万大军的安全转进，为国家保存了实力，算算统盘大账，还是划得来的。”

2、八路军在阳明堡烧了日军 24 架飞机

忻口正面的红土山梁早没了过去的模样，经过短短几天的鏖战，中日两军倾全力在这里厮杀，上万发炮弹、炸弹落在上面，数万发各种类型的手榴弹、手雷在这儿炸响。还有那些对射的飞蝗一般密不透风的子弹，使同处地球东方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日本人在这片红土地上扔下了上万具血肉之躯。遍地都是死人和鲜血。忻口成了人间地狱。

晋绥军独立第 3 旅的前身是第 208 旅第 412 团，不久前，他们在平型关右翼作战，受到重创。平型关撤退时，他们进入河北省，经龙

泉关回晋，然后经五台山、东冶镇、定襄到达忻县南胡延村。转进途中，旅长章拯宇不架电台，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系，阎锡山以为他们全军覆灭或是全部溃散，异常恼火。到达忻县境内后，阎锡山传令给予旅长章拯宇处分。

这天，傅作义派来一个汽车营，将全旅 2000 余人运至金山铺，说是已归第 35 军指挥。傅作义站在队前讲话，号召大家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并当场发赏钱，士兵每人一块大洋，官长两块。在国民党军中，上阵前发赏钱或是悬赏作战，是很普遍的现象。按如今的说法，叫做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但到了独 3 旅临往上开时，上面又传令，独 3 旅暂归第 61 军陈长捷指挥。

独 3 旅被指定进入关子村西南方向的 204 高地附近，接替新编第 4 旅的部分阵地。第 5 团团长樊荣带人到达指定位置后，团直属机炮连上尉连长周亚文看到他们接防的小土山上全是梯田，地楞间有小型隐蔽部，小土山周围有躺卧呻吟的伤员和大量遗弃的尸体，还有一摊一摊的血迹，以及乱扔的枪支弹药、通信器材、军服军毯、食品杂物等，令人触目伤怀。听说新编第 4 旅大部牺牲在这片地段。

当日下午 3 时许，团长樊荣召集营连长在高地鞍部豁口处，划分射击目标，布置战前准备工作。正讲话间，突然，对面高地上的日军机枪响了起来，樊团长腹部连中数弹，当即倒地昏迷。眼疾手快的周亚文跳跃着奔往不远处的新编第 4 旅旅部借担架。此时，第 4 旅旅长于镇河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周亚文扛上担架往回走时，于镇河在他身后说：“周连长，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啊……”

周亚文将全连的 4 挺马克沁重机枪布置在步兵连队的后面，那些未及掩埋的战死者的遗体成了他们防御工事的一部分。望着脚下那些新鲜的、然而又是残破不堪的尸体，周亚文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伤。这年他已经 27 岁，由于又矮又瘦，看上去倒像未长大成人的少年。他出生在离雁门关 10 公里远的一个小山村，传说当年杨六郎曾在这儿打仗，八国联军打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途中曾在此落脚。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关于金戈铁马的陈年旧事，使周亚文在很小的时候就憧憬当一名军人。他先是在村里读了 3 年私塾，学会了描红模字；适逢阎锡山在各地办学校，他又进了附近的一所国民学校学习，毕业后到代县中学，学过英文，并成为国民党预备党员。就在这时，大革命的风潮汹涌而至，太原的学生到代县宣传革命道理，年少气盛的周亚文未假思索便跟上人家到了太原，进入当局主办的国民党党务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的学员结业后将放到各县组织县党部，后来周亚文一直记着训练班一位老师说过的话：“革命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然而周亚文最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军人。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前夕，阎锡山为扩充实力，在太原组建军官学校，史称北方军官学校，分设步、骑、炮、工 4 科，大量招收中学生，施以两年的军事教育，毕业后分到各部队充任下级军官。周亚文兴冲冲地前去报考。招生的人见他这么瘦小，说：“看你这副模样，当兵后身背 40 斤，日行 80 里，(当)炮兵拉不了骡子，(当)骑兵骑不了马，你不行的，还是当你的学生吧！”但他执意要参加招生考试，居然考入步兵科第 2 期。从

军校毕业后，他先是参加了中原大战，一直打到山东曲阜；后又参加了 1936 年堵截红军东征作战，直到不久前的平型关战役，也算是一个多次亲历实战的老兵了。但这次开赴忻口，一上来他就预感到，这次战斗的残酷程度会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进入 204 高地附近的当夜夜间，他们就与当面之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机炮连一个重机枪班的阵地被一颗日军炮弹炸毁，人枪俱无踪影。周亚文的护兵和号长都负了伤。

次日，团部传来通知说，陈长捷军长接任前敌总指挥，并附有战地命令，其主要内容是：无命令不许退；轻伤不许退；弹尽援绝不许退。周亚文听了，觉得只有与阵地共存亡，奋斗到底，战死为荣这一条路了。

10 月 17 日，日军第 5 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将他的指挥所由崞县推进至原平。位于忻口正面的第 21 旅团伤亡近半，仅仅在南怀化打开一个缺口，而已方的攻势却成了强弩之末，板垣大为不满。

17 日午后，板垣亲自到前沿视察。当晚，他命令第 21 旅团长三浦敏事集中兵力，重点攻击关子村西南高地。因为这块高地西扼南怀化，东临界河铺南北通道，如夺取它，便可会同已占领 1300 高地的日军直捣忻口村。

这块高地便是忻口战役中有名的 204 高地。

次日清晨 7 时，上千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重点向 204 高地猛扑。这块横切面约 2 公里的地段上顿成一片火海。

忻口后沟。第 9 号窑洞。18 日这天，陈长捷始终在这里指挥战

斗。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起，204高地险情不断。原先守卫这片高地的是第9军第54师一部，第54师师长刘家琪阵亡后，该师第162旅旅长孔繁瀛接任师长。因连日苦战，第54师消耗极大，阵地被迫缩短，空出的阵地由第35军第211旅接替。

这天的恶战从早晨持续到中午，第54师又付出重大伤亡。孔繁瀛一气之下，跑到第9号窑洞找陈长捷，要求再缩短防线。他没喊报告就径直推门闯了进去。

陈长捷不满地问：“孔师长，出了什么事”

孔繁瀛说：“出了什么事妈的，这仗还能打吗！”

“坐下慢慢说嘛。”参谋长李铭鼎给孔繁瀛让座。

孔繁瀛余怒未消：“54师一上来就担任正面地段，如今全师剩下不足两个团，仍担负那么长的防御地段，今天打了整整一上午。又死伤不少，我已无力据守，请赶快压缩我师防线！”

陈长捷脸色很冷，强忍着解释道：“孔师长，我已考虑到54师减员太多，所以将原阵地给你们缩短了一大半，其余大段阵地全由晋军防守。目前各阵地均感兵员不足，请你勉为其难，务必顶住！”

孔繁瀛仍不罢休：“哼！你们晋军只知保存实力，可我们中央军呢一上来就同日本人打得不可开交，所以损失惨重，眼下晋军就应该多负担一些……”

陈长捷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你们军长尸骨未寒，你便如此猖狂。你来找我，我去找谁你既不能守，我先枪毙了你再说。来人！”

卫士推门而入。孔繁瀛这才清醒过来，随即吓得面色如土，连声

说：“部下错了，饶我这一次吧……”

参谋长李铭鼎出面圆场，一边指责孔繁瀛一边为其说情：“临敌抗命，罪应不赦，可是看你的样子，倒还有些悔悟畏法。军长，看在郝军长的面上，且饶他一次。”

陈长捷脸色有些缓和，手一挥厉声说“记住！军法是不能开玩笑的。跑步回去，顶住打！”

别人趁机对孔繁瀛摆手示意，提醒他赶快走。孔繁瀛刚出门，陈长捷操着福建腔说北方话：“你把我看得不成玩艺儿，这仗还怎么打我只好拿出个人的样子叫你看看！”

许多年后，当时在场的第 61 军军部参谋张光曙一直清楚地记得这个场面。陈长捷能镇住中央军——很多人都这么说。

忻口战场陷于危机之时，深入日军后方的八路军却异常活跃，胜仗一场接一场。

10 月 18 日凌晨，鸡叫头遍时，一支部队悄悄从雁门关西南 5 公里远的老窝村潜出，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直奔雁门关下的黑石头沟。他们是八路军第 120 师第 716 团。

几天前，在神池县义井镇，素有“中国夏伯阳”之称的八路军第 120 师师长贺龙，嘴里叼着他那只烟斗，琢磨第 120 师的行动计划。此时，同蒲铁路北段已被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切断，日军南下的交通运输只靠两条汽车路：一条从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一条由灵丘经平型关、繁峙至忻口。贺龙想，第 120 师应当在这两条线上主动作战，切断汽车路，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贺龙把第 716 团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召到师部，对他们说：“忻口会战正在进行，敌人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往忻口运输弹药、给养。这是日军最主要的一条运输线。但是，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经成为他们的后方，没有中国军队，因此，警戒疏忽。你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充分利用日军这个弱点，发动群众，给鬼子来个突然打击，把这条运输线切断！”

第 716 团立即出发。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日军施暴后的景象。部队路过宁武县城时，他们看到差不多家家的菜窖都成了人的坟墓；所有的水井，都堆塞着被刺刀挑死的男人、小孩和被奸淫后复遭杀害的妇女的尸体。战士们的眼睛都气红了。

16 日，到达老窝村后的第 716 团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大同日军集结了 300 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往南开往忻口的模样。团里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进行动员。政委廖汉生问：“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话音未落，3 营长王祥发霍地站起来：“我发表意见。我永远也忘不了敌人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11 连连部驻的那个院，一家 8 口人，被杀了 7 口，一个不满 3 岁的小孩，也被刺刀活活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她眼泪都哭干了，拉着我们，要我们报仇。这是她一家的仇，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仇！”王祥发越说越气愤，脸色铁青，“要叫敌人以血还血！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们全营同志的决心！”11 连指导员胡觉三紧接着站起来说：“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鬼门关！”

17 日拂晓，贺炳炎、廖汉生带干部们到黑石头沟看地形。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点。贺、廖二人决定 1、3 营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高坡上，3 营担任主攻，1 营派 1 个连向阳明堡方向警戒，3 营 11 连负责断敌退路。

18 日黎明前，第 716 团秘密进入伏击位置。毕竟是第一次同日本人交手，团长贺炳炎有些紧张，决定再到阵地上看看。战士们见到他后，有的露出几分神秘的笑容。这时，他发现阵地上有几个文书、炊事员，便惊奇地问：“怎么，你们也上来了”战士们回答说：“打鬼子人人有责，团长，这是第一次和日寇交手，不参加，心里不好受！”“老大哥在平型关给鬼子吃了个大苦头，这回也叫他尝尝咱们的厉害！”贺炳炎有心听听他们的决心，故意说：“别想得太容易了，要知道这是 300 辆汽车啊！”“甭说 300 辆，3000 辆也别想漏过去，不信打起来看！”

贺炳炎放心地回到指挥所。上午 10 时许，长长一列汽车终于从北面进入伏击圈，大家焦躁不安的心这才放下来。突然，3 营又送来情报：“南面阳明堡方向又开来 100 多辆。”这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日军数量增多，无疑给战斗增加了困难。贺炳炎和廖汉生一商量：不管怎样，都要打。

从两个方向开来的汽车都到了眼皮底下，贺炳炎发出命令：“打！”狭窄的黑石头沟顿时变成一片火海，那些未被击中的汽车加足马力往前开。3 营长王祥发挥动驳壳枪，带领全营冲锋，11 连率先冲上公路，战士们使用长征时大显神威的“鬼头刀”与敌肉搏。连长胡觉三一连

砍死两个鬼子后，发现车下还趴着一个，他想捉活的，但刚一迈步，被那家伙一枪打中前胸。胡觉三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同志们，坚决地打，为宁武的老乡们报仇……”

贺炳炎和廖汉生也下到公路上。贺炳炎看见一个战士正用铁锹狠狠地砸着汽车——他一面砸，一面气呼呼地说：“我叫你再跑！我叫你再跑！”贺炳炎对他说：“这样多的汽车，哪能砸得完”廖汉生说：“不要砸了，应该炸掉！”

这次伏击，第 716 团毙伤敌 300 余人，炸毁汽车 20 余辆。3 天之后，第 716 团在同一个地方再次伏击鬼子车队。贺炳炎、廖汉生向贺龙报告：“我与敌激战两小时。我伤 13 名，牺牲 20 名，敌伤亡 3 倍于我。”

17 日那天，八路军第 129 师第 769 团到达代县以南的苏龙口。苏龙口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较大的村子，顺河南下便是忻口，隆隆的炮声不断从南面传来。日军的飞机一会儿两架，一会儿三架，从苏龙口上空飞过。有的战士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各营的干部找到团长陈锡联说：“下命令吧，干掉它！”

老乡们反映，隔河约 5 公里外的阳明堡有鬼子的飞机场。

在作出决定前，24 岁的陈锡联先寻访了住在附近的一个晋绥军团长，据说他曾和日军打过仗，陈锡联想听听他与日军作战的经验。谁知那家伙却嬉皮笑脸地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们的小饭锅而已……老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

起来，还不是白送礼”陈锡联厌恶地掉头离开。

18 日下午，陈锡联带几个营长到滹沱河边实地侦察。他们登上一座山峰，不约而同地举起胸前的望远镜。突然，2 营长叫道：“飞机！”顺着 2 营长的手指望去，果然，在阳明堡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整齐齐排列在跑道上，机体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芒。

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打着赤脚的农民进入他们的望远镜。等那人走近时，陈锡联等人迎上去问：“老乡，从哪里来”那人惊恐地倒退几步：“老、老总……”“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打鬼子的。”

当那人听到他们是八路军时，马上打消了疑虑。他说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小村里，日本兵弄得他家破人亡，一家三口，只剩下他一个，这还不罢休，又抓他去做苦工，整天饿着肚子往飞机场搬汽油、运炸弹，他实在受不了，才偷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机场狠狠地说：“去收拾他们吧，我给你们带路！”3 营长赵崇德上前握住他的手：“老乡，我们一定给你报仇，给所有受难的老乡报仇！”赵崇德是河南商城县人，长着一张精干、机敏的娃娃脸，很早以前他就成了有名的战斗英雄。

经过了解和侦察后得知：阳明堡机场共有 24 架敌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日军约 1 个联队的兵力大都住在阳明堡街里，机场只有一小股守卫部队。陈锡联和几个团领导研究后，当即决定马上下手。

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 3 营。3 营能攻善守，犹以夜战见长，曾

获得过“以一胜百”的奖旗。另外，1、2 营各抽一部兵力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崞县、阳明堡的援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随时支援 3 营。

19 日傍晚，陈锡联等人来到 3 营 11 连。陈锡联问：“准备得怎么样啦”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

陈锡联指着一个小战士问：“飞机全身包着铝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

小战士很干脆地回答：“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

3 营长赵崇德说：“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日军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

这时，一个手提轻机枪的粗壮汉子站出来：“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有脸耻笑人！我定要缴架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他是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

有人笑问：“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

老李认真地说：“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

月色朦胧，寂静笼罩了原野，滹沱河的流水声清晰可闻，宛若天籁。夜 10 时，部队分头出发。3 营在那个老乡的引导下，悄悄向阳明堡机场行进。3 营长赵崇德命令 9 连向阳明堡市街方向警戒，10 连和 11 连为突击队，12 连为营预备队。

机场里死一样静，部队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机场。赵

崇德带 10 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对付敌守卫部队，11 连直接扑向停在机场中央的飞机。11 连 2 排的战士们最先接近敌机，有人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要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这时，10 连与敌哨兵遭遇，西北角响起尖利的枪声。攻击从两个方向瞬间展开。11 连迅速扑向敌机，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火光照亮了夜空。日军的守卫部队和附近的巡逻队冲进机场，双方就在机群中间展开白刃战。有几个正在机舱里值勤的日军飞行员慌乱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接连打进前面的机身。混战之间有人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不少人七手八脚往飞机上爬，机枪班长老李爬上一架飞机的尾部后，端起机枪猛扫。赵崇德跑前跑后指挥：“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这时，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了，他正举起铁锹使劲砸——老李实在想敲一块飞机尾巴带回去。赵崇德跑过来大喊：“快打！砸什么！”

突然，一颗流弹飞来，赵崇德猝然倒地。几个战士上前将他扶起，这个年仅 23 岁的年轻营长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去……”

当大批日军赶来时，20 多架飞机已经付之一炬。然而，3 营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百余人，仅运回伤员 30 多人，其余伤员和阵亡者的遗体落入敌手。

在发起这次行动前，第 769 团团长陈锡联并未想到他的团队是在创造一个军事史上不大不小的奇迹。消息传到忻口前线时，国民党军队起初根本不相信，20 日以后，到忻口、太原轰炸的敌机明显减

少，甚至一度息影，他们终于相信了。有些官兵为此在阵地上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

10多天之后，在太原，卫立煌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要不是娘子关方面的情况变化，我们真能够把板垣师团歼灭一个差不多。这件事情没有完成真是可惜。太可惜了！”

卫立煌又说：“没有把 129 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 24 架飞机，是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3、川军开赴山西

师长王铭章号召官兵：“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娘子关战役自开始以来，事实上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军第 20 师团采取逐次增兵的方法，不断往前推进。守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虽暂时在某些阵地阻止了日军的攻势，但那些被严重打残的疲惫之师终究无法长期固守。

10 月 19 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娘子关战役总指挥黄绍竑在如焚的心绪中赶回太原，找阎锡山商量办法。作为战区最高长官的阎锡山几乎把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晋北的忻口，而不能对同一战区之内的娘子关战役有所兼顾，令黄绍竑感到些许的愤怒。而在阎锡山眼里，自己原本就是“客人”，况且几乎未带一兵一卒前来上任，那些七杂

八牌的部队又掌握不住，黄绍竑有气只能闷在肚子里。

见到阎锡山后，黄绍竑顾不上寒暄，便切入正题。

黄绍竑道：“娘子关方面冯钦哉第 27 路军显然是有意躲避作战，曾万钟第 3 军情况也不明了。铁路正面虽不是敌人攻击重点，赵寿山第 17 师也已打得很残破。攻占旧关的敌人，虽有孙连仲部暂时顶住了，但敌人必定会陆续增加。他们攻击的目标，必是孙连仲与曾万钟两部的接合点，向昔阳、平定方面突进，企图占领阳泉，截断正太路，包围娘子关和旧关的我军，威胁太原。”

阎锡山说“季宽兄，你分析得对。我没料到石家庄丢得那样快，更没想到敌人不顾平汉路我军的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娘子关。”

黄绍竑说：“其实平汉线上的中央军自石家庄一退，就退到安阳，仅在漳河南岸防守，完全不起牵制敌军的作用，所以娘子关战役自始即是处于疏忽被动的。”

阎锡山生气地：“如果娘子关过快丢失，太原被敌攻占，第一战区的中央军负有严重责任！”

黄绍竑道：“副委员长所言极是。事已至此，我要求从忻口方面抽调一些部队增加娘子关方面。”

阎锡山陷入沉思。许久，他才说：“川军邓锡侯集团军已奉令调来山西，先头部队从风陵渡过河后，已乘火车北开，预定是增加娘子关方面。”

黄绍竑道：“时间来得及吗”

阎锡山答非所问：“忻口方面担任正面作战的部队，是不好抽调

的。”

黄绍竑告辞后，阎锡山感到很疲倦，坐在太师椅上不想动。自抗战爆发以来，山西一直是华北的焦点，尤其是忻口和娘子关的战事，令他身心交瘁，日渐苍老。日军的铁蹄踏进山西后，他自认为自己尽了全力，他把晋绥军全部投入进去，数万将士的牺牲，数千兵员的溃散，使他感到悲痛，更使他心里发毛——如果部队都打光了，往后依靠什么生存

此时的太原已经风声鹤唳，大街小巷流传开一首老百姓编的歌谣：“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丢部属，小兵扔大枪。”太原不保已在阎锡山预料之中，他把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调回太原，给他做搬家撤离的准备。又电召忻口前线副总指挥傅作义到忻县以南、太原以北的石岭关督修工事，以求忻口守不住后，在石岭关再抵挡一阵。

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传来，阎锡山不用看就听出，来者是照顾他日常起居的堂妹、五姑娘阎慧卿。

这天晚些时候，阎慧卿来到阎锡山的住处，给他讲了几个五台老家的笑话。阎锡山并没有笑，他唉声叹气地说：“日本人从北、东两个方面进攻咱们，忻口、娘子关难以久守，太原很难保住，五妹子，你要做好搬家准备。”

阎慧卿问：“去哪里”

阎锡山说：“先去临汾。”

在太原会战最激烈、紧张的关头，一支装备十分简陋然而士气极

为高涨的队伍正日夜兼程，向山西挺进。这支队伍便是出川抗日的邓锡侯第 22 集团军。

1937 年 8 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 14 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川军领袖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不久，又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 23 集团军总司令，所部沿长江东下，经武汉北行到许昌集结；邓锡侯为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辖第 41、45、47 军，开赴山西抗战。

9 月 5 日，在成都市举行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上，48 岁的邓锡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 20 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如战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欢送大会之后，邓锡侯又召集第 45 军驻成都的出川官兵训话。他说：“125 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国卫民，出川抗战。目前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他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

“愿立即出发杀敌！”将士们齐声答道。

两年后，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时，邓锡侯奉命率部堵截。一天，他

收到了多年之前的故交朱德和刘伯承的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

那时邓锡侯不可能“来”，如今，他可以来了……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德阳县县城广场，孤儿出身的第41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宣称：“我王铭章此次出川抗日，不成功，便成仁。成仁就是壮烈牺牲……我过去不知为谁而战，为谁而死，我率领你们参加过多次内战，都是互相残杀，给地方和老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痛苦……今天我们奉令出川抗日，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为民族生存而战。愿与诸君，共赴时艰……”

从9月8日开始，第22集团军按照第41、45、47军的顺序，由四川原驻防地出发。第41军一部离开成都时，前来欢送的民众挤满了大街小巷，口号、鞭炮和锣鼓声惊天动地，许多人情不自禁，泪水涟涟。多少年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同全国的民众一样，饱受内战的苦痛，他们多么希望有朝一日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善良的中国人一直不能如愿。而今，内乱未停，外祸又起，早已厌倦了战争的中国人民只有一个选择，那便是自己的军队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这一天，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将他新创作的《抗日战士出征》像，竖在成都街头，表达人民对川军出川抗日的真诚敬意。

王铭章的第122师作为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率先开拔。他们身着单衣草履，背负竹席斗笠，徒步出剑门，翻越秦岭和大巴山，以每日行军60里的速度，跋涉在漫漫征程上。然而，他们满腔的爱国热忱无

法掩饰近乎原始的装备带来的隐忧，川军将士的手中，尽是一些川造步枪，甚至还有一些手工制品，打几枪就拉不开栓，手榴弹每人只有2颗；一个团或一个旅仅有三五挺机枪；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也没有。几乎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缺医少药，伤员无法救护。冬季将临，北方已是寒风萧瑟，每个士兵仅有两套粗布单衣，脚上是赤足草鞋。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电请蒋介石予以补充，蒋复电说：“俟到西安照办。”消息传到部队上，大家喜气洋洋，委员长开了口，当然是打了保票啦。

10月中旬，第122师到达宝鸡，然后从宝鸡乘火车抵西安。部队尚未下车，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却派人手持蒋介石的手谕来到车站——“限令川军原车东开，迅速渡河。”与此同时，紧随在前卫部队后面的王铭章接到南京军事委员会急电：“晋北忻口战况甚急，41军先头部队，应不待全军集结及换发装备，即向山西开拔，受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指挥。”

第41军高参章雨初代表邓锡侯面见蒋鼎文，说：“川军武器羸劣，作战配备全无，蒋委员长有电，允在西安补充。现在官兵还是单衣草鞋，如何上雪地打仗”

蒋鼎文说：“蒋委员长刚发来急电，第22集团军划入第二战区序列，当然应由二战区直接补充。”

蒋鼎文推得一干二净。

邓锡侯偕同他的副总司令孙震飞赴西安与蒋鼎文面商，仍无结果。

部队却不能停顿，继续前进。

10月15日，第122师渡过黄河。在渡河后举行的临战誓师大会上，同普通士兵一样身着单衣脚踏草鞋的师长王铭章号召官兵：“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10月19日深夜，第122师先头第364旅到达太原。部队尚未吃上一口热饭，便传来了阎锡山的命令：“娘子关战况甚烈，飭364旅，不待全师集结，即转运晋东，受黄副长官(绍竑)指挥……后续部队，不必再运太原，即由榆次转车，陆续至晋东参加作战。”战令下达，急如星火，而作战必要的配备，却一概不予考虑，甚至连作战地图，也不发一张。

邓锡侯令孙震立即飞往太原面见阎锡山，要求解决武器、棉衣、医药、地图等作战要务。阎锡山两手一摊，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抱歉得很，仗打到现在，战区内已无武器装备补充。”

阎锡山答应代为电呈中央解决。

就这样，远道而来的第22集团军未得到一枪一弹的补充，便紧急开赴娘子关。

风陵渡。年轻的上海《大公报》记者陆诒站在黄河岸边了望。这时，诗人李白的诗句在他的脑海里涌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陆诒是一个月前离开上海的。那天，当报社决定派他到山西战场当战地记者时，大名鼎鼎的范长江对他说：“我始终认为山西是华北的根本，我们决不能放弃山西，山西不守则华北永远不得翻身，而敌

骑蹂躏又决不仅止于黄河。眼前，我们虽然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在淞沪一带作战，但论到战略意义的重大，远不能与山西战场相比。”范长江劝陆诒要从远大处看战局的发展，下决心到山西战场作深入采访。

当时日军的炮火已经封锁了上海北站，铁路交通在白天受敌机的威胁，只能在晚上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先到嘉兴，转乘由嘉兴至苏州的火车再转沪宁路到南京，然后渡江北上，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到达潼关。

河防司令部安排陆诒随川军第 22 集团军的后续部队一起渡河。陆诒注意到，川军军纪良好，秩序井然。在同蒲路车站候车时，他遇到了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3 年前，陆诒曾在成都见过邓锡侯。交谈中，邓锡侯说：“我们四川军队连年打内战，名声不好，人民厌恶我们，痛恨我们。这次奉命出川抗战，徒步行军，翻越秦岭到陕西，沿途群众热烈欢送，对我们刮目相看，家乡父老也对我们寄以厚望。我们决心与战区友军团结战斗，密切配合，争取抗战的胜利。”

4、部队大量伤亡，陈长捷没落一滴眼泪，他已经麻木了

忻口。大约在 10 月 19 日那天早晨，守卫在关子村西南 204 高地附近的官兵发现，日军一阵猛烈的炮弹打来之后，在炮弹爆炸的烟雾中，升起一团团黄色的烟云。顿时，烟雾飘过之处，所有的人都嗅到一种强烈的异味，同时眼泪横流，眼球疼痛难忍，眼睛无法睁开。

“敌人发毒气弹了！”有经验的人大声惊呼。

包括各级指挥官，没有人想到日军会明目张胆地违犯日内瓦公约，使用如此歹毒的一招，预先也就毫无防毒准备，阵地上立即乱作

一团，有的呆在隐蔽部不敢出来，原先在外面的纷纷往隐蔽部里钻挤。有些胆子大、好奇心重的，摸出隐蔽部，想看个究竟，但眼睛睁不开，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因此而失脚滚下山坡，其他的想再摸回隐蔽部，已不可能，他们很快昏死过去。

烟雾一散，日军的敢死队就冲了上来，一阵乱打乱杀后，守军非死即退，204高地随之丢失。

就在这天早晨，一串炮弹落在红沟第9号窑洞旁边的一孔窑洞上，在这个窑洞里担任电话总机的一个班被埋在里面，全数伤亡。正在第9号窑洞指挥作战的陈长捷和一些参谋人员均被震得站立不住，泥灰粉末落了他们一脸一身。炮弹就在窑洞门口剧烈爆响，不能出去，而他们所藏身的第9号窑洞又难保不被炸塌。人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挨到炮战停止，他们钻出窑洞，看到总机窑洞坍塌下来，新鲜的泥土宛若被血染红。里面好像有人呻唤。陈长捷命令他的卫队连：“赶快挖，看能不能救活几个。”

这时，一个军官气喘吁吁赶来，顾不上敬礼、报告，便对陈长捷说：“总指挥，不好了，敌人放毒气了，204高地丢了。”

陈长捷惊得一个愣怔。他自然清楚204高地对于忻口正面防御的重要性。原地转了几个圈后，陈长捷右手指向一个方向，对那个军官说：“你赶快到对面那个山梁上去，向201旅王丕荣旅长传达我的命令，叫他立即组织部队把204高地夺回来！”

一个小时之后，刚刚由后方增援上来的第201旅一个反击，将占

领 204 高地的日军击溃。陈长捷这才吐出一口长气。

像最初争夺南怀化一样，204 高地的争夺战成为忻口战役中期的焦点所在。

20 日凌晨，日军约一个大队的兵力，在烟幕弹和毒气弹的掩护下，向 204 高地再行攻击。此时，吃过一次大亏的守军官兵已经获得了经验——毒气弹飞来时，躲在隐蔽部里不出来，再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由于阵地上缺水，不少士兵只好将尿撒在毛巾上对付。等毒气消散后，日军的步兵已冲至有效的射击距离，双方就此展开近距离的格斗。但仍然有不少人因毒气中毒而失去战斗力，部分阵地落入敌手。陈长捷督促各部陆续增援，不停地反击，力争丢失的阵地能够得到恢复。

连续几天，双方对 204 高地的争夺达到白热化。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个小时几乎要牺牲 1 个团，一天下来，要牺牲 10 个团左右。

后来，大量的回忆文章中，都反复提到 204 高地的争夺战，有的老兵说，一昼夜间阵地易手竟达 13 次之多。日军久攻不下，兽性大发，除了使用毒气弹外，还以火焰放射器配合大口径迫击炮，抛射凝缩汽油弹，我方阵地前后顿成火海，官兵们被溅上凝缩汽油，除了倒地自行滚转外，无法加以救护，伤亡极重。

这天，第 61 军第 72 师第 433 团上校团长曹炳在反攻中亲自率队冲锋，腰部被敌弹洞穿。陈长捷得到报告后，马上离开第 9 号窑洞，前去慰问，刚行至半路，就见曹炳的卫士用担架抬他下山。陈长捷趋前握住曹炳的手，不说话，只是默默凝视着他。曹炳吃力地说：“对

不起军长，未能完成任务，负伤了。我已命令张翼营长负责继续攻击那个高地，相信一定能夺回来……”

在说过这话不久，第 433 团团长曹炳因失血过多去世。南口之战第 416 团团长张树桢牺牲，平型关之战第 434 团团长程继贤牺牲，至此，陈长捷手下的 3 个最得力的团长全部阵亡。作为第 61 军主力的第 72 师原有 8000 多人，现在剩下不到 2000 人。

曹炳牺牲时，陈长捷甚至没有落一滴眼泪，他已经麻木了。

无论是在忻县的卫立煌和在忻口的陈长捷以及前线的各级指挥官都注意到，部队存在的大量减员除不易避免的伤亡原因外，其他非战斗减员，如运送伤员、输送弹药等，同样使第一线的战斗员锐减，每有一个官兵负伤，常常有三四个人护送而下；各部用来输送弹药和给养的人员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一来，第一线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卫立煌和陈长捷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卫立煌不由想起他初进太原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说过的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谆谆教诲。如果把战地的老百姓都发动起来，支援抗战，一切为了前线，那么，他这个战役最高指挥官的日子会好过得多。每每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摇头。

本来，战火未烧至山西境内时，阎锡山就成立了全省总动员委员会，但并没有积极活动，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9 月中下旬日军侵入晋北后，临近战地的县份，支配壮丁，做了些帮助军队挖战壕、抬伤兵，以及运送军用品等工作，别的则很少活动。到 10 月份，战区日

渐扩大，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积极建议下，又成立了以阎锡山的高级参谋、著名民主人士续范亭为主任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共同参加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从它在太原成立起，便不顾一切困难，肩负起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重大责任。却因战局发展太快，尤其是沦陷区及周围各县的官员纷纷逃离，直接影响到发动群众支援抗战的工作，因此，在整个太原会战期间，山西民众并没有真正被发动起来，会战结束之后，在八路军的游击区，全民抗战的威力才逐渐显示出来。

不能说山西人民缺乏抗日热情，实在是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当然，在离战场较远一些的地方，如忻县、太原、临汾、寿阳等地，仍有不少社会各阶层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四处奔走，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新兵上前线，运送和接待伤病军人，担任粮秣转运工作，出工出夫，以及铲除汉奸等。

这天，在南怀化西南一带红土山梁坚守阵地的第 61 军独 2 旅第 1 团 3 营营长赵光勋身中数弹，鲜血染红了他赤裸的上身，营副刘子奇命令四个弟兄用担架抬他下山，转送后方医治。两天后，赵光勋在太原的一处临时被改做医院的教堂里醒来，一睁开眼睛，他就看到他的身边放着一束叫不上名字的红色的小花，一个留着短发、面孔白净的女孩正在给他喂水。见他醒来，女孩高兴地说：“大哥，你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了，我一直对大夫说，你没事的，你没事的……”

女孩的眼角挂着闪亮的泪珠。

后来经过交谈，赵光勋得知女孩姓蔡，是山西大学理学院的学生，一个多月前，山西大学迁往晋南，她和几个同学自发地留了下来，做抗日工作，大批伤兵运至太原后，她们每天都来医院给伤员喂药喂饭，清洗身体。赵光勋还得知，蔡姑娘的父亲是临汾的一个很有钱的木材商，她有一个哥哥，是黄埔军校第十期的学生。蔡姑娘说：“我哥在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第 88 师当兵，和你一样，也是少校营长，听说眼下他们正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仗……你的个头、长相和我哥差不多……”

突然就有泪水从赵光勋的眼窝里涌出。他艰难地说：“不知我还能不能重上战场打鬼子”

“大哥，你会的，你会的。”蔡姑娘轻轻地说，“再上战场，别忘了替我打死一个鬼子……”蔡姑娘说话的语气令赵光勋想起童年的夜晚母亲哼唱歌谣的情景，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

独立第 3 旅第 5 团机炮连连长周亚文和他的弟兄在 204 高地附近度过了难熬的几天，阵地上倒是不缺吃，伙夫每天往上送两次饭，有馍馍，有烙饼，就是缺水，干渴得不行。他们每天都与日军发生战斗，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大伙疲倦已极，只能轮换着趴在战壕里休息一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日军的炮弹就飞过来，有的人在睡梦中便身首异处。旧的尸体无法运出或掩埋，新的尸体又层出不穷，向别处望去，只见枪支和各种姿势的死尸铺满地面，血肉模糊，景象十分阴森、恐怖。

战斗间隙，周亚文就在阵地上转一转，他想最后看一眼那些死去的弟兄，他太熟悉他们了，很多人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像显影胶片一样在他面前闪现……他弯腰抓一把焦土，缓缓撒在一张冰冷的面孔上……再抓一把，再撒……

这副凄惨的景象深深刻在了周亚文的脑海里，令他终生难忘。57年后的一个秋日，85岁的周亚文在太原开化寺街他简陋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当他谈到这个难忘的细节时，禁不住数次老泪纵横，震颤不已。他说：“那么多弟兄，转眼就死了，连个坟墓都没留下。爹娘养那么大，不容易呀……”一说话，他满嘴的假牙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周亚文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后投诚的，他最后的一个职务是第6集团军兵站分监。1968年，已回到原籍劳动的周亚文被山西省山阴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判处1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侮辱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化，攻击我们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1975年，周亚文被特赦。

周亚文走过了一条中国旧军人所走过的比较典型的道路。

这天夜里，周亚文指挥全连尚完好的两挺重机枪与前来偷袭的日军激战了很久。后半夜，突然漫山遍野响起冲锋号声，双方的信号弹、照明弹把山沟照得一片通明。邻近的工事里，友军跳出战壕冲锋。有人问周亚文：“连长，咱们怎么办”周亚文说：“上！”随即，机炮连除留少数人看守重机枪外，其余人拿起轻武器奋起出阵，耳边响起震

撼山谷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拂晓前，他们冲到南怀化附近的山底。由于地形复杂，各部又不能协同，混乱的追击反而又给日军造成反击的机会，各部纷纷溃退。周亚文带自己的弟兄返回阵地后，发现周围的友军都撤走了——重机枪没有步兵掩护是难以继续作战的，不得已，他们跟着往后退。

天亮了，忻口后沟聚集了上千溃兵。几十个执法队员手提冲锋枪或轻机枪跑过来，居高临下俯视着他们。有个军官大声喊：“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没有人敢站出来，因为无命令后退，弄不好要杀头。陈长捷督战之严厉，谁都清楚。自陈出任中央兵团的前敌总指挥后，他把各级指挥官都赶到第一线与阵地共存亡，通往后方的各个路口都有执法队严加盘查，往后方运送伤员或搬运物资，必须持有团以上的通行证，否则就要军法从事。据说已有上百人因此被处决，首级就高挂在道路两旁的杨树上。又据说被处决的人中，竟然有团一级的官佐。有人编排说，第9号窑洞门前的忻口后沟“上去是个鬼门关，下来是个阎王殿”，前方的官兵背后都称陈长捷为“陈屠夫”、“活阎王”，有好几个光杆团长、旅长都在半山腰蹲着，队伍打光了，陈长捷硬是不让下来……

那个军官叠声说：“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

周亚文看到，有几个他认识的团、营长躲躲闪闪畏缩不前。他壮壮胆子说：“我是机炮连长。”有个执法队员随即把他带进不远处的第9号窑洞。

陈长捷正襟危坐。周亚文敬礼后，忐忑不安地站立一旁。

陈长捷道：“先说说你的情况!”

周亚文鼓起勇气：“报告总指挥，我是独3旅第5团机炮连上尉连长周亚文。”

陈长捷冷冰冰地：“你为什么无命令后撤？”

周亚文回答：“我连官兵伤亡三分之二，4挺重机枪打坏了3挺，剩下的1挺又没有步兵掩护，只好撤下来。”

陈长捷让周亚文先把人枪带来，由执法队员进行检验，看是否属实。经检验证实周亚文说的是实情后，陈长捷说：“你这个连带下去，让军部李铭鼎参谋长把你们编为收容队，专收缴负伤官兵的枪支，不准他们把枪带到后方去!”

就这样，周亚文和他的残余官兵离开了火线，离开了死神。

离周亚文他们原先的阵地不远处，22岁的排长王增禹正带领他的弟兄苦熬。王增禹原是王靖国第19军的士兵，一年前考入太原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当学兵。半个多月前的一天上午，学兵队教育长集合全体学兵讲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已由大同南下，第61军军长陈长捷要学兵100名，前往忻口前线参战，谁愿意去谁就报名。”王增禹平时喜欢唱歌，这时他的耳边响起聂耳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于是，他第一个举起手来，当众表态：“日军大敌当前，我愿保卫祖国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奔赴忻口战场!”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

到达忻口后，他们被作为补充力量分配到第61军各部，王增禹被分到第72师新编第11团3营9连3排担任排长，接令后他即进入

阵地，清点人数，发现 3 排此时已伤亡近 20 人，仅余士兵 20 名。

上了战场，其他的什么就顾不上了。当日军冲锋时，就拼命还击；周围的部队向日军逆袭时，就跟着跳出战壕追击。每天不知要进行几次拉锯战。一静下来，得赶紧用洋镐、铁锹修临时简易掩体。原先构筑的较为牢靠的掩体早被日军的炮火掀掉了，这种临时掩体奈何不了日军的炮弹，每次遭到炮击，总有士兵受伤或阵亡。一天，一块炮弹皮将王增禹左耳后的脖颈擦伤，鲜血直流，当即昏倒在地。与他同时参战担任 2 排长的贾成玺下颌被炸掉，贾成玺掏出一面小镜，照了照自己，看到不成人样后，贾成玺举枪自杀。

在各个阵地上，重伤号自尽的情况屡见不鲜。

后来接到撤退命令时，王增禹的 3 排只剩下他和士兵王学义两人。许多年后，他说他一直记着 1937 年农历三月，第 61 军第 434 团程继贤团长写在他笔记本上的四句话：“男儿立志出乡关，生不成名死不还，葬骨何须桑梓地，天涯到处有青山。”他和牺牲于平型关战役中的程继贤是好朋友。

时隔多年之后，杨锡九老人已经记不清他们部队的确切位置。他是第 19 军第 215 旅第 429 团 4 连 7 班下士副班长。他只记得他们连的阵地在界河铺附近一个倒八字形的山口上，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是守住那个宽约 30 多米的山口及其两边的山坡。原先守在这个阵地上的友军一个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本来忻口西北的红土山梁经多日激战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又没有明确的地标，如果不亲临现地，很难说清具体位置。估计也在 204 高地附近。

第 19 军守崞县的战斗杨锡九没有参加，那时他被抽调在太原郊外督修工事，听说部队开往晋北后，他让铁匠打了一把大砍刀，刀的两面分别打了“杀敌杀奸”、“成功成仁”各四个字，然后，他背上那把沉重的大砍刀前往崞县归队，刚走到宏道镇，便遇见从崞县撤出的部队。随后他跟着连长党增瑞开赴忻口。

第 19 军没能守住崞县，但在撤退途中骚扰起民众来却一点都不示弱。在宏道镇，杨锡九看到，散兵们像脱缰的野马，一群一伙四处乱窜，大肆行劫，宏道镇的商人都跑光了，大街两旁的商店大门和护窗板被砸得东倒西歪，店铺里乱得不成样子，红糖、白糖、红枣、大豆等货物撒得遍地都是，酒缸里的酒，士兵们随便去喝，有的灌满了壶，有的端着碗边走边喝，互相传递着喝，烧酒味弥漫在空气中——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素质。虽然杨锡九那年还不到 20 岁，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有爱国爱民之心的青年，沿途所见令他十分痛心。

部队开到忻口后，士气这才为之一振。

大约在进入阵地后的第四天夜里，他们迎来了一场恶战。杨锡九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到四五十个日军端着刺刀向前冲锋，弟兄们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连长党增瑞终于打出了信号弹，4 连的 7 挺轻机枪一齐开火，步枪手们不停地甩手榴弹，随后，全连在冲锋号声中冲下山坡，一个小时后，他们将这股日军消灭。4 连付出了伤亡 60 余人的代价，伤亡人数约占全连的一半。

天亮了，忽然有人发现阵地右前方约百米处的山坡下，有个人影在蠕动，两名士兵从掩体里跳出，飞快地跑过去，把那人抓住了——

原来是一名负了伤的日军上尉。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收获，4 连的阵地上像开了锅一样热闹，人们仿佛忘记了刚才残酷的厮杀。连长党增瑞派人将日军上尉押送到团部，交给团长卢仪欧，并领回 300 块现大洋分给大家。

又过去两三天，杨锡九被派往团部修理电话机。回来的途中，杨锡九看到班里的士兵王宝山背着班长王清友走过来，王清友的双脚刚刚被日军的炮弹炸掉。杨锡九赶忙迎上前。王清友说：“副班长，我不行了，你要替我报仇。抗战胜利了，给我家写封信。”杨锡九对王宝山说：“你好好照顾班长，我去找担架。”但是，等他扛着担架急急往回走时，老远就听见王宝山在放声大哭。王清友已经咽气。想起王清友活泼可爱的模样和以往对自己的关照，杨锡九忍不住失声痛哭。

许久，他们擦干眼泪，向阵地走去。路上又见两个士兵架着一个军官往下走，那人赤着右臂，满脸鲜血，前额骨被掀掉了一块，淡红色的脑膜皮露在外面，十分吓人。而且他边走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国土！”

杨锡九问那两个士兵：“他是谁怎么这么眼熟。”

“你小子瞎了眼吗他是咱们党连长！”

杨锡九接替了王清友担任 7 班班长。一天下午，在与日军肉搏时，他的右腿负伤。但他坚持着抠响手中的冲锋枪，击毙了 3 个鬼子。

作为第 19 军主力的第 429 团经数日战斗，所剩人员仅能编成一个营。团长卢仪欧在率部攻打一个高地时，身中五弹阵亡。

许多年过去了，杨锡九总觉得忻口之战就像发生在昨天……

10月24日，从天津调来的日军萱岛支队到达忻口前线。板垣征四郎命令以该支队为主力，再次向忻口正面发起攻势。守军顽强反击，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冲锋。

近几日来，日军虽然每天都对守军发动几次攻击，但攻击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小，持续的时间也一次不如一次。至此，在原平指挥作战的板垣感到他已无力突破忻口中国守军的防线。

《伦敦时报》东京通讯社称：“日军在晋进行缓慢，大有拿破仑在俄国受困时之状。”

10月25日，汉口《大公报》载文：日军“自认处于绝境，士兵每相顾落泪……支那军队之英勇，实出于日人意料之外。近日受支那军前后夹击，两翼包抄，日人死伤惨重，忻口前线三易指挥官仍难挽回颓势……惧敌夜袭，昼夜不敢熟睡，患传染病者极多，吃尽山地战之苦……敌军抵抗力意外顽强，且攻击巧妙，前方守军顽抗，后方八路袭扰，粮食、汽油俱绝，深为陷溺。数次断粮，且最近饼干、面包、烟草均感缺乏，士兵饿极时，也吃起了晋北红高粱、黑豆充饥，官兵相对哭泣……”

至今，忻州的老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粱——没法子呀！”

一天夜里，一辆小汽车停在忻口后沟第9号窑洞门口，从车里走下第19军军长王靖国。傅作义被阎锡山调离忻口前线后，王靖国住进了傅作义在金山铺的指挥所，他名义上还是中央兵团的总指挥，陈长捷仅是前敌总指挥，但王靖国实际并未插手指挥，只负责在后面调

动部队。

数日前，最后一支增援忻口的部队——第 201 旅路过金山铺时，王靖国边吃喝从太原送来的鲜牛奶泡蛋糕，边对旅长王丕荣说：“这个陈介三太任性了，部队牺牲过大，弄得情况很紧张。你们是咱晋绥军的最后一点力量，我的意思，不要再往坑里填啦！”在陈长捷的坚持下，第 201 旅还是开了上去，并且在日军初次使用毒气弹、204 高地失陷时，第 201 旅一个冲锋夺回了高地。当然，同所有的部队一样，第 201 旅的牺牲是巨大的。

对于王靖国的深夜到来，陈长捷一时不解其意。王靖国郑重而神秘地告诫他：“介三，慎重些，不要冒险！长官(指阎锡山)嘱咐你：要保存实力，不能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把这点家当拼完了，就是日本人不进来，老蒋能容许我们存在吗”

陈长捷顿时无语。

忻县。这些日子，卫立煌明显地消瘦了，黑了，身上长满了虱子。

最初，他曾有过把板垣师团歼灭于云中河谷地的设想，但是，双方交锋之后，他立即发现这一计划显然难以实现。好在前方将士用命，和优势日军硬拼了半个多月，没有垮下来。但是，中央军和晋绥军将士四五万人的巨大牺牲，使他这个久经战阵、打仗最多、最狠的人都感到了无法遏制的创痛。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视察，面前的景象令他想起《桃花扇》里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城郭萧条……”

进入 10 月下旬后，日军的攻势陷于萎顿，空军和炮兵优势已不

复存在，而且八路军在敌后和正面的守军南北夹击，基本形成了一个包围日军的态势。他意识到又一个机会摆在了面前。

大约在 10 月 25 日，陈长捷打来电话说，当面日军已开始就地大批焚尸，向后转移物资，表现出撤退迹象。

卫立煌眼睛一亮。他立即叫来参谋长郭寄峤，商讨战局。郭寄峤是合肥人，同卫立煌是地地道道的同乡。郭寄峤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从他父亲往上数，十一代都是秀才。17 岁那年，他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从此走上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道路。

由于他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娴熟读写，身体又强健、脑子聪明，所以进入军界不久，就被誉为“文武兼备之才”。1929 年，经同乡介绍，郭寄峤投靠卫立煌，他尽心尽力辅佐这个沉着、老练、富于军事才华的“主人”，深得卫立煌的赏识。卫是一个纯粹军人风格的将军，不屑于案牍劳神，有了这个善于代其当家的幕僚长，也就“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双方配合得非常好。后来蒋介石赞扬郭寄峤说：“像这样的参谋长，才是标准的参谋长。”郭寄峤更加声誉鹊起。

10 月 16 日，第 9 军军长郝梦龄在忻口前线牺牲后，卫立煌在鏖战之际力保郭寄峤接任，蒋介石居然痛快地批准了——在蒋介石的部队里，没有当过师长的人一下子坐到军长位置上，这种先例非常少见。当上第 9 军军长后，郭寄峤却很少到前线去，因为卫立煌更需要他，他还兼着卫的参谋长，卫时时刻刻要和他商量事情。

卫立煌说：“寄峤，晋北的敌人已经没有能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敌后却异常活跃，他们巧妙的战法和挽救国家危亡的独到见解令

人钦佩。事实上八路军已经和正面的我军对敌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据陈长捷报告说，敌人近日有撤退的迹象，我军可不可以趁机出击一下？我觉得机会难得。”

郭寄峤说：“卫总，经参谋处计算敌人的尸体和俘虏口供，以及缴获的文件证实，敌人已被杀伤 2 万余众，确已无力后继，我军出击一下正是时候。问题是经半月苦战，我军大量减员，出击的规模和效果恐怕难以令人满意。”

卫立煌说：“是的，我军装备差，久战疲劳，伤亡减员数目甚大，攻坚力量有限，手头已无预备队可调，委员长和阎长官来电说，增援部队即到晋。我知道，这不过是空口鼓励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忻口这么多敌人一口吃掉也还不好办。但是，拖垮敌人，多杀伤一些，让他吃个大亏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郭寄峤道：“我同意卫总的看法。我马上和参谋处的人一起，拟定一个全面出击的计划。”

然而，未等这个出击计划付诸实施，娘子关失陷了，东路日军疯狂地向太原追击，忻口守军的后路受到严重威胁。卫立煌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忍痛撤退。这将使他抱憾不已。

5、娘子关失陷，太原危矣

对于急于灭亡中国的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来说，他们精心策划的“十月攻势”进展并不顺利。

华中方面，在淞沪一隅之地，除原驻上海的部队外，已经投入了

5 个师团，依然进展缓慢，大本营决定继续从国内和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在华北，日军在平汉、津浦线方面的作战虽比较顺利，但在晋北的忻口地区则陷入了苦战，因此，大本营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完成津浦、平汉线的预期作战任务后，迅速夺取太原，以便调整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

10 月 21 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命令第 1 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第 20 师团全部及第 109 师团一部，继于 27 日又命令第 109 师团主力加入正太线方面战斗，以解第 5 师团之危，并与第 5 师团会攻太原。

当日晚间，日军第 20 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进至娘子关外的井陘指挥作战。

娘子关之战进入最后阶段。

马山村是晋、冀两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接近娘子关前线。18 日晚 8 时，八路军第 129 师第 386 旅旅长陈赓率全旅到达这里。次日下午，刘伯承师长来到马山村，他准备亲率第 386 旅侧击进犯娘子关的日军，支援正面的友军作战。

在当天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上，刘伯承通俗而又风趣地讲道：“日本鬼子人多装备好，很愿意跟我们硬拼。可我们偏不这样干，而是打他的侧背。大家一定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对付大人的欺侮，小孩子只有找机会躲在门背后，等他过来，就乘其不备地给他迎头一棍。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一打法。”

21 日，刘伯承赶到娘子关以南的柏井，与国民党第 3 军军长曾

万钟联络。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看来他是研究好了娘子关倚壁临渊、易守难攻的特点的，想来个避实击虚。现在既然发现新关也不易得手，它很可能还会往南迂回。新关以南的石门，位于防御主阵地的右翼警戒线上，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没有接受刘伯承的建议。而事实却并未出乎刘伯承的预料，攻击新关失利后的日军以 5 个大队的兵力迂回至石门，24 日晚上，集结在附近的第 386 旅第 771 团突遭日军包围袭击，疏于戒备的第 771 团仓促应战，伤亡 30 余人。幸得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撤离，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此，刘伯承感到痛心，他对参谋长李达说：“部队遭敌突袭，这是一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你再把情况核实一下，我要给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

作为川军先头的第 122 师第 364 旅于 10 月 24 日凌晨到达阳泉车站。又渴又饿、疲惫至极的川军弟兄透过微弱的亮光，看到车站上乱糟糟的。不光车站上如此，沿途他们看到，在整个正太路两侧，逃难的人流和溃散的士兵拥塞着视野，遗弃的物资遍地都是，这时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越来越浓烈的战争气氛。

黄绍竑派高参陶钧手持他的命令在阳泉车站等候第 364 旅。有人把一个个头矮小、满脸胡须的中年将领带到陶钧面前。中年将领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说“我是 122 师 364 旅旅长王志远。”

陶钧说：“王旅长，弟兄们辛苦了！黄副长官让兄弟代为慰问并转达命令。”

王志远从陶钧手中接过黄绍竑的手令，见那张纸片上写着：“不必待师部到达，立即依照战区参谋指示，徒步向正太铁路南侧，平定东方之东回镇、西回村与友军联络。”

“娘子关已很危急。川军是有战斗力的，是一支生力军，黄副长官希望王旅长率部暂时将敌人顶住。”陶钧说。

“我部在西安、太原未得任何补充，我手头连一张地图都没有。”王志远满脸忧虑神色。

“不光你们，许多后续开上来的部队都没有得到补充，没有地图。”

“我们往哪个方向开进”

陶钧手指东南方向比划了一阵，然后离开。

经短暂休息后，王志远命令全旅依照陶钧指示的方向，以急行军姿态向前开进。蒋介石和阎锡山一毛不拔，让川军弟兄憋了一肚子气，但他们的士气仍很高昂。各级官长在队列里鼓励部下：“老蒋和老阎不把川军当人待，咱不靠他们，咱们去找日本人要，日本人那里大炮、机枪、三八大盖多得是，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夺过来了……”

当日傍晚，第 364 旅赶到东回村宿营。

就在王志远率第 364 旅离开阳泉不久，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乘坐的小火车驶抵阳泉车站。听说娘子关战役总指挥黄绍竑驻在阳泉煤矿局，王铭章立即前往请求任务。

见了面，黄绍竑说：“王师长，你率所部及时赶到，我十分高兴。当前战局极为紧张，正需要你们加入前线作战。目前娘子关左翼尚平

静，右翼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第3军防线一度动摇。一部敌人从侧鱼镇方面经七亘村突了进来，这股敌人显然是企图经马山村、东回、石门口向平定进攻，迂回阳泉。现在八路军129师386旅陈赓部正在马山村以东地区与敌作战。你这个师必须迅速开到马山村一带阻击敌人，不让他们经石门口向平定发展。”

王铭章道：“请长官放心，我们川军就是为了抗日才出川的。但是，我们连续行军，十分疲惫，加之装备未经任何补充，就这样拉上去，我有些担心……”

黄绍竑说：“这些情况我都清楚，眼下军情紧急，你们只好先开上去顶住敌人。至于枪支弹药、服装粮食等问题，我负责催战区尽快给你们补充。”

王铭章明白，黄绍竑不过是又给他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而已。军情确实紧急，此时他已不再考虑别的，他想得最多的是，第122师作为川军的前卫部队，怎样打好第一仗。

辞别黄绍竑时，王铭章认真看了几眼挂在墙上的那幅作战地图——作为即将率部参战的一师之长，他的手中同样连一份地图都没有。

25日拂晓，第364旅旅长王志远率全旅继续向马山村开进。先头第727团于上午8时进抵马山村西面时，突然遭到道路南侧高地上密集火力的袭击。这意外的、猛烈的打击使第727团顿时陷入混乱。团长命令部队立即展开，并指挥一部兵力与日军抢占制高点。

伏击他们的日军正是昨天晚上袭击八路军第386旅第771团的日军第79联队一部。初一交手，第727团仅有的2挺捷克式轻机枪就

被打哑 1 挺。士兵手中的川造步枪打不了几发子弹便卡了壳，一个团的火力不如日军的一个中队。第 727 团其实是在用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优势兵器。士兵们扔掉手中的破烂步枪，挥舞着锈迹斑斑的大砍刀，以密集的队形呐喊着冲锋，早已占领制高点的日军集中轻重机枪疯狂射击，暴风骤雨般的子弹劈头盖脸打来，士兵们大片大片倒在山坡上、道路上……

3 营 9 连的上士班长熊克义和士兵小于也在冲锋的队列中。他们两个都是自贡人，熊克义兵龄比小于要长几年。在开来前线的火车上，小于向熊克义透露，他本打算开小差的，听说部队要出川打鬼子，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晃着拳头对熊克义说：“班长，只要能打死一个鬼子，阵亡了也不冤枉。”小于又说：“我就不信，中国这么大，打不过小小的东洋鬼。”熊克义笑了笑：“要不，到战场上咱俩比一比！”

头一拨冲锋的 8 连被日本人打得退了下来，3 营长一挥手，轮到 9 连上了，熊克义和小于冲在前面。突然，一颗子弹打中熊克义的右肩，他尖叫一声倒地。同时他听到近前响起一阵阵子弹穿越肉体的噗噗声，宛若裂帛，血星子四溅。他看到小于胸前中了数弹，鲜血将他破烂的粗布衣服染得透亮。熊克义用尽力气抱住小于朝山下滚去。这时，10 连的弟兄又接替 9 连冲锋。小于躺在熊克义的怀里，用微弱的声音说：“班长，我还没得看清鬼子的模样，还没得放一枪，我心不甘啊……”

半个多世纪后，白发苍苍的熊克义老人对来访者说，他一直忘不掉这一幕，忘不掉小于年纪轻轻而又老气横秋的模样。他又说，这和

拿活人白送礼差不多呀……

半个时辰过去了，旅长王志远率第 728 团赶到。一看这阵势，王志远当即决定撤出。第 727 团残部和第 728 团一起后撤至东回村以东占领阵地。但是，日军紧追不放，第 727 团仍然首当其冲。在日军猛烈的火力轰击下，他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终于，数百个鬼子嗷嗷叫着冲杀过来，士兵们抡起手中的大砍刀同日军搏斗。肉搏被认为是川军的拿手好戏，但这种短兵器同日军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相比，仍是吃亏不小，川军弟兄差不多是拿十条命换日军一条命……

战至中午，原有 2000 余人的第 727 团已所剩无几，残部溃退下来。当面的日军也死伤不少，暂时停止了攻击。

当日下午，经过整理后的日军又对第 728 团发动猛烈攻击，情况与上午相同。一阵残酷的厮杀之后，王志远被迫率两个团的残部后撤。仅仅一天时间，作为第 122 师主力的第 364 旅便失去了战斗力。

这天夜间，在阳泉的黄绍竑好不容易才接通了与八路军第 129 师的联系。黄绍竑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对刘伯承说：“今日川军在马山村以西受到敌人攻击，损失极大。敌人正向第 3 军军部固驿铺迂回，我已命令川军王铭章师长率 366 旅向柏井驿开进，协同第 3 军夹击这股敌人。请伯承兄率部予以配合。”

刘伯承说：“我判断明日可能有敌人后续部队由侧鱼镇经七亘村通过，继续向石门口进攻。所以，我已命令 386 旅明日在七亘村设伏，消灭敌人的后续部队！”

黄绍竑说：“好！请伯承兄协助我挽回娘子关右翼的危局。”

刘伯承说：“请黄副长官放心，我将尽力指挥所部配合友军作战！”

10月26日上午9时许，果然有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进入七亘村伏击区。七亘村是井(陘)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5公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和陈赓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中了这个理想的伏击阵地。第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3营天亮之前便已埋伏在峡谷两边的高地上待机歼敌。

战斗瞬间打响，一阵短促的火力袭击后，3营的官兵们随着喊杀声冲入沟底与乱成一团的日军展开肉搏。好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仅经两小时激战，即以10余人的伤亡换取了击毙日军300余众的重大胜利，并缴获骡马300多匹。

两天之后，在同一个地方，还是由第772团3营在此设伏，取得了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40多匹的胜利。而且这次战斗，牵制了日军，并把困在旧关的第3军曾万钟部1000多人，从日军的包围圈中解救了出来。

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一份山西省地图和华北地区军用地图。这两张地图是刘伯承渴望已久而未能获得的“宝贝”。高兴之余，刘伯承愤慨地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那里说没有地图了，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然而，第129师的两个团毕竟无法挡住数万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的胜利只能暂时起到牵制、迟滞日军的作用。就在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进行的那天，日军攻占了柏井驿，直接威胁到娘子关与旧关守军

的侧背，这些部队惧怕后路被切断，争相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

早在娘子关战役之初，中共就曾有过极好的建议，但并未被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和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至娘子关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在战役展开之后，正像蒋纬国先生后来主编的《抗日御侮》中所指出的：“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失败是必然的。作为战略要地的娘子关过早丢失，与战术思想有误有关，更与战略指导思想重视不够有关。娘子关的沦陷所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山西战局从此急转直下。

娘子关之战进入尾声。整个太原会战也开始进入尾声。

10月25日那天，当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得知第364旅已经溃不成军的消息时，他怎么也难以相信。但仅仅过了一天他就相信了——26日，王铭章亲率第366旅在柏井驿与日军鏖战一天，弟兄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然而，第366旅依然遭到了同第364旅一样的命运。王铭章忍痛率残部撤出，连夜经上盘石沿铁路线西退。

阳泉。急于求成的黄绍竑在将第122师推上前线后，稍后到达的第124师两个旅，无不是到一团上一团，到一营上一营。就这样，黄绍竑将第22集团军作先头的第41军，支解成若干无头小股，令其盲目进入战地，遭受日军疯狂的摧残。待第22集团军总部到达时，第41军已被消耗大半。尤其是那些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轻伤者多半鲜血淋漓地自个儿往后方走，重伤者多遗弃于阵地，任敌杀戮。仓促上

阵的川军就像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各师、旅、团都未来得及配属战时最起码的卫生部队，有的团连一副担架都没有。

10 月底，平定县城陷落时，第 124 师第 372 旅数百名重伤官兵未及撤走，当伤兵们见被遗弃时，声泪俱下：“兄弟们，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哟，带了伤就没人管了吗”

“天呀!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怀有满腔杀敌报国之志的川军弟兄在山西留下了极度的悲怆。许多年过去了，那些活下来的人仍然无法忘却这个黑色的十月。娘子关一丢，黄绍竑几乎与所有的部队都失去了联络。

27 日，黄绍竑率他的指挥部人员离开阳泉，撤退到寿阳城南的半月村。此时，他这个战役最高指挥部已形同虚设。

28 日晚上，一封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送到黄绍竑手中：

限 1 小时到。太原阎司令长官，寿阳黄副司令长官。0 密。娘子关失守影响全晋，我为保障晋北最后胜利及待川军增援起见，在娘子关方面作战各军应在寿阳以东地区利用山地坚强抵抗。如无命令，即将全部牺牲亦不许退至寿阳以西，如有不听命令者，决以军法从事。望即转令遵照为要。中正。俭午。

黄绍竑感到问题严重。次日一大早，他来到寿阳城北的坡头村，与第 26 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商讨战局。

黄绍竑说：“仿鲁兄，前方情况如何”

孙连仲道：“很明显，各部都已失去指挥，损失惨重。我的 3 个师中，只有冯安邦的 27 师尚好一些，池峰城的 31 师和张金照的 30

师都没有战斗力了。”

黄绍竑说：“正太路上如不在阳泉作有效的抵抗，敌人一下子就能冲到太原，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仿鲁兄，无论如何要令 27 师在阳泉抵抗一阵，不得后撤。”

恰在这时，第 27 师师长冯安邦打来电话向孙连仲报告：“敌人已接近阳泉，阳泉地形不好，最好撤到阳泉以西地区收容整顿后再作抵抗。”

孙连仲大声地：“不管地形好与不好，我命令你就地收容抵抗。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

然而，一切努力均告失败。

川军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沿正太铁路西撤。王铭章走在队列的最后面，他不时回头望望东方，那个如恶梦一般的战场。

娘子关之战的激烈程度无法和同期进行的忻口之战相比，但却先行失败了，并牵动了忻口的撤退以及太原的迅速失守。很多人不甘心。但是，这时候没人会想到，从娘子关溃退下来的残破之师中，有两支部队在半年之后的台儿庄战役中却响彻云霄——他们便是王铭章的第 122 师和孙连仲的第 26 路军。

1938 年 3 月 14 日，保卫徐州外围的滕县之战正式打响，王铭章率 3000 余众抵御上万日军的冲击。激战到 17 日，全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最后关头，王铭章给他的老上级、第 41 军军长孙震发出最后一封电报，表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他对身边的滕县县长周同说：

“周县长，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这儿的事，有我。”早已受到感染的周同说：“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我是明白的。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也真惭愧得很！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决不苟生，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在说过这话 3 个小时之后，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评价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

日军疯狂追击，正太路上的国民党军已溃不成军。

此刻，刘伯承仍在从容不迫地指挥第 386 旅侧击日军。

11 月 1 日，在昔阳以东黄崖底附近一座山顶的后侧，刘伯承站在冷风中，拿起单筒望远镜。他看到，一座小庙和十几孔窑洞紧挨道路，小路和小河在这里交汇，河床半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路和河的两边是长长的斜坡，现出一个大漏斗的形状——这里又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点。

两天前，刘伯承已决定在黄崖底设伏。参谋长李达心领神会：“师长，你说让哪个团担任主攻。”

“让第 771 团打吧，”刘伯承说，“自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呢，指战员们早憋不住了。”

11 月 2 日，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 20 师团第 136 联队的一个大队，被打得抱头鼠窜，第 386 旅仅以伤亡 30 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 300 多人。一个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曾用“过天险黄崖底”这样的标题描述这次战斗。

两天之后，从晋北地区南下正太路的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在昔阳以西的广阳伏击日军第 109 师团的辎重部队，经 4 小时激战，歼敌近千人。

又过了 3 天，刘伯承和刚刚赶来的徐向前率第 129 师到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歼敌 250 余名。

11 月 4 日那天，被蒋介石紧急调来增援山西作战的汤恩伯部到了榆社便不敢前进。汤恩伯给刘伯承打电话：“刘师长，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刘伯承说：“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很安全。”

汤恩伯说：“我的右侧背有没有情况呢”

刘伯承说：“你尽管放心，右侧背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都有我们的部队。”

汤恩伯说：“刘师长，目前战局混乱，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能否请你到榆社来一叙。”

十几天之后，一见刘伯承的面，汤恩伯就欣喜地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啊！日本人吃不消，日军的攻势被挡住了。”

过了几天，第 129 师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去浮山、沁源一带扩兵时，刘伯承和政委张浩委托他去拜访已退至长治的汤恩伯。汤恩伯向宋任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的部队，用什么法子，也能跟你们一样，打不烂、拖不垮，打散了还可以回来呢”。

宋任穷这样回答汤恩伯：“这好办，照我们八路军的样子，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包你打不散！”

第七章 强弩之末

1、大事不妙，阎锡山要把挑子全撂给傅作义和卫立煌

娘子关的失陷，实际上成为山西战局的转折点。

连日来，太原出现了外逃风潮，日本人即将兵临城下的传说沸沸扬扬，惊恐不安的富人和部分穷人纷纷携带资财和家眷出城，市区内和郊外通往西、南的道路上混乱不堪，太原宛若一座中世纪的危城，在发出最后的哀鸣。

10月30日早晨，上海《大公报》记者陆诒到达太原。在此之前，报社已派出孟秋江和邱映溪两名记者到山西战地采访，孟秋江随卫立煌在忻口战场，邱映溪则随八路军第115师在五台山活动。听说孟秋江已从忻口回到太原，陆诒下车后即到首义门内的青年会宿舍去找孟秋江。

一见面，孟秋江就说：“老兄来的不是时候，如今大家都在打铺盖准备走路，而您还千里迢迢赶来太原。”

陆诒说：“既来之则安之，能和您一起再共患难也不错。”

话毕，二人相视苦笑。孟秋江又说：“如今太原的商店都关门了，连找个吃饭的馆子都没有，这几天我的一日两餐是找八路军办事处解决的，你来了，也只好如此。”

这天中午，孟秋江带陆诒来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彭雪枫招待

他们刚用罢饭——吃的是小米稀饭和从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用饼干——周恩来便从隔壁房间走过来和他们握手。周恩来说：“抗战爆发以后，你们在报上所发表的战地通讯，我们都看到了。你们深入前线，为抗战的宣传报道作出了贡献，这非常好。欢迎你们到八路军来采访。”

周恩来指出：目前太原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晋东从娘子关沿正太路进攻的这支日军。临别时，周恩来特别关照彭雪枫，要为陆诒准备好给第 129 师首长的介绍信。那天周恩来身穿黑色呢子中山装，目光炯炯，谈话时全神贯注，亲切感人。他对战地记者的关怀备至和热忱指导，给年轻的陆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娘子关一丢，忻口已失去防守价值。阎锡山于万般无奈之际作出撤退忻口守军，执行“依城野战”计划，守卫太原的决定。

11 月 1 日上午，在绥靖公署办公厅会客室内，阎锡山召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战区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楚溪春、他的高级秘书梁化之等少数亲信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讨朱绶光起草的守卫太原依城野战作战计划，并议定了太原军政机关撤退方案及物资转运、城内市民疏散等重大事项。

作战计划的第一条这样写道：

本会战在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

在这份作战计划中，朱绶光并没有提出哪些部队野战，哪些部队守城，以及由谁来指挥野战和守城，等如一纸空文。

阎锡山有些不满意：“绥光，你先提个方案。”

朱绥光赶紧说：“我提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以忻口撤下来的第 14 集团军为主，配以王靖国第 19 军和陈长捷第 61 军，在卫立煌指挥下布置太原城防；以晋东正太线撤下来的部队，在太原附近准备依城野战，仍由黄绍竑指挥；以傅作义的第 35 军和晋北撤回的其余部队，在忻县、石岭关、黄寨等线抗击南下敌人，掩护卫立煌由忻口南撤，完成掩护任务后，作为预备军到太原城西集结。第二，由傅作义指挥所属第 35 军，再配属晋绥军一部守太原城，以晋北、晋东撤下来的部队，归卫立煌指挥，分别在太原城北、城东依城野战。”

朱绥光讲完后，无人发言。片刻过后，阎锡山的高级秘书梁化之壮壮胆子说：“我不懂军事，但我觉得，第一方案好，其好处是能够保留傅总司令指挥下的预备队，可作机动。”

参谋处长楚溪春发言：“第一方案固然全面，但正太线敌人进攻速度很快，我军没有充足时间在北线节节抗击敌人进攻，掩护卫军南撤。特别是卫军进入太原占领新阵地，一切生疏，地形不熟悉，更怕这时东面的敌人不待我守城部队入城，便已兵临城下，整个计划自然全被破坏。我觉得还是第二方案可取。”

争来争去，形不成一致意见。赵戴文说：“百川，还是由你来定。”

阎锡山说：“我看第二个方案更好一些。是由中央军守城，还是由咱们晋绥军守城，我想来想去，还是由咱们的部队守为好。因为丢了太原，中央军不心疼，咱可心疼。咱的部队谁守为好当然是有守城经验又有威望的傅宜生了。守太原嘛……谁也不愿干，让傅宜生干，

卫立煌、黄绍竑也就无话可说了。另外，我决定让卫立煌担任战区前敌总指挥，除八路军和杨爱源第6集团军以外的部队，不管中央军、晋绥军、陕军、川军，等等，都归他指挥，依城野战。这么办蒋介石高兴，我阎百川把军权都交给中央了嘛！”

按照阎锡山的这个设想，等于他把挑子全撂给了傅作义和卫立煌。

朱绶光问：“今日讨论的作战计划，可否通报卫、傅两总司令？”

阎锡山道：“暂且不必，因为作战计划尚需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决定。今日咱们内定的事，都不能泄露出去。”

城内。傅作义公馆。当傅作义接到11月2日下午2时参加战区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的通知时，他的心立即被牵动了一下——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傅作义根据目前的战局，已经意识到阎锡山一定會在近日召开军事会议，并会分配给他艰巨的任务。

太原岌岌可危，阎锡山决不会轻易放弃他经营了多年的老巢，最后关头，他会寻找一支部队固守太原，而且这支部队不会是他的亲信部队，又必须具有守城经验，守住了当然是好，守不住，打光了，也不足惜。那会是谁呢？看来十有八九是傅作义和他的第35军！数日前，阎锡山将傅作义调离大战犹酣的忻口前线，而令他督修忻县以南及太原的城防工事，又急调第35军第218旅开赴太原北郊兵工厂一带待命，这两个举动已经显露出阎锡山的意图。

也许这一切都缘于傅作义是尽人皆知的守城名将。

1927年6月，阎锡山依附蒋介石，9月，阎部兵分三路出京汉、

京绥线攻打奉军张作霖。阎锡山手下年仅 32 岁的第 4 师中将师长傅作义率部作为别动队，担负横断京汉、京绥线间奉军后方联络的任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位于北京正南百里之遥号称“畿南第一州”的涿州，是奉军的后方重地。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傅作义部像天兵天将，出敌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占了涿州。该地为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带的要冲，紧扼北京的咽喉，战略地位异常重要。

坐镇北京的“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对涿州失陷非常惊恐，即令他的儿子张学良集中 3 万奉军精锐前去攻城。从 10 月 15 日开始，傅作义以不足万人之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击败奉军 7 次大规模的攻击。第 1 次攻击，奉军动用了百余门大炮，飞机在空中助战，傅作义沉着指挥，一天之内连续挫败奉军的 5 次猛烈冲锋。后来奉军想尽一切招数，包括坑道战、使用燃烧弹和毒瓦斯，反复冲击，涿州城仍然屹立不动，张作霖毫无办法，只得派高级参谋、原保定军校战术教官、傅作义的老师于国翰进城送劝降书。傅作义风趣地说：“老师教授学生的战术中，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因此，学生不敢从命。”

傅作义怀着必胜的信心，决心固守待援。他给阎锡山打电报，要求增援，阎却回电只说：“尽军人最后之天职。”至 12 月上旬，城内粮食断绝，军民只好吃酒糟、树皮。12 月 14 日，城中妇孺百余人，环绕傅作义的师司令部伏地泣告，请求罢战。傅作义处于奉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百姓泣号，濒临绝境，他已不忍心再固守下去，决定亲自出城与奉军谈判。

1928 年 1 月 5 日黎明，傅作义仅带两个随从出城，在奉军师长

万福麟的陪同下，赴保定和张学良议和。虽是战场上的死对头，但26岁的张学良钦佩傅作义骄人的战绩。一见面，张学良首先向傅作义表示了慰问。傅作义说：“作义此来，有个要求向总指挥提出，涿州城中的人，已经有两天没有一点吃的了。”不待傅作义说完，张学良当即让万福麟传令前方，马上拨给涿州城内军民3天的食物。傅作义表示感谢。张学良说：“两家本是一家，同为国事，此事不必介怀。你远来辛苦，先到宾馆休息吧！”7天之后，傅部7000人出城接受改编，历时3个多月的涿州攻防战就此结束。

傅作义“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年的晋奉战争，涿州不是前线，更不是主要战场，但晋奉两军攻城与守城的战事，却比双方主力部队的作战还要激烈、残酷，当时竟至震惊了海外，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

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太原不是涿州，面对的敌人不是奉军，而是装备精良、更加凶悍的日军……防守太原，谈何容易！

这天夜里，傅作义陷入了苦闷与迷惘之中……

阎锡山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几个月来，他的晋绥军付出了重大牺牲，而今日本人即将兵临太原城下，繁华的太原不仅要遭受战火的蹂躏，而且极有可能落入日军之手，他感到痛心。丢掉太原，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夜色笼罩了绥署大院，一片凄凉之状。11月1日夜，侍卫以及各色人等在绥署东花园进进出出，他们在忙着搬运东西。第二天一早，阎锡山的继母陈秀卿、大太太徐竹青、二太太徐兰森，以及儿子、儿

媳们和孙子，还有五姑娘阎慧卿等人将撤离太原，他们从此将过上漂泊无定的生活。

阎锡山在侍卫长张逢吉的陪同下，到继母、两位夫人和孩子们的房间转了转，安慰一番。然后，他来到阎慧卿夫妇家，同他们话别。从很早的时候起，阎锡山就非常喜欢这个堂妹，她殷勤周到，善解人意，对自己又极为忠实可靠，从不惹事生非——但这时阎锡山并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阎慧卿在他的生活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阎锡山统治区的一个特殊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曾遭到种种非议，后世的某些文艺作品甚至把阎慧卿描绘成与阎锡山同床共枕的荡妇。其实，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兄妹情谊，阎慧卿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依附于阎锡山，阎锡山则在衣食起居上依赖阎慧卿照料。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绥署钟楼下的避弹室里，阎慧卿被迫同杀人恶魔梁化之一起自尽。她同旧政权一同死亡，那年她只有40岁。

这天夜里，阎慧卿忧心忡忡地对阎锡山说：“大哥，我们走后，你要爱惜自个儿的身体。”

夜半时分，阎锡山回到自己寓所。他怅然若失，心郁难平，气血涌动。沉思一阵，他提笔赋诗一首：

忻口布防得从容，
全凭原平抗敌功，
假使娘关不失败，
岂能念三任敌攻？

写毕，阎锡山长叹一声，猛地掷笔于桌上，久久无语。

2、混乱的大撤退

太原绥署东花园中和斋作战室。11月2日下午2时，阎锡山如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因卫立煌在忻口指挥部队撤退，黄绍竑在寿阳指挥各路残兵应付日军的追击，阎锡山没让朱绶光通知他们参加。中共代表周恩来被特邀莅会。

傅作义带领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参谋长陈炳谦一走进大厅，立刻就感受到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他的目光掠过与会者——王靖国、杨爱源、孙楚、楚溪春……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像是怀了满腹心事，一个个愁眉苦脸，有的人头上罩着一团团的烟雾。蓦然，傅作义看到一张英俊、飘逸的面孔。是周恩来。周恩来站起来与傅作义握手寒暄，并将座位让给傅，而自己则坐在傅作义身边。傅作义感激地冲周恩来点点头。

阎锡山在赵戴文、朱绶光等人的陪同下步入大厅。坐定后，阎客气地朝周恩来颌首致意。接着他宣布开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在前一天已经安排好，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照例由阎锡山先讲，他在开场白中着重强调大敌当前保卫太原的意义。接着，参谋长朱绶光宣读了依城野战和守卫太原的计划，由于阎锡山事前的交代，朱绶光并未将军队部署和盘端出，而是提请大家讨论。又由于内定的依城野战指挥官卫立煌不在场，阎锡山和赵戴文等人主要提请大家讨论一下防守太原的部署。

会场上出现了难堪的沉默。晋绥军将领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谁都清楚，在这种时候守城，无疑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而且杨爱源、孙楚、王靖国等将领此刻还不知道阎锡山的底牌，所以他们难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阎锡山又不想直接挑明，他要让傅作义自己提出来，这样才合乎情理。于是，他反复强调保卫太原的意义，一遍又一遍地征询大家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声明，防守太原最好由晋绥军承担。

回答都是支支吾吾、模棱两可。作为与会的两位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和杨爱源引人注目。杨爱源神情紧张，不停地望向阎锡山，他在察言观色，同时又像是用目光恳求阎锡山，千万别把这副重担压到他和他的第6集团军头上。傅作义倒是显得有些超脱，虽然这时候傅作义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阎锡山的心思，但他不想轻易承担下来，他认为，守卫太原之责，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应由常驻太原的晋军将领们担负，因为他们地形熟悉，工事都是他们修造的，占有地利、人和诸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也是尽量保持沉默。

每一分钟都显得漫长，阎锡山到底沉不住气了，他鹰隼般的目光频频扫向傅作义。这下，不停地察言观色的晋军将领心里有了底，他们也将目光对准傅作义。杨爱源、孙楚、王靖国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担任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者，必须具有很高的威望和高超的指挥才能，还应有守城的丰富经验。又说，咱们这里就有守城名将嘛……潜台词已经很明显：请傅作义自告奋勇吧。

终于走上正题，阎锡山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接下来，晋军将领便

大肆吹捧傅作义，历述他的光荣战绩。结语是：守太原的重任，非傅作义莫属。

就这样，他们把驻防绥远多年的傅作义推到了第一线。傅作义面对如此场面，心情十分激愤，他毅然拍案而起：“弃土莫若守土光荣，太原城由我傅作义守！”

阎锡山表现出很受感动的样子，他离开座位，走到傅作义面前，拍着傅作义的肩膀，连声说：“宜生！一定要守住咱的太原！一定要守住咱的太原！”

周恩来自始至终目睹了这一场面，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基本上没说什么。傅作义挺身而出守太原，使他再一次领略了傅的胆识和胸怀。临散会时，他紧紧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关切地说：“宜生将军！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主要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停了停，他又加重语气说，“抗日战争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请你多加保重！”

傅作义默默地将周恩来的话记在了心里。回到设于太原西北角平民中学的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后，他把周恩来的话向他的机要秘书王克俊复述了一遍，然后说：“这才是语重心长、恩重如山的赠言，对咱来说受益无穷。请你把周代表的讲话记录下来！”

忻县。10月31日那天，卫立煌接到阎锡山令忻口守军向太原附近撤退的命令。早在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时，卫立煌在震惊之余，即已意识到忻口撤退只是时间问题。没能将已陷入困境的板垣师团歼灭，遂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卫立煌让参谋长郭寄嶠拟定全线部队撤退计划。

前线的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一天晚上，遍地撒着清冷的月光，卫立煌身披黄呢大衣，踱到房东杨老先生一家居住的偏房。他们一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南逃。杨老先生摸着山羊胡子，小心翼翼地说：“卫老总，我听到守机器的人一个劲地喊，要撤，要撤，真的要撤吗？”

卫立煌脸红了，说：“本来这里可以不撤，但是，东面的娘子关叫鬼子占了，鬼子沿正太铁路快到太原了，抄了这儿的后路，不撤不行……”

杨老先生说：“你们这一撤，俺们就更要撤了，鬼子来了，能有咱的好果子吃”

卫立煌说：“撤退只是暂时的，我们还要打回来。你想，咱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鬼子制服不了咱们……”

杨老先生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辞别杨老先生一家，卫立煌站在院子里向北方瞭望。气势雄伟的北门城楼黑黢黢的，此刻无法看清那上面写有“晋北锁钥”的巨匾。卫立煌于寂静之中回忆了一下坚持达 20 多天的这场残酷的战争，觉得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广大官兵的爱国和牺牲精神在过去的内战中从来不曾见过，他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感到欣慰。而战斗中不该有的失误——譬如指挥系统的紊乱、各部队分割使用、逐次增兵、只知死守阵地的呆板战法等等，都减低了战斗力的发挥，尤其是 10 月 16 日反击南怀化的失败和郝梦龄军长、刘家琪师长以及数千将士的壮烈、乃至无谓的牺牲，使他感到内心隐隐作痛……同时，通过

和周恩来、彭德怀等共产党高级将领的接触，他进一步了解、认识了共产党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忧虑，对抗战前途的见解和强烈的自信心使他折服；战役期间，八路军一仗一仗地配合正面友军作战，使他在若干个关键时刻，都能顺利脱险，他们机智、灵活、聪明的战法，令他神往。他认为，也许八路军才真正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这时，参谋长郭寄峤走过来。卫立煌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寄峤，一定要督促各部，越是撤退，越要沉着，越不能乱，不然，敌人放开手脚追击，我们损失更大。”

郭寄峤说：“是！我在琢磨，阎长官命令我们向太原以北既设阵地线后撤，依城野战，保卫太原，结果会怎么样”

卫立煌说：“我也在考虑。以忻口和晋东撤下来的疲惫之师，在太原周围与强敌决战，不会有好结果，部队能否掌握住都难说。”

此时，卫立煌对抗战充满信心，但他对依城野战保卫太原已失去信心。

11月2日晚9时，前线部队按照卫立煌的命令，各派出小分队向当面之敌发动短暂的出击后，主力开始撤离。

被外国舆论誉为“华北抗战高潮的标志”的忻口战役就此结束。

许多年来，忻口战役一直被史学家称作国共合作的典型战例。然而，这样的合作，在此后的对日作战中却很少出现，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国共两党的合作，也从此结束了它的“蜜月”时期……

寿阳。11月2日上午，原定到八路军第129师跟踪采访的上海

《大公报》记者陆诒随川军后续部队到达寿阳。他看到寿阳的局势更加混乱，部队一边往前开，溃兵一边往回撤，据说日军已到达离寿阳20公里的地方，此时，再想沿正太路去第129师已不可能。当晚，陆诒搭上一辆运载伤兵的列车，撤退到榆次。

11月3日天刚亮，数架敌机飞临榆次车站上空，对准车站和受阻的伤兵列车一阵狂轰乱炸，当时的场面惨不忍睹。陆诒在混乱中与部队失去联系，这个远道而来的战地记者还未及写出一篇稿子，被迫夹杂在难民群中连夜步行35公里到达太原以南的太谷。

就在这一天，娘子关战役总指挥黄绍竑发出正太线守军全线向太原方向撤退的命令。其实在日军的追击下，正太线早已混乱不堪，撤退令一下，混乱的状况更是难以用语言复述。这种局面与忻口方面较有秩序的撤退形成反差。

在太谷，陆诒听说同蒲路每晚有两三班不定期的列车，装运伤兵和难民，他打算搭这种车辆继续南逃。终于，夜色之中有一列小火车开进太谷站，难民们蜂拥而上，但是，每一节车厢都有士兵把守，伤兵车不准上，绥靖公署的专车不准上，各机关的包车不准上，上去就要开枪。其实，陆诒注意到，这些车厢都是满载官员眷属和大批行李，既无伤兵，更无难民。陆诒对看守车门的士兵说，他是上海来的记者，请允许他上去。然而，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说，没有上司的命令，哪个都不能上车，不然就开枪，打死活该。

陆诒没有办法，只好趁士兵们不留意时，在黑暗中攀上铁篷车的车顶，于4日下午到达临汾。抗战初期短暂的山西之行像一场梦魇，

令年轻的战地记者陆诒深切地体验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

3、傅作义孤军守太原

他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太原后营坊街北边靠近城墙的地方，有一所私立中学，名叫平民中学，它和私立成成中学、进山中学、省立第一中学，被誉为四所名牌中学。如今战火将至，平民中学于数日前就已停课，学校教职员工皆不知去向。有一些军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紧张的神情显示出大战将临的迹象。

从忻口前线撤出后，傅作义便将他的第7集团军总部设置于平民中学内。

尽管是自己挺身而出领受了守城任务，但傅作义仍然感到这个任务来得突然，他似乎觉出了前所未有的沉重。阎锡山向他交代了太原城中尚有大量的粮食和枪械弹药，答应将王思田代师长的第73师归还第35军建制(第73师原属第35军，抗战前夕，阎锡山为削弱傅作义的实力，决定第35军取消师一级建制)，第211旅孙兰峰部和第218旅董其武部各补充一个半团的兵力；其余供傅作义调遣的部队还有原第61军军长李服膺的旧部第213旅，独立新编第1旅3个团、原正太护路军两个团、3个炮兵团，以及高射炮连等一些七零八碎的部队，共约1万余人。

这么点部队，面对的却是无论从人数还是从装备上讲都强大得多

的日军，战斗结果已不言自明。如果不能坚守较长时间便将太原丢掉，那么，他傅作义以往的几乎是百战百胜的显赫功业，也许就要尽付东流了，把太原视作自己命根子的阎锡山怕是也不会轻饶了他……被阎杀掉的原第 61 军军长李服膺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凭多年的经验，傅作义认定阎锡山是一个狡诈、阴险、自私、冷酷无情、翻脸不认人的小人。

1918 年，傅作义 23 岁那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阎锡山所部第 10 团当见习官，第 3 年即升任该团少校团副，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每天早晨，他总是亲自带部队急行军三四十里，训练场上，他身着士兵服装，每项课目自己先做示范。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该团获得第一名，他因此得到了阎的赏识。在此后的岁月中，他追随阎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被阎视为难得的大将之才。1928 年，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蒋介石施展分化瓦解的惯技，两次以重金收买傅作义。傅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对阎如实报告，还将 5 万元现金如数上交。阎十分高兴，对赵戴文说：“傅宜生真是咱们的关云长，义重如山。”

然而，随着傅作义翅膀逐渐变硬，阎越来越对他不放心。傅作义在张学良的举荐下担任绥远省主席后，他们的关系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 1936 年绥远抗战以来，傅作义声名大振，引起一些晋绥军高级将领的忌恨，更引起阎锡山的猜疑，全面抗战爆发后，阎、傅的矛盾一度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阎锡山安排傅作义守城，除了考虑到他是守城名将，

所部具有守城经验外，还可以保存他的亲信部队——杨爱源第6集团军的实力，同时又心怀叵测，深藏寓意——胜则自己可以居功，败则加之以罪。

在平民中学第7集团军总部，当各部长官得知第35军防守太原时，绝大多数将领都对阎锡山此举感到气愤，责难之声四起。副军长曾延毅说：“阎长官对我们太不公平！我们本应守绥远，可他硬调我们守山西，开战以来，都叫我们担负重要作战任务，可他的第6集团军，平型关打了一下，就给藏起来了，杨爱源、孙楚，这回干脆跑到晋南去了，他们常驻太原，明摆着该由他们守。说穿了，阎长官就是想牺牲我们35军！”

类似这种悲观论调极不利于守城，傅作义将手中的水杯猛地往桌上一放，大声说：“不要再说这些！我既然领受了任务，就要把太原守住。我们不是给哪个人守太原，而是为国家守，为民族守！现在咱们研究守城计划！”

参谋长陈炳谦忙说：“请总司令指示。”

傅作义说：“首先要命令守城部队迅速集结，4日以前必须部署完毕。北城、东城将是敌人攻击的重点，我们35军就部署在敌人重点突击方向上。213旅可部署在南城，估计沿正太路的敌人除进攻东城外，还会进攻南城。西城外有汾河，不是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可配备战斗力较差的新编独1旅。”

傅作义沉思片刻：“关于城防工事与火力配备……我提出一个要旨：城防各种兵器的配备，应能集中所有火力，以达歼灭敌人的目的。

为使接近城垣的敌人完全消灭于我火网内，城外近距离的死角，须以最大努力消除。各城角、各瓮城及城根掘洞，伏藏山炮，对接近城墙的敌人，以零线子母弹构成交叉火网。各城墙突出部，构筑机关枪地下室，用侧射火力辅助山炮火力。监视哨所一律设置在城墙腹部，采用互相监视法。城内房院可形成复廓者，须加筑外壕，形成纵横无数的方形阵地，以备阻绝突入城内之敌。城内较高坚的建筑物配备远射炮，并能向各方随时集中射击。”

为维持城内秩序，傅作义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并任命第 35 军副军长曾延毅为戒严司令。

11 月 4 日下午，阎锡山又在绥署会议厅主持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这是太原失陷前的最后一次高层会议。黄绍竑、卫立煌、孙连仲、傅作义等高级将领到会。重点商讨从晋北、晋东两个方向撤退下来的部队依城野战计划。

会议一开始即陷入僵局。卫立煌不同意这个计划，所以他保持沉默，一言不发。黄绍竑也不同意此计划，但他率先发表意见。他说：“太原固然要守，但怎样守，值得研究。是以野战支持守城还是以守城支持野战我认为应以守城支持野战部队的休整。因为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的部队正在败退，恐怕在他们还未占领阵地时就被敌人压迫到太原城边来，前方后方这许多人马都混杂在太原城边的锅底里，其危险后果不堪设想。我主张晋东方向的部队撤至寿阳以南、榆次以东的山地收容整理，从忻口撤下来的部队除派一部分人守太原北郊的工事外，其余的撤至汾河以西的山地整顿。因此，我觉得，即使守城部队

都作了牺牲，来换取大多数野战部队休息整顿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黄绍竑的意见和阎锡山的本意相差甚远，阎锡山是既要守城又要野战，只要能保住太原就行。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来争去，相持不下。

夜深了，会议仍无结果。有的将领多日休息不好，疲惫已极，居然在会场上打起呼噜来。阎、黄二人就在这种连成一片的呼噜声中继续争论。

4日晚上，上海《大公报》记者孟秋江怀着伤感之情在太原街头踟躕。他是昨天随卫立煌的总部从忻县返回太原的。一缕新的感触，使他不忍心遽辞这座古老的危城，他想在这最后时刻周览太原城的景况。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把小汽车借给他随意使用，但白天不停地遇到敌机前来轰炸，他只得夜晚出来游逛。

孟秋江细心地观察着。由于敌机的轰炸，市区电线网已经紊乱，电力不能送达全市，仅有几处路灯在亮着，黑暗处的行人，只好互相以咳嗽声来探路，避免碰撞。稍不留意，就会被路上散乱的电线绊倒。孟秋江看到，在一条寂静的、狭窄的小巷里，有一群人手握黄豆大的灯光，在大肆搜罗富人们遗弃的财物，他们中有穷困的汉子，有平素以拾垃圾为生的小孩子。那些平时他们无法接近的红墙深院，今夜里可以自由出入了。几天前，政府召告民众迁出城外，人们纷纷外逃，全市骚然。从前线撤回的军队，希望过太原时补充一些冬季用品，但大商店都已关门，所幸小商贩们仍留恋这最后的市场，以剩余的劣等货物，卖上等的价钱——这么好的销路，20多年来不曾见过。孟秋

江注意到，商贩们推销的商品有鞋、袜、毛线编织物和洋蜡，有老糟子(酒酿)滚鸡蛋，还有豆腐煮粉条的小食担——小食担早已被饥饿的人们包围了……

几天之后，孟秋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阎百川先生这夜里离开太原了，离开他经营 20 余年的太原了！……11 月 5 日天明后，在太原城里的人物，可以数得清，除卫立煌、孙连仲、傅宜生、周恩来、彭雪枫五位先生外，还有一个不负军政责任的新闻记者。”

时针已指向 5 日凌晨 1 时，在某些将领的呼噜声中，阎锡山同黄绍竑的争执仍无结果。阎锡山本来就对黄绍竑指挥的娘子关作战极不满意，只不过碍于情面不便发火而已。情况紧急，他不想再争论下去，断然道：“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

然后，阎锡山站起身，对赵戴文、朱绶光、楚溪春等亲信说：“咱们走吧。”

他们悄悄往外走，参谋处长楚溪春指了指那些正在睡觉的将领：“还未宣布散会，他们还不知道呢。”

阎锡山说：“不用管了。”

阎锡山随即离开太原。黄绍竑走出会议厅后，却发现阎锡山指定给他使用的小汽车不见了。他吓出一头冷汗，慌忙带十几个卫士摸到大南门，狼狈出城而去。

事实上阎锡山所幻想的依城野战计划根本无法实施——正太路方面的部队均已失去控制，这些溃兵未退到太原便折向晋南，太原城东的工事里连个兵影都没有；晋北方面的部队除少数进入太原以北的

既设阵地外，大部过汾河撤向晋西。那些仓皇进入阵地的部队久战疲劳，军心涣散，日军仅以少量的穿插部队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破溃已在预料之中。

据说中央军后撤，是由于有蒋介石的命令，晋绥军王靖国等部的后撤，则是他们受到中央军行动的连锁反应。岂不知，摸透了阎锡山心思的王靖国，率部后撤的心情比中央军还要急迫，对他来说，只要能保存了实力，阎锡山就不会亏待他。

原忻口战役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第 61 军军长陈长捷被阎锡山委派为北线副总指挥(总指挥王靖国)，在阳曲湾设立前敌指挥部。陈长捷的心眼远没有王靖国活泛，他很认真、很沉着地指挥第 61 军等部占领了预定阵地，自己则未见慌张地在阳曲湾指挥部坐镇。11 月 4 日下午，第 61 军的两个旅被尾追的日军阻隔于 15 公里外，军部(即前敌指挥部)被日军的前卫部队包围于阳曲湾北端一块小高地的寨子里，十分危急。陈长捷督率警卫部队与日军交战至入夜，才掘开寨墙突围而出。陈长捷率残部退至皇后园去寻找总指挥王靖国，不料王靖国已带补充旅和第 19 军主力撤往汾河以西地区。王靖国临行前竟无耻地对部下说：“向第 14 集团军所在地集结去！”

北线各部随即闻风而散。

这样，原定的依城野战计划成了一纸空文，剩下的便是傅作义孤军守太原。

11 月 5 日上午，傅作义将他的指挥部从平民中学搬入绥署大院内。4 日夜 12 时之前，所有的守城部队都已入城完毕，并到达指定

的位置严阵以待，傅作义对此感到满意。他下令从 5 日凌晨起，开始封城，除大南门因城内物资仍在向外输送，暂可通行外，其余各城门全部封闭，断绝交通。

傅作义刚把指挥所布置完毕，新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前来辞行。在忻口前线，卫立煌住忻县，傅作义住金山铺，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们彼此仰慕对方的功名和品德，每次交谈都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昨日上午，卫立煌刚从忻县赶回太原，即来到傅作义寓所拜访。当谈到城内尚有不少多余的武器弹药时，他们二人研究后决定，除了留下守城所需的军用物资以外，其余的武器都以卫立煌的名义，就近拨给八路军，作为抵抗日军之用。

这天，这两位被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领，再一次从对方那里感受到了人格的力量。

卫立煌说：“阎司令长官和黄副司令长官都走了。现在敌人已占领太原外围的山地，他们是居高临下，太原城完全在人家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况且还有飞机助战，孤城岂能守住。宜生兄虽有守涿州的经验，可那是 10 年前的事了，当时的对手是装备一般的奉军，如今的敌人是现代化坚甲利兵的日军，怎好同日而语”

傅作义说：“卫总司令的分析作义完全赞同，但是，太原已成为华北最重要的城市，轻易放弃，则我辈军人有负国家和民众养育。作义既已答应守城，理应尽力支撑危局。至于后果，现在考虑不了那许多。”

卫立煌也许这时候想到了在忻口壮烈牺牲的第 9 军军长郝梦龄，

他决不忍心看到傅作义会是这样的结局，于是，毫不犹豫地说：“是呵，你现在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过我看太原是无法固守下去的。从全局看问题，还是因时制宜为好，必要时，须要撤就撤。撤出太原的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傅作义极为感动：“作义永远难忘卫总司令的关怀！”

随后，卫立煌掏出笔记本，唰地撕下一页白纸——他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写下“相机撤退”的手令，郑重地递给傅作义。

时候不早了，傅作义还要去城内各处检查部队进入阵地情况，卫立煌告辞。临上汽车前，二人紧紧握别。卫立煌又一次关照说：“宜生兄，请你保重，我暂在汾河西岸指挥，请你多与我联系。”

卫立煌离开太原后，总觉得还不放心，他担心如果太原丢在傅作义手中，会引起蒋介石的恼怒和阎锡山的加害。所以，他想了想，又亲拟一份电报，将太原军事会议的情况、守太原的部署、傅部历次参加抗击日军的战绩，以及部队减员情况，还有阎锡山当初不得不处决原第 61 军军长李服膺的经过，均如实地电呈蒋介石。这份电报，后来确实助了傅作义一臂之力。

正是 11 月 5 日这一天，华中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淞沪战场的局势顿时恶化。而太原守城战即将开始。

11 月 5 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守城部队连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我们要守住太原城，阻止敌人前进，才能掩护大部队和太原市民及物资安全转移。”接着，他用通俗的语言比喻守城之战，他说：“现在城门已封得差不多了，我们城内的官兵，就像活人躺在棺材里，只差钉上

棺材盖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守住太原城，就能把棺材盖子给顶开了，大家也就得救了。否则，棺材盖子就被敌人给咱钉死了。”

傅作义抬高嗓音，继续说：“困兽犹斗，我们抗日军人，为何不能和敌人决一死战呢？希望弟兄们发扬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爱国精神，努力杀敌，完成保卫太原城的光荣任务！”

最后，傅作义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坚决奋斗，尽到守土抗战的神圣职责！”

傅作义的训话给了守城将士很大鼓舞，但他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活人躺在棺材里，只差钉上棺材盖了”——自然也吓跑了不少胆小鬼。20 多年后，参加过太原守城战的绥远省警察局督察长韩伯琴回忆道：“当天晚上，不只士兵和下级军官有越城潜逃的，就连总部里傅的亲随中校副官尹绍伊、第 35 军上校处长李荣骅等，也都乘黄昏封城的空子，相偕出走。”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但中共代表周恩来仍然没有出城。5 日下午，周恩来和彭雪枫安排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撤退完毕，并组织群众将卫立煌和傅作义赠送的武器全部抢运出去后，他和彭雪枫来绥署大院同傅作义告别。

傅作义惊讶地说：“怎么，周先生还没走？刚才接到 218 旅报告，今日敌人已与我军发生前哨战，在城东十几里处，也已发现敌人骑兵侦察部队。敌人很快就要攻城，请周先生赶快出城吧！”

周恩来幽默地说：“傅将军，你还没有发给我通行证呀！”

傅作义即刻叫过机要秘书王克俊：“你马上安排周、彭二位先生

从水西门走，出水西门不远就是汾河桥，那里还好走一些。”

临别，周恩来用他炯亮的目光凝视着傅作义——这位他非常喜爱和尊重的热血将军，语重心长地说：“傅将军守城名将，是可信赖的。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也是不足为训的。要着眼于争取最后的胜利。能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务请深思。”

傅作义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到 11 月 5 日晚上，太原城四面城门都已关闭。晚 8 时许，周恩来等人来到水西门。水西门的守军在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后，只好派人从预留的道路口搬开沙包，放周恩来等人出城。

随行的人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风闻攻城的日军已接近太原城，关闭了城门的太原已是一座死城，如果再晚一些就难出来了。但是，刚刚出城的周恩来看到汾河桥梁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的状况混乱而凄惨，周恩来眉头紧皱，当即又转身回城，找到太原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郝莘田，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离的措施，然后才重新出城。这时已是晚上 10 时许。他步行过桥，乘坐预先停放在汾河对面的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运输汽车，先过汾阳，再转至临汾。

20 天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周恩来的山西之行一共两个半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山西、华北，乃至全国的形势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太原城里，该走的人都走了。傅作义送别周恩来后，到附近的阵

地转了转，回来时已是深夜。他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绥署大院内自省堂前面大楼的地下室内，他坐在桌前，思绪万千。回忆一下这几天来的遭遇，他再一次领略了老长官阎锡山的为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教诲极其重要，令他顿悟；卫立煌对他的关照使他感动。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既已接受了守太原的责任，就只能坚决执行，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中途更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才符合他的性格。

眼下，太原城外那些“依城野战”的部队无影无踪了，晋北和晋东两个方向的强大日军自然会无任何顾虑地全力攻城，太原到底能守多少时间？……他有些不敢往下想，但是，他必须面对现实。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傅作义像突然想起什么，顺手从面前的笔筒里抓过一支毛笔，展开一张信笺，给大哥傅作仁写了一封遗嘱式的信件：

……我奉命在平绥线担任前敌指挥，虽经国军浴血奋战，仍未能阻止日寇的疯狂进攻。目前战火已烧到太原附近，我已奉命担任太原城防司令，肩负保卫太原之责。须知此次对日寇之战是一次外御顽敌和保卫祖国之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人人有责。作义身为军人，更是守土有责，责无旁贷。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

作义自幼在外，很少关心家务。俗话常说，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亲尽孝，我看亦不尽然。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次保卫祖国，亦就附带保卫家乡，或可兼顾忠孝两面，此点差堪告慰！“生，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写罢信，傅作义感到心头轻松了许多。

4、最后的抵抗

在忻口被中国军队打得几乎一蹶不振的日军第 5 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当面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后，重新鼓起精神。他当即命令全部日军紧追不舍，意图抢在第 20 师团前面占领太原，以便挽回一点忻口受挫的面子。

11 月 6 日上午，板垣指挥下的日军先头部队直抵城北工厂区和城东杨家峪一带，与守军发生前哨战，并有一部西渡汾河南进。同日早些时候，日军第 20 师团一部到达太原城南小店镇，因其主力需沿同蒲路向南压迫卫立煌的中央军，受命攻城的一个旅团只能起到配合第 5 师团的作用，已难以达到首先进入太原的目的。

6 日整整一天，日军在城北和城东地带对当面的第 218、211 旅发动了数次猛烈的攻击，遗尸数百具，但进展缓慢。傍晚时分，守军为减少伤亡，主动撤离前沿阵地，向城内撤退。日军在战车和大炮的掩护下尾追而至，在大北门与小北门之间猛扑城垣，受到守军城墙上的机枪和城根炮兵火力的大量杀伤，遂停止攻击。

晚上，板垣接到日军华北方面军的通报：

据谍报称：支那军决定以依城野战方针坚守太原，待援反攻。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官，傅作义为守城司令官。又，在上海方面，第

10 军已于 5 日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指日可下。我军必须在上海之前占领太原。

同时，日军第 1 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致电板垣，规定 7 日一整天为攻击前的准备时间，8 日对太原发动总攻。

板垣和他的参谋长西村利温研究后决定，总攻时间为 8 日上午 8 时。

7 日这天，日军仍然像前一天那样，重点从北城和东城发动攻击，飞机在空中助战，板垣调集所有的炮兵主要轰击城墙，为步兵开辟道路。

大约在下午 3 时左右，东北角的城墙被日军密如风暴的炮弹轰开一个缺口，砖土向下倾坍，形成了斜坡，日军步兵在战车的掩护下蜂拥而至，很快冲了上来。防守在这个地段上的第 211 旅第 419 团在团长袁庆荣的率领下，拼死堵截，日军死伤累累，但仍继续冒死由豁口处向城内突进。团长袁庆荣负伤，一个营长阵亡。

这个时刻，有一个叫刘一平的见习军官清晰地看到了城墙东北角豁口处的战斗场面。

刘一平是第 35 军学生队的学生。战前，他和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到总部见习，太原守卫战期间，他担任军官观察哨和值勤等工作。

刘一平清楚地记得，11 月 4 日早晨 8 时，傅作义总司令来到学生队训话。傅从排头走到排尾，先帮助个别衣冠不整的同学整整衣帽，然后站在队前亮开他洪亮的嗓门训话：“同学们！由于我军务繁忙，顾不得看望大家。你们辛苦我知道，你们都是爱国的有志青年，是跟着

我来抗日的。现在我们守城，就要不怕牺牲，坚决守住太原，狠狠阻歼日寇。我们一定要打出一个样子，给全国人民看一看。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希望你们勇敢参加战斗！”

傅作义训完话后，令随从发给每人 5 元钱，一件衬衣。不少同学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7 日午后，刘一平来到绥署大院里面的梅山观察所。透过观察哨所的瞭望孔，能够看到第 35 军两个旅防守的大部分地区。数十年后，刘一平回忆说：

从战斗情况看，以东北城角为最激烈，日军的飞机、大炮仍在集中火力对东北城角轰炸，日军步兵已占据靠城墙的建筑物接近城墙，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炮兵及坦克上的火炮接近最近距离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来压制我城墙上下立体火力点。在烟尘弥漫中，隐约看到，东北角城墙已被日军炮兵集中火力轰开一段高低不平的大缺口，使城墙缺口处形成了波状。由于城墙的阻遮还看不到有日军坦克的活动，但能听到缺口两侧密集的机枪连续射击声，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还看到城墙上的守军紧张活动，像是向城墙外和缺口处投手榴弹，或者是对突击的日军进行射击或格斗。接着比较清楚一些地看到我守城部队，由三个方向向缺口处一批又一批涌进的日军冲杀肉搏，终于把突击之敌制止在城墙外面。这种英勇壮烈的场面，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我在黄昏前回去向队长报告时，该处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向东北角城墙豁口处冲锋的日军虽一次次被打退，但他们并不甘心，仍在组织力量更加凶猛地冲击，一度占据城上阵地。而且在刚才

的混战中，已有部分日军进入城内，并有数十名鬼子在太原军校的操场上空降成功。

局势顿时变得恶化。如果不能彻底堵住城墙豁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突进城内的日军如不加以消灭，弄不好要祸及全城。旋即，小东门附近发现日军。在小东门内掩蔽部指挥战斗的第 211 旅第 422 团团长王雷震向旅长孙兰峰报告了这一情况。孙兰峰立即命令王雷震指挥第 421 团 1 营、第 422 团 3 营、第 419 团残部，收复城墙豁口，并进击突入城内之敌。

正要行动时，第 73 师代师长王思田前来传达傅作义的命令：“收复东北城角城上阵地，赏洋 5 万元！”王思田随即将 5 万元赏洋交给孙兰峰。

孙兰峰重新指示王雷震：“第 421、422、419 各选一个奋勇连，每连先给赏洋 1000 元，着即出动，如逆袭成功，收复东北城角后，再将赏洋 5 万元如数发给。”

各团奋勇队在小东门附近集结，王雷震把领到的 3000 元赏洋分给各奋勇连官兵。官兵们将叮当作响的银洋揣进怀里，即开始发动攻击。

第 422 团 3 营营长安春山指挥该营 7 连率先冲上城墙豁口，排长曹学成带领全排与敌肉搏，毙伤日军数十名，拔掉了插在城墙角上的日本太阳旗，收复了城上阵地。但排长曹学成头部中弹牺牲。曹学成是典型的山西人——极喜欢吃醋，平时腰间就挂一个锡制的醋瓶，经常当众拧开瓶塞美滋滋地抿一口。在平绥路作战时，他负伤与部队失

散，一位好心的大娘救起了他，并给他包了一碗莜麦面的水饺。他激动得难以下咽。老大娘说：“孩子，别客气，快趁热吃。”他仍是不吃，吭吭唧唧想说什么。老大娘再三劝，他才忍不住问：“大娘，有醋吗？”

与此同时，其他奋勇队员们消灭了进入城内的大部分日军。局势暂趋稳定。

后来王雷震却抱怨说，傅作义所悬赏的5万元大洋他并未从旅部领到。

7日夜间，日军虽停止了攻城，但城内并不平静，到处有人放冷枪，估计是汉奸、日本特务和突进城内未被消灭的漏网日军所为。

8日黎明，傅作义召戒严司令、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到绥署大院地下室总指挥部谈话，要求他督率戒严部队维持城内治安，以免动摇军心。傅、曾二人是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学，平素关系密切，属患难之交。1928年傅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委任曾为市公安局局长。尽管傅多次告诫部属不得贪污腐化，但是，既贪财又好色的曾延毅当上公安局长不久，便成为百万富翁。傅作义有所感觉，他常对左右说：“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贪生怕死。”傅到绥远担任第35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时，调升第218旅旅长曾延毅为第35军副军长，所遗一职由董其武接任。傅作义表面上擢升曾延毅，实际上是很体面地收回了曾的带兵权，不让他具体指挥作战。

曾延毅神色慌张地从总指挥部出来，没有回设在绥署大院东院的戒严司令部，径直向大门走去，同时命亲信卫士去叫戒严司令部参谋长郝莘田快来——曾延毅决定和郝莘田一起逃走。两天前，曾延毅曾

对第 422 团团长王雷震说：“总司令不许人说太原城不能守，要说太原城不能守者，就杀头。我当时对总司令说，太原城是不能守，你守，我不守。”曾延毅早就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8 日 8 时整，日军发动总攻击。昨日好不容易恢复的东北城墙豁口很快又被强敌突破，日军源源不断进入城内。巷战就此开始。

太原城混乱了，满街都是散兵游勇，不少商店的门窗被打开，酒瓶、罐头筒子遍地都是。

曾延毅和郝莘田带三四十名戒严司令部的人员，骑马火速赶到大南门。日军没从此处攻城，这里相对平静。但城门已被沙袋牢牢堵塞，有人大声喝令城上守军：“快快搬开沙袋，副军长有紧急公务要出城！”

守卫大南门的第 213 旅第 425 团团长李在溪马上给旅长杨维垣打电话报告。杨维垣说：“没有傅总司令的命令，任何人均不准出城！”同时向傅作义请示。傅作义在电话里说：“不能开城门放他们出去。请你劝告曾副军长，让他即速返回总司令部共商大计！”

曾延毅遭到拒绝后，遂改向水西门，令部下强行搬开沙袋出城。在他之后，总部总稽查处处长马秉仁乘装甲汽车到达大南门，企图出城，遭拒后索性弃车，从城墙中间的炮筒口钻出去逃之夭夭。

据说曾延毅后来经晋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香港，到达天津，过起了安逸的生活。

曾延毅的逃走是一个契机。“副”、“傅”同音，“副军长逃走了！”——三传两传，便成了“傅军长逃走了！”。这个传闻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于是军心大哗。除北城、东城与敌胶着的部队仍在支撑外，其

他城段的守军，官不管兵，兵不顾官，纷纷丢下武器越城逃走。有些防守地段已无军队的踪影。

上午 10 时许，有人对着绥署大院的大门放了一阵枪，院内顿时哗然。总部副官长黄士桐仓皇跑进地下室，大喊大叫向傅作义报告：“敌人在总部门外打枪，快打进总部来了！”

已经急红了眼睛的傅作义抬头看见黄士桐的神色，勃然大怒，厉声斥骂：“谁说的！简直是汉奸造谣。你惑乱军心，我砍你的脑袋！”

黄士桐呆若木鸡。参谋长陈炳谦暗中推他一把，悄声道：“还不赶快出去。”

黄士桐退出地下室，瘫靠在墙上，惊慌未定。许久才回过神来，羞愤地自言自语：“人家几千里跑来帮你抗战来了，骂人家是汉奸，要砍人家的头，咱是不能干了……”黄士桐是江苏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已跟随傅作义很多年。

当敌特在绥署大门口放枪，院内发生骚乱时，原绥远省政府秘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侄子林亚萍和第 35 军特务连的 30 多名官兵跑到西便门，意图挪开沙袋外逃。原绥远省警察局督察长韩伯琴发现后赶来劝阻。林亚萍红着脸，带头喊道：“走！咱们回去保卫总司令部去！”

这天晚上，在撤退时，林亚萍于混乱中被冷枪误杀。

8 日下午，日军第 5 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命令师团预备队加入战斗，第 211、218 旅伤亡重大，已无力阻截入城的日军，日军攻击部队逐渐延伸至精营、坝陵桥、粮食局及绥署后门外的东缉虎营。总指挥部与各部队失去正常联系。

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傅作义仍在苦撑危局。没人能说清他已几天未睡觉，他的眼里布满血丝，往日红润的脸膛罩上一层铅灰色。他嘶哑着嗓子，不停地说：“打！”连半个“走”字都不露。

包括秘书长曾厚载在内，总部的很多人都已悄悄逃走，傅作义的身边只剩下参谋长陈炳谦、总参议袁庆曾、中将高参叶启杰、张濯清、侍从参谋刘春方、副官张景涛、卫士郝德振等少数人员。

气氛极其压抑、紧张。每一分钟都显得如此漫长。挨到下午5点多钟，幕僚们暗中怂恿参谋长陈炳谦和总参议袁庆曾，劝傅作义赶快撤走，不然就来不及了。陈、袁二人婉转地对傅作义说：“对敌人一定要打，对窜入的日军一定要消灭，但需要筹划一种有利的打法。现在局势已恶化到对我军极端不利，我们最好先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转进到西山里，反转来再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当前万全之策。”

傅作义脸上出现痛苦、复杂的表情，许久不语。这种压抑而紧张的气氛几乎使在场的每一个人行将崩溃。不知过了多久，傅作义翕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反复想过了，抗战是长期的，今晚就撤走……”

所有的人都舒了一口长气，抬头看——傅作义已是泪眼蒙蒙。

5、彭德怀说：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

夜幕笼罩了太原。因发电厂已被炮火摧毁，入夜之后，全城一片黑暗，几乎见不到一点亮光。

这天夜里，守军是在极度混乱中撤出城外的。

傅作义在卫士的簇拥下摸黑朝大南门走，他身后是第35军特务

连、宪兵第 10 队、保安第 3 队，拉成了一个长长的队列。他们到了大南门才发现，门洞里外、城墙上下，到处都是争着出城的溃散官兵，黑压压的人你挤我拥，喧嚷之声，震耳欲聋，有人哭喊叫骂，有人开枪瞎打，秩序异常混乱，简直成了一锅粥。堆在城门口的大量沙袋根本无法挪移，日军不时地往这边打几炮，更增加了人们的惊恐情绪。遍地是遗弃的沙袋、踏烂的自行车、挤死的马匹、骆驼，踩死的百姓和军人……

城门打不开，人们只好四散开来，自寻出城之路，有人从大炮和机枪掩体的射击孔往外钻，有人从三丈多高的城墙上抓住绳子往下滑，甚至有人干脆往下跳，摔死摔伤的难以计数。

傅作义是从城墙上的射击孔里钻出去的，卫士架着他，打算通过汾河桥西去，但还没有到达桥边，前面便传来阵阵机枪射击声，走在前头的人慌忙往回跑，傅作义在黑暗中与随行的陈炳谦、袁庆曾等人失散，身边只剩下特务排长薛文等几个人。他们搀扶着他随人群向南走了一段，然后在汾河的宽阔、浅显处渡河。上岸后，又遇到日军的装甲巡逻车，他们赶忙躲进公路边的草丛中。日军经过后，他们不敢再走大路，沿着乡间小路急行。薛文发现傅作义行走困难，低头一看，才发现他赤着双脚——刚才涉水过河时，傅作义的布鞋陷进了淤泥。

幸亏一个卫士身上背着一双新布鞋，那卫士拿过鞋子让傅作义穿，无奈脚大鞋小，穿不进去。薛文用小刀将鞋口划开一些，傅作义才勉强穿上。他们继续赶路。

这天夜里，在大南门下，第 35 军见习军官刘一平亲眼看到他身

边有四五个人被踩死。许多年后，那些遇难者的惨叫声仍在他耳边回响，令他毛骨悚然。他还算幸运，居然挤进城门洞得以钻入瓮城。堵塞的城门一直打不开，钻进瓮城内的人进出不得，既怕日军追来向这打枪打炮，又想到瓮中捉鳖，因此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人大骂：“傅军长早上就出城逃跑了，为什么给他开门，到现在还不给我们开门”刘一平说：“总司令天黑时还在指挥部，大家别急，赶快开门要紧。”有的大喊：“不能再挤了，再挤不能搬沙袋，怎么开城门”有人掏枪乱打，大家骂他是汉奸，开枪给日军报信，要抓住他，枪声才停止。

过了好久，城门终于打开一扇，人们如潮水般地往外拥，有人边跑边大声喊：“冲啊！”其实并没有日军。从城门往外涌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被挤死、踩死。刘一平随众人跑向汾河桥，哪知大桥已被日军占领，一阵机枪打来，前面的人纷纷中弹倒下。侥幸活下来的，赶紧调头散开，涉水渡河。渡河过程中，刘一平看到很多人被淹死，其状惨不忍睹……

也是这天夜里，率部在小东门以北、国民师范以东地区与敌巷战的第 218 旅旅长董其武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通信联络下午即已中断，黑夜来临之后，他派参谋王步云去总指挥部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多时不见回来。再派人去，回来说，总指挥部已经没有人，估计可能撤走了。

旅部的人催促董其武赶快下令撤退。董其武说：“没有接到傅总的正式命令，不能撤。”周围的人急不可耐，但董其武态度很坚决：

“没有撤退命令，就不走!”这时，陆续有人送来消息：“总部确乎没人了!”“其他部队已涉过汾河向西撤走，只剩 218 旅了!”“快走吧，不然咱们都没命了!”……

董其武当时的心情很沉重：没有接到正式命令撤退，等于临阵脱逃。同时他感到这一仗打得太窝囊，不把窜进城内的日军消灭，他不甘心。然而，接二连三有人来报告，总部和各部队的确已撤离。董其武只得咬咬牙：“撤!”

夜 10 时许，他们来到大南门，那里仍然乱成一团。他们另寻出路，转身登上城墙。有人发现脚下有一条较粗的黑被覆电线，一端拴在城墙垛口上，一端垂到城下，看来已经有人从此处顺电线下滑出城。

董其武就是按这个办法出的城。

1937 年 11 月 8 日夜晚，华北重镇太原沦陷。11 月 11 日，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沦陷。12 月 13 日，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自 9 月中旬日军攻陷大同和攻击平型关开始，至 11 月 8 日太原沦陷为止，坚持了近两个月的中日太原会战宣告结束。太原会战是中国抗战初期抵抗最坚决、最持久、战绩显著的四大会战之一，它打破了日军企图进行华北平原会战的计划，又为我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署新的作战，争取了时间。在这次悲壮的会战中，八路军于平型关一战扬威名；而惨烈的忻口战役，消耗日军兵力 2 万余人，创下了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的纪录；会战之后，八路军初步在华北站稳了脚跟，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又是国共合作的典型战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高潮的标志，因此，它的意义

自当更为深远。1937年秋天的三晋大地，是血和火的海洋……

1937年11月11日，在山西古交镇，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面对刚刚集结起来的1000余名从太原突围的官兵，用悲凉的语调说：“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不怕死的跟着我傅作义来继续抗战！”

1937年11月15日，在山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会见了几个远道而来的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详细回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他告诉他们：“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在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作家。几天之后，周立波用他的笔，将“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此时，在延安，中共领袖毛泽东十分自信地宣布：“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尾章 叶落无声

8年很快就过去了。

1945年8月底，阎锡山急匆匆回到阔别达8年之久的太原。在太原城里日伪机关大小汉奸们举行的“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的大会上，阎锡山发表讲话说：“行者”（即随他流亡到晋西的人员）与“居者”（留在太原降日的伪职员）原系“一家人”，同样有功。他还说：“‘行者’曾经8年跋山越岭的辛苦，‘居者’亦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万不要自划鸿沟，互相隔离。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产党，要精诚合作，紧密团结，高举枪杆，共同对付共产党。”

然而，这时候阎锡山不会想到，仅仅3年多之后，太原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不仅止一个太原，整个中国大陆似乎都在转瞬之间插上了红色的旗帜。

在太原会战中的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傅作义、黄绍竑、陈长捷、邓锡侯、李默庵、王靖国、孙楚、郭宗汾、李仙洲、董其武、孙兰峰……他们后来不是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客，便是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历史给了他们要比常人丰富许多的人生空间。

1974年4月15日，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北京医院，探望处于弥留之际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周恩来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功。”此时已经不能说话的傅作义嘴唇颤抖着，眼

里闪着泪花。4天后，傅作义与世长辞。

1968年4月7日，是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陈长捷含冤去世的日子。他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争罪犯，原以为能够安度晚年，最终却没能逃脱“文革”风暴。

10年前，正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陈长捷与同伴一起，来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参观。面对雄伟壮观的桥梁工程，陈长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活到60岁了，历四朝，走遍了全国，也只看到郑州铁桥，还有号称远东第一的钱塘江大桥。如果和武汉长江大桥相比，有如小巫见大巫。以往建成的几座桥都离不开洋人、洋技术、洋材料，总之是离不开洋字。武汉长江大桥靠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给了帝国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说到这里，陈长捷已是热泪滚滚。

1955年，在香港寓居了6个年头的卫立煌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上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一下子猜出，是周恩来。他的思绪拉回到山西抗战的日日夜夜，往事历历在目。卫立煌当即决定返回大陆。他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

两年后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毛泽东主席在座。席间，伏罗希洛夫见到了卫立煌，周恩来作了介绍。

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话题稍稍一转：“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这时，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以他超群的远见，响亮地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从那以后，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便成为海峡两岸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共同愿望。